

2024

贸易和发展报告

在不满的时代
重新思考发展



联合国



2024年贸易和
发展报告

2024

贸易和发展报告

在不满的时代
重新思考发展



联合国

2024年，日内瓦

© 2024,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若需摘录或影印，请发送请求至版权许可中心，网址为copyright.com。

关于版权和许可证(包括附属权利)的所有其他问题，请咨询：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405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un.org
网站: <https://shop.un.org>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图表内的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文提及任何公司或特许工艺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其表示认可。

本出版物经外部编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印发的联合国出版物

UNCTAD/TDR/2024

ISSN: 0251-8015

eISSN: 2412-1452

eISBN: 978-92-1-106720-0

致谢

《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处编写。该处由Anastasia Nesvetailova领导,成员有Rami A. Alazzez、Diana Barrowclough、Jeronim Capaldo、Lyubov Chumakova、Cambiz Daneshvar、Pierre Kohler、Nicolas Maystre、王大为。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债务和发展融资问题处)、国际贸易及初级商品司(初级商品处)、技术和物流司(贸易物流处)、投资和企业司以及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的同事为本报告提供了投入和反馈。贸发会议统计处和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的技术团队也为本报告提供了投入。

贸发会议其他同事及贸发会议秘书长办公室为本报告提供了补充意见、实质性贡献和统计支持。

贸发会议衷心感谢外部贡献者和评论者提供研究资料和宝贵意见,包括Stefan Avdjiev、Nelson Barbosa、Hafiz Choudhury、Giselle Datz、Lorraine Eden、Sophie van Huellen、Deniz Igan、Photis Lysandrou、Joerg Dieter Mayer、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Herman Mark Schwartz、Jan Toporowski。

报告原稿由Gretchen Luchsinger编辑。在贸发会议的整体制作工作由政府间外联和支助处Maritza Ascencios监督。在Amalia Navarro领导的贸发会议宣传和对外关系团队的协调下,David Bustamante、Nadege Hadjemian、Gilles Maury和Magali Studer完成了设计和制图工作。Ivonne Paredes-Ayma和Karen Mulweye提供了行政支持。



目录

前言.....	xi
缩略语.....	xii
解释性说明.....	xiii

第一章	
对不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1
主要政策启示.....	3
A. 导言.....	4
B. 全球增长进入低迷期.....	6
C. 对消费者不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13
D. 推迟货币宽松和美元走强.....	15
E. 财政刺激措施逐步淡出，公共债务水平上升.....	19
F. 收入不平等加剧.....	25
G. 区域经济趋势.....	31
美洲.....	31
欧盟.....	32
英国.....	34
俄罗斯联邦.....	34
东亚.....	34
南亚.....	36
东南亚.....	37
西亚.....	38
非洲.....	39
大洋洲.....	40
参考文献.....	41

第二章	
反弹的假象：2024年国际市场.....	43
主要政策启示.....	45
A. 导言.....	46
B. 国际贸易：2024年的复苏并非隧道尽头.....	47
1.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限制反弹势头.....	47
地缘政治动荡时期的货物贸易.....	48
服务贸易仍然更具活力.....	51
展望未来，全球贸易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小.....	53
2. 寻求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服务主导型出口的局限性.....	53
过去的研究指出了问题所在，但在确定所需行动方面存在不足.....	55
需求侧措施和现代产业政策需要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	57
非贸易部门需要采取雄心勃勃的政策组合.....	62

C.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但仍处于高位	64
1. 石油和天然气：高利润率限制了能源转型	65
2. 矿物和金属：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价格波动持续	67
3. 粮食和化肥：价格上涨仍给贫困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68
D.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复苏依然脆弱且不确定	70
1. 直接投资：地缘经济碎片化正在重塑格局	73
2. 证券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环境依然严峻	74
3. 其他投资(包括同业银行拆借)在各发展中区域出现分化	78
4. 迈向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79
参考文献	81

第三章	
全球化走到拐点	83
主要政策启示	85
A. 导言	86
B. 发展已走到重要关口	88
特别关注：	
增长浪潮决定了以出口促进发展的潜力	93
C. 三个关键拐点	100
1. 新能源和新交通模式	101
2. 新通用技术与消费品和投资品	108
3. 企业和社会组织	113
D. 了解贸易体系碎片化的推动因素和影响	116
E. 总结和 policy 启示	122
参考文献	125

第四章	
崛起、回落与重新定位：全球南方的经验教训	129
主要政策启示	131
A. 导言	132
B.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与“崛起”的概念	133
1. 概念背后的推动力量	133
2. 脱钩迷思	136
3. 回落：2003-2013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的不同影响	138
亚洲	138
拉丁美洲	141
非洲	144
4. 总结	147
C. 重新定位：发展的新路径	149
1. 金融化的挑战：新老问题并存	152
2. 金融：资源诅咒的新维度	157
3. 政策重点	160
参考文献	162



第五章	
全球南方与国际税收新架构：对发展资金的寻求.....	167
主要政策启示	169
A. 导言	170
B. 寻求长期发展资金来源	171
C. 全球南方与建立国际税收架构的呼声	179
D. 发展中国家力推联合国主导的税收公约	181
1. 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	183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益处	183
3. 制定税务框架公约的关键挑战	185
4. 总结：有两条前进道路	187
E. 结论	188
参考文献	189



图目录

图一.1	通胀压力缓解，全球产出增长乏力.....	6
图一.2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陷入停滞， 增速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8
图一.3	增长停滞和放缓困扰着世界主要经济体.....	9
图一.4	中国的公共债务和企业债务自2022年初重回上升轨道.....	10
图一.5	大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分化.....	11
图一.6	金砖国家(除中国)的增长和通胀轨迹正在分化.....	12
图一.7	消费者价格上涨削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购买力.....	13
图一.8	许多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14
图一.9	全球的货币政策利率保持高位.....	16
图一.10	除日元外，主要储备货币在2024年逐步升值.....	17
图一.11	2024年，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大幅贬值.....	18
图一.12	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财政结余动态呈现差异.....	19
图一.13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实际工资的轨迹却呈现差异.....	26
图一.14	金砖国家的趋势与发达经济体类似.....	27
图一.15	在部分发达国家，低收入者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中首当其冲.....	29
图一.16	疫情过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朝着更公平的方向演变.....	30
图二.1	世界商品贸易再次增长，但各区域之间出现分化.....	49
图二.2	服务贸易继续表现出比商品贸易更强的活力.....	50
图二.3	集装箱运价2023年恢复正常后，2024年再次飙升.....	51
图二.4	商业服务增长保持稳健，而旅行部门仍在恢复中.....	52
图二.5	过去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大多出现下滑.....	54
图二.6	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增长正日渐式微，而服务业主导的出口增长正蓬勃发展.....	56
图二.7	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并从中受益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于无形资产.....	59
图二.8	承担大部分服务贸易的大型跨国企业总部主要位于发达地区和中国.....	61
图二.9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仍比疫情前水平高出20%以上.....	64



图二.10	全球化石燃料历来盈利且利润率持续上升，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66
图二.11	能源转型关键矿物和黄金价格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瓶颈高度敏感	67
图二.12	除大米外，粮食和化肥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69
图二.13	经过九个季度的负值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在2024年初出现反弹	71
图二.14	借款成本仍然高企，而发展中区域新的主权债券发行量正在反弹	74
图二.15	月度投资组合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后增长势头消失	75
图二.16	2024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贷出现反弹	78
图三.1	第五次增长浪潮导致出口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趋于平稳	92
图三.2	除了一些例外，大多数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并没有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98
图三.3	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石油消费之间的关联逐渐减弱	103
图三.4	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燃料出口比重较高的出口依赖型国家 可能面临重大冲击	104
图三.5	对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需求激增，到2050年可能大幅增长	105
图三.6	巴西：由于对外国公司投入的长期依赖而损失了大豆商品链的大部分价值	109
图三.7	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帮助推动了生产的分拆， 但目前的油价仍远高于1990年代的水平	110
图三.8	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上升可能导致物流成本飙升	111
图三.9	外债偿债成本相对于出口收入的比率上升可能引发一连串危机	112
图三.10	全球供需失衡将给贸易和国内政治带来压力	115
图三.11	发达经济体的工人仍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享有稳定工作的保障， 但可能大多不再出现在制造业	116
图三.12	制造业萎缩？巴西转向大宗商品出口	118
图三.13	结构转型的缺失刺激了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削弱	119
图三.14	2007年至2023年间全球南方的出口额几乎翻了一番	120
图四.1	全球南方的崛起带来了更多财富，但主要集中在亚洲	133
图四.2	全球南方吸引了超过65%的外国直接投资	134
图四.3	危机期间，经济增长全面下滑，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产生了持久影响	137
图四.4	即使在危机时期，该地区两大经济强国的出口依然保持增长且势头强劲	139
图四.5	在疫情期间，扩大区域内贸易增强了韧性	139
图四.6	亚洲国家参与了更多区域贸易协定，减轻了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140



图四.7	亚洲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拉动了拉丁美洲的出口，但拉动效应 随时间和商品类别而有所不同.....	141
图四.8	在拉丁美洲，降低对大宗商品依赖的多样化进展有限.....	142
图四.9	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	143
图四.10	依赖大宗商品的非洲主要经济体明显呈下行趋势.....	145
图四.11	多样化帮助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提高了生产能力，尽管两国起点很低.....	146
图四.12	出口收入用于偿债比例最高的25个国家	148
图四.13	投资向服务业倾斜可能会加剧结构性障碍	150
图四.14	大宗商品周期等同于金融周期吗？有证据表明二者存在密切联系， 在新兴市场尤其如此	154
图四.15	经济多样化程度影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158
图四.16	经济复杂性指数有所提高的国家往往经济更加多样化.....	161
图五.1	在全球金融安全网获取危机融资的机会不平等	173
图五.2	主要经济治理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仅小幅变化.....	175



表目录

表一.1	1991-2025年世界产出增长	7
表一.2	COVID-19冲击后公共债务水平飙升	20
表二.1	2023年全球商业服务和商品出口前30位排名	60
表二.2	在吸纳劳动力的服务部门中扩大生产性就业的四种策略	63
表二.3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量	72
表三.1	六次熊彼特式技术革命和增长浪潮	94
表三.2	部分国家极易受能源出口下滑影响	102
表三.3	锂资源的地理分布很分散	106
表五.1	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	174
表五.2	初步估算显示部分经济体的非法资金流动规模可达官方贸易额的50%	178

插文目录

插文一.1	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术	22
	图：实际利率主导债务动态	23
插文一.2	弥合资本缺口：政府与央行	24
插文二.1	服务贸易日益增长的能源使用量和碳足迹	58
插文二.2	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券尚未摆脱困境	76
	图：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券收益率尚未回落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77
插文二.3	应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脆弱性	80
插文三.1	汽车产地位置的转变反映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变化	89
插文三.2	恩格尔定律说明了依赖原材料出口存在风险	90
插文三.3	汽车、轮船与飞机——国际政策机制正在引导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	107
插文四.1	加纳：可可定价机制的特殊案例	155
插文五.1	危机时期的区域和双边措施	172
插文五.2	经合组织及双支柱进程	180



前言



如果只看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世界经济实现了专家所说的“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没有陷入衰退。这是重要成就。但是《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在不满的时代重新思考发展》表明，现实情况更为微妙。虽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前景看好，但全球南方的总体情况是增长乏力，日益面临全球冲击，并且存在贸易碎片化的风险。

据本报告预测，2024年和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7%，连续三年低于疫情前3%的增长趋势。区域层面，南亚的增长最具活力。全球三大经济力量—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增长正在减速或减弱。虽然技术革命如火如荼，但是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面临资金和资源外流、投资萎靡和强制紧缩等多重困境，要实现亟需的经济活动加速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在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维持7%的年增长率这一目标。

从许多方面看，目前全世界的情况是，超过15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增长的“新常态”正在进一步恶化。但地缘政治和经济思维方面的重要转变—包括产业政策回归、贸易的多极格局和新技术创新—表明，全球化本身正步入拐点。由此是否将带来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范式尚未可知。

本报告试图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第1章和第2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初级商品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主要经济趋势。第3章和第4章探讨了当前全球化的转向，其特点是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南南贸易兴起。第5章围绕更加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和能够为发展中国家适应这个新时代并繁荣发展提供所需政策空间的全球金融架构提出了具体构想。

《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呼吁采取行动，报告显示，尽管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但发展中国家显然有机会实现持续的人均增长，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和关键矿产、南南贸易以及战略性地利用新一代产业政策方面。报告呼吁决策者、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参与重要对话以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减少当前现状的脆弱性和波动性。最重要的是，报告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并非只能坐等未来发生，未来由我们共同铸造。全球化正在转变，我们必须谨慎并且有计划地将之引向可持续发展。

贸发会议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



缩略语

Ad Hoc Committee	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	
ADB	亚洲开发银行	
BEPS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IS	国际清算银行	
BRICS	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ECB	欧洲中央银行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IRE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GDP	国内生产总值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EA	国际能源署	
ILO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ITC	国际贸易中心	
IMF	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ECD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EC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PPP	购买力平价	
United Nations		
Tax Committee	联合国税务委员会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UNWTO	世旅组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WHO	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TO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解释性说明

国家的分类

本报告中对国家的分类仅仅是为了便于统计或分析，并不意味着对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作出任何判断。

在联合国系统中，对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认定没有既定惯例。本报告沿用了《贸发会议2023年统计手册》对这两大国家组别的分类(见<https://hbs.unctad.org/classifications/>，2024年10月10日访问)，分类基于被称作“M49”的“用于统计目的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编码”，由联合国统计司负责维护(见<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2024年10月10日访问)。

为了便于统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报告中的区域组别基本沿用《贸发会议2023年统计手册》中的用法。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省的数据。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正文和表格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时均包括南非。

其他说明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美元” (\$) 系指美国美元。

“十亿”代表1,000,000,000。

“万亿”代表1,000,000,000,000。

“吨”系指公吨。

年增长率和变动率系指复合比率。

在两个年份之间使用连字符(-)，例如，2019-2021年，系指所涉整个时期，包括首尾年度。

两个年份之间使用斜线(/)，例如2019/20年度，系指财政年度或作物年度。表中的圆点(.)表示该项不适用。

表中的两点(..)表示没有数据，或没有单独报告。

表中的连字符(-)或零(0)表示数额为零或可忽略不计。

由于采用了四舍五入，因此各项小数和百分数加起来并不一定等于总数。



2024 贸易 和发展报告

第一章

对不满的宏观 经济学分析

全球产出增长呈现停滞迹象，增长率持续低于疫情前水平，而疫情前的那几年全球经济就已经增长乏力。按照当前的增长轨迹，不仅难以应对全球发展与气候挑战，也无法实现相关目标。

从债务形势来看，当前的全球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因为低增长和高利率的组合正在加剧债务负担。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比率高企，这已成为疫情后新常态的一个标志，增加了重新将财政紧缩作为政策指导方针的风险。

疫情后的通胀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供给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瓶颈和关键部门集中度过高所致。过度依赖长期的货币紧缩作为降低通胀的唯一政策工具，不仅效果有限，还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在 COVID-19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消费者价格上涨和信贷成本上升持续侵蚀家庭可支配收入，招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受到抑制，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导致对全球化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



联合国



主要政策启示

- ▶ 疫情导致公共债务增加，应对当前发展与气候挑战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这清楚地表明，重新平衡国家预算需要提高财政收入。今后需要在全球征税方面采取协调行动，特别是对高净值个人和大公司进行全球征税，摒弃在超全球化时代主导经济政策的“涓滴”逻辑。
- ▶ 为各国(特别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负担、可靠且更长期的融资渠道，是确保对发展目标进行充分公共投资的关键。因此，国际领域的优先政策行动包括：向多边和区域银行注资以增加优惠融资，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并重新分配现有特别提款权，以及采用创新金融工具等措施。
- ▶ 针对加剧通胀压力的不同因素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将更为有效，所造成的“附带损害”也会更少。这种政策组合应包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遏制反竞争做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关键市场中的企业集中现象，以及修订商品交易活动的现有监管框架。
- ▶ 货币当局应慎重考虑其决策的更广泛影响。例如，需要考虑货币决策对债务轨迹和偿债成本、筹措急需的投资资金以及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需要将政策制定标准和操作上的调整纳入货币机构的任务范畴。



A. 导言



2024年对全球经济是一个重大考验。一方面，所有区域都实现了正增长，印度、卢旺达和越南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加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都在下降，尽管速度缓慢且不一。最初担忧的情况没有发生，2024年8月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未演变为更广泛的金融传染，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然而，稳定状态引发了日益扩大的不满情绪。COVID-19冲击发生近四年，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15年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其特点是通胀逐步下降，实际利率为正，增长乏力。这种新常态对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稳定在较低水平，无法满足全球南方应对其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挑战的需求。

经济政策方面的趋势加剧了担忧。对于债务状况而言，当前的国际形势尤为令人不安，因为低增长和高利率的组合正在加重债务负担(第二章，D节)。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比率居高不下，这已成为疫情后新常态的一个标志，增加了重新将财政紧缩作为政策指导方针的风险。

然而，财政紧缩并不能解决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考虑到疫情导致公共债务增加且应对当前发展与气候挑战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重新平衡国家预算需要提高财政收入，而提高财政收入又需要更活跃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

全球经济迫切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全民公共服务，以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并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鼓吹通过控制支出来整合公共债务是根本不够的。全民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往往不是政府支出的当前优先领域，因此最容易迫于政治压力，为减少基础财政赤字让步。今后需要采取协调行动，增加对高净值个人和大公司的全球征税，摒弃在超全球化时代主导经济政策的“涓滴”逻辑。

在货币层面，自2022年年中以来，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但失业率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相应增长。这表明，疫情后的通胀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供给问题，源于全球价值链瓶颈(Weber and Wasner, 2023; Stiglitz, 2023)以及关键部门(特别是农业食品和能源行业)内存在的过度寡头垄断(UNCTAD, 2023b)。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这种立场，有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必要的困难。相比之下，更为渐进的方式着眼于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投资，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而生产能力的扩大又将有助于缓解中期通胀压力。

考虑到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所需的投资，通过控制支出来稳定公共债务是不够的。

今后需要采取协调行动，增加对高净值个人和大公司的全球征税。



除短期经济政策外，产业政策也已经明确重回发达经济体的议程之上，尤其是在美国。不过，产业政策仍然被发展中经济体视为不受欢迎的政策工具，它们认为在一个国家没有适当的制度框架时，风险会大于收益。然而，成功的发展案例表明，顺序可能恰恰相反(第四章)。虽然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但这些政策也将促进治理结构和监管框架的改善，而此类改善反过来又会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成功率。

明确回归产业或发展战略的同时，需要配合采取气候政策，因为科学指标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加速显现。2023-2024年，全球气温创历史新高，洪水和干旱更加频发，森林和水资源持续退化，生物多样性不断恶化。缓解气候风险将产生许多正面影响，包括减少极端天气条件带来的通胀压力，减少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支出。

总体而言，短期情景不容乐观。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许多国家政府不再将环境问题和进步经济政策作为优先事项(第三章)。在这种背景下，贸发会议等多边机构在敦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鉴于上述挑战，本报告建议：

- 公共债务负担加重，应对当前发展与气候挑战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这清楚地表明，重新平衡国家预算需要提高财政收入。今后需要采取协调行动，包括增加对高净值个人和大公司的全球征税。

- 为各国(特别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负担、可靠且更长期的融资渠道，是确保对发展目标进行充分公共投资的关键。国际领域的重要政策行动包括：向多边和区域银行注资以增加优惠融资，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并重新分配现有特别提款权，以及采用创新金融工具等措施。
- 针对加剧通胀压力的不同因素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将更为有效，所造成的“附带损害”也会更少。这种政策组合应包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遏制反竞争做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关键市场中的企业集中现象，以及修订商品交易活动的现有监管框架。
- 货币当局应慎重考虑其决策的更广泛影响。例如，需要考虑货币决策对债务轨迹和偿债成本、筹措急需的投资资金以及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需要将政策制定标准和操作上的调整纳入货币机构的任务范畴。

在本章中，B节展望了全球宏观经济前景，侧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通货膨胀。C节讨论了物价高企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引发的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D节分析了利率和汇率的近期趋势和预期走向。E节转而讨论财政政策，阐述了COVID-19冲击对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公共债务的影响。F节展示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模拟分析以及疫情冲击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的最新数据。G节按区域详细阐述了全球经济前景。

产业政策已经明确重回发达经济体的议程之上。

B. 全球增长进入低迷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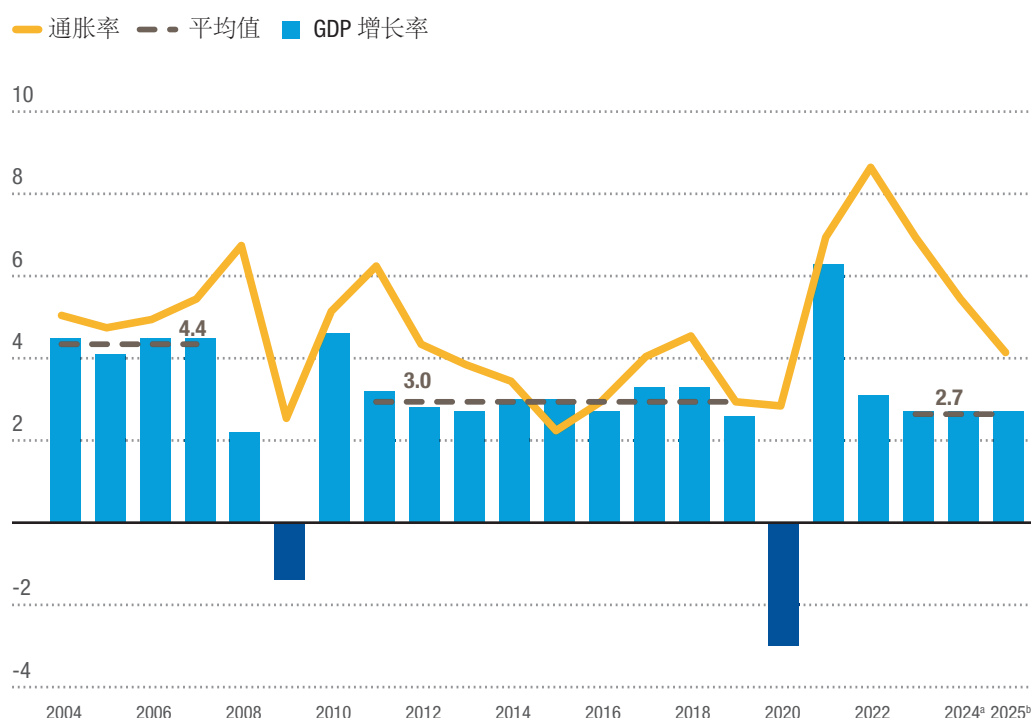
随着应对COVID-19疫情的刺激措施逐步取消，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已变为使通胀率回到央行的目标区间。全球产出增长随之放缓，从2022年的3.1%降至2023年的2.7%。贸发会议预计世界经济在2024和2025年将维持2.7%的低速增长，这标志着在全球通胀趋缓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将会步入三年稳定但停滞的增长期(图一.1和表一.1)。

纵观历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曾出现短暂的通胀飙升，尽管幅度要小得多。当时，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基于“扩张性财政紧缩”假说推行了“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整顿(Alesina and Ardagna, 1998; Jayadev and Konczal, 2010)。然而，结果表明财政刺激远远不足以弥补需求缺口。与此同时，通胀率仍低于发达经济体通常设定的2%的年目标值。



图一.1

通胀压力缓解，全球产出增长乏力
世界产出增长率和通胀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产出增长基于2015年不变价GDP(市场汇率)计算得出。灰色虚线表示2004-2007年、2011-2019年和2023-2025年的年均增长率。通胀率按国家和区域GDP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衡量。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表一.1

1991-2025年世界产出增长

GDP增长率

(年百分比变化)

国家组	1991- 1999 ^a	2000- 2009 ^a	2010- 2014 ^a	2015- 2019 ^a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b	2025 ^b
世界	2.9	3.4	3.2	3.0	2.6	-3.0	6.3	3.1	2.7	2.7	2.7
▶ 非洲	2.4	5.5	2.6	2.9	2.6	-2.4	4.6	3.4	3.0	3.0	3.2
南非	2.7	4.0	2.5	1.0	0.3	-6.0	4.7	1.9	0.6	0.9	1.4
▶ 北非(包括南苏丹)	2.7	5.3	-1.9	3.8	2.3	-3.3	4.7	2.6	2.5	2.6	3.2
▶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和南苏丹)	2.0	6.4	6.2	2.9	3.4	-1.0	4.4	4.3	3.8	3.8	3.6
▶ 美洲	3.4	2.5	2.4	1.9	1.8	-3.4	6.0	2.5	2.4	2.3	2.0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2	3.4	3.4	0.1	-0.6	-7.3	7.1	4.1	2.1	2.0	2.5
墨西哥	3.0	1.9	3.2	2.0	-0.4	-8.4	6.0	3.7	3.2	2.0	1.5
▶ 中美洲(不包括墨西哥) 和加勒比	2.8	4.4	3.6	3.0	2.2	-8.7	8.3	4.8	3.6	3.1	3.0
▶ 南美洲	3.4	3.9	3.4	-0.9	-1.1	-6.7	7.3	4.1	1.5	1.8	2.8
阿根廷	4.6	3.8	2.7	-0.3	-2.0	-9.9	10.4	5.0	-1.6	-3.5	4.8
巴西	2.9	3.6	3.2	-0.4	1.2	-3.3	4.8	3.0	2.9	2.8	2.2
▶ 北美洲	3.4	2.3	2.1	2.3	2.4	-2.4	5.8	2.1	2.4	2.4	1.8
加拿大	2.8	2.3	2.6	2.0	1.9	-5.0	5.3	3.8	1.2	1.1	2.1
美国	3.5	2.3	2.1	2.4	2.5	-2.2	5.8	1.9	2.5	2.5	1.8
▶ 亚洲(不包括塞浦路斯)	4.4	5.6	5.7	4.8	3.8	-0.9	6.7	3.6	4.2	4.0	4.0
▶ 中亚	-4.4	8.1	6.7	3.7	4.2	-1.2	5.4	4.1	5.6	3.6	3.5
▶ 东亚	4.4	5.6	5.8	4.8	4.0	0.4	6.9	2.5	4.2	3.9	3.7
中国	11.0	10.6	8.6	6.8	6.0	2.2	8.4	3.0	5.2	4.9	4.6
日本	1.2	0.9	1.4	0.9	-0.4	-4.2	2.7	1.2	1.8	0.9	1.0
大韩民国	6.8	4.9	3.7	3.1	2.3	-0.7	4.6	2.7	1.4	2.3	2.1
▶ 南亚	4.7	6.3	5.4	6.1	3.7	-3.8	8.1	5.7	6.1	5.7	5.5
印度	5.9	7.2	6.6	7.0	4.6	-5.9	9.4	6.5	7.7	6.8	6.3
▶ 东南亚	5.3	5.5	5.7	5.0	4.4	-3.8	3.6	5.6	3.9	4.5	4.4
印度尼西亚	4.8	5.2	5.8	5.1	5.0	-2.1	3.7	5.3	5.0	5.1	5.2
▶ 西亚(不包括塞浦路斯)	4.3	5.1	5.4	2.9	1.6	-2.9	6.9	6.2	2.0	2.4	3.9
沙特阿拉伯	2.2	4.3	5.7	2.2	1.1	-3.6	5.1	7.5	-0.8	1.7	4.7
土耳其	3.9	5.0	7.6	4.3	0.9	1.7	11.8	5.3	4.5	3.5	3.8
▶ 欧洲(包括塞浦路斯)	1.4	2.2	1.2	2.1	1.8	-5.9	6.3	3.0	0.7	1.2	1.6
俄罗斯联邦	-5.9	6.2	3.1	1.2	2.2	-2.7	5.9	-1.2	3.6	3.5	1.5
英国	2.6	2.0	1.8	2.0	1.6	-10.4	8.7	4.3	0.1	0.9	1.4
▶ 欧盟	1.9	1.8	0.8	2.2	1.8	-5.6	6.1	3.5	0.5	1.0	1.6
▶ 欧元区	1.9	1.6	0.6	2.0	1.6	-6.1	6.0	3.5	0.5	0.9	1.4
法国	1.8	1.6	1.1	1.7	1.8	-7.5	6.4	2.6	1.1	1.0	1.3
德国	1.6	1.0	2.0	1.8	1.1	-3.8	3.2	1.8	-0.2	0.2	1.2
意大利	1.4	0.7	-0.8	1.1	0.5	-9.0	8.3	4.0	0.9	0.9	1.0
▶ 大洋洲	3.7	3.2	2.8	2.7	2.0	-2.1	5.4	3.7	1.9	1.4	2.1
澳大利亚	3.7	3.3	2.8	2.5	1.8	-2.1	5.5	3.9	2.0	1.4	2.1
▶ 发达国家	2.3	2.2	1.7	2.1	1.9	-3.9	5.7	2.5	1.6	1.8	1.7
▶ 发展中国家	4.9	6.4	5.8	4.4	3.6	-1.6	7.2	3.9	4.2	4.1	4.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计算得出的结果，依据包括：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4年年中更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2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智库国别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国家资料来源。

注：五个地理区域的构成遵循联合国统计司的M49标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基于2022年5月更新的M49分类。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基于以2015年定值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a 平均值。

b 预测值。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介入，通过大幅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UNCTAD, 2013; Palley, 2016)。然而，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经济体的实际利率为负，但全球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足以显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水平(E节)。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12年后，随着COVID-19疫情的影响再次将全球经济推向深度衰退，发达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却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大相径庭。由于利率极低或为负，并且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扩大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政府得以以较低成本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政府实施了更大力度的预算刺激措施。通过提供大规模和临时性的收入转移，政府减轻了2020年经济突然停摆的冲击，并帮助推动了2021年的复苏。

全球产出增长率趋于稳定，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证明了财政政策在协调一致且达到足够规模时的有效性。然而，在财政政策收紧和已经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2023至2025年(预测)的全球产出增长显示出趋稳迹象，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都持续低于疫情发生前几年的水平(图一.2)。而疫情前的全球增长轨迹已然很不理想，比全球金融危机前低了不少一个百分点。过去和现在的增长率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全球发展挑战，也不足以实现发展目标。

全球增长停滞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的发展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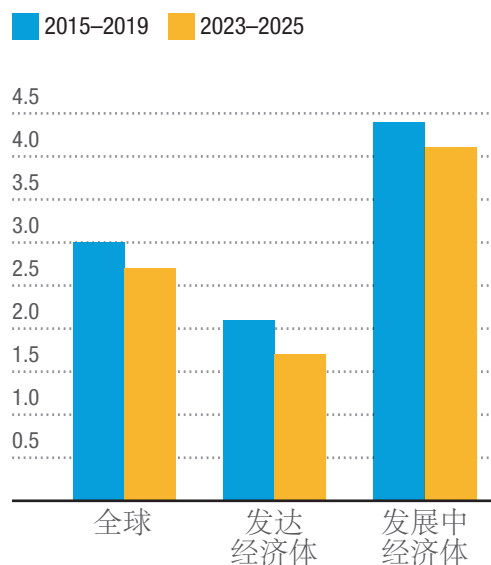
46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尤为严峻。预计这些国家2023至2025年的总产出年均增长3.9%，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至少7%的年增长率”相去甚

远。¹卢旺达是唯一有望达到7%增长率的最不发达国家。

图一.2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陷入停滞，增速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实际GDP增长率均值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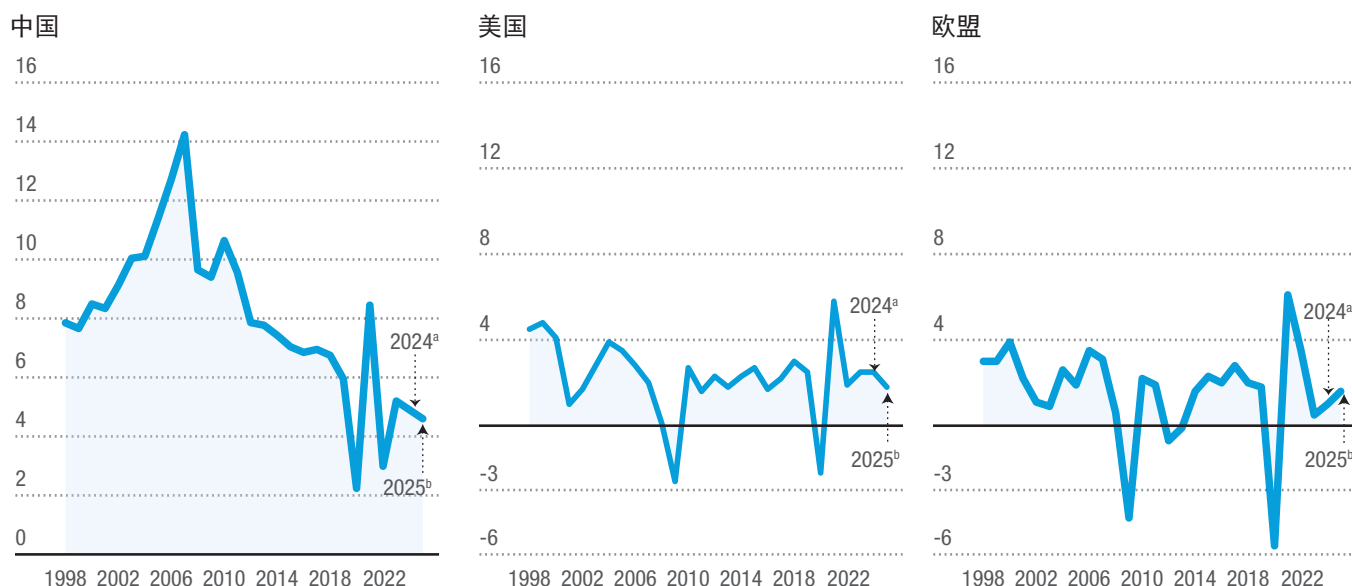
注：产出增长基于2015年不变价GDP(市场汇率)计算得出。2024年数据为估计值，2025年数据为预测值。

全球增长停滞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的发展轨迹：美国和欧盟的增长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的增长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也明显放缓(图一.3)。中国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向均值的回归：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相同数额的额外实际支出对GDP增速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此外，中国增长放缓也是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热潮退去的结果，在过去十年中，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蓬勃发展已取代净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¹ 关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详情可查阅：<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nomic-growth/>。

图一.3

增长停滞和放缓困扰着世界主要经济体
部分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基于2015年不变价GDP。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展望未来，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出口部门和债务驱动的建筑热潮——不太可能继续为经济提供同样的推动力。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以中国标准来看已经偏高(62%)，加上2021-2022年恒大集团调整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不断上升，以及自COVID-19爆发以来公共债务的比率持续攀升(图一.4)，这些因素表明，当前的金融条件不利于债务驱动的国内建筑热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虽然净出口近期加速增长，但是否可能出现新一轮出口拉动的繁荣，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国际方面，中国企业的价格政策致使许多经济体采取反倾销措施

(Friedberg, 2024)。在国内方面，尽管出口量增加，但中国企业并未实现高利润，反而债务水平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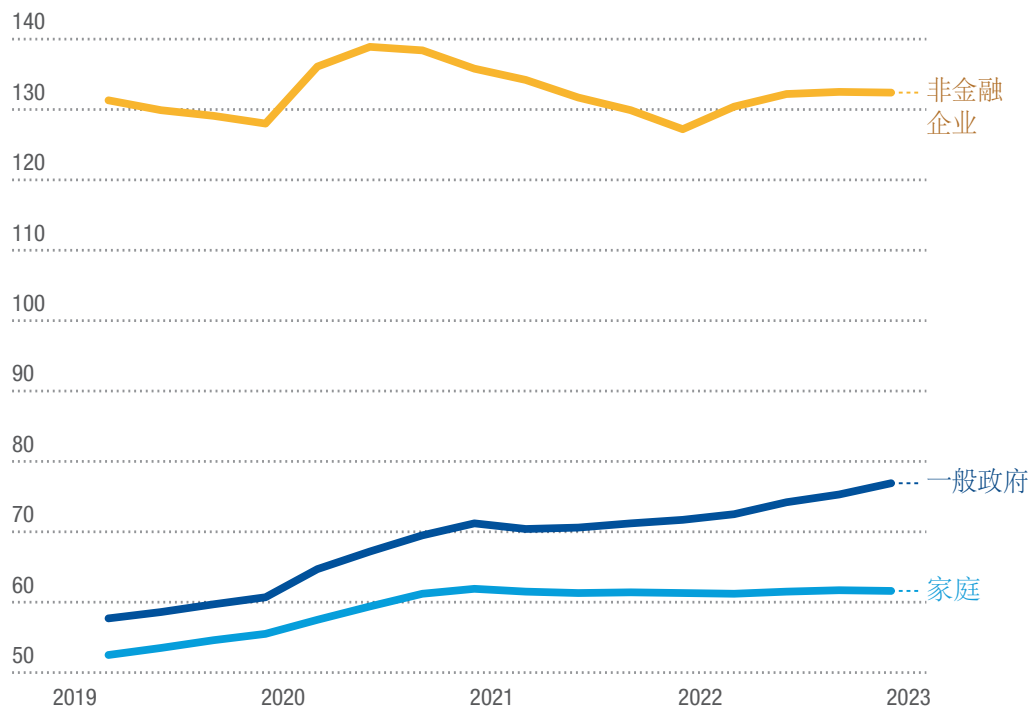
中国政府的战略着眼于应对GDP增长的减缓，因为现阶段虽然扩大了创新和科技投资，但并未像此前净出口和建筑业刺激下的发展阶段那样，产生同样的需求效应。研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投资的增长往往会提高生产率，有助于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但这也意味着，在政府未采取政策刺激国内私人和公共消费的情况下，中国将步入一个更为温和的增长时期。



图一.4

中国的公共债务和企业债务自2022年初重回上升轨道

中国非金融企业、一般政府和家庭信贷与GDP的比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注：家庭包括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一般政府指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以及由这些机构控制的社会保障基金。

就全球经济而言，2020年的近乎瘫痪和2021年的反弹造成了大量供给瓶颈，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巨大但暂时性的通胀压力(UNCTAD, 2023b; Stiglitz, 2023)。消费模式向耐用品的暂时性转变(UNCTAD, 2022)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第二章)加剧了这些供给压力。金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纷纷对通胀攀升做出反应，大幅提高政策利率，使这些国家的实际利率回到正值(第一章，D节)。

的结构性变化，并利用其市场势力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UNCTAD, 2023b; Weber and Wasner, 2023)。截至2024年年中，世界范围内的价格上涨趋势已经放缓。不过，在这一通胀减缓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增长轨迹却出现了显著分化，包括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之间(第一章，G节)。

从数字上看，美国经济保持2%的增长趋势，预计在2024年将实现相对软着陆。中国的增长继续放缓，趋势增长率尚不明朗。日本经济似乎已趋向于稳定，增长率保持在1%左右，而德国在经历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双重冲击后，甚至始终未能达到1%的增长率(图一.5)。

事实证明，价格加速上涨主要是一个供给问题。

疫情距今已有五年，现在看来，货币主义者对“疫情后大通胀”的担忧似乎是错判了形势。事实证明，价格上涨主要是一个供给问题——是卖方通胀，而非买方通胀。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企业适应了相对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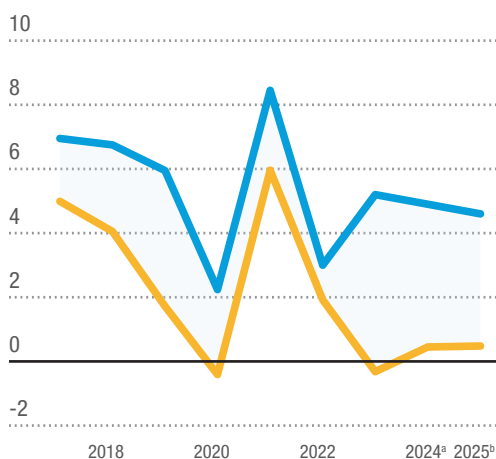
图一.5

大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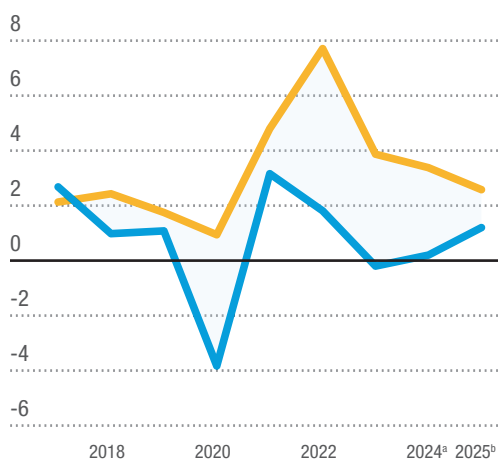
二十国集团部分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胀率
(百分比)

中国

— GDP 增长率 — 通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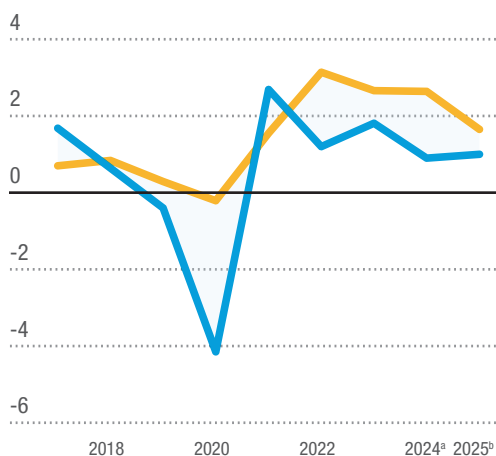


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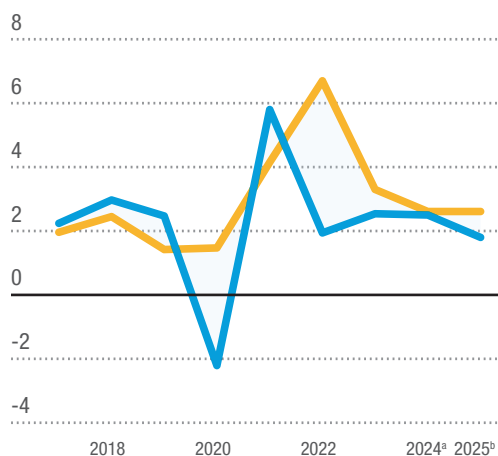


日本

— GDP 增长率 — 通胀率



美国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产出增长基于2015年不变价GDP。通胀率按GDP平减指数衡量。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除中国外，也经历了疫情后的通胀飙升，但经济增长和通胀轨迹各不相同(图一.6)。具体而言，巴西在经历了十年停滞，似乎正在

向2%的增长率和3%的通胀率靠拢。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的通胀率似乎正在向4%靠拢。受COVID-19疫情冲击以及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呈现出“W”

型增长模式，GDP增长率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印度的GDP增长率似乎已稳定在6%，通胀率为4%，而南

非则在艰难地争取到2025年实现2%的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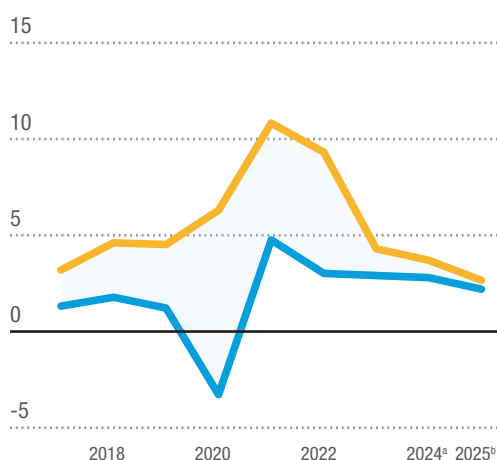


图一.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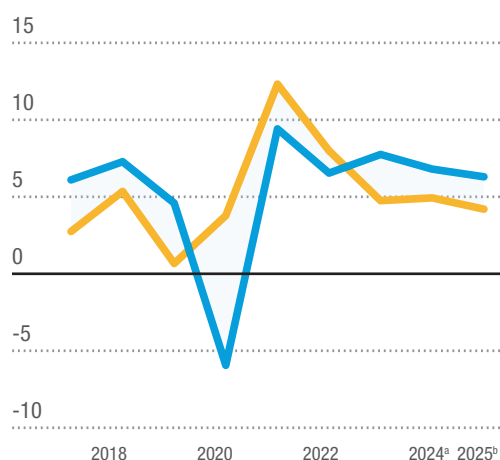
金砖国家(除中国)的增长和通胀轨迹正在分化
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胀率
(百分比)

巴西

— GDP 增长率 — 通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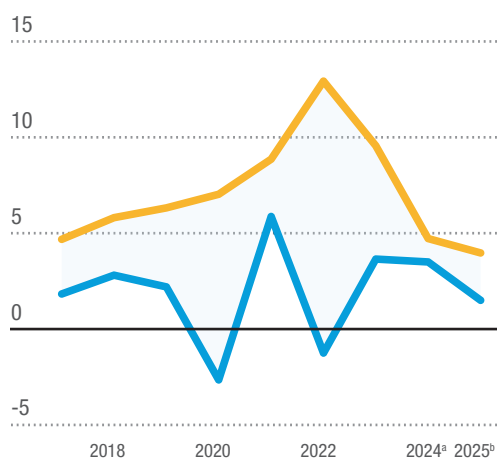


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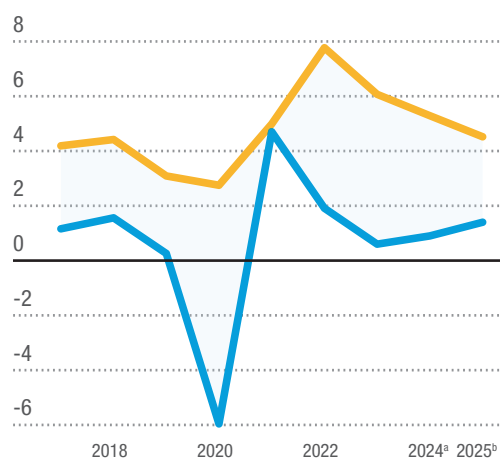


俄罗斯联邦

— GDP 增长率 — 通胀率



南非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产出增长基于2015年不变价GDP。通胀率按GDP平减指数衡量。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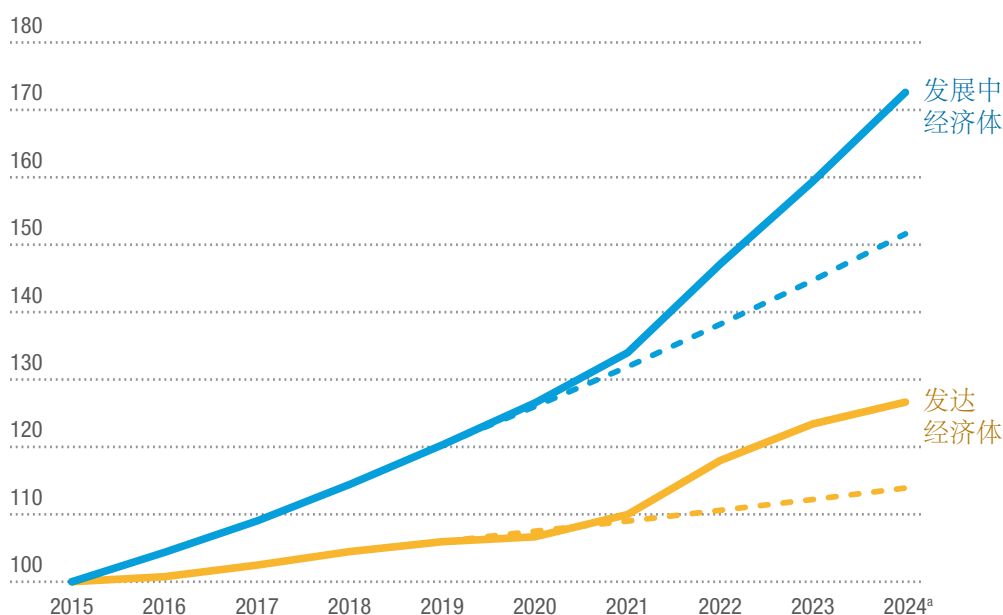
C. 对消费者不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通胀减缓伴随着各国普遍的不满情绪。利率上升导致信贷成本飞涨，对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特别是在家庭债务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因可支配收入缩水，不得不削减开支。同样，尽管近年来通胀有所缓解，但消费者价格走势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大大削弱了家庭的购买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价格较疫情前趋势水平分别高出11%和14%(图一.7)。

价格上涨和信贷成本上升正在侵蚀家庭可支配收入。

图一.7

消费者价格上涨削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购买力
消费者价格指数
(2015=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基金组织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

注：虚线对应的是基于疫情前趋势(2015-2019年)的估计值。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和采用几何平均数计算。

a 估计值。

许多国家的家庭实际支出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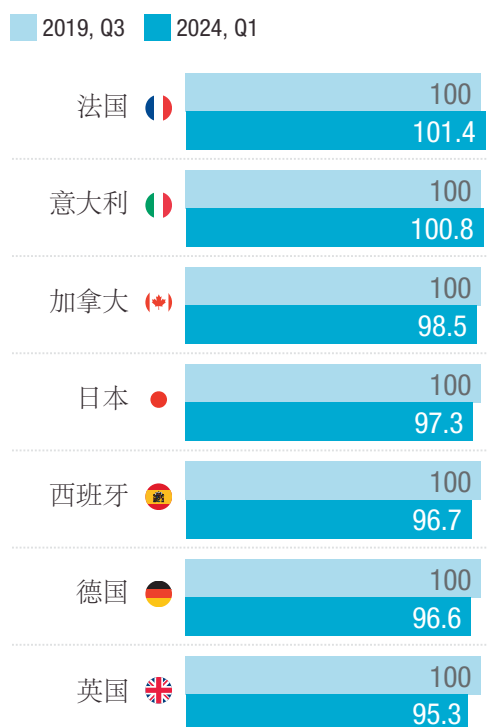
这些价格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导致一些国家陷入经济停滞，而在另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在疫情期间向家庭提供的财政支持较为有限的国家，则导致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相比疫情前有所下降(图一.8)。



图一.8

许多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人均实际最终消费支出
(2019年第三季度=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经合组织数据库。
缩略语：Q1, 第一季度；Q3, 第三季度。

疫情后的通胀飙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后疫情时代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2021年开始的通胀上行作出政策反应。正如贸发会议在最近几期的

《贸易和发展报告》中所述，疫情后的通胀飙升不仅仅是经济过热(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商品和服务)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包括暂时的供给瓶颈、消费模式的转变、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市场集中度提高以及某些部门，特别是农业食品和能源部门大公司的价格操纵行为(UNCTAD, 2023b)。

通货膨胀的结构——许多供给侧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引发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通货紧缩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将通胀率推升至目标水平；如今，主要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急剧而长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作为将通胀率降至目标水平的唯一政策工具，也是注定效果有限。此外，紧缩性货币政策代价巨大：它大大抑制了经济活动；推高了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加剧了金融不稳定风险；增加了汇率压力；加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UNCTAD, 2024c)。相比之下，针对加剧通胀压力的不同因素采取更加平衡的政策组合将更为有效，所造成的“附带损害”也会更少。

这种政策组合或将包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遏制反竞争做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关键部门中的企业集中现象；还可能包括采用价格稳定工具，修订商品交易活动的现有监管框架，以遏制过度的金融投机，并在货币政策中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金融稳定和流动性管理(UNCTAD, 2020, 2023)。

D. 推迟货币宽松和美元走强

经济学家关于全球经济是否已进入长期停滞时代的讨论似乎因一场疫情而尘埃落定。长期停滞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低增长趋势是投资水平下降的副产品。尽管因储蓄率上升，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但投资水平仍在下降，导致总需求持续不足。事实上，2010年代实际利率为负，正是因为财政刺激不足以抵消金融危机后私营部门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UNCTAD, 2015; Cooper, 2022)。

疫情期间和之后，供给瓶颈和一系列其他因素共同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暂时性通胀飙升，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几乎同步调高了利率(图一.9)。2021年底至2023年中，英国和美国以及欧元区的政策利率急剧攀升。尽管在2024年初，人们预计货币宽松周期将很快开启，时至今日应该已经全面展开，但备受期待的宽松周期却一再推迟。

几度推迟后，欧洲央行终于在2024年6月6日将三大主要利率下调25个基点，开启了货币宽松进程。9月12日，欧洲央行再次将存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英国和美国则推迟到2024年下半年才降息，英格兰银行于8月16日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美联储于9月18日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50个基点。尽管采取了这些初步的货币宽松措施，但鉴于2021到2023年的累计加息幅度，货币政策仍然高度紧缩。

此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上调政策利率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如法炮制(图一.9)。这些国家的货币正常化步伐不可避免地有所差异，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通胀率、汇率走向以及其他特定的国内因素。在拉丁美洲，巴西和智利率先加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紧随其后。截至2024年年中，巴西的情况尚不明朗，有可能在2025年再次加息，而墨西哥尚未启动货币宽松进程。预计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央行将继续逐步降息。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仍处于名义利率较高的阶段，且预计2024-2025年不会大幅降息。中国继续逐步放宽货币政策，有可能在2024-2025年进一步降息，以避免经济增速放缓。俄罗斯联邦央行预计将维持高利率，以应对乌克兰战争给汇率和价格带来的持续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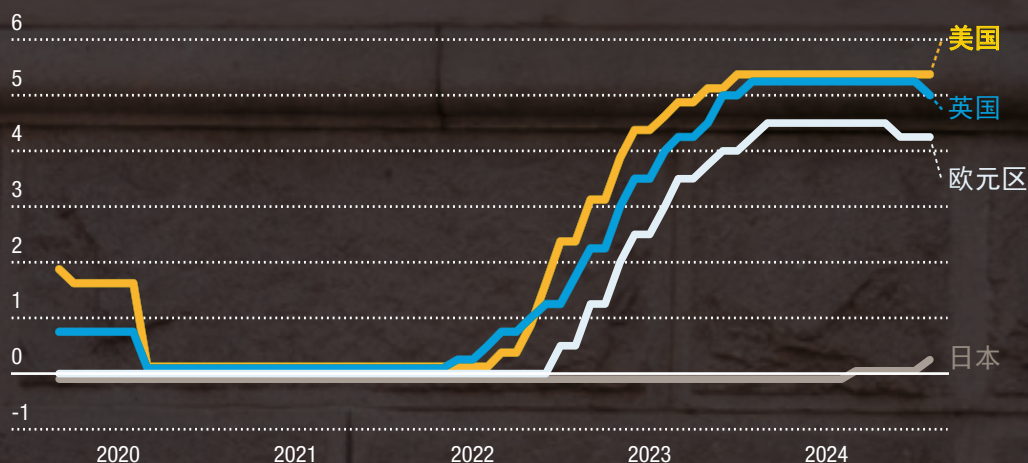
备受期待的货币宽松一再推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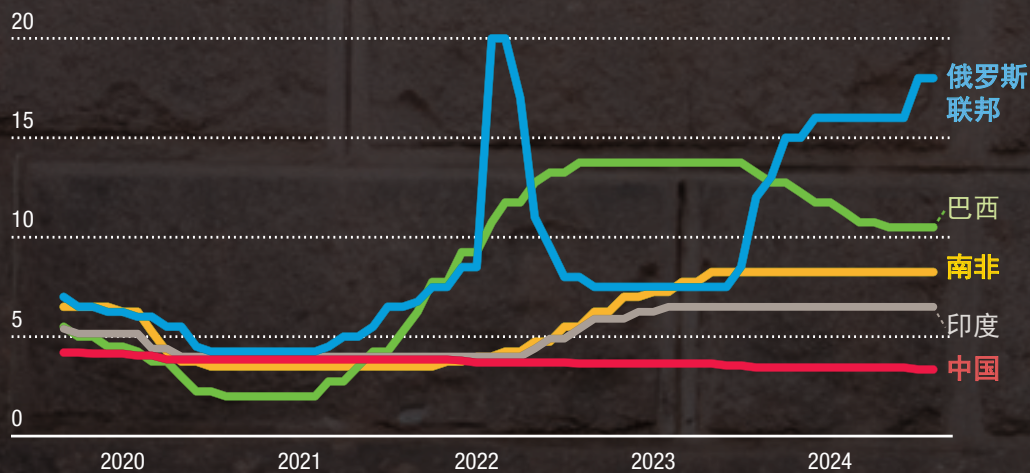
图一.9

全球的货币政策利率保持高位
央行(短期)政策利率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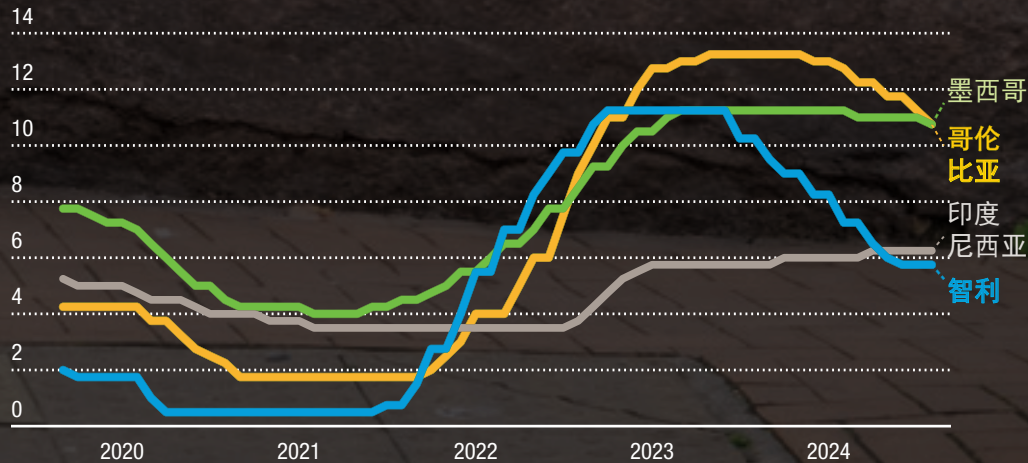
部分发达国家



金砖国家



部分非金砖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之所以倍感压力，除特定的国内因素外，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迟货币宽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迟迟没有降息，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认为有必要维持比实际需要更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利率差异可能引发的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与此同时，主要央行曾通过量化宽松方案便利外币债券的发行，但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终结，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量化宽松期间发行的外币债券在再融资时面临新的挑战。

2024年迄今为止在货币政策上的新动向出现在日本——日本央行结束了近八年的负名义利率。虽然日本的政

策利率仍然接近于零，实际利率依然为负，但在以日元为借贷货币的短期套利交易中，利率最近出现了20个基点的变化，预计将缓解疫情后日元对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的大幅贬值(图一.10)。

除日本外，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在2024年均逐步升值(图一.10)。在发展中经济体，尽管货币当局采取了紧缩立场，但大多数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都出现了贬值。在94个实行非固定汇率制度且有数据可查²的发展中经济体中，79个经济体的货币在2024年对美元贬值。

发达经济体推迟放宽货币政策对全球南方的央行造成了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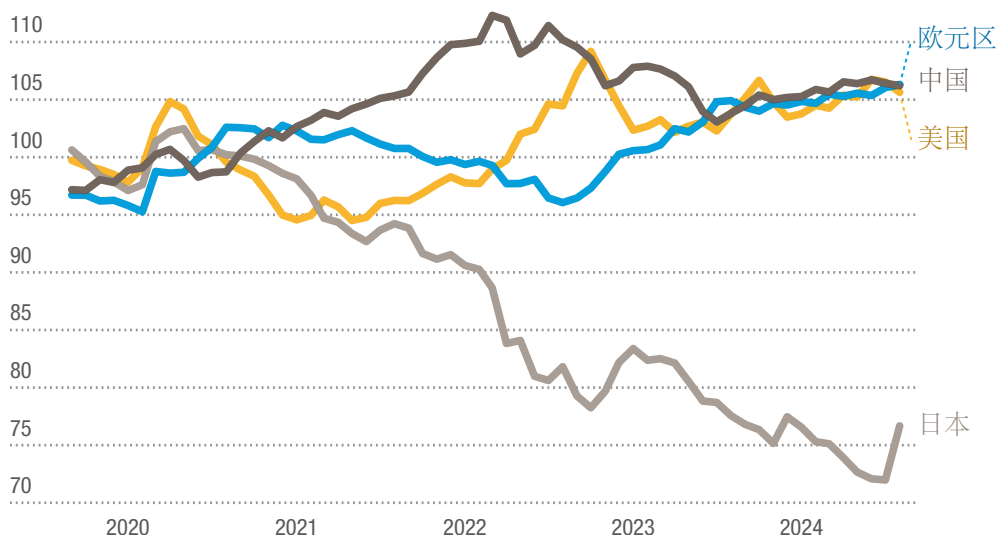
在94个实行非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经济体中，79个经济体的货币在2024年对美元贬值。

图一.10

除日元外，主要储备货币在2024年逐步升值

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2020=100)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注：名义有效汇率按双边汇率的几何贸易加权平均值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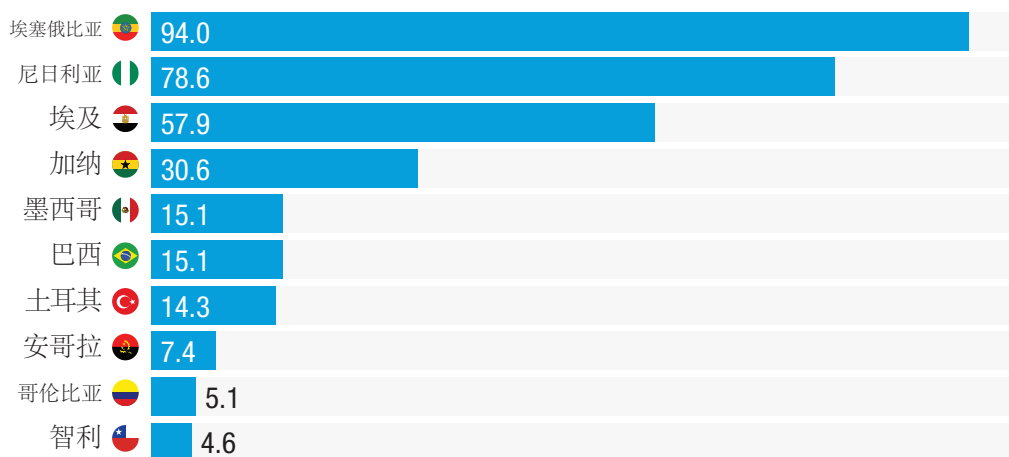
² 见国际清算银行双边汇率数据门户，可查阅：<https://data.bis.org/topics/XRU/data>。



图一.11

2024年，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大幅贬值

2024年1-8月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情况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Eikon平台数据。

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22日期间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百分比变化。

国际上持续的货币紧缩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造成了额外压力。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严重贬值(图一.11)，加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虽然特定的国内因素也起了作用(G节)，特别是在货币严重贬值的国家，但加剧整个发展中世界本币贬值压力的主要因素还是国际上持续的货币紧缩环境。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居高不下，而本国货币又不断贬值，这两种因素交织，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当局的政策空间，也增加了外币计价债务的偿还成本。这种情况正在挤压财政账户，给金融稳定增加了潜在风险。



E. 财政刺激措施逐步淡出，公共债务水平上升

二十国集团中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在应对 COVID-19 冲击时采取了规模迥异的财政刺激措施。在美国，基础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从 2019 年的 3.5% 上升至 2020 年的近 12%。随后的财政整顿有望在 2024 年将财政账户恢复到基础财政赤字占 GDP 4% 的水平。比较美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19 冲击采取的措施发现，2020 年的财政刺激或基础财政赤字的变化比 2009 年更加显著（图一.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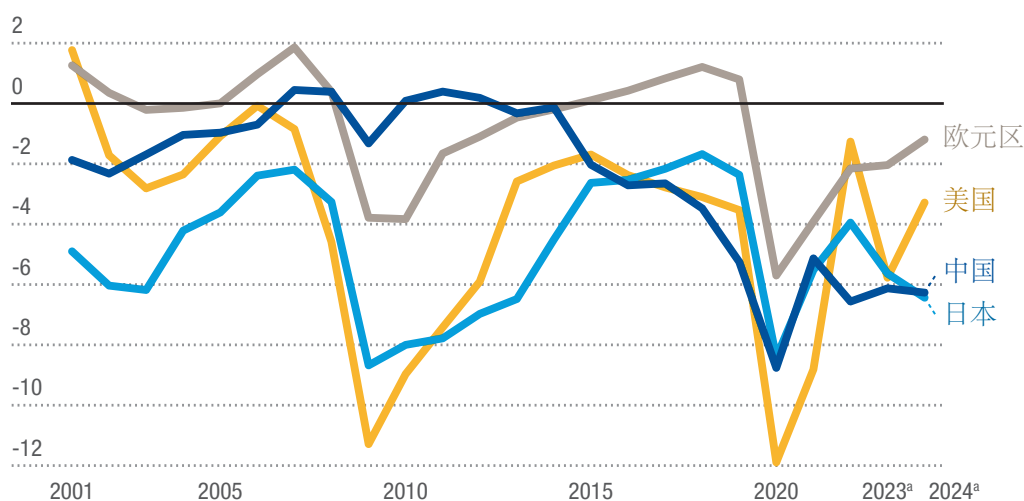
欧元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19 冲击时也采取了财政刺激措施，但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预算整顿速度更快。近年来，基础财政结余占 GDP 的比重从 2019 年 0.7% 的盈余下降到 2020 年约 6% 的赤字。欧元区自 2021 年起进行财政整顿，预计

到 2024 年，欧元区的基础财政赤字将降至约占 GDP 的 1%。

在亚洲，日本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19 冲击时采取了类似的财政刺激措施，都是将基础赤字占 GDP 的比重提高 5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

图一.12

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财政结余动态呈现差异
二十国集团部分经济体的基础财政结余
(占 GDP 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基金组织 2024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
a 估计值。

COVID-19冲击导致二十国集团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增加。

国在疫情后采取的财政措施远比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更加积极。2009年，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小规模基础财政赤字，随后在2010-2014年基本实现了基础预算平衡。2015年，形势发生变化，基础财政赤字开始扩大。到2019年，赤字已占GDP的5%；2020年更是在疫情冲击下攀升至近9%。预计2024-2025年，中国的基础财政赤字

将稳定在GDP的6%左右。如下文所述，基础财政赤字的增加反映在公共债务存量的扩大上。

正如经济衰退后时常发生的那样，COVID-19冲击导致二十国集团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增加(表一.2)。唯一的例外是巴西和土耳其，两国的情况都很特殊。巴西在疫情前



表一.2

COVID-19冲击后公共债务水平飙升
二十国集团经济体的一般政府债务总额
(占GDP的百分比)

国家	COVID-19 冲击期间					2019-2023 的变化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a	
阿根廷	90	104	81	85	155	65
澳大利亚	47	57	56	50	49	3
巴西	87	96	89	84	85	-2
加拿大	90	118	114	107	107	17
中国	60	70	72	77	84	23
欧元区	84	97	95	91	89	5
法国	97	115	113	112	111	13
德国	60	69	69	66	64	5
意大利	134	155	147	141	137	3
印度	75	88	84	82	83	8
印度尼西亚	31	40	41	40	40	9
日本	236	258	254	257	252	16
墨西哥	52	59	57	54	53	1
大韩民国	42	49	51	54	55	13
俄罗斯联邦	14	19	16	19	20	6
沙特阿拉伯	22	31	29	24	26	5
南非	56	69	69	71	74	18
土耳其	32	39	40	31	29	-4
英国	86	106	105	100	101	15
美国	108	132	125	120	122	14

资料来源： 基金组织 2024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

a 估计值。



就积累了大量公共债务，疫情爆发时，政府正在进行财政重组。在土耳其，高通胀、高增长和实际利率低等因素减轻了疫情对债务动态的影响。

在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中，债务扩张最为显著的是阿根廷，其债务激增主要发生在2023年，导火索是比索汇率暴跌。由于阿根廷的政府债务大部分与美元挂钩，其稳定战略对财政偿付能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公共债务增幅第二大的国家是中国（占GDP的比重升了23个百分点），不过中国在疫情前的债务比率相对较低。在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疫情导致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上升了约13至17个百分点不等。在其余发展中经济体中，南非的债务增幅最大，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8个百分点。

债务水平攀升意味着政府不得不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偿债，而国际金融环境趋紧（第二章）及本币贬值进一步加重了债务攀升造成的负担。政府不得不将更大比例的公共资金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投向亟需的公共服务和对实现发展与气候目标至关重要的领域。

虽然财政整顿的支持者常以赤字攀升和公共债务存量扩大为由，主张政府必须压缩支出，但这一政策处方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挑战所需的公共支出缺口却是于事无补。事实上，压缩支出反而会加剧发展挑战。要应对财政失衡及其引发的债务动态的负

面影响，同时维持充足的公共投资用于缩小发展差距，需要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策。

在财政层面，应对财政失衡和政府债务高企的一个关键是确保财政收入充分反映出大型企业和顶层收入者的经济和金融收益。企业利用各种工具逃避纳税义务，³ 导致国库资金流失，极大妨碍了政府为基本公共服务和投资调动资源的能力（UNCTAD, 2017）。要进一步纠正这些做法，必须协调打击企业套利行为、避税港和“管道”管辖区，还必须建立一个多边机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扭转在双重征税协定谈判中的不对等地位（第五章）。

为各国（特别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负担、可靠且更长期的融资渠道，是确保对发展目标进行充分公共投资的关键。国际领域的重要政策行动包括：向多边和区域银行注资以增加优惠融资，发行新的特别提款权并重新分配现有特别提款权，采用创新金融工具（例如可持续发展债券和韧性债券），以及扩大美联储首创的货币互换机制以便利以本币而非外币借款（UNCTAD, 2023b）。

在货币层面，货币当局——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在制定政策时不应只关注通胀目标，而应考虑其决策的更广泛影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货币政策对债务轨迹和偿债成本、亟需投资的融资、金融可持续性和资本供应缺口的影响（UNCTAD, 2023b, 插文一.2）。

需打击企业避税行为，并建立多边机制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

³ 这些税务规划工具中最重要的做法是将利润转移到位于避税港的关联公司，将负债转移到位于高税率管辖区的关联公司，通过故意对公司内部跨境交易进行不准确的估值来转移定价，以及利用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条约中的税收漏洞（UNCTAD, 2020）。

货币当局应考虑其
决策的广泛影响。

政策制定标准和操作上的调整不能是临时性的，需要被纳入货币机构的任务范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货币政策在用于稳定

金融时最为有效，单纯用于调节通胀和商业周期，则会因为货币传导机制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削弱政策的有效性。



插文一.1

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术

COVID-19冲击过后，公共债务攀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普遍担忧，针对不同经济体，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建议快速实施财政整顿以赢得政策公信力，即使这样可能导致GDP增长在整顿周期的初期大幅放缓甚至出现收缩。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则采取了更加循序渐进的策略，允许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基础财政赤字，并延长向通胀目标靠拢所需的时间跨度，以避免实际利率飙升(Taylor and Barbosa-Filho, 2021)。

从理论上讲，通过适当的政策协调和国际支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不再需要采用两套不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标准，发展中经济体也将能够采取与高收入经济体相同的渐进式调整方法。在实践中，困难在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成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 r 减 g ”——政府债券实际利率(r)与国家GDP增长率(g)之差。

近期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低于GDP增长率(Mehrotra and Sergeyev, 2021)，形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财政算术：国家可以通过适度的基础预算赤字来摆脱高债务比率。相比之下，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 r 减 g ”为正，且数值很高，使得这些国家面临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术，因为它们需要维持大量的基础盈余以确保公共债务可控。由于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将更多公共支出用于全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当前的财政制约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关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术，除了需要采取国内行动外，还需要至少两项全球范围的应对措施。首先，需要协调增加对跨境活动征税，尤其是对高净值个人和大公司征税，以提高政府的基础收支平衡(Ocampo, 2014)。第二是采取多边举措，降低发展中国家某些政府投资的风险溢价，由基金组织和类似机构充当最后的对冲工具，抵御全球冲击带来的汇率风险。

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适度的基础预算赤字摆脱高债务比率。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的财政制约与推进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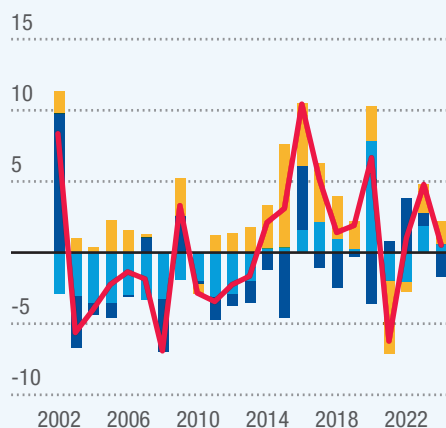


插图一.1 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财政算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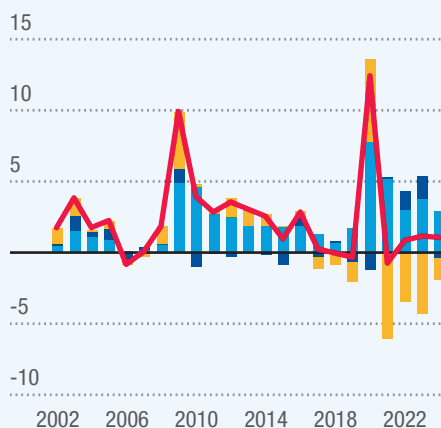
实际利率主导债务动态
部分经济体净债务与GDP比率变化的来源
(占GDP的百分比)

■ 基础财政结余 ■ 净资本损失 ■ r 减 g — 净债务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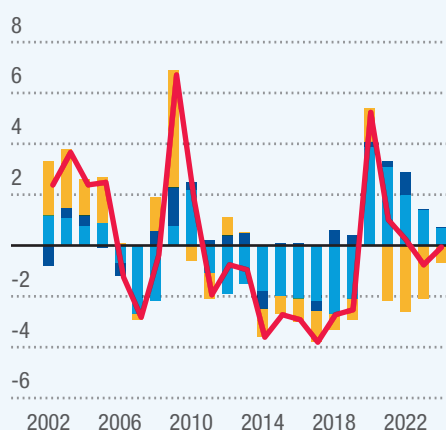
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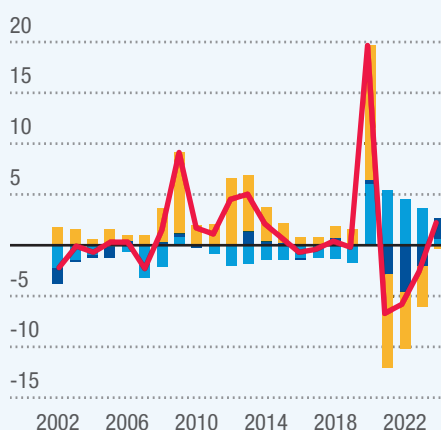
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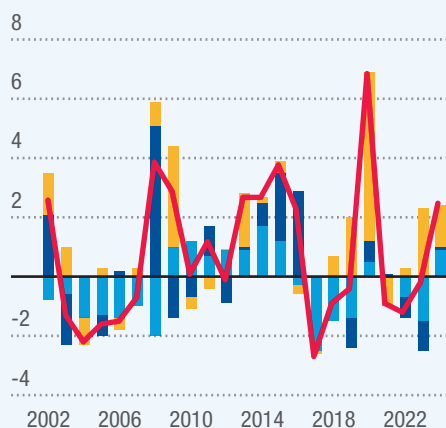
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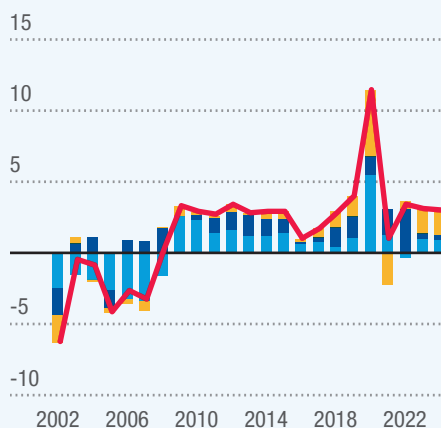
意大利



墨西哥



南非



资料来源： 基金组织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注： 公式“ r 减 g ”代表政府债券实际利率(r)与国家GDP增长率(g)之差。 2023年和2024年数据为估计值。

在经济困难时期，
长期融资的缺口变得
更加突出。



插文一.2

弥合资本缺口：政府与央行

资本市场为结束企业对短期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提供了机会。在资本市场融资，企业不仅可以锁定融资成本，优化现金流，还可以在资本设备投资尚未产生回报的情况下，渡过更长的亏损期。与此同时，股票市场让投资者通过“一级”市场为企业提供所需资金，而不必承诺长期持有股票，直至企业偿还资金，而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将股票出售给其他愿意持有的金融投资者。

然而，长期融资的选项依然有限。长期融资的缺口表明，依赖资本市场并非推动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面的高效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当政府和企业自身财政拮据或面临无法估算现金流收益的紧急投资（如气候变化相关投资）需求时，资本市场的融资不足问题就更加突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政府为恢复经济，接管了资本市场的功能，为企业提供资金，条件是企业必须参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也得到了中央银行的支持。政府和央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并非出于对凯恩斯“投资社会化”理念(Keynes, 1936)的认同，而是由于资本市场功能在经济中失效。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股票和债券为资产负债表“融资”。正是这种崩盘，而非任何出于政治动机的共识，为二战后的产业政策和规划奠定了基础(Engerman, 2015)。

短期银行融资的缺点在于银行可能拒绝续贷，或要求续贷必须支付更高利率。长期融资是显而易见的出路。但长期融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融资渠道窄，而且正如股市连续崩盘时看到的那样，股票持有者可能缺乏流动性，从而导致资本市场失灵。

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由早期工业化强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中，国家需要在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实现工业化。然而，央行的职能是管理政府债务和实施货币政策，因此不宜直接管理工业项目。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设立了专门的“开发银行”，为工业项目提供长期融资。这些银行通常能够从央行获得优惠的再融资条件，从而能够长期为项目提供资金，而无需考虑股票持有者缺乏流动性的问题。

这种融资模式似乎非常适合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工业和建筑业（如住房）。如果项目能够带来共同利益，如绿色转型，则这种模式可以为切实有效的项目提供资金，而不是将项目作为纯粹的融资工具。

构建央行业务框架的货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应实行通胀目标制，利用短期政策利率来调节通胀



插文一.2 弥合资本缺口：政府与央行

率。但这种利率工具主要作用于银行业务和短期信贷流动，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脱节，而货币政策的传导需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发挥作用 (Toporowski, 2024)。

经历多次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的 COVID-19 疫情后，金融发达国家在制定通胀目标时已经开始考虑金融稳定的需求，为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总体而言，中央银行并未努力填补资本市场在生产性投资、创新和绿色转型方面的融资缺口 (UNCTAD, 2023b)。

虽然央行有充分理由不直接提供此类资金，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支持那些能够填补资本市场融资缺口的机构。这些融资缺口也不应成为中央银行政策框架中的盲点。

中央银行并未努力填补资本市场的融资缺口。

F. 收入不平等加剧

贸发会议认为，疫情期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一个暂时现象，原因在于利润下降的幅度大于工资下降的幅度，而且在封锁期间，低工资工人的数据未被统计在内。疫情后的数据证实了这些推测。

利用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模拟二十国集团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即附加值在工资、利润、租金和税收之间的分配)的演变发现，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但实际工资的轨迹存在较大差异。在加拿大、德国、英国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往往伴随着实际工资的增长；而在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同时，实际工资也

停滞或下降(图一.13)。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工资同时下降的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表明这些国家的工人面临结构性压力和周期性压力的双重困境，生活状况日益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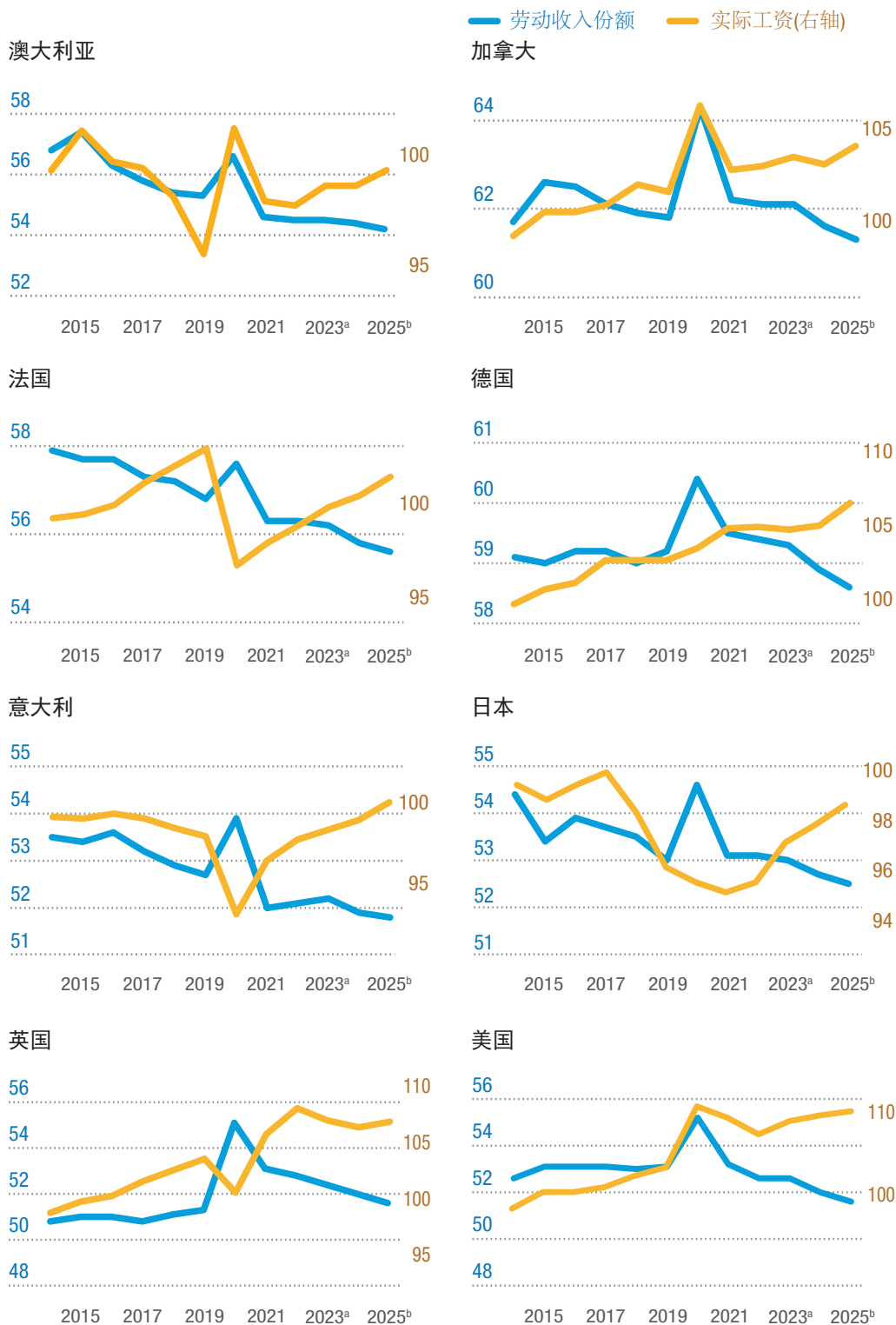
在金砖五国中，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下降，而实际工资却呈现不同走势(图一.14)。中国和印度的情况符合卡尔多-凡登假说，即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Barbosa-Filho, 2008)，从而推动了实际工资的较快增长。相反，巴西和南非的实际工资则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下降。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介于二者之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实际工资略有增长。

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工资的同时下降尤其令人担忧。



图一.13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实际工资的轨迹却呈现差异
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工资指数
(百分比；2020=100, 右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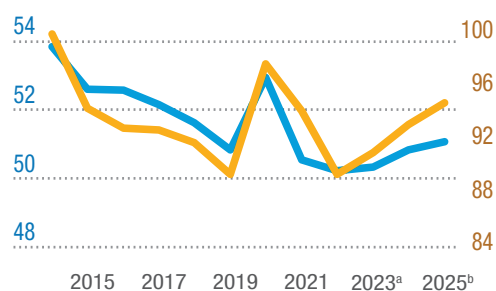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2023^a, 2024^a 估计值。
2025^b 预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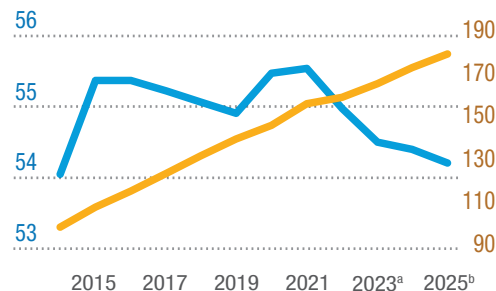
图一.14

金砖国家的趋势与发达经济体类似
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工资指数
(百分比; 2020=100, 右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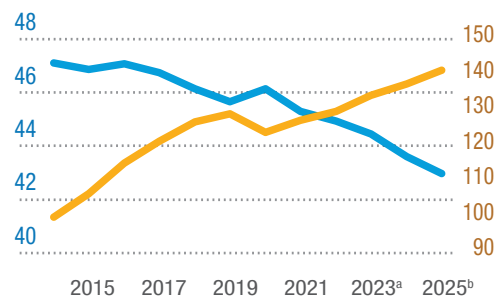
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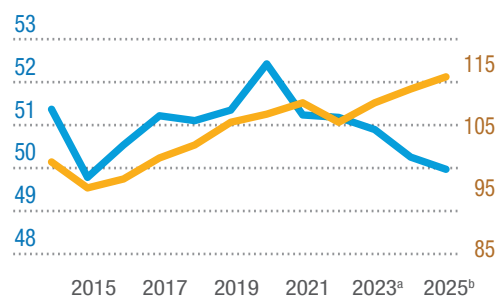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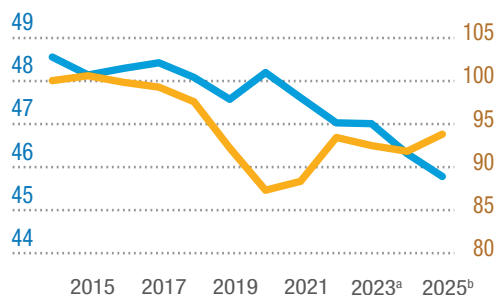
印度



俄罗斯联邦



南非



— 劳动收入份额 — 实际工资(右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2023^a, 2024^a 估计值。
2025^b 预测值。

当前形势下，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轨迹是否可能逆转？前景不容乐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呈下降趋势，而利润份额则相应上升。如果经济重新回到疫情前的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很可能继续下滑，这不仅会影响

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还会将加剧收入不平等(UNCTAD, 2019)。

虽然功能性收入分配有助于分析实际工资动态，但它未必能准确反映收入分配底层和中间层的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向了收

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会下降，从而对全球经济和收入不平等造成负面影响。

入分配顶端的高薪人员。相反，一部分资本收入则通过养老金以及累进税制与转移支付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分配给了中间层。要揭示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个人收入分配情况，还需要引入其他衡量标准。

低收入人群往往在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
降中首当其冲。

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正在慢慢将个人收入分配的动态纳入其分析中。这样做的主要困难在于，个人收入分配数据的统计频率低且数据滞后。此类数据通常来源于住户调查和所得税记录，而所得税数据往往滞后两三年。因此，2021和2022年的个人收入分配数据已是现有的最新数据，首次揭示了疫情对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通过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可以窥见疫情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变化。为便于分析，将总人口划分为四个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底部50%)、中产阶层(中间40%)、上中产阶层(上层9%)和富人(顶端1%)。

美国的税前个人收入分配数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急剧下降，中产阶层保持稳定，而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份额有所提高，尤其集中在顶端的1%(图一.15)。定性分析表明，意大利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份额上升，底部50%的收入份额下降。不同之处在于，自

疫情以来，中间40%的家庭收入份额也有所下降(图一.15)。

疫情对德国和英国的影响与美国截然不同。在英国，疫情过后，底部50%和上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几乎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中间40%的收入份额有所增加，顶部1%的收入份额减少。在德国，底部50%和中间40%的收入份额在经历最初的下降后出现了反弹，而顶部10%的收入份额有所减少(图一.16)。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均普遍下降，加之部分国家的收入进一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表明低收入群体往往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中首当其冲。这导致了广泛的不满和不安，在实际工资仍低于疫情前趋势水平的国家，如法国、日本和南非，这种不安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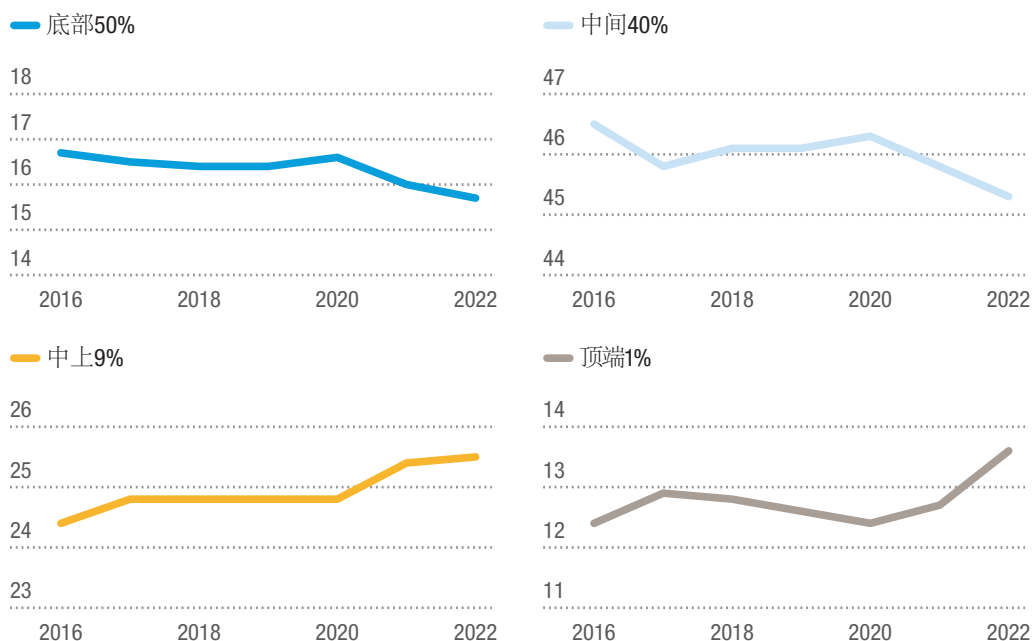
扭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趋势，必须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政策优先事项，并通过更公平的政策方案加以解决。对更全面的社会保护做出切实承诺是一个必要的起点。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并实现更具包容性增长的系统性政策措施理应成为发展和增长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UNCTAD, 202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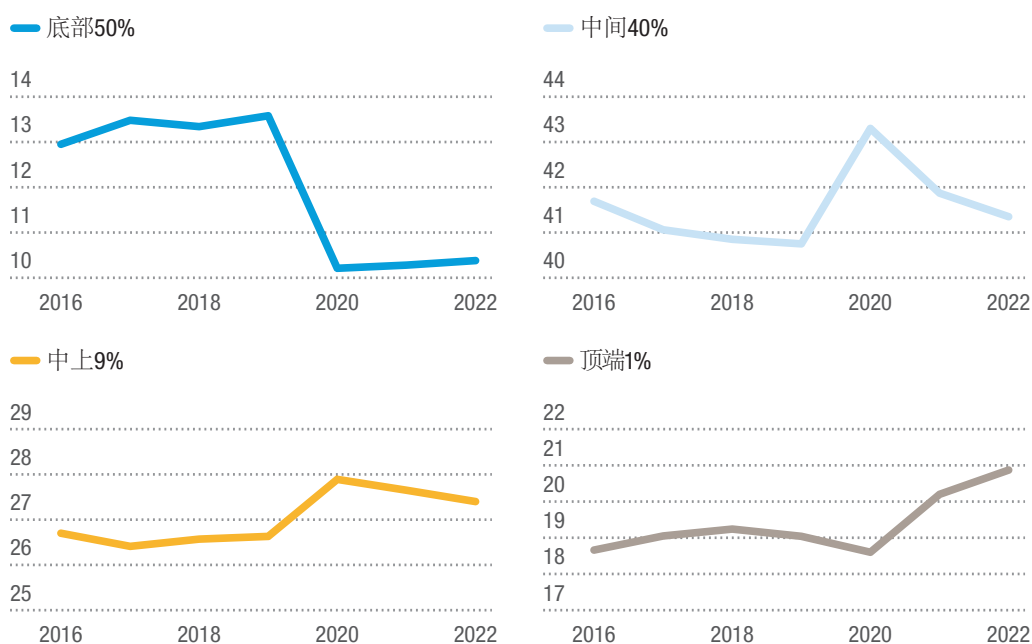
图一.15

在部分发达国家，低收入者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中首当其冲
税前个人收入分配
(占个人收入总额的百分比)

意大利



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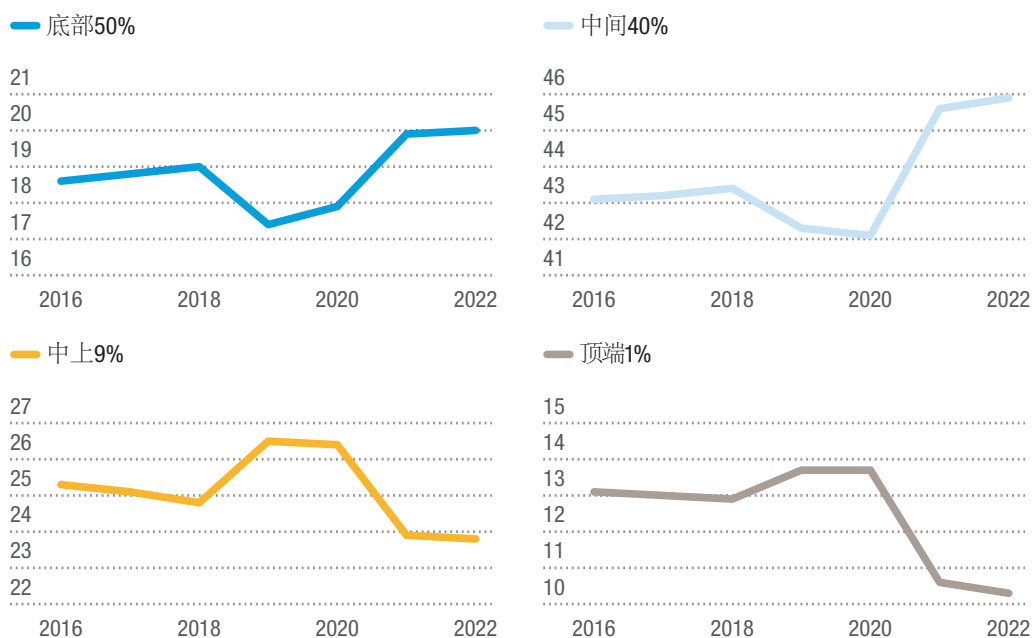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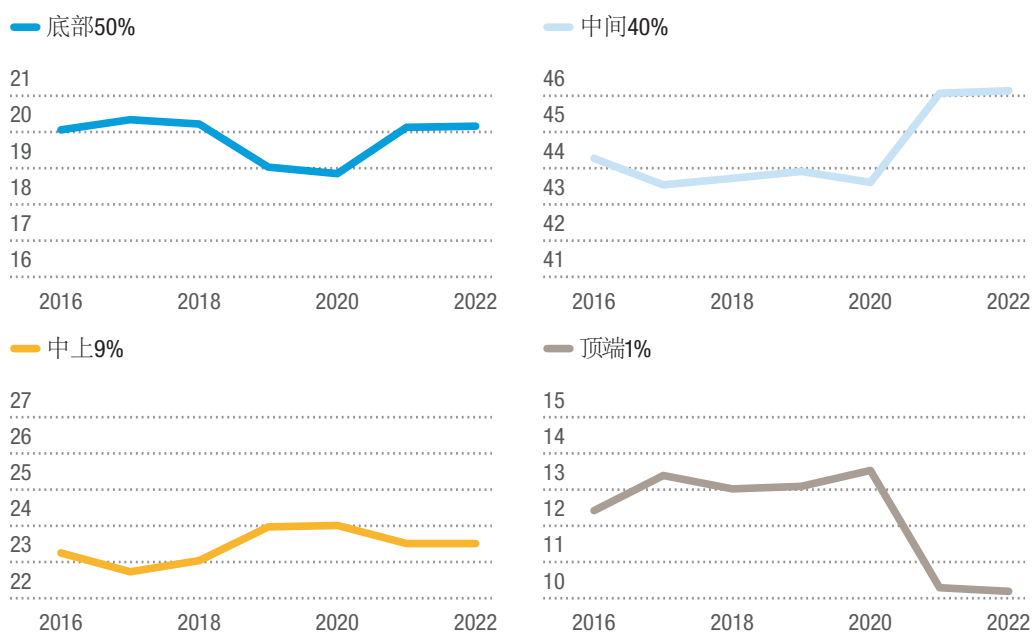
图一.16

疫情过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朝着更公平的方向演变
税前个人收入分配
(占个人收入总额的百分比)

德国



英国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G. 区域经济趋势

美洲

贸发会议估计，2024年美国的经济将维持2.5%的增长率，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首先，在财政层面，依据《降低通货膨胀法》和《芯片与科学法》实施的投资激励措施已经完全弥补了COVID-19相关转移支付和补贴的逐步减少造成的影响(Ahmad et al., 2024)。第二，在货币层面，2023-2024年间，美联储通过渐进式去通胀战略将10年期实际利率维持在1.5%至2%之间，从而推动了住宅投资在经历2023年的两位数下滑后出现周期性复苏。第三，人工智能的勃兴促进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投资，预计该领域的投资在2024年和明年将实现5%的年增长。

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将降至1.8%，主要原因在于负面的财政刺激。尽管货币宽松可以为改变宏观经济前景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核心通胀指数仍比美联储2%的目标高出1.5个百分点，在2024年9月首次降息50个基点后，未来货币宽松的口径和速度仍然存很大不确定性。

加拿大方面，预计经济增长将略有放缓，从2023年的1.2%小幅降至2024年的1.1%。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较为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整顿战略未能立刻见效。鉴于核心通胀指数已降至央行2%的通胀目标，加之经济几乎停滞，加拿大央行于2024年年中开始下调政策利

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望在2025年将GDP增速提高至2.1%。

墨西哥方面，贸发会议预测，受宏观金融环境持续紧缩(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和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3.2%降至2024年的2.0%。金融市场对政府债务趋势不明朗的反应已导致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而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拉丁美洲经济体出现短期衰退。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墨西哥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1.5%。美国经济预期放缓以及疫情带来的近岸外包很可能结束，都会对墨西哥明年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积极的一面是，随着通胀率降至4%，货币政策有望在今年年底转向扩张，加之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在南美洲，预计巴西今年经济增长将略有放缓，从2023年的2.9%降至2024年的2.8%。这种放缓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分化——当局一方面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结果是，通胀率似乎稳定在4%，高于央行目标1个百分点，迫使货币政策直至2025年继续保持紧缩。财政政策方向很不明朗，尤其是在2024年上半年巴西货币遭受小规模投机性攻击之后。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经济继续受益于粮食和石油出口的增长。然而，这些因素恐难以完全抵消内需的放缓。因

此，预计巴西2025年GDP增速将降至2.2%。

阿根廷2023年的经济衰退(经济萎缩1.6%)预计将持续到2024年。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急剧收紧，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3.5%。这场衰退是政府根据“扩张性财政紧缩”假说(Alesina and Ardagna, 1998)实施的去通胀战略的一部分。该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在2023年底让本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但其效果已被两位数的国内通胀所侵蚀。国内相对价格的初步变动有利于出口部门，该部门持续增长，预计将推动经济在2025年摆脱衰退，因此贸发会议估计阿根廷明年将实现4.8%的经济增长。稳定政策的负面影响是贫困率上升，以及对有管理的

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更加不确定。此外，外债偿付能力取决于基金组织的支持。阿根廷比索或将再度一次性大幅贬值，可能抑制2025年的增长前景。

在安第斯地区，受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最大几个经济体在2023年经济急剧减速，哥伦比亚和秘鲁几乎零增长，智利则出现了轻度衰退。2024年，随着这些国家通胀率的下降，经济将恢复增长。此外，2024年年中启动的货币宽松、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和优惠的贸易条件将助力这些国家在2025年维持GDP增长。不利因素在于，安第斯经济体容易受外部冲击，特别是美国利率突然调整的影响，可能导致这些经济体在2025年再次陷入缓慢增长。

欧盟

贸发会议预计，欧盟经济体2024年的GDP增长相较于2023年0.5%的增幅将有所回升。但预计增幅仍将保持在相对较低的1%水平。经济向好主要得益于服务业活动的增强。2024年6月，欧洲央行终于决定放松货币政策，将关键政策利率下调25个基点，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融资条件。此举使欧元区在货币宽松周期中领先于美国，因为美国推迟了货币宽松进程。然而，由于欧洲央行在过去两年累计加息450个基点，因此政策利率仍处于历史高位。这导致整个欧元区的企业和家庭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欧盟撤销了为减缓能源价格上涨而采取的财政支持措施，标志着2024年财政政策全面收紧。

贸发会议预计，随着货币政策逐步放松和融资成本随之降低，内需将得到增强，推动欧盟经济在2025年进一步回暖，达到1.6%的增长率。然而，持续的财政紧缩政策将继续阻碍经济增长。2024年7月，欧盟决定对进口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8%的关税，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包括对欧盟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对一些依赖中国市场的欧洲国家的涉外经济部门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法国方面，贸发会议估计经济增长将略有放缓，从2023年的1.1%小幅降至2024年的1.0%。持续的高利率继续拖累私人投资和消费，而主要贸易

伙伴的外部需求疲软也抑制了经济活动。今年上半年，法国政府宣布了两轮共计200亿欧元(约占GDP的1%)的支出削减，预计将导致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放缓。巴黎奥运会对第三季度GDP的增长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法国经济略有反弹，增幅1.3%，因为通胀回落和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有助于刺激私人支出。

德国方面，贸发会议预计，继2023年经济收缩0.2%之后，2024年将略有好转，出现0.2%的小幅增长。高利率本就拖累经济，雪上加霜的是，近期围绕绿色转型投资激励措施的融资政策高度不确定，反过来又会抑制投资支出。这一不确定性源于联邦宪法法院2023年底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定使用专项基金投资其他项目违宪，导致气候与转型基金的可用资源减少了600亿欧元。这一裁决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公共投资支出下降，为绿色转型私人投资提供财政激励受阻。鉴于德国当前的投资水平低于其他类似

发达经济体，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德国在绿色转型、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资支出可能会继续落后于类似发达经济体，因此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贸发会议估计，随着货币政策放松和家庭支出增加，2025年德国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达到1.2%。

贸发会议预计意大利2024年将维持0.9%的增长，与去年持平。在高通胀和工资低增长的共同作用下，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继续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持续紧缩的金融环境以及能源危机后推出的特别财政措施的取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随着对建筑业的慷慨补贴“超级奖金”逐步取消，近期房地产投资的强劲势头可能会减弱。“下一代欧盟”基金支持下的公共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负面趋势。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意大利经济增长率为1%，与2024年大致持平，这是因为融资条件放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需求回暖，可能会抵消财政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影响。

英国

贸发会议估计，2024年英国经济虽然相较于2023年几乎停滞的0.1%增长有所改善，但增长依然乏力，预计增幅0.9%。生活成本危机虽然缓解但仍在持续，英国脱欧进程带来的贸易摩擦继续阻碍出口，在此背景下，私人消费持续低迷，是经济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英国央行仍维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尽管通胀率已于5月回落至2%的目标，但预期中的宽松周期却一再推迟，直到8月才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这一情况导致企业和消费者支

出继续受到高借贷成本的制约。政府支出保持平稳，服务和投资方面的公共支出持续不足。

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英国经济增速将回升至1.4%，因为通胀降低和利率下调将有助于提振家庭支出。新一届政府可能在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扩大公共投资支出，这也有望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持续的贸易摩擦可能会继续对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俄罗斯联邦

贸发会议估计，俄罗斯联邦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5%，略低于2023年的3.6%。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个人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消费支出增长的原因包括：2022和2023年受抑制的需求延迟释放、去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以及劳动力市场趋紧。据估计，2024年年中劳动力缺口约为170万人；失业率降至2.6%，创历史新低。此前的财政刺激和高企业利润为投资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这两个因素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趋于平稳。

在信贷紧缩和外汇政策的作用下，2024年通胀率维持在4.3%至4.8%之间。尽管卢布在这一年保持稳定，但资本外流、外币需求上升(用于购买外资持有的国内资产)和预算支出增加仍对卢布造成持续压力。

贸发会议预计，由于国内信贷环境收紧、企业税预期上调以及贸易和金融压力加大，2025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将降至1.5%。

东亚

贸发会议估计，今年东亚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9%，低于2023年的4.2%。东亚整体经济减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东亚的增长率将进一步降至3.7%。



贸发会议预计，中国经济将小幅减速，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5.2%降至2024年的4.9%。强劲的净出口和工业部门的韧性表现推动了经济增长。制造业投资的加强，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加强，支撑了经济增长。就业和企业利润均略有改善。然而，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和消费疲软正在抑制经济扩张。消费尚未恢复至疫情前趋势水平，说明消费者信心和预期依然脆弱。自2022年初以来，曾经的经济增长支柱房地产业急剧萎缩。这一趋势延续到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均大幅萎缩，分别下滑10%和25%。

有待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构成重大风险，已成为政府的政策重点。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构成了经济下行的进一步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正在加大救市政策措施的力度，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样，在货币层面，中央银行也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并刺激消费。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最优惠利率、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和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两项再贷款机制，其中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额度3,000亿元人民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人民币。

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4.6%。贸易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围绕电动汽车和相关产品的贸易摩擦加剧，正在给涉外经济部门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国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关系和产品布局、在多种绿色能源产品领域的强大能力以及在技术和供应链

方面的优势，应有助于扩大出口。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建议。如果中国能够在年底前稳定房地产行业，并有效推进改革方案，中期内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合理增长。

贸发会议估计，大韩民国的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1.4%上升到2024年的2.3%。这一加速主要反映了出口的强劲表现，包括入境游客数量的回升。尽管通胀较去年显著回落，但央行依然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借贷成本继续抑制内需。高额的家庭债务抑制家庭支出，仍然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紧缩的货币政策伴随着同样紧缩的财政政策；预计政府支出的年增长率将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大韩民国的增长将放缓至2.1%，预计出口放缓和持续低迷的内需将对经济活动构成压力。

贸发会议估计，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降，从2023年的1.8%降至2024年的0.9%。疫情后阶段曾出现的对日本制造商品的强劲外部需求并未持续，由此导致的涉外经济部门疲软以及人口老龄化正在掣肘经济增长。尽管工资涨幅创下30多年来的新高，但由于社会负担加重以及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等原因，工资增长对消费支出的拉动作用有限。迄今为止，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正在动用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

2024年3月，日本央行时隔17年首次加息，代表着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变。此次加息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时代，标志着货币政策开始逐步正常化。同年7月，政策利率进一步上调至0.25%，引发市场震动并推动了日元走高。由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差缩小，高杠杆交易者和投资者纷纷撤离利差交易和相关市场，引发了快速抛售。央行行长承诺在市场稳定前

不会再次提高政策利率，降低了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在财政层面，日本政府于2023年底宣布了一项1,130亿美元的减税和燃料及公用事业费补贴计划，并作出了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承诺。

贸发会议预计，由于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制约内需并抑制经济增长，2025年日本经济增速将维持在1%。

南亚

在印度强劲增长以及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复苏的推动下，南亚经济前景持续向好。2024年，该区域经济预计增长5.7%，略低于2023年的6.1%。贸发会议预计，该区域2025年的增长将略微放缓，但仍将高达5.5%，与该区域最大经济体印度步伐一致；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正从极端气候事件或长期政治不稳定以及债务困境中恢复，两国的经济复苏也为区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外部失衡和对区域外化石燃料能源进口的依赖加剧，将使该区域容易受到通胀压力的影响，此外，持续的公共支出可能因政党联合组阁而变得复杂。

2024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6.8%的高位，低于2023年的7.7%。这一增长得益于持续强劲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与消费，以及服务出口的持续扩张。尽管服务出口和部分商品(如化学制品和医药产品)的出口增加，

但由于外部需求相对疲软以及化石能源进口花费巨大，印度的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仍将持续。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印度正在同步扩大国内非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能源供应，以支撑经济增长。非化石燃料的供应在过去八年里翻了两番，化石燃料的供应也增长迅速；2024年，印度国内煤炭产量增长80%，创下10亿吨新高。这一增长得益于乌克兰战争引发能源危机后，政府加大了公共投资力度。由于通胀率有望在今年年底降至4%，印度储备银行可能启动货币宽松政策并降低回购利率。回购利率自2023年初以来一直维持在6.5%，导致高杠杆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印度本财年的公共支出可能高出收入5.1%，在此背景下，若无金融不稳定或外部冲击，2025年印度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增速达到6.3%。

东南亚

贸发会议估计，东南亚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3.9%提高到2024年的4.5%，这得益于全球电子产品需求的逐步回升带动了该区域的贸易增长。由于担心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外流并对当地货币造成贬值压力，东南亚维持货币紧缩立场，这继续抑制区域内需。贸发会议预计，随着借贷成本下降，内需逐步增强并推动增长，2025年东南亚经济将保持较稳定的增长，增速达到4.4%。

贸发会议估计，印度尼西亚将在2024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增速为5.1%，略高于2023年的5.0%。尽管利率处于高位，私人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面对美国持续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印度尼西亚央行在4月进一步上调了政策利率，以避免与美国利率出现明显差异。印尼盾一向对利率路径的分化特别敏感，利率差异可能会对印尼盾造成进一步的下行压力。国内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了借贷成本，最终体现为私人投资支出放缓。

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计划和社会援助计划的财政支出，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入境游人数，特别是亚洲游客人数的增加提振了服务出口，而贱金属(特别是镍)出口量的增长也改善了涉外经济部门的收支平衡。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印尼经济将保持强劲增长，在降息预期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推动下，增长率将升至5.2%。

贸发会议预计，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3.6%加快到2024年的4.4%，因为通胀率下降和国家现金转移计划有助于刺激私人消费。随着一系列多年期基础设施项目持续推进，投资支出保持强劲。得益于入境游的持续恢复，服务业目前已接近疫情前的水平。然而，国际上持续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继续给马来西亚林吉特造成贬值压力。贸发会议估计，2025年马来西亚经济将实现4.0%的增长，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贸发会议估计，2024年泰国的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1.9%跃升至2.9%。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支撑了强劲的私人消费，而随着旅游业继续强势反弹，服务出口也蓬勃发展。财政预算几经推迟终获批准，公共支出势必会增加。拟实施的“数字钱包”计划将为家庭消费提供额外动力。尽管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等一些行业继续吸引大量投资，但投资支出总体上依然低迷。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泰国经济将保持2.9%的稳定增长。

越南仍然是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增速将从2023年的5.0%提高到2024年的5.6%。一系列工资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刺激私人消费支出。公共投资基金拨付进度加快，有效拉动了投资支出增长。虽然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越南对入境游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国际游客人数的持续回升也为涉外经济部门注入

了增长动力。由于信贷紧缩，房地产部门增长仍然低迷，继续拖累经济增长。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越南经济

将实现5.4%的增长，随着货币政策有望转向宽松，当前的信贷紧缩状况将得到缓解，建筑业也将迎来复苏。

西亚

贸发会议估计，西亚2024年将实现2.4%的增长，高于2023年的2.0%。经济活动的回暖主要得益于石油价格的企稳和主要石油出口国经济的反弹。但仍然存在重大风险：冲突扩大引发了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对红海的国际航运造成了连锁反应。⁴ 紧张局势升级的重大风险可能会影响整个区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经济表现，对某些国家——以色列、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国——尤其不利。⁵ 如果紧张局势不再升级，2025年西亚的增长预计将加速至3.9%。

贸发会议预计，沙特阿拉伯经济在2023年经历0.8%的历史性收缩后，将在2024年出现反弹，增长1.7%。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调控石油产量，包括通过限制产量将油价维持在每桶70至90美元之间，石油出口收入可能会随外部需求波动。尽管对Neom开发区(新未来城)庞大项目的投资正在削减，导致建筑业和相关上下游行业的预期活动减弱，但预计非石油行业仍将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可再生能源投资占能源总投资的比例仍然不到20%，这延迟了亟需的能源多样化和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

2025年，沙特阿拉伯经济预计将增长4.7%，石油和非石油部门(特别是旅游业、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强劲活动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贸发会议估计，2024年土耳其经济将增长3.5%，低于2023年的4.5%。内需因通胀逐年攀升而受到重创，通胀率曾在5月达到75%的峰值。2023年6月，土耳其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到2024年3月，政策利率已从最初的8.5%上调至50%，并维持在该水平。融资成本高企继续对需求和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土耳其里拉继续对美元等其他硬通货贬值。里拉贬值增加了外币计价外债(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私营公司持有)的偿还成本，但同时促进了出口，削弱了进口(化石燃料能源进口除外)。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出口商以及旅游业表现尤为突出。

土耳其当前的货币紧缩政策有望于2024年下半年结束，从而带动来年消费的逐步恢复并增强经济活动。在此背景下，贸发会议预计土耳其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8%。

⁴ 详见UNCTAD (2024a)。

⁵ 以色列军事行动对加沙及西岸的影响详见UNCTAD (2023a, 2024b)。

非洲

在经历2021-2023年的逐步放缓后，非洲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保持低迷。近期为恢复宏观经济稳定所做的努力应该会从2024年下半年起显现效果，特别是在几个大型经济体，因此非洲大陆的总体增长将从2024年较为疲软的3.0%加快至2025年的3.2%。然而，这两个数字仅略高于近年来非洲2.4%的人口年增长率。因此，GDP增长率仍然达不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取得重大进展所需的水平。各种困难拖累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前景和生计。

COVID-19疫情过后，非洲的政策制定者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均面临不利的经济环境，不得不迅速采取政策行动以应对复杂挑战。虽然精准的结构改革有可能在中期内促进增长，但政策调整过于仓促，往往在短期内引发严重的经济动荡，对非洲的普通民众，尤其是穷人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影响。

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许多非洲经济体的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在外汇储备的进口覆盖比率降低和资金流动低迷的情况下，这导致一些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固定汇率的非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货币大幅贬值叠加基本主粮供应短缺，有时还伴随着不受控制的流动性投放，已将多国的通胀率推升至远超历史均值的高位，安哥拉、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便是如此。为遏制通胀，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在2024年8月将利率提高至20%-30%。

在财政层面，整个非洲大陆目前的主流立场是进行财政整顿，以应对债务

形势严峻、融资成本上升、援助资金减少、预算赤字巨大(疫情后扩大国内资源调动的成效不大，加剧了赤字)以及出口收入下降(包括在一些出口量下降的大型油气出口国)等问题。

面对经济困境、高通胀率(尤其是基本主粮的高通胀率)和仓促实施的改革，非洲大陆各地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例如，在肯尼亚，血腥的示威迫使政府撤回了一项有争议的税收法案。总体而言，这凸显了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推行改革的复杂性。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即使整个非洲大陆的通胀压力开始逐渐缓解，仍有其他关键因素在继续阻碍发展。例如，持续不断的冲突，包括利比亚以及萨赫勒国家和中部非洲多个地区的冲突。再例如，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冲击的负面影响预计将在2024和2025年加剧本就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已有33个非洲国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而非洲2024年的谷物年总产量预计将比2023年下降3%。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干旱造成了大面积的作物损害和枯萎，尤其是在南部非洲(FAO, 2024)。

贸发会议估计，在南非，电力供应和物流的改善可能会助力经济微弱反弹，从2023年的0.6%提高到2024年的0.9%。与另外两个近年来增长率低于历史均值的非洲主要经济体——埃及和尼日利亚一样，南非经济仍面临巨大阻力。贸发会议预计，南非在2025年仍将保持相对疲软的增长，增长率仅为1.4%。

大洋洲

贸发会议预计**澳大利亚**经济将继续逐步减速，从2023年的2.0%降至2024年的1.4%。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疫情结束后，政府为了使通胀率回归目标水平，颁布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但回归目标水平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截至2024年年中，单位劳动力成本已同比上涨6%。预计今年底的消费者通胀率将在3%左右，比央行2%的目标高出1个百分点。预计明年将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推动GDP增长在2025年回升至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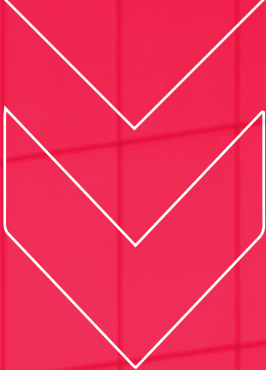
新西兰方面，据贸发会议估计，在今年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负财政刺激的作用下，2024年新西兰的增长率将仅为0.9%，略高于2023年的0.6%。与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的通胀率有望在2024至2025年间逐步下降，这预示着货币政策明年有望放松。贸发会议预计，2025年新西兰的增长率将回升至2.0%。



参考文献

- Alesina A and Ardagna S (1998). Tales of fiscal adjustments. *Economic Policy*. 13(27):489–585.
- Ahmad S, Nabors G and Sheiner L (2024).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fiscal policy and the econom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27 September.
- Barbosa-Filho NH (2008). Verdoorn's la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Cooper R (2022). The Biden–Trump stimulus shows how badly Obama's 2009 plan failed. *The Week*. 10 January.
- de Soyres F, Santacreu AM and Young H (2022). Fiscal policy and excess inflation during COVID-19: A cross-country view.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5 July.
- Engerman DC (2015). The rise and fall of central planning. In: Geyer M and Tooze A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4).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 – Triannual Global Report*. Rome.
- Friedberg AL (2024). Stopping the next China shock. *Foreign Affairs*. 20 August.
- Jayadev A and Konczal M (2010). When is austerity right? In boom, not bust. *Challenge*. 53(6):37–53.
- 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
- Mehrotra N and Sergeyev D (2021). Debt sustainability in a low interest rate world.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4:1–18.
- Ocampo JA (2014). Finishing the job of global tax cooperation. *Project Syndicate*. 29 April.
- Palley T (2016). Zero lower bound (ZLB) economics: The fallacy of New Keynesian explanations of stagnation. IMK Working Paper No. 164. Hans Boeckler Found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 Stiglitz JE (2023). A victory lap for the transitory inflation team. *Project Syndicate*. 13 November.
- Taylor L and Barbosa-Filho NH (2021). Inflation? It's import prices and the labor sh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0(2):116–142
- Toporowski J (2024). Monetary policy and illiquidity. Working Paper No. 218.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 UNCTAD (201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Adjusting to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3.II.D.3. Geneva).
- UNCTAD (2017).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Beyond Austerity – Towards a Global New Dea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7.II.D.5. Geneva).
- UNCTAD (2019).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Financing a Global Green New Dea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II.D.15. Geneva).
- UNCTAD (2020).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From Global Pandemic to Prosperity for All: Avoiding Another Lost Decad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0.II.D.30. Geneva).
- UNCTAD (202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Global Disorder and Regional Respons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II.D.44. Geneva).
- UNCTAD (2023a).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y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Report on UNCTAD assistance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o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TD/B/EX(74)/2. Geneva. 11 September.
- UNCTAD (2023b).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Growth, Debt and Climate: Realig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3.II.D.24. Geneva).
- UNCTAD (2024a). Navigating troubled waters: Impact to global trade of disruption of shipping routes in the Red Sea, Black Sea and Panama Canal. Geneva.
- UNCTAD (2024b).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destruction in Gaza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Geneva.
- UNCTAD (2024c).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pdate*, April 2024. Geneva.
- Weber IM and Wasner E (2023). Sellers' inflation, profits and conflict: Why can large firms hike prices in an emergency?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43.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24 贸易 和发展报告

第二章

反弹的假象： 2024年国际市场

商品贸易的实际增长率在2023年下降1.2%后，预计在2024年反弹约2%。由于世界两大经济体预计将出现经济减速，2024年第一季度观察到的强劲趋势将在年底前放缓。此外，提前下订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24年初的增长势头。

2024年，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台了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

服务贸易仍然比货物贸易更具活力。2024年第一季度，运输和旅行板块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增长率约为5%。

许多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已从2022年的高峰回落，但按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高位。

2024年初，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有所恢复，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区域的主权债券发行量出现反弹（尽管在非洲的反弹有限）。然而，借贷成本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联合国



主要政策启示

- ▶ 在商品贸易疲软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超越制造业主导的出口模式，推动在服务部门，包括非贸易服务部门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 ▶ 迅速淘汰化石燃料是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和可持续经济多样化的必要条件。对化石燃料的持续补贴以及化石燃料开采和贸易的高盈利性将危及绿色转型进程。
- ▶ 贸发会议提出了贯穿债务生命周期五个阶段的一系列转型建议，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筹资成本，降低主权债务脆弱性。



A. 导言



2024年，主要国际市场出现反弹，包括制成品、服务、初级商品和金融资产贸易。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之后，大宗商品价格已从**2022年**的高位部分回落。**2024年第一季度**，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转为正值，商品贸易增长也重回正区间。

然而，在表象之下，政策制定者面临着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变暖、金融和货币不稳定加剧了人们对因危机和投资不足而疲弱的全球经济的不满（第一章）。

不确定性给国际市场带来压力，可能分散政策制定者对长期挑战的关注。

因此，当前时期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眼前的问题转移了人们对长期挑战的关注。这在许多领域削弱了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稳定性。正如**2024年8月**的市场动荡所示，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变化，加上金融头寸快速平仓，危及国际贸易、货币和金融体系。最关键的是，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疲弱的宏观经济基础无法为发展提供有利的经济和金融环境。

本章将回顾国际贸易(B节)、初级商品(C节)和资本流动(D节)的当前趋势和具体挑战。同时，还将指出对发展政策构成核心挑战并需要获得进一步多边关注的主要问题：

- 在商品贸易疲软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超越制造业主导的出口模式，广泛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 化石燃料的开采和贸易利润丰厚，推动了当前的“棕色”能源投资和出口，同时，对化石燃料的持续补贴也危及亟需推动的绿色转型进程。
- 需要在债务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改变全球金融架构，以降低发展筹资成本。



B. 国际贸易：2024年的复苏并非隧道尽头

1.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限制反弹势头

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在2023年陷入停滞，预计2024年将实际增长2%至3%。⁶ 2023年商品贸易实际下降1.2%，是导致2023年整体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货物总流量仍占全球贸易总量的75%以上。贸易局势紧张、全球需求低迷、库存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支出暂时转向耐用品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共同导致了贸易额下降(UNCTAD, 2024h)。因此，全球商品贸易相对于经济产出的弹性跌至负值。

这一变化在近几十年来是前所未有的。除了2023年，全球贸易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仅在2009年和2020年两次出现年度收缩。然而，在这两次危机中，世界生产总值也同步收缩。因此，弹性(即贸易量变化百分比与世界生产总值变化百分比的比率)仍为正值。2023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全球经济活动仍在增长的同时，商品贸易却出现了萎缩。

除了这些算术上的考虑之外，这一发展趋势还凸显了商品贸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历的结构性放缓。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则更具活力。

2023年，全球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约5%，凸显了国际服务贸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贸易支持者最近更加重视国际服务。随着服务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在2023年达到近25%，并预计将进一步增长，⁷ 一些政策界和学术界对国际服务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寄予厚望。

然而，对于服务贸易能否成为撬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主要杠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不过，主流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提高生产率并在护理、零售、教育和其他个人服务等往往不涉及国际贸易的吸纳劳动力的部门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应成为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石。这似乎是确保目前大部分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实际工资增长的唯一途径。本节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⁶ 只有在2023年所有国民账户数据发布后，才能对该年的情况做出精确估计。然而，对关键价格指数的初步估计以及已发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次级项目的名义数据表明，2023年贸易总额的实际增长将放缓，甚至略有萎缩。

⁷ 虽然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World Bank and WTO, 2023)发现，服务活动——尽管不仅仅来自服务贸易——目前占全球贸易增加值的一半左右，但2023年服务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略低于25%。然而，这两种统计方法并不矛盾，因为在服务产生的增加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国际贸易制成品所必需的，因此，在追踪贸易总流量时，这些增加值被计入货物而不是服务项下。

地缘政治动荡时期的货物贸易

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增长前景已恢复为正值。贸发会议的即时预测模型预测，2024年出口收入将接近32万亿美元。然而，区域发展并不均衡。虽然世界贸易收入正在恢复增长，但不太可能超过2022年的历史最高水平(UNCTAD, 2024c)。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口值近期停滞甚至下降(图二.1)，同时也因为关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有所回落(C节)。

在作为国际贸易重要参与者的欧洲，欧元区货物出口的欧元收入在2024年第一季度仍比去年同期低3%。尽管通货膨胀机械地推动了收入增长，但情况依然如此。更确切地说，欧元区12个最大的出口国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都出现了下降(ECB, 2024)。在英国，以英镑计算的出口收入也下降了4%(United Kingdom, 2024)。总体而言，这凸显了来自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疲软，以及欧洲出口企业在维持其世界市场份额方面面临的困难。

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强劲的增长轨迹在2024年上半年对商品出口增长贡献最大。具体而言，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出口收入呈现强劲增长，到2024年年中，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约7%至9%，主要得益于汽车和半导体出货量增加。

然而，两个关键因素表明，这种强劲的出口模式可能不会持续到第二季度，明年很可能同样如此。一个因素与提前向中国下订单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风险有关。另一个因素则尤其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整体放缓的风险相关。

关于提前向中国下订单，一些分析师认为，这对于2024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数据强于预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前下订单是因为经济主体预计，作为全球主要制成品出口国的中国将在2024年面临新的贸易限制(*Financial Times*, 2024f)。2024年5月，美国宣布将从8月开始提高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United States, 2024)，其中包括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三倍至100%。虽然二者之间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但2024年6月，中国创下了990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顺差纪录，而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疲软和产能强劲，这可能是加剧贸易紧张局势的另一个因素。

继美国实行贸易限制之后，世界主要市场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例如，欧盟在7月份证实，将对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尽管最高税率仅为37.6%。土耳其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40%的额外关税。8月底，加拿大财政部决定“采取措施，保护加拿大工人和关键经济部门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上述措施将于2024年10月生效(Canada, 2024)。

采取更多保护主义行动的情况不仅限于经合组织经济体。在发展中亚洲，印度尼西亚7月宣布，计划对主要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征收最高200%的进口关税(*Reuters*, 2024)。印度最近实施了一系列反倾销措施，一些观察人士报告说，印度政府内部关于是否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产品和外来投资的辩论日益激烈。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正在恶化，而印度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1”的制造业目的地(*Financial Times*, 2024a)。泰国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负责审查对中国进口的限制(*Foreign Policy*,

2024年初商品贸易的强劲趋势可能会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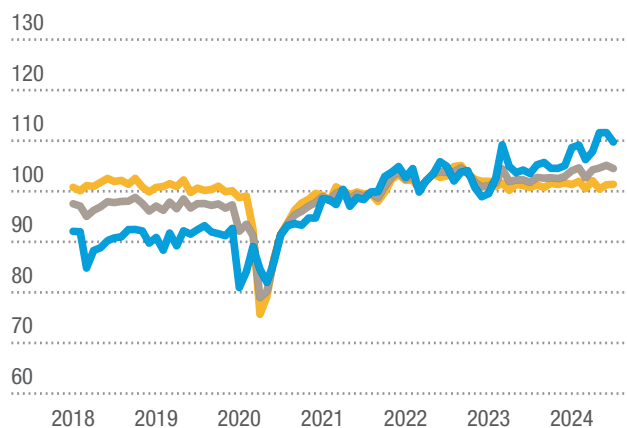
采取更多保护主义行动的情况不仅限于经合组织经济体。

图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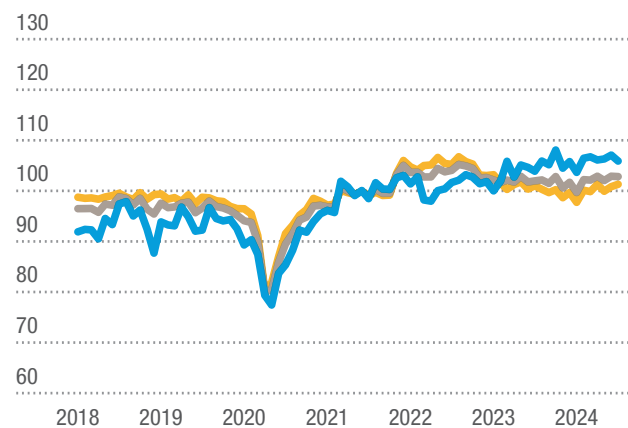
世界商品贸易再次增长，但各区域之间出现分化
2018年1月至2024年7月实际贸易流量
(2021年平均值=100)

A. 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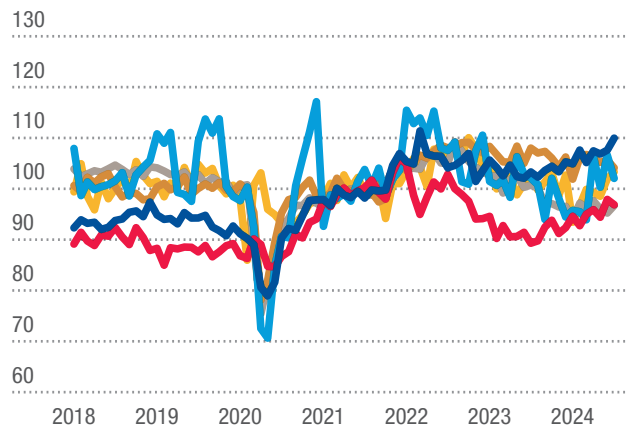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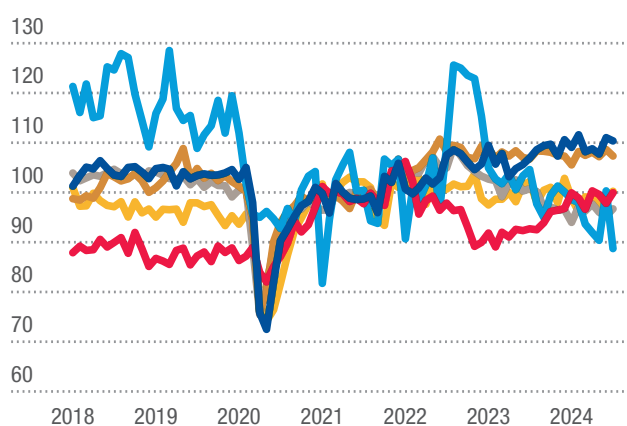
— 全球 — 发达经济体 — 新兴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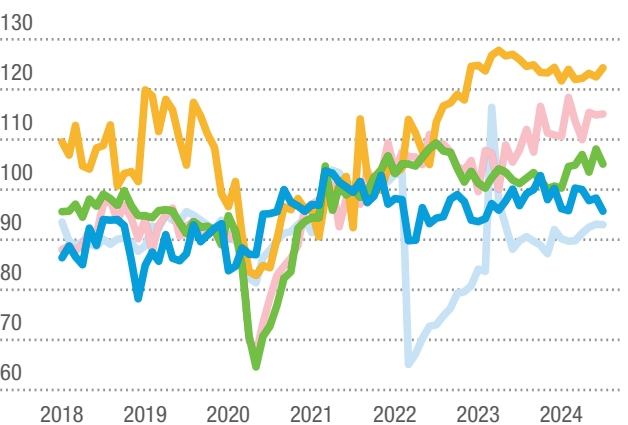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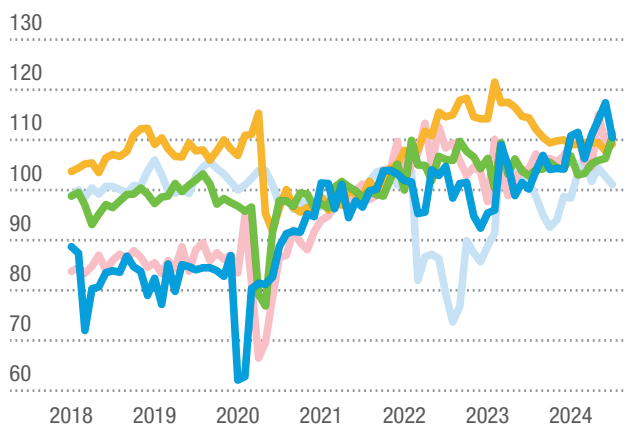
B. 进口



— 日本 — 英国 — 美国 — 亚洲发达经济体，不包括日本 — 欧元区 — 其他发达经济体



— 中国 — 非洲和中东 — 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 新兴亚洲，不包括中国 — 拉丁美洲



资料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世界贸易监测数据库。

注：国家组别划分依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的数据(见Ebregt, 2020)。

2024)。在拉丁美洲，智利对中国钢铁征收反倾销关税。巴西和墨西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在经济减速方面，自疫情以来一直支撑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已开始显露疲态。鉴于美国以及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除外，该国到2024年年中对世界进口的贡献为负)提供了最大的

需求侧动力，预计全球经济在2024年下半年将进一步面临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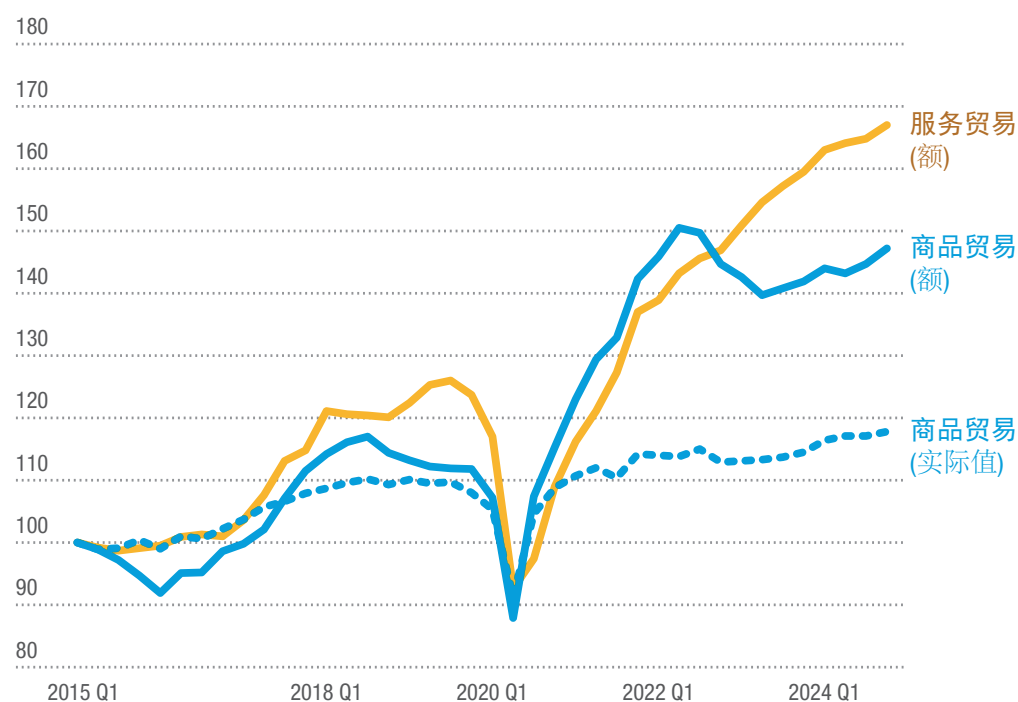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未来几个季度商品贸易前景疲软的迹象已在一些先行指标中显现。例如，7月发布的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新出口订单部分连续第二个月萎缩(S&P Global, 2024)。贸发会议9月份的贸易即时预测显示，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贸易增速将放缓(图二.2)。



图二.2

服务贸易继续表现出比商品贸易更强的活力

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4年第四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季度数据
(2015年第一季度=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Q1, 第一季度。所有系列数据均按季节调整。2024年第二至第四季度的数据为贸发会议即时预测的估计值。



服务贸易仍然更具活力

与之前的趋势一致，2024年服务贸易的前景相较于商品贸易更为乐观。第一季度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的年化增长率计算，以美元计算的全球服务出口环比上升9%。高碳排放型服务增长最快：旅行增长了18%，运输增长了15%。所有其他商业服务增长了5%。

然而，这一增长背后亦有隐忧：当前运输行业的繁荣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足迹。海运方面，截至2024年9月，收入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需要使用更长的贸易路线完成两点之间的运输任务，而且往往需要加快航速(UNCTAD, 2024f)。这是由于船只只在红海地区遇袭，结果不仅推高了运输成本，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区域来看，2024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亚洲和大洋洲、北美和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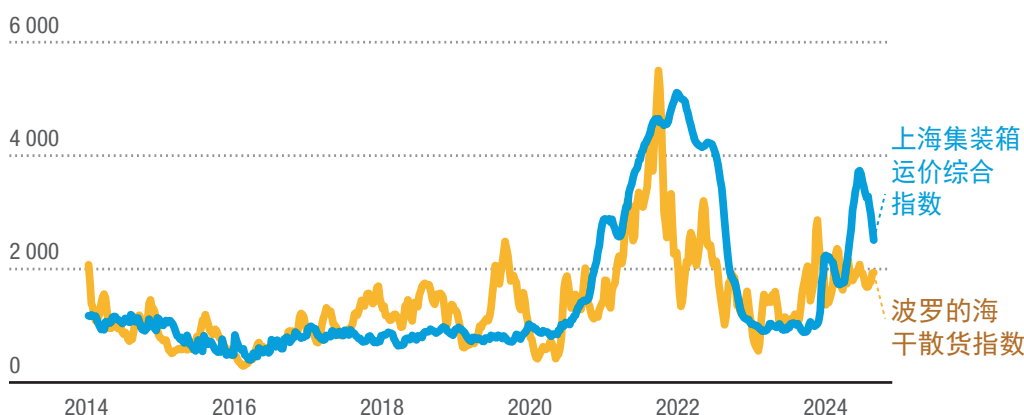
洲的服务出口整体增长，按季节调整后的年化增长率计算，环比上升8%至1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得益于墨西哥国际运输服务的强劲表现，增长率达到19%。

对于2024年余下时间，从第二季度开始，贸发会议对以美元计算的服务贸易的预测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将继续扩张，按季节调整后的年化增长率计算，环比增幅在2%至5%之间，明显低于第一季度增速。预测显示，服务出口收入年增长率将接近6%，而商品出口收入年增长率将仅略高于2%。

由于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集装箱运价大幅上涨，预计运输收入将在2024年大幅反弹(图二.3)。这主要是由于需求增长以及红海航线中断，其次是由于2024年初巴拿马运河的延误(UNCTAD, 2024f)。

图二.3

集装箱运价2023年恢复正常后，2024年再次飙升
每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和上海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
(基准日=1,0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克拉克森航运情报网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的基准日为1985年1月4日(指数=1,000)，上海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的基准日为2009年10月16日(指数=1,000)。所示的两个系列数据均截至2024年9月。

在旅行方面，2024年1月至7月期间，国际游客数量约为7.9亿，比2023年增加约11%，但比2019年减少4%。欧洲的强劲需求和亚太地区多个市场的重新开放推动了这一回升。数据显示，今年年初增长强劲，第二季度则较为温和。2024年9月的联合国旅游信心指数显示，尽管低于5月至8月的预期值(得分130)，但2024年9月至12月预期前景乐观，得分为120(信心指数范围为0-200, 100表示与预期表现持平)。总体而言，2024年全年的入境人数与201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大致相当。在国际旅游收入方面，63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有47个在2024年上半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其中许多国家报告称，以当地货币和现价计算，与2019年相比实现了强劲的两位数增长(UNWTO,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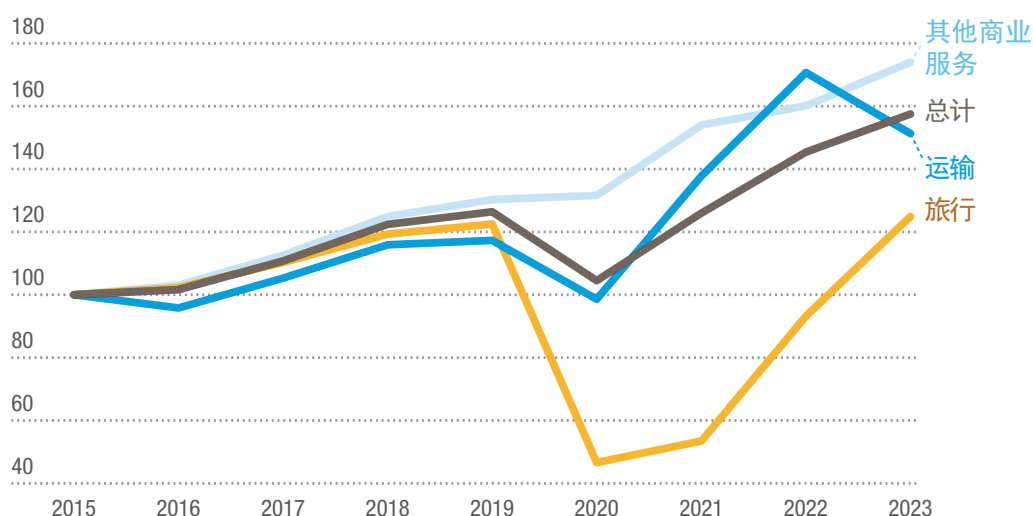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预计2024年其他商业服务将与服务贸易大致同步增长。这些多样化的活动主要包括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还包括建筑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中，电信和计算机服务以及金融服务增长相对较快。

回顾过去，服务贸易在2023年录得强劲增长，按进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球商业服务贸易收入增长约9%。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服务贸易增长了13%。就少数有数据的非洲经济体而言，增长率为11%。这些是增长最快的区域。除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现任和前任成员国商业服务出口停滞不前外，所有其他主要区域在2023年都实现了7%至9%的增长(WTO, 2024)。



图二.4

商业服务增长保持稳健，而旅行部门仍在恢复中
全球商业服务出口，部分板块
(2015年=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其他商业服务包括货物相关服务、建筑、保险和养老金、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收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2023年的增长构成得益于旅行部门的持续快速反弹，国际旅行收入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全球运输服务收入下降了8%，这也反映在航运费率急剧但短暂的下跌上，运价一度回落至疫情前的水平。包括货物相关服务在内的其他商业服务与所有服务的总体增长保持一致。2023年，商业服务占服务总量的57%，位居首位，其次是运输和旅行，各占服务总量的20%。与货物相关的服务排名垫底，占比为3%(图二.4)。

展望未来，全球贸易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小

除了全球贸易反弹以及预计2024年增长放缓外，优先考虑国内问题以及履行气候承诺的迫切需要⁸正在促使贸易和产业政策发生转变。对贸易限制和内向型产业战略的依赖性增加，尤其是大型经济体对此的依赖程度增加，预计将阻碍国际贸易的总体平稳运行，特别是影响铝、半导体和钢铁等关键部门。然而，行业增长放缓并不总是意味着总体贸易流量减少，预计2024年中国钢铁出口将创下八年来的新高，就说明了这一点(*Financial Times*, 2024c)。

全球商品贸易长期的增长放缓及其正在进行的重构(UNCTAD, 2023a)，以及信息和通信与数字技术的重大突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展路径。中低收入国家一度青睐的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出口带动的增长为核心，吸纳大量非技术工人，提升生产率，并

最终促进经济转型——似乎越来越无法在这些方面同时取得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今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展开更广泛的思考。

下一节将梳理决策者需应对的一些问题。

2. 寻求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服务主导型出口的局限性

直到不久前，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路径还主要与工业化相关联。制造业出口被寄予厚望，特别是在国内市场有限的小型经济体，被视为强大的引擎。理由很简单。通过专注于制造业，这些国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更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包括为从农村地区流向不断发展的城市的相对缺乏技能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一种特定类型的制造业出口主导型战略——理想情况下应反映一国的具体背景和条件——被认为是推动这些国家向最先进经济体靠拢的动力。一些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案例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蓝图，尽管将这些成功仅仅归因于更大的贸易开放性是极具误导性的。这些国家通过结合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和外向型战略，极大地改变了其经济面貌(关于这一模式局限性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四章)。

自这些经济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快速转型以来，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

⁸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不足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要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从2010年的水平至少减少45%，并在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开采，包括由化石燃料公司采取行动(*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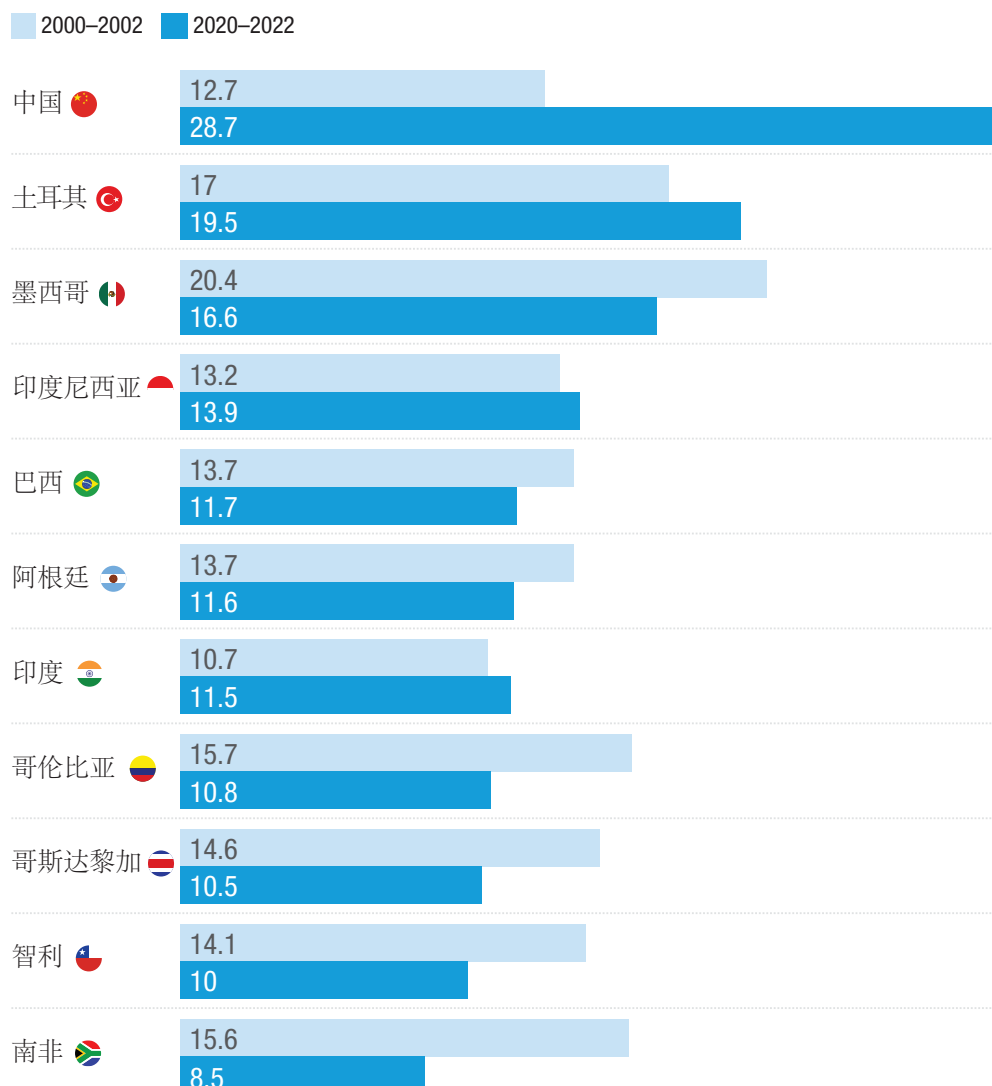
重大变化。中国在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工业机器人和数字技术的兴起、全球贸易模式的转变以及对可持续性的日益重视，已经重塑了经济发展的轮廓，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制定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实计划，更

不用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提供就业方面，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许多拥有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均经历了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的下滑(图二.5)。



图二.5

过去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大多出现下滑
部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虽然制造业依然重要，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化作为增长战略的有效性已经受到削弱。部分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充足，但已不再适应日益以技能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为核心的制造业流程。对工业化以及货物和服务贸易可能产生的沉重生态足迹和碳足迹缺乏关注，进一步削弱了战略的有效性(见插文二.1)。研究一再证实，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物质损失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及其最贫困的公民承担(UNCTAD, 2022, 2023a)。

过去的研究指出了问题所在，但在确定所需行动方面存在不足

对主流发展战略局限性的担忧屡见不鲜。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和提供就业方面，世界银行经济学家(Hallward-Driemeier and Nayyar, 2017)就曾表示担心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恐日益难以做到一举两得：既提升生产率，又为非技术工人创造就业。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对制造业部门和可贸易服务能够带来的益处持总体积极态度，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能够成功实现“3C”目标，即：

-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发展企业生态系统，从单纯追求低工资转向更广泛地考虑商业环境、法治以及利用技术完成财务交易。
- 能力(Capabilities)。使工人掌握新技能，建立更强大的企业，并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以采用现代技术。
- 连通性(Connectedness)。改善物流，降低对制成品的贸易限制，减少对服务的贸易限制。

Baldwin 和 Forslid(Baldwin and Forslid, 2023)更进一步预计，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在未来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由于服务业的成功取决于与制造业不同的因素，人们对服务贸易提高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地区相对高技能工人收入的潜力持适度乐观态度。这一观点基于一种假设，即服务贸易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直接出口其比较优势的来源，即劳动力(由于其生产率较低，因此成本较低)，而无需先用这些劳动力制造商品，然后再出口商品。换言之，与发展工业基础相比，加入服务增值链所需的推动力要小一些。然而，与在金融高度开放的情况下积累实物资本所需的时间相比，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Baldwin (2024)利用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增值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定义了一个基于产出的指标，以捕捉各国何时经历了出口导向型增长阶段。研究考虑了1995-2008年和2008-2020年两个时间段以及三个收入水平组别，试图确定出口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是否以及何时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可计算出相关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在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数据库所列国家中，大多数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1995-2008年期间经历了制造业出口带动的增长。当时，约60%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80%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增速高于GDP。约40%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50%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可贸易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于GDP。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里，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增长实际上主导了这两类国家的发展。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制造业主导的出口曾经支撑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以往的全球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危机过后，情

如今，服务业主导出口增长的可能性更大。

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2020年，只有不到20%的中等收入国家仍然实现了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增长，而近70%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近90%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这些年间实现了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有趣的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尽管在两个时间跨度之间，制造业主导增长的国家占比略有

下降，服务业主导增长的国家占比有所上升，但制造业和(或)服务业主导增长的国家所占百分比更为稳定(图二.6)。这支持了一种观点，即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失去动力，而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正在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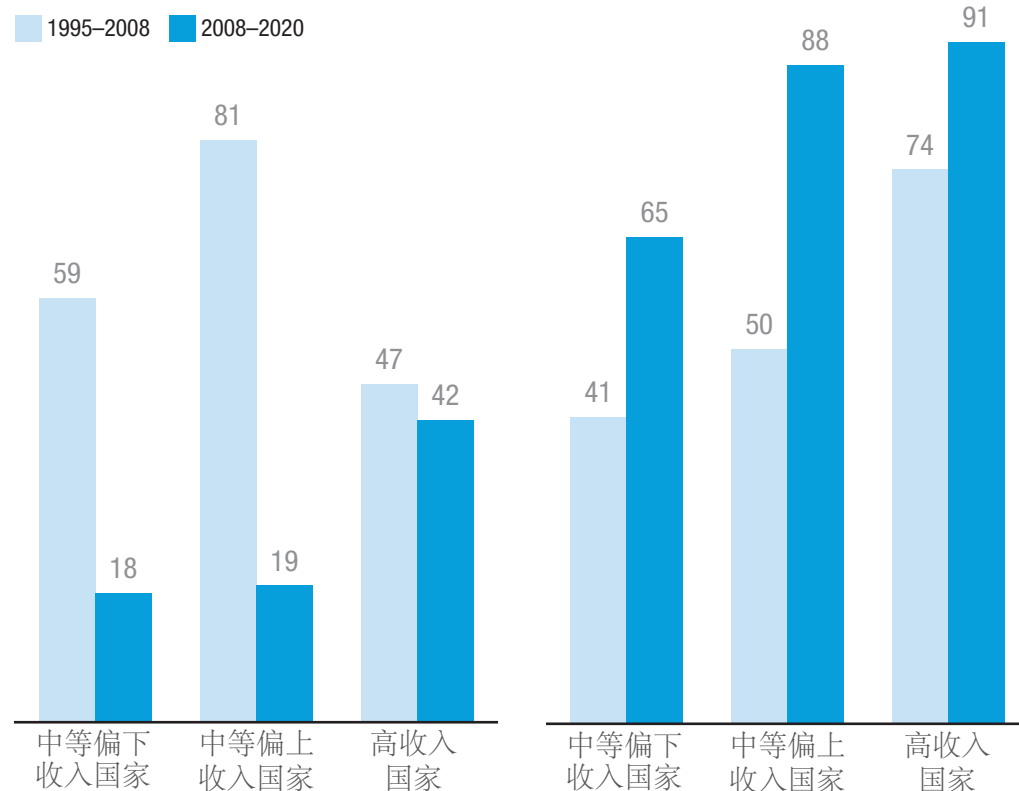


图二.6

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增长正日渐式微，而服务业主导的出口增长正蓬勃发展
部分收入组别中经历了制造业和/或服务业主导出口增长的经济体所占比例
(百分比)

A. 制造业

B. 服务业



资料来源：Baldwin (2024)。

注：本图反映了所考察的两个时期内，每个收入组别中经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带动增长的国家所占比例。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两个部门中某一部门的出口增加值增速高于GDP，则认为该国在该部门实现了出口带动的增长。一个国家可以同时经历这两种类型的出口带动的增长。服务业带动的出口增长只考虑信息和通信技术带动的服务贸易，不包括运输和旅游业。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组包括17个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包括16个经济体，高收入国家组包括43个经济体。



需求侧措施和现代产业政策需要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

虽然研究成果就结构转型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点，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其政策建议并不完全适用。例如，Hallward-Driemeier和Nayyar (2017)提出的政策选项大多是供给侧措施，未能认识到现代产业政策在从根本上调整和扩大整体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侧方面发挥的基本作用。此外，虽然让工人掌握新技能看似前景光明，但所提出的政策与大多数非技术工人关系不大，而非技术工人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技术工人。由于这些人群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均收入最低国家的劳动力主体，因此需要提出一种更加全面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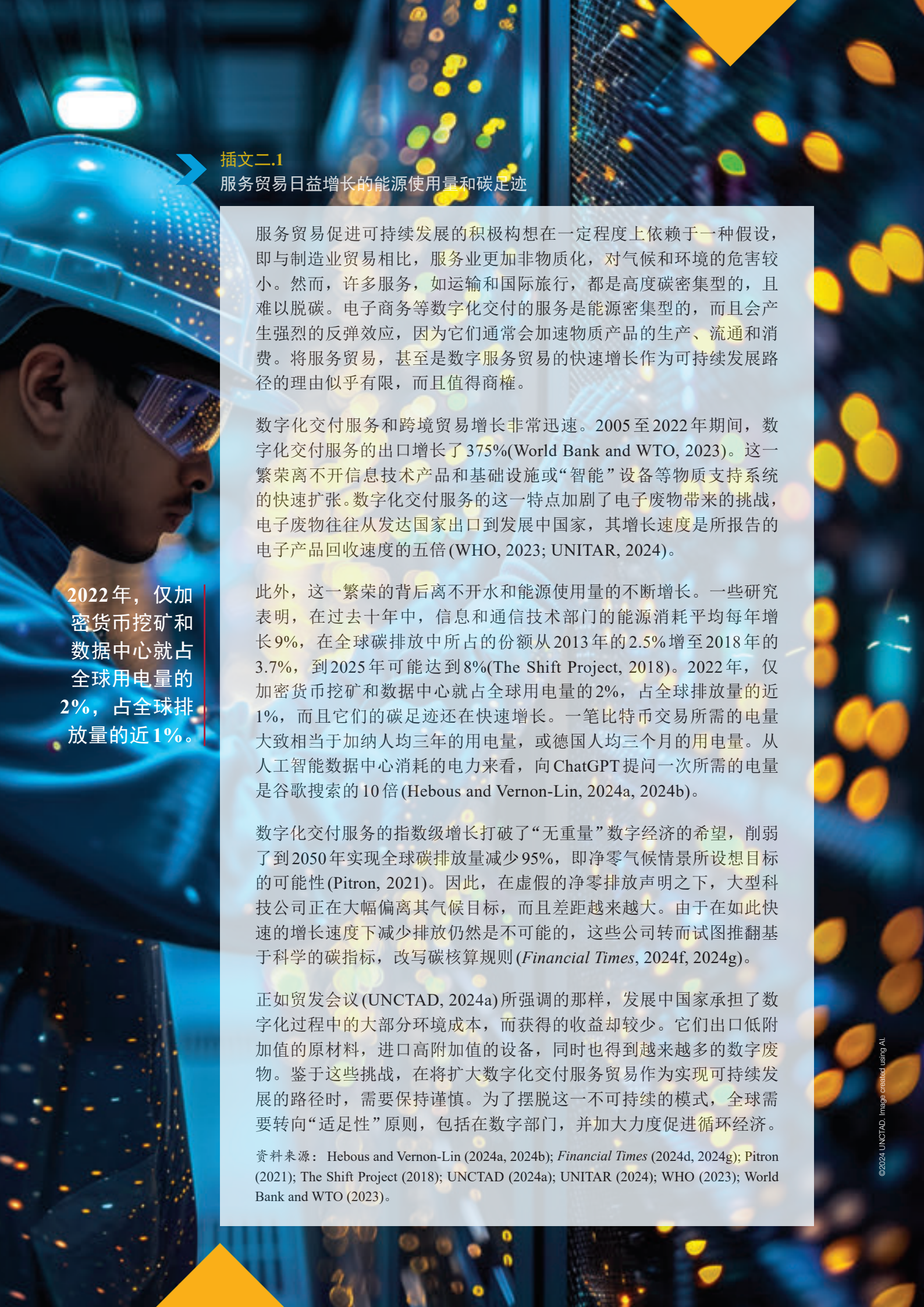
简而言之，必须更加重视第三产业，尤其是非贸易产业。如果政府不制定明确着眼于通过经济活动结构转型以实现某种公共目标的政策——即Juhasz等人(Juhasz et al. 2019)定义的产业政策，则市场靠自身的力量不太可能推动所需的结构改革(更不用说无法解决对较贫困国家非技术工人影响最大的紧迫的生态问题)。

现代产业政策的战略方法应扩大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这是具有气候意识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考虑到上述讨论，这种方法还应超越工业化本身，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环境、人口、金融和技术因素之间日益重要的相互作用。

服务贸易本身面临若干限制，很难指望其成为制造业主导型发展的现实替代方案。服务贸易难以实现一举两得：既提高生产率，又为非技术工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更不用说某些活动还造成日益增长的负面环境足迹(插图二.1)。

一方面，具有生产率和活力的可贸易服务——如银行业、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为非技术工人创造广泛就业机会的空间有限，原因与当今制造业无法为无技能劳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相同(见第四章关于“金融诅咒”的讨论)。简言之，这些部门往往主要依赖于高技能和自动化流程。另一方面，由于实现有意义的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后向和前向联系的可能性有限，旅游业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无法显著提高生产率。

需要制定涵盖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的现代产业政策。



插图二.1

服务贸易日益增长的能源使用量和碳足迹

服务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假设，即与制造业贸易相比，服务业更加非物质化，对气候和环境的危害较小。然而，许多服务，如运输和国际旅行，都是高度碳密集型的，且难以脱碳。电子商务等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是能源密集型的，而且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效应，因为它们通常会加速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将服务贸易，甚至是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作为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理由似乎有限，而且值得商榷。

数字化交付服务和跨境贸易增长非常迅速。2005至2022年期间，数字化交付服务的出口增长了375%(World Bank and WTO, 2023)。这一繁荣离不开信息技术产品和基础设施或“智能”设备等物质支持系统的快速扩张。数字化交付服务的这一特点加剧了电子废物带来的挑战，电子废物往往从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其增长速度是所报告的电子产品回收速度的五倍(WHO, 2023; UNITAR, 2024)。

此外，这一繁荣的背后离不开水和能源使用量的不断增长。一些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能源消耗平均每年增长9%，在全球碳排放中所占的份额从2013年的2.5%增至2018年的3.7%，到2025年可能达到8%(The Shift Project, 2018)。2022年，仅加密货币挖矿和数据中心就占全球用电量的2%，占全球排放量的近1%，而且它们的碳足迹还在快速增长。一笔比特币交易所需的电量大致相当于加纳人均三年的用电量，或德国人均三个月的用电量。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来看，向ChatGPT提问一次所需的电量是谷歌搜索的10倍(Hebous and Vernon-Lin, 2024a, 2024b)。

数字化交付服务的指数级增长打破了“无重量”数字经济的希望，削弱了到2050年实现全球碳排放量减少95%，即净零气候情景所设想目标的可能性(Pitron, 2021)。因此，在虚假的净零排放声明之下，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大幅偏离其气候目标，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在如此快速增长的速度下减少排放仍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公司转而试图推翻基于科学的碳指标，改写碳核算规则(*Financial Times*, 2024f, 2024g)。

正如贸发会议(UNCTAD, 2024a)所强调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数字化过程中的大部分环境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却较少。它们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进口高附加值的设备，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数字废物。鉴于这些挑战，在将扩大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时，需要保持谨慎。为了摆脱这一不可持续的模式，全球需要转向“适足性”原则，包括在数字部门，并加大力度促进循环经济。

资料来源：Hebous and Vernon-Lin (2024a, 2024b); *Financial Times* (2024d, 2024g); Pitron (2021); The Shift Project (2018); UNCTAD (2024a); UNITAR (2024); WHO (2023); World Bank and WTO (2023)。

2022年，仅加密货币挖矿和数据中心就占全球用电量的2%，占全球排放量的近1%。

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带动的服务，甚至一般服务贸易，通常仍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最近的贸易数据显示，在2023年世界服务出口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非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数量较少。相比之下，这类经济体在商品贸易排名中占比明显更高。总体而言，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服务出口收入中占比不到30%；而在商品出口收入中占比44%(表二.1)。

无形资产的作用日益重要，加剧了这些关切(图二.7)。亚洲开发银行等(ADB et al., 2021: xviii)指出：“传统的贸易统计没有反映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无形资产服务出口，因此大大低估了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出口，扭曲了它们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平衡”。然而，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并从中受益的能力越来越取决于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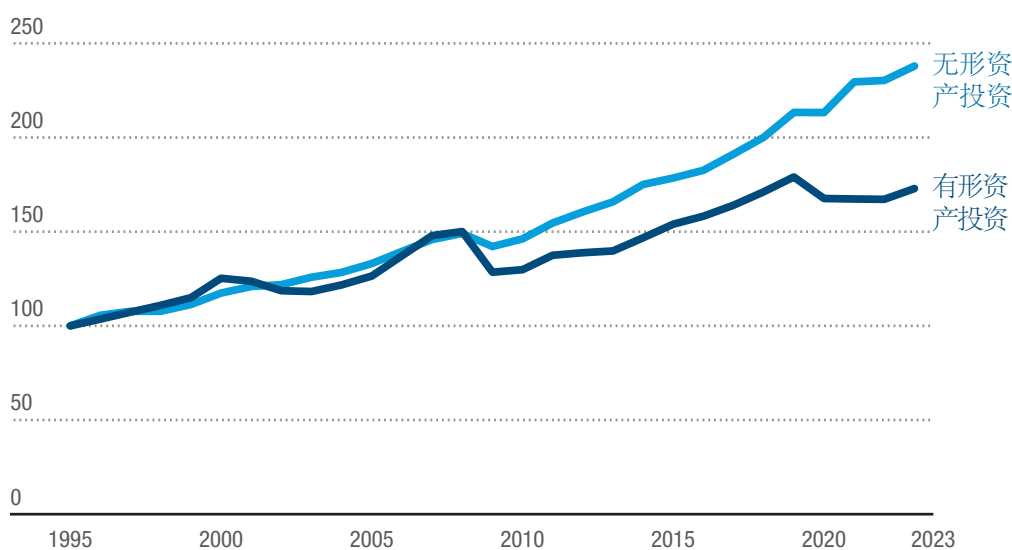
牌、独特设计、专利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知识等无形资产，而非有形资产(即制造业生产)。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导致“无工厂”生产，即设计和销售制成品的公司不拥有任何生产流程。因此，现代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型国家出口知识产权服务，进口制成品(ADB et al., 2021: xi)。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路易斯商学院(2024)的数据，在过去15年中，对品牌、设计、数据和软件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对工厂和机械等有形资产投资的三倍。法国、瑞典和美国的投资活动最为密集，印度也呈上升趋势。2023年，无形投资总额达到6.9万亿美元，比1995年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2023年，有形投资增至4.7万亿美元。

2023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出口收入中占比不到30%，在商品出口中占比44%。

图二.7

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并从中受益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于无形资产
全球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投资
(1995年=100)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路易斯商学院(2024)。

表二.1
2023年全球商业服务和商品出口前30位排名

商业服务				商品		
排名	经济体	百分比	10亿美元	经济体	百分比	10亿美元
1	美国	13.0	1 027	中国	14.2	3 380
2	英国	7.4	584	美国	8.5	2 020
3	德国	5.5	439	德国	7.1	1 688
4	爱尔兰	5.0	398	荷兰王国	3.9	935
5	中国	4.8	381	日本	3.0	717
6	法国	4.6	360	意大利	2.8	677
7	印度	4.3	338	法国	2.7	648
8	新加坡	4.1	328	大韩民国	2.7	632
9	荷兰王国	3.9	312	墨西哥	2.5	593
10	日本	2.6	207	中国香港	2.4	574
11	西班牙	2.5	198	加拿大	2.4	569
12	瑞士	2.1	169	比利时	2.4	562
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1	166	英国	2.2	521
14	卢森堡	1.9	14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1	488
15	意大利	1.9	148	新加坡	2.0	476
16	比利时	1.8	146	中国台湾省	1.8	432
17	加拿大	1.7	137	印度	1.8	432
18	大韩民国	1.6	124	俄罗斯联邦	1.8	424
19	丹麦	1.4	114	西班牙	1.8	423
20	波兰	1.4	108	瑞士、列支敦士登	1.8	420
21	瑞典	1.3	104	波兰	1.6	382
22	土耳其	1.3	102	澳大利亚	1.6	371
23	中国香港	1.2	98	越南	1.5	354
24	奥地利	1.1	90	巴西	1.4	340
25	以色列	1.1	83	沙特阿拉伯	1.4	322
26	澳大利亚	0.9	74	马来西亚	1.3	313
27	泰国	0.7	57	泰国	1.2	285
28	葡萄牙	0.7	56	印度尼西亚	1.1	259
29	中国台湾省	0.7	54	土耳其	1.1	256
30	希腊	0.7	53	捷克	1.1	255
全球				全球	100.0	23 784
发展中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44.1	10 489
发达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55.9	13 29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除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关切外，市场集中度问题(例如在创意服务贸易中⁹)也表明，发达经济体继续在一个常被描绘为具有潜力的经济发展多维度引擎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该行业的价值在2022年升至1.4万亿美元，而发达经济体2022年仍占其出口的80%。这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到60%)。

高度集中还体现在提供国际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总部的地理分布上。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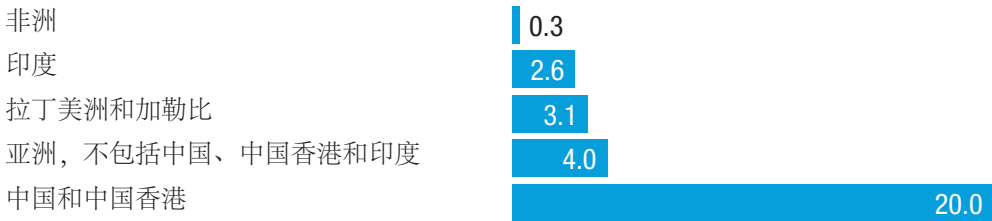
二.8所示，70%的国际服务贸易总部活动集中在发达地区，而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仅占10%。这一数字是根据一组近1,000家跨国企业的财务报表得出的，这些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每家企业在2022年的收入均超过100亿美元。可以说，这些企业是国际服务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其收入(尽管也来自国内活动)在2022年合计将近35万亿美元，是当年服务贸易额的五倍多。

图二.8
承担大部分服务贸易的大型跨国企业总部主要位于发达地区和中国
提供国际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总部所在地所占比例
(百分比)

A. 发达地区



B. 发展中经济体和区域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LSEG Eikon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样本涉及924家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每家公司在2022年的商品和服务销售收入均超过100亿美元，且业务涉及国际服务贸易(即不包括主要从事商品生产和出口的公司)。School (2024)。

⁹ 创意服务贸易统计涵盖以下服务类别：广告、市场研究、建筑、视听、文化、娱乐、遗产相关、信息、研发和软件。

尽管服务贸易领域近来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出口促进举措，但可贸易服务仍不足以吸纳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劳动力(UNCTAD, 2024i)。更广泛地来看，不同国家组别之间出口不对称，以及贸发会议最近重新评估的市场集中度和竞争相关问题(UNCTAD, 2024d)，解释了为何国际服务业看似难以复制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过去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功。演绎推理表明，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转向某些非贸易部门的服务业，本节后续部分将讨论这一主题。

非贸易部门需要采取雄心勃勃的政策组合

Rodrik 和 Stiglitz (2024) 认识到，服务贸易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未充分就业者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因此最近提出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政策转变，其核心是绿色转型和促进吸纳劳动力的服务活动，主要是在非贸易部门。他们主张采取三管齐下的战略，其基础是：

- 鼓励大型企业在非贸易服务领域创造低技能工作岗位
- 为小型企业提供公共投入和获得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的机会
- 投资于补充而非取代服务部门低技能工人的技术。

这一战略主张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增长策略，即使增长速度较慢。简言之，它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核心思想是通过更好的就业为社会较贫困群体带来直接收入增长，从而构建中产阶级，而不是等待出口冠军和大型企业的“涓滴效应”。

尽管尚未深入理解如何提高劳动力吸纳型服务业的生产率，但新的研究从更实际的角度提出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愿景。例如，Rodrik 和 Sandhu (2024) 借鉴印度、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具体实例，提出了四种可供探索的策略(这些策略并不相互排斥)，以便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服务部门中扩大生产性就业(表二.2)。

扩大服务部门就业机会的有效战略必须有选择地实施，针对那些更有可能成功的企业和子行业。实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权力下放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奏效。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如市政府和国家以下各级主管部门，往往更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此，它们可能最适合开展和实施试点项目。

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善收入分配中较低端人群的就业前景。这可能会壮大中产阶级，进一步刺激内需，从而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就业创造的良性循环。

为了避免自然环境沦为这些未来增长策略中的“次要角色”，主管部门在选择目标行业和企业时，应考虑规划中的发展可能在经济和环境方面引发的预期联动效应。如果缺乏这样的考虑，或将带来长期且可能不断攀升的成本，最终使这些干预措施得不偿失。

当政策制定者踏上这一充满挑战的旅程，批判性地审视、评估并可能重新调整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路径时，上述讨论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在此关头，值得强调的是，实施现代产业政策的最谨慎且最有希望的方法或许涉及两个并行的方面：既要解决已发现的问题，又要尽量减少对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不利影响。这一新的

探索之路不会轻松，正如之前试图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优势一样。众所周知，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然而，如果不更多地考虑非贸易服务，试图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优质就业的愿景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

表2.2
在吸纳劳动力的服务部门中扩大生产性就业的四种策略

重点	行动	预期效益	典型案例
► 生产率相对较高且具有市场地位的成熟大型企业	鼓励这些企业直接或通过当地供应链扩大就业	与服务提供商建立上游联系	在印度哈里亚纳邦，与Uber和Ola合作开展Saksham Saarthi项目
► 小型企业	为这些企业提供具体投入(如管理培训、贷款或补助、工人的特定技能、特定基础设施或技术援助)	提高这类企业的生产能力	尼日利亚的青年创新创业计划(YouWiN!)
► 工人或企业	提供数字工具和其他现代技术，专门支持低技能劳动力	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能够从事(部分)传统上由技能较高的专业人员从事的工作，扩大他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范围	印度北方邦的Manthan项目
►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	将职业培训与“环绕式”服务相结合，为求职者提供一系列额外援助方案	提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就业能力、留任率及晋升机会	南非的Harambee青年就业加速器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Rodrik和Sandhu (2024)的资料编制。
注：Saksham saarthi直译为“能干的车夫/司机”。

C.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但仍处于高位



截至2024年7月，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尽管与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高点相比，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总体价格仍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20%以上。

2024年初，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季度，由于全球需求增长放缓，燃料价格略有下降（图二.9）。

这些变化是在2023年经历了一些波动之后发生的。2023年6月至9月，贸发会议所有大宗商品组别的大宗商品

价格指数显著上涨12%，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欧佩克+）宣布减产，导致燃料价格飙升。随后，从2023年9月到12月，价格又出现了大致相同幅度的下降，使得全年平均价格远低于2022年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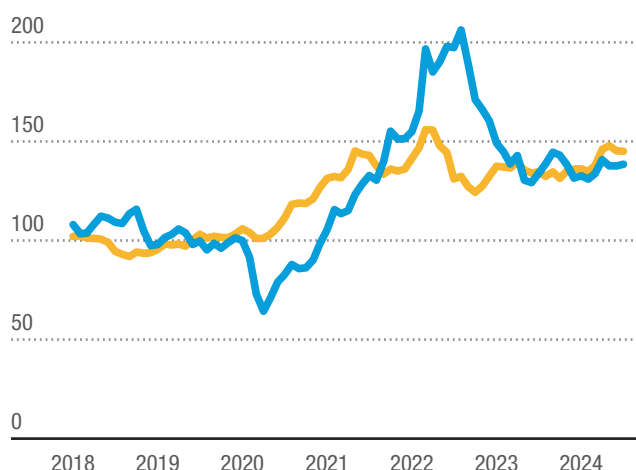


图二.9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仍比疫情前水平高出2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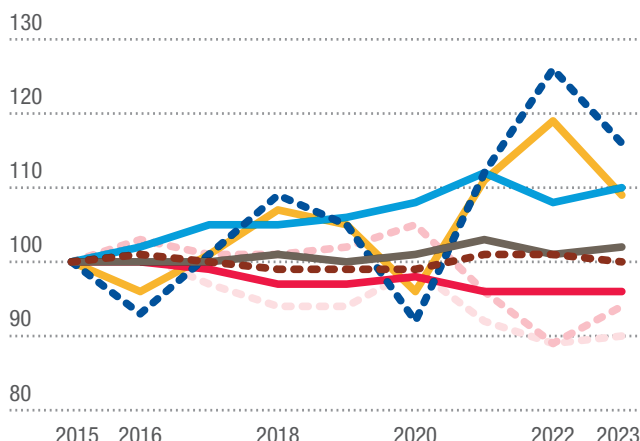
A. 贸发会议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2019年平均值=100)

— 所有组别 — 除燃料外的所有组别



B. 部分国家组别的净易货贸易条件
(2015年=100)

— 非洲 — 亚洲 — 东亚 — 南亚
— 西亚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 东南亚
— 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图A中的数据截至2024年8月。



因此，2022至2023年，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地区的净易货贸易条件略有恶化，但不足以抵消近年来取得的成果。例如，非洲和西亚的贸易条件下降了近10%。个别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更为严重，如安哥拉(23%)、赤道几内亚(35%)和尼日利亚(14%)。

预计大宗商品总体价格将小幅上涨。发达经济体已经宣布和预期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支持这一趋势。对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需求上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也将支撑大宗商品总体价格(详见第三章的深入讨论)。与此同时，持续的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局势可能会威胁到通过黑海和红海等海上贸易路线运输的大宗商品供应，并引发价格波动。

1. 石油和天然气：高利润率限制了能源转型

在最近的经济衰退和危机期间，化石燃料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从2020年6月疫情导致的低谷到2022年8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峰值，天然气价格出现了逾十倍的增长。然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此后都回落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水平以下。过去12个月里，石油价格基本稳定在每桶80美元以上(图二.10.A)，这使化石燃料出口国受益，但也削弱了摆脱石油出口依赖、实现多样化的动力(见表三.1)。

从历史上看，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与全球经济活动同步增长。由于气候行动和减排努力仍远远不足，不论这些年化石燃料价格如何波动，化石燃

料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80%左右(图二.10.C和D)。全球石油消费的少数几次暂时下降(如2009年和2020年)并非由高油价引起，而是由于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对经济活动和能源需求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上，单靠更高的化石燃料价格和市场机制似乎不足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Financial Times*, 2024g)。这一趋势因持续的化石燃料补贴而进一步加剧(UNCTAD, 2023a)。

由于能源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能源供应商的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化石燃料部门的预期利润似乎是未来化石燃料开采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化石燃料的利润率仍然高于可再生能源(图二.10.B)。尽管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价格将继续下降，但仅凭这一趋势似乎不足以对化石燃料部门普遍的高利润率和产量产生太大影响(Christophers, 2022, 2024)。

在这方面，国际能源署(IEA)和欧佩克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由于“绿色”投资增加和更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化石燃料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IEA, 2023)，后者则认为，“石油需求峰值不会在短期内到来”。欧佩克预计，到2045年，化石燃料开采量将从2023年的每日1.02亿桶增加到至少每日1.16亿桶(OPEC, 2024)。短期内，在没有对化石燃料开采和贸易进行有约束力的定量监管限制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均预计2024年石油消费量将维持常规增速，即100万-200万桶/日。

自1965年以来，化石燃料一直占全球一次能源的80%，多年来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化石燃料的高利润率继续使净零目标遥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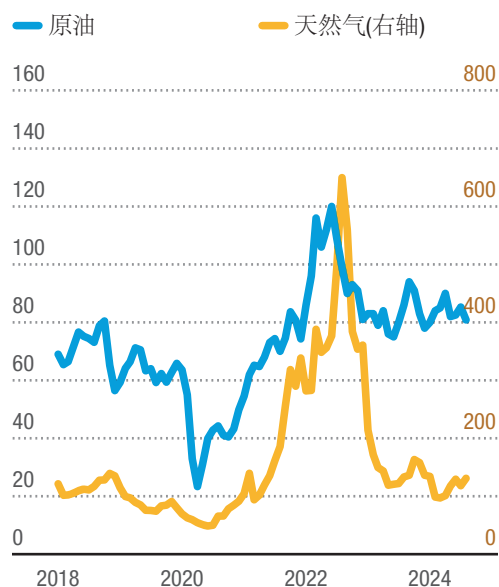
图二.10

全球化石燃料历来盈利且利润率持续上升，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A.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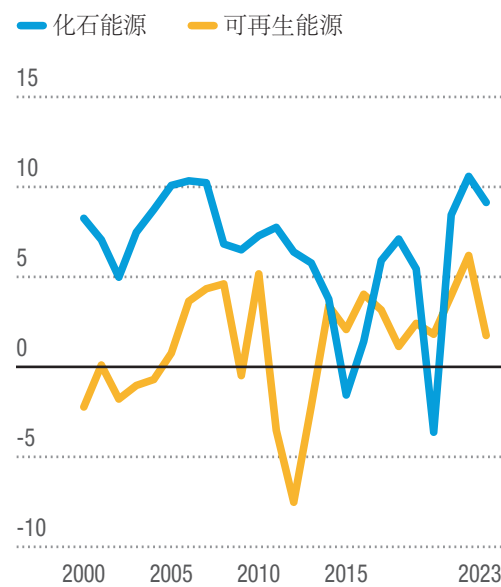
(美元/桶)

(2019年平均值=100)



B. 能源部门收入利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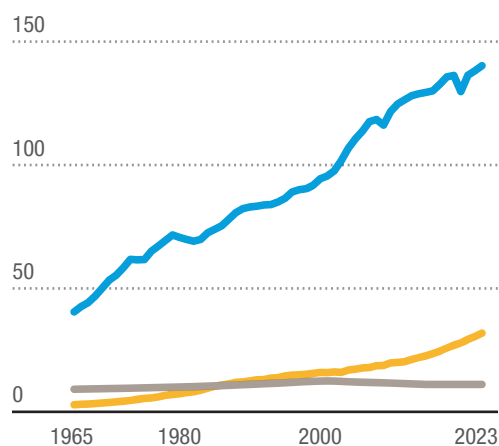
(百分比)



C. 按类型分列的一次能源消费

(拍瓦时，替代能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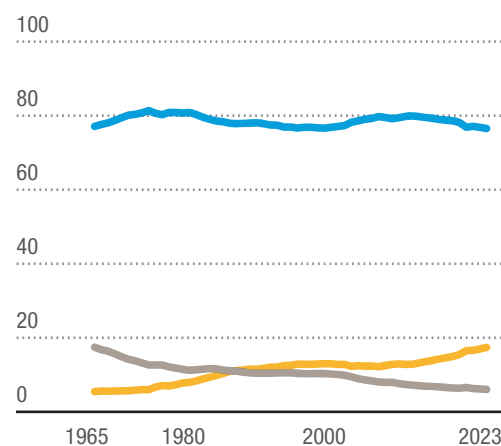
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 传统生物质



D. 按类型分列的一次能源占比

(百分比)

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 传统生物质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LSEG Eikon 和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数据(粉单)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图A中的数据截至2024年8月。图C和D中的一次能源消费数据是基于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分类，前者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后者包括水电、核能、风能、太阳能、现代生物燃料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图B中关于利润和收入的财务数据将核能单独列为一个类别，不包括在“可再生能源”之下。



2. 矿物和金属：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价格波动持续

与其他综合大宗商品指数类似，贸发会议矿物、矿石和非贵金属指数自2023年初以来，波动幅度小于往年。2023年2月至5月，该指数下降了11%，反映了铝、铜、铁矿石和镍等主要商品价格的下跌。2023年6月至12月期间，该指数相对稳定，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上涨逾10%。

黄金和铂金等贵金属也经历了类似的价格走势。特别是黄金价格在2024年3月至9月中旬上涨了25%。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以及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央行计划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产生的需求，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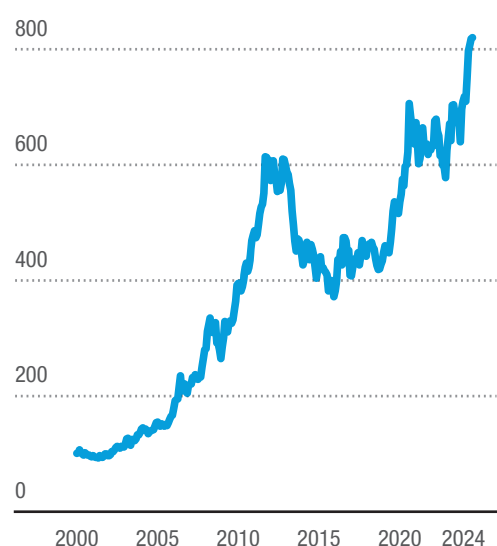
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图二.11)。黄金价格上涨也反映了市场对美国即将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预期，这种预期引发了对通胀回升和美元贬值的担忧，尽管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表明，这种预期可能是错误的。

一些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市场价格波动最为剧烈。2023年，锂、钴和镍的价格分别下降78%、34%和42%(图二.11)。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继2021年和2022年初电动汽车和电池需求强劲增长后，这些原材料产量激增、供应过剩。此外，电动汽车电池销量增长放缓，加上电芯和正极材料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下游产品库存大量积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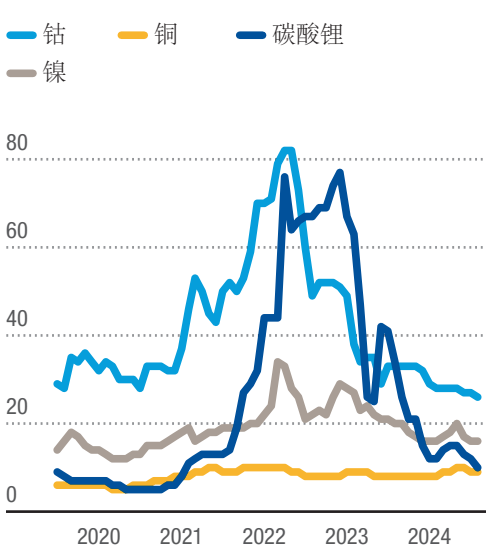
图二.11

能源转型关键矿物和黄金价格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瓶颈高度敏感

A. 黄金价格
(2000年=100)



B. 部分能源转型关键矿物
(千美元/公吨)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LSEG Eikon和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数据(粉单)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数据截至2024年8月。

中国制造业的波动导致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价格波动高于其他矿物。

中国占据了全球对这类金属和矿物需求的一半。鉴于中国在电动汽车(58%)、风力涡轮机(66%)、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各占80%以上)生产中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价格比其他金属和矿物更多地受到中国制造业波动的影响。

在能源转型关键矿物价格波动和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进口国试图通过贸易相关协议确保稳定和多元化的供应。2023年,共签署了22项此类协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生产国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以利用矿产资源推动国内工业化,从而获得比继续出口原材料更大的增加值份额(UNCTAD, 2024e)。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导致能源转型关键矿物市场趋紧,产生新的价格上行压力。

3. 粮食和化肥:价格上涨仍给贫困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粮食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最严重的短期不稳定影响。2023年,粮食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增加了粮食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支出。直到2023年12月,贸发会议粮食指数才回落至2022年2月的水平以下,稳定在比疫情前高出约20%的水平。

其他农产品(如植物油籽和植物油)的价格也经历了类似的波动。相比之下,热带饮料作物的价格自2024年初以来大幅上涨,这是由于厄尔尼诺等不利天气条件和气候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

化肥价格也稳定在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图二.12)。乌克兰战争爆发后,钾和尿素的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此后有所下降。相比之下,磷矿石的价格在2023年11月才下降了约50%,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下降带来的生产前景改善,随后价格稳定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

在主要粮食大宗商品中,玉米和小麦等谷物的价格自2023年初以来缓慢下降,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图二.12)。黑海倡议虽然于2023年7月暂停,但最初却促成了价格的急剧下降,因为它推动了乌克兰农产品的持续出口,并改善了俄罗斯联邦的生产和出口。根据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的数据,俄罗斯的出口量从2021-2022年的7,600万吨增至2022-2023年的1.04亿吨。

与其他谷物不同,大米的价格并未回落至2022年2月的水平以下。在2023年初小幅下降后,泰国大米的基准价格从3月到12月飙升了35%(图二.12)。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大米的重要出口国(如印度)为应对国内价格上涨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强劲需求,颁布了出口限制措施,以增加国内粮食供应,确保粮食安全。2024年第一季度,由于主要出口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价格上涨导致全球大米需求疲软,以及季节性供应增加,大米基准价格略有下降。

全球玉米产量和出口量预计将略有增加,而小麦将呈相反趋势。预计全球大米产量将会增加,但国际大米出口量不会增加,这可能会导致粮食总体价格上涨的压力。由于寡头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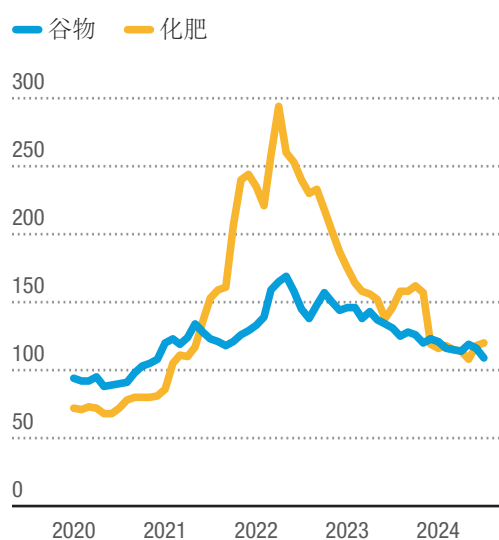
断的市场结构，高粮价和通货膨胀也可能持续存在。在谷物市场，前四大公司控制了全球贸易的70%至90%(UNCTAD, 2023a)，而化肥、种

子和技术等生产投入的市场也日益集中(见第三章)。为了确保发展中进口国的市场准入并减轻其财政负担，必须防止反竞争的贸易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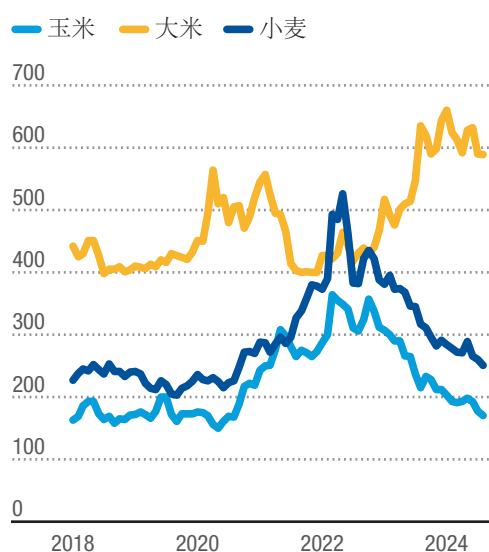
图二.12

除大米外，粮食和化肥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A. 谷物和化肥
(2010年=100)



B. 部分粮食大宗商品基准价格
(美元/公吨)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数据(粉单)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数据截至2024年7月。

D.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复苏依然脆弱且不确定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在连续九个季度录得负值后，于**2024年第一季度**恢复正值。¹⁰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常住单位再次成为来自发达国家的非常住单位的净借款方。

从区域来看，这一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与2023年最后三个季度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资本净流入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其他两个发展中区域的净流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净流入多年来一直保持正值，但自疫情以来波动更大，且尚未恢复到2011-2014年期间的较高水平。

状况改善的另一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净流出在2022年年中达到高点后逐渐减少，尽管2024年第一季度的净流出略高于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这一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中国香港

和新加坡的发展。非洲在2023年尽管表现积极，但增幅有限，录得小幅净流出（见图二.13）。

上一轮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总体净流出发生在2014-2016年期间。与这一轮情况类似，主要是由于发展中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净资本流出所致（表二.3）。然而，这两个时期资本外流的主要驱动因素明显不同。2010年代中期的净流出主要围绕2013年“缩减恐慌”后中国股市的动荡展开，其他投资的净流出占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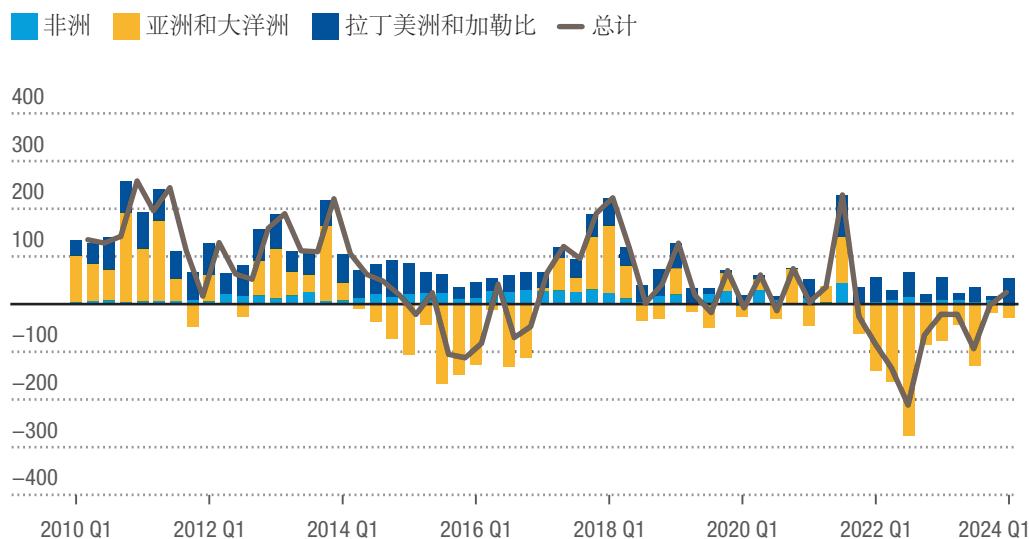
¹⁰ 在本节中，净资本流动是指国际收支金融账户中净直接投资、净证券投资 and 净其他投资的总和。它反映了非常住单位净流量与常住单位净流量之间的差额，不包括“衍生工具”和“储备及相关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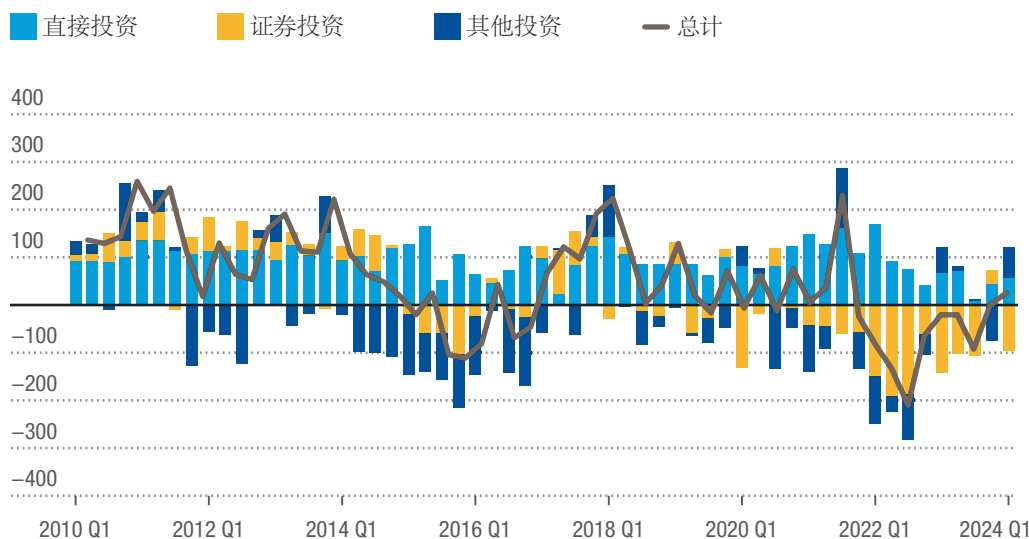
图二.13

经过九个季度的负值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在2024年初出现反弹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季度净资本流量，按区域和类型分列
(10亿美元)

A. 按区域分列



B. 按类型分列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Q1，第一季度。源数据中的净正负债被计为正流入，净正资产被计为负流入。证券投资包括债券和股权。其他投资包括短期和长期银行贷款。资本流动总额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总和，即国际收支金融账户中不受货币当局直接有效控制的三类投资。



表二.3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量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年度净资本流量，按区域和类型分列
(10亿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a
► 发展中国家	617	490	279	566	185	-193	-150	483	400	208	128	280	-484	-116
直接投资	408	508	480	485	397	456	317	343	434	349	363	564	387	185
证券投资	112	109	140	49	119	-255	-49	203	-37	-45	-128	-212	-594	-278
其他投资	97	-127	-341	32	-331	-394	-418	-63	3	-96	-107	-72	-276	-23
其中：														
► 非洲	17	34	63	83	83	94	105	132	70	84	41	80	48	18
直接投资	46	36	48	39	63	49	40	46	30	36	18	72	39	13
证券投资	6	8	27	23	8	25	17	47	3	32	0	-40	-30	-1
其他投资	-36	-10	-12	21	12	20	47	39	38	16	23	49	40	6
其中：														
► 北非	11	-1	14	19	22	34	47	35	26	28	28	37	11	.
直接投资	10	5	8	11	11	11	12	12	13	13	9	9	14	.
证券投资	8	-11	-3	1	1	2	2	23	-2	12	3	4	-23	.
其他投资	-7	5	9	7	10	20	33	0	15	2	17	25	20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6	35	49	64	61	60	58	97	44	56	13	43	38	18
直接投资	36	31	40	28	51	38	28	34	17	23	9	63	25	13
证券投资	-1	19	29	22	7	23	15	24	5	19	-3	-43	-6	-1
其他投资	-29	-16	-21	14	2	0	14	39	23	14	7	24	20	6
► 亚洲	385	196	-22	260	-153	-456	-386	208	142	26	52	43	-671	-233
直接投资	252	315	267	292	190	272	148	171	258	200	243	390	221	39
证券投资	4	-6	28	-75	3	-331	-113	114	-58	-75	-132	-185	-555	-258
其他投资	128	-114	-316	43	-346	-398	-421	-77	-58	-99	-59	-162	-337	-1
其中：														
► 中亚	-10	-8	-5	2	6	10	9	7	-1	6	19	9	-6	8
直接投资	6	11	13	10	6	6	16	6	6	9	7	5	11	5
证券投资	9	-13	-17	-6	-1	6	-1	6	-3	-4	9	6	-13	-4
其他投资	-24	-6	0	-1	1	-1	-7	-4	-4	1	3	-1	-4	8
► 东亚	277	256	-31	316	-69	-429	-438	112	142	-30	-53	-88	-304	-262
直接投资	176	238	170	215	135	171	14	52	118	78	127	212	38	-134
证券投资	-33	16	43	-9	69	-204	-115	54	33	15	21	-35	-325	-111
其他投资	134	2	-243	111	-273	-396	-336	6	-9	-123	-201	-266	-17	.
► 南亚	82	66	93	70	82	86	37	102	84	107	85	147	66	75
直接投资	16	28	19	31	28	42	46	35	37	43	58	32	39	18
证券投资	38	2	32	9	45	11	-4	34	-10	27	11	7	-19	31
其他投资	28	36	43	30	9	33	-5	33	57	37	16	108	46	27
► 东南亚	37	-5	3	-36	-50	-69	-23	25	15	-12	10	42	-172	-27
直接投资	42	32	50	46	37	56	59	82	97	83	55	126	147	150
证券投资	8	11	-43	-59	-49	-74	-2	-4	-58	-97	-82	-86	-75	-109
其他投资	-12	-48	-4	-23	-39	-51	-80	-53	-24	3	37	2	-243	-68
► 西亚	-1	-114	-82	-92	-122	-54	30	-38	-99	-46	-9	-66	-256	-27
直接投资	14	6	15	-9	-17	-3	14	-4	-1	-13	-4	14	-14	1
证券投资	-16	-23	14	-9	-61	-70	9	24	-20	-16	-91	-76	-122	-65
其他投资	2	-97	-111	-74	-45	18	8	-59	-78	-17	86	-4	-119	37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12	258	234	218	256	171	132	146	191	102	36	161	138	99
直接投资	107	155	162	151	142	133	128	126	147	114	103	104	127	133
证券投资	101	106	84	101	108	51	47	43	17	-2	5	13	-10	-18
其他投资	4	-3	-13	-34	7	-14	-43	-22	27	-10	-71	44	20	-16
► 大洋洲	3	2	4	5	-1	-1	-1	-4	-3	-4	-1	-5	1	.
直接投资	2	2	3	3	2	2	1	0	0	0	-1	-1	0	.
证券投资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
其他投资	1	0	1	3	-4	-3	-2	-3	-4	-3	0	-3	1	.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源数据中的净正负债被计为正流入，净净资产被计为负流入。证券投资包括债务和股权。其他投资包括短期和长期银行贷款。资本流动总额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总和，即国际收支金融账户中不受货币当局直接有效控制的三类投资。因四舍五入，有些总数可能与单项数字的总和不一致。

a 表示初步估计数。



相比之下，由于2021年第四季度至2023年底的负流出与发达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和全球金融环境恶化有关(UNCTAD, 2023a)，因此从地理分布上看更为广泛，所有发展中区域的多个国家都经历了与发展中国家总体情况相似的模式。然而，这一次，“证券投资”，特别是非常住单位出售国内债券，发挥了更大作用，其次是其他投资的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表现也大不如前，尤其是在2023年的非洲和发展中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到三年的发展态势表明，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际投资者发生了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没有理由对2024年第一季度观察到的积极动态沾沾自喜。总体金融环境依然脆弱且不稳定，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2024年第二季度的初步数据系根据少数几个有资料可查的发展中大国的月度投资组合流量得出，这些数据表明增长势头正在减弱，令人对2024年初观察到的趋势的稳健性产生怀疑。这说明金融投资者认识到，美国的货币政策放松并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迅速发生。

2024年8月日元套利交易平仓是未来可能出现麻烦的另一个信号，尽管截至目前来看，当时冲击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似乎是短暂和可控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然而，8月初一些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还是令许多市场参与者对当前的总体金融环境感到不安。毫无疑问，当今金融市场

的不稳定没有为长期关键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

1. 直接投资：地缘经济碎片化正在重塑格局

在当前关于企业迁移和更长期结构性变化的讨论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数据表明，在近期的全球和区域危机下，其流量正在放缓。2023年，投资流量连续第二年保持低迷。按绝对值计算，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降至8,67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对发展中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8%，不过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也分别减少了3%和1%。

更广泛地说，实证证据表明，随着贸易网络分裂、监管环境趋异以及国际供应链重新配置，地缘经济碎片化正在重塑全球直接投资的格局(UNCTAD, 2024b; 2024j)。然而，并非所有投资模式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苹果公司(美国)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与此相反，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德国大型汽车制造商加强了在中国的生产，他们将在中国赚取的约一半利润再投资于扩大生产(Schmitz and Matthes, 2024)。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汽车制造商都不想失去在这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市场中的相对份额。然而，除了这些个别案例外，整体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因为高度的不确定性难以支持长期规划，可能导致在短期至中期内推迟或缩减投资决策。

2024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恢复为正值，但脆弱性依然存在。

整体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形势难以支撑长期规划。

2. 证券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环境依然严峻

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现有证券投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触及低点后，流入这些经济体的非居民资本流动势头在2024年第一季度发生了逆转。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重返国际债券市场，有时甚至创下发行量纪录(UNCTAD, 2024h)。这一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前景略显有利(第一章)。这也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降息预期改善了全球金融环境，尽管总体来看，金融投资者有时对降息的预期过于乐观。

然而，深入分析后发现，至少有两类论点支持更为谨慎且不那么乐观的判断。第一类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有关。如图二.14所示，2024年1月

至8月的新债务发行量超过了2022年和2023年全年水平，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的兴趣有所恢复。然而，总流量仍低于2019-2021年的峰值，可能也低于此前三年的水平。此外，2024年非洲主权债券发行量仍低于2015年以来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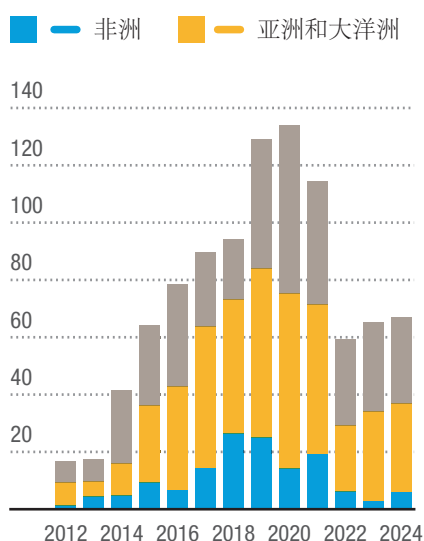
在所有发展中区域，2024年发行的债券平均票面利率均高于历史水平，引发了对偿债负担增加的担忧，因为这将占用本应用于发展投资的重要资源(图二.14)。此外，2024年利用国际债券市场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总体上低于2015年至2021年的常规水平，比2019年的纪录低40%。总体而言，这些趋势凸显了自2022年以来全球利率上升如何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预算压力。利息支出超过了卫生、教育和气候行动等基本公共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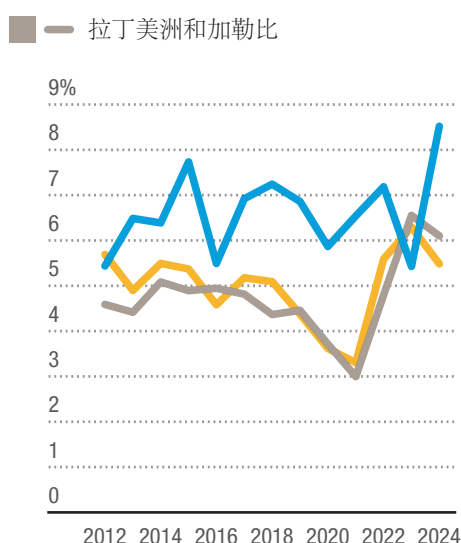
图二.14

借款成本仍然高企，而发展中区域新的主权债券发行量正在反弹
部分发展中区域新发行主权债券的总发行量、加权平均票面利率和发行国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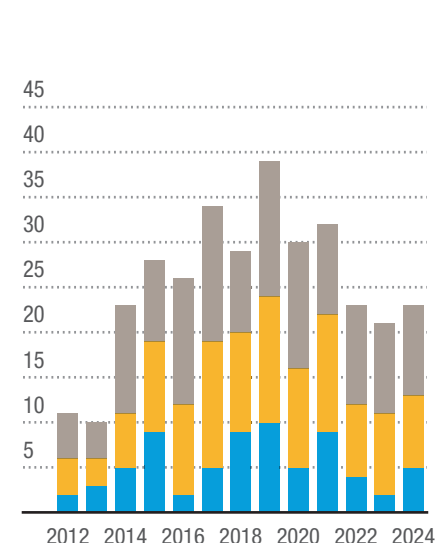
A. 总发行量
(10亿美元)



B. 加权平均票面利率
(百分比)



C. 发行国
(数量)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LSEG Eikon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数据涉及在外国司法管辖区发行的美元、欧元和日元主权债券的年度发行量，不包括债务重组背景下的发行。2024年的数据仅包括截至8月的发行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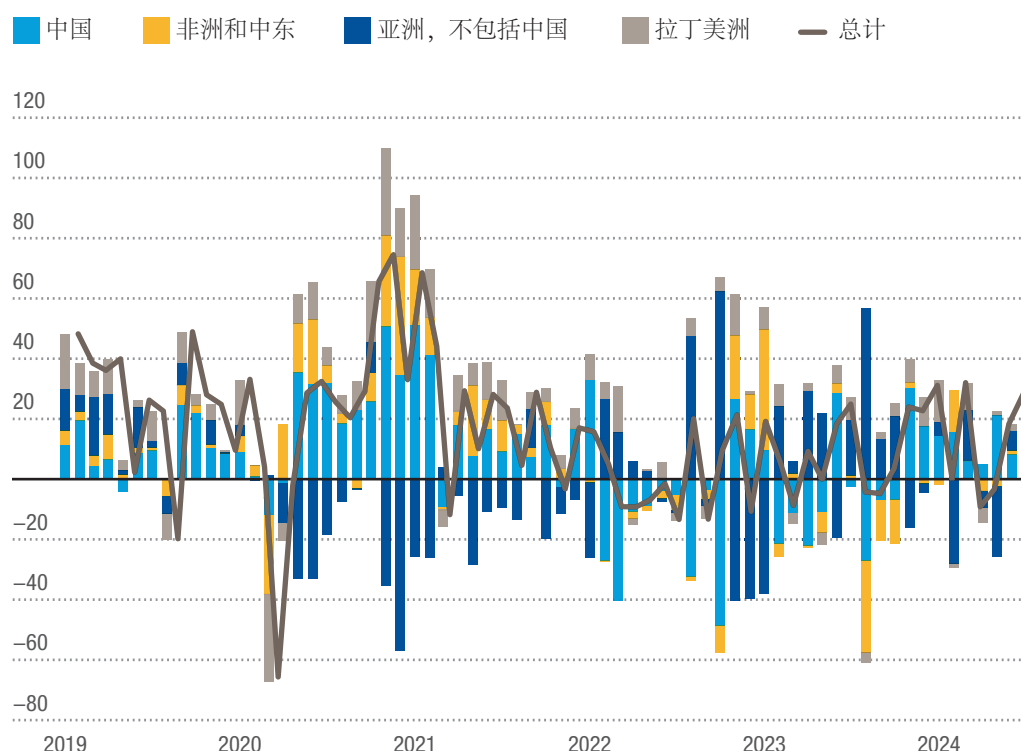
三分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出超过了这些人类发展关键领域的支出 (United Nations 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Technical Team, 2024)。

另一个论点与2024年第一季度观察到的势头可能减弱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样本的月度投资组合流量表明，2024年4月和5月期间，除了对中国债券的组合投资之外，流向发展中国

家的非居民投资组合显著放缓。其后，特别是在墨西哥和土耳其发行量强劲的7月，资金流动出现反弹(图二.15)。然而，这种波动令人对2024年初观察到的趋势的稳健性产生怀疑。这凸显了金融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步伐的初始乐观情绪逐渐消退，给2024年第二季度的全球融资成本带来了上行压力。

图二.15

月度投资组合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后增长势头消失
流向中国及部分发展中区域的非居民投资组合流动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数据截至2024年7月。本图中考虑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巴西、智利、中国、中国台湾省、哥伦比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越南。

2024年8月，杰克逊霍尔会议释放出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消息，消息在9月18日得到确认，当天美联储宣布将政策利率下调50个基点，这是美联储加息逾两年半以来首次降息。然而，由于后续降息的幅度和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前景依然阴云密布。美国即

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也带来了不可预测性。鉴于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相关的脆弱性加剧(插文二.2)，以及发展中国家在2024年和2025年面临债务到期高峰时将进行大量债务展期，对利率水平的关切尤为突出。



插文二.2

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券尚未摆脱困境

在两个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中经济体组别，即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前者大多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后者主要是低收入或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才开始进入这一市场。

前沿市场经济体向全球投资者发行的多为高收益的投机级主权债券，因此债券利差波动往往较大，在全球金融震荡期间最先被抛售。由于许多养老基金不得投资于非投资级债务工具，投机性较强的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如对冲基金)在此类证券的所有权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2019年至2023年年中，当全球融资环境恶化时，前沿市场经济体外部主权债券的利差增幅大于新兴市场经济体。2023年第四季度至2024年第一季度，当全球金融环境改善时，也出现了更大幅度的逆转。当前沿市场经济体主权债券价格跌至历史低点时，全球投资者再次买入，使其利差压缩至接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水平(UNCTAD, 2024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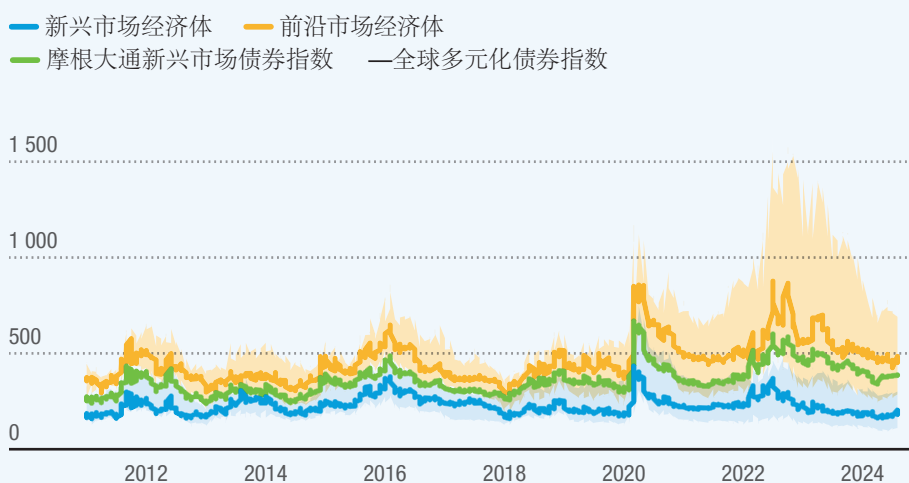
于是，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券重新获得了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尽管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利率上升，融资成本也更高。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相对于美国基准利率的利差仅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至新冠疫情开始时的平均水平附近，而过去的基准利率要低得多。

在此背景下，2017年至2023年期间，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和公共部门债务可持续性恶化，其中前沿市场经济体的恶化程度更为显著，这并不令人意外。外债偿付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外汇收入的增长速度，利息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Technical Team, 2024)。2023年，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估计达到6,840亿美元，是2010年的三倍。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幅为2.4倍，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1.8倍，这些经济体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程度有限，主要依赖外部公共融资和官方发展援助。



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券收益率尚未回落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2011年7月至2024年8月部分经济体主权债券收益率与美国国债的每周利差(基点)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的国家级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前沿市场经济体组别的粗线对应每组的中位数，是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全球多元化债券指数中的特定经济体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阴影区域表示四分位距。

2010年至2023年，前沿市场经济体的外债偿付总成本增加了约550%(平均每年15.5%)，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别为174%(每年8.1%)和121%(每年6.3%)。

前沿市场经济体主权外债的积累主要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主权债务偿付压力，这挤占了用于关键公共支出的资源。2010年至2023年间，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的偿付额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不到6%飙升至15%。相比之下，2023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一比例约为3%，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略高于7%，仅为前沿市场经济体的一半。^a

这些模式令人担忧发展中国家外债和公共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在实现《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目标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的背景下，此类债务偿付在多大程度上消耗了发展资源。

资料来源：UNCTAD (2023a, 2024g); United Nations 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Technical Team (2024)。

^a 组别平均值掩盖了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在2023年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付额与政府收入之比最高的25个发展中经济体中，2个是新兴市场经济体，10个是前沿市场经济体，13个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也面临着高度的债务脆弱性。在这13个国家中，只有2个国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伯利兹和毛里求斯)。

3. 其他投资(包括同业银行拆借)在各发展中区域出现分化

最近几个季度，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投资净额在正负区间之间波动，反映了其不稳定性。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跨境银行借贷也呈现了类似的趋势。国际清算银行(BIS)按地点编制的银行统计数据(按汇率和断点调整后的数据)显示，继2023年第四季度微弱增长后，银行对非洲和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全球跨境债权在2024年第一季度大幅增长1,170亿美元。在这些债权中，信贷——包括贷款和持有的债券——占近1,000亿美元(图二.16)。这些资金流动构成了过去三年来最大的季度增长，得益于人民

币贷款创下490亿美元的新高，反映出银行以人民币进行的跨境信贷的增长(*Financial Times*, 202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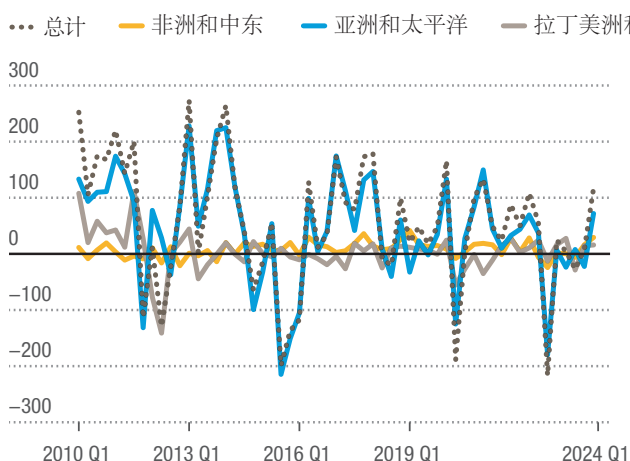
各区域的信贷扩张情况略有不同。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信贷增长了640亿美元，年增长率恢复正值(0.4%)。对非洲和中东居民的信贷增加了290亿美元，年同比增长3.5%。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实体提供的信贷增加了6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对巴西借款人的强劲信贷支持，其年度增长率达到8%(图二.16)，但该区域整体的同比增长率放缓至2.0%。向发展中国家非银行机构提供的美元计价外币信贷增长了约1%，为近两年来首次出现正增长(BIS,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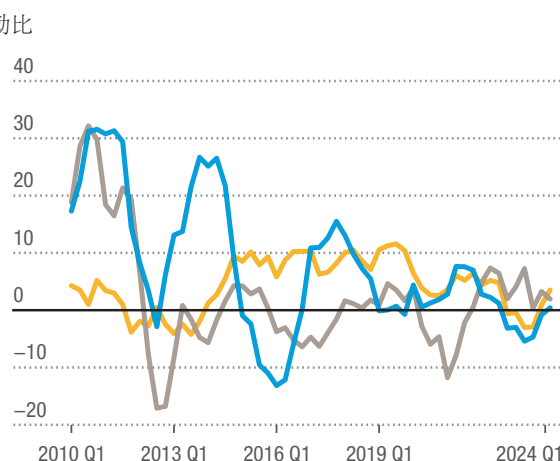
图二.16

2024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贷出现反弹

A. 银行对部分发展中区域常住单位的全球跨境债权
(10亿美元，按汇率和断点调整后的数据)



B. 向部分发展中区域提供的跨境银行信贷同比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按地点编制的银行统计数据库得出的计算结果。

注：Q1，第一季度。债权指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工具”，包括信贷(贷款、存款以及持有的债券)和剩余的其他工具。年度变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 2019)的数据作了调整。国家组别分类依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标准。

4. 迈向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随着2025年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逐步展开，近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表明，外部私人资金不足以弥补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日益扩大的巨额资金缺口(United Nations, 2024)。

据贸发会议估计，截至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度投资缺口已增至4万亿美元，比通过《2030年议程》时估测的2.5万亿美元高出约60%(UNCTAD, 2023b)。这一额外缺口源于两个关键趋势。首先是投资不足。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增长速度低于2014年的预期，而新冠疫情是拖累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利率上升加剧了私营部门投资疲软的趋势。资本成本上升对资本密集型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尤其不利，因为这些投

资对货币和金融环境相对敏感(United Nations, 2024)。第二个趋势是，危机接连发生，带来了额外需求，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投资的估计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动在2024年第一季度恢复至正值，但不确定这一趋势是否将会持续。资本流动——尤其是证券投资 and 跨境银行借贷——的顺周期性和高波动性，意味着外部私人融资在最需要时往往会消失。地缘经济碎片化导致的外国直接投资轨迹令人失望，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联合国会员国筹备2025年会议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利用混合融资撬动私人资金的愿望并未实现；“十亿撬动万亿”的口号从未兑现。第二，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脆弱性问题，需要采取政策行动，以阻止日益严重的发展危机(插文二.3)。

私人资金不足以弥补可持续发展筹资的缺口。



插文二.3

应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的脆弱性

一连串危机——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不断深化的气候危机、生活成本危机以及日益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加上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原本就不可持续的主权债务状况(插文二.2)。

尽管系统性外债危机——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从债务困境走向违约——尚未发生，但一场发展危机正在上演，不断上升的外债和公共债务偿付成本正在慢慢耗尽实现《2030年议程》和《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资源。

当前的债务挑战和随之而来的发展危机深深植根于等级化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不平等性。这一体系与发展优先事项日益脱节，外部私人资金的最新趋势便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背景下，对于外债可持续性不断恶化的国家，有两大类无需以抑制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政策应对措施。第一类措施旨在通过减少进口需求和/或逐步扩大出口并实现出口多样化来减少外债。第二类措施是降低偿还外债的平均成本。前者主要涉及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带来经济进出口倾向的结构性变化。后者主要涉及国家获取私人 and 官方资本流动的能力，以及关于获取这些资金的条件(UNCTAD, 2024d)。前沿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插文二.2)表明，获取私人资本流动可能会增加可用的资本，但代价高昂——特别是因收入水平提高而无法再获得来自官方渠道的优惠融资而只能以私人资本取而代之。

在这方面，正如贸发会议(UNCTAD, 2023a)详细阐述的那样，在债务生命周期的五个阶段对现行国际金融架构进行调整，可以降低发展融资的成本。对于流向发展中主权国家的私人外部资本，可以考虑以下转型建议：

- 1 重新审视贸发会议《促进负责任的主权放款和借款原则》，使之与更广泛的发展筹资需求、创新金融工具以及新的债权人格局相一致
- 2 建立国际贷款数据库，通过将贷款交易数字化、确保融资条款的一致性以及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改善债务管理
- 3 建立多边主权债务解决机制，确保包括私人贷款机构在内的所有债权人以可比条件参与其中
- 4 建立借款人俱乐部，讨论技术问题和创新，分享经验和建议
- 5 对宣布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自动暂停债务，让债权人集中精力于债务解决过程
- 6 制定国际和国内规则，规定在气候、卫生和其他外部危机期间暂停债务人义务。

资料来源：UNCTAD (2023a, 2024d)。

注：这六点是贸发会议为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脆弱性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Institute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and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21).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Geneva and Tokyo.
- Baldwin RE (2024). Is export-led development even possible anymore? Factful Friday blog. 7 June. Available at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xport-led-development-even-possible-anymore-richard-baldwin-nusge/> (accessed on 25 September 2024).
- Baldwin RE and Forslid R (2023). Globotics and development: When manufacturing is jobless and services are tradeable. *World Trade Review*. 22(3–4):302–311.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9).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the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July. Basel.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24). Statistical release: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and global liquidity indicators at end-March 2024. 31 July. Basel.
- Canada (2024). Canada implementing measures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 and key economic sectors from unfair Chinese trade practices. News release. 26 August.
- Christophers B (2022). Fossilised capital: Price and profit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7(1): 146–159.
- Christophers B (2024). *The Price Is Wrong: Why Capitalism Won't Save the Planet*.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 Ebregt J (2020). The CPB world trade monitor: Technical description (update 2020).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24). ECB Data Portal. Available at <https://data.ecb.europa.eu/data/datasets/BPS/dashboard> (accessed on 22 August 2024).
- Financial Times* (2024a). Can India's economy thrive without China's help? 7 August.
- Financial Times* (2024b). China's international use of renminbi surges to record highs. 29 August.
- Financial Times* (2024c). Chinese steel exports to reach eight-year high. 1 September.
- Financial Times* (2024d). Climate targets group under fire over Bezos-backed carbon offsets decision. 11 April.
- Financial Times* (2024e). How big tech is quietly trying to reshape how pollution is reported. 14 August.
- Financial Times* (2024f). Maersk says companies are bringing orders forward on US-China trade war threat. 7 August.
- Financial Times* (2024g). The price is wrong – Brett Christophers on saving the planet. 22 February.
- Foreign Policy* (2024). The coming clash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11 September
- Guterres A (2023).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press conference - on Climate. New York. 15 June.
- Hallward-Driemeier M and Nayyar G (2017). *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Hebous S and Vernon-Lin N (2024a). Cryptocarbon: How much is the corrective tax? *Energy Economics*. 138:107827.
- Hebous S and Vernon-Lin N (2024b). Carbon emissions from AI and crypto are surging and tax policy can help. IMF blog.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4/08/15/carbon-emissions-from-ai-and-crypto-are-surging-and-tax-policy-can-help> (accessed 16 August 2024).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3).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Paris.
- Juhász R, Lane N and Rodrik D (2023).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3153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2024). Peak oil demand not on the horizon. Press release. 13 June.
- Pitron G (2021). *L'enfer numérique: Voyage au bout d'un Like*. É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Paris.
- Reuters (2024). China's exports top forecasts, but falling imports point to more stimulus. 12 July.
- Rodrik D and Sandhu R (2024). Servicing development productive upgrading of labor-absorbing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imagining the Economy Policy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 Rodrik D and Stiglitz JE (2024). A new growth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IEA-ERIA Project on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 Schmitz E and Matthes J (2024). Konkurrenzdruck aus China für deutsche Firmen. IW-Report 30.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Cologne.



- S&P Global (2024). JP Morgan global manufacturing PMI. News release. 1 August.
- The Shift Project (2018). *Lean ICT – Pour une sobriété numérique*. Paris.
- UNCTAD (202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 Global Disorder and Regional Respons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II.D.44. Geneva).
- UNCTAD (2023a).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Growth, Debt, and Climate: Realig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3.II.D.24. Geneva).
- UNCTAD (2023b).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3.II.D.17. Geneva).
- UNCTAD (2024a).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4: Shaping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igital Fu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I.D.12. Geneva).
- UNCTAD (2024b). *Global Economic Fracturing and Shifting Investment Patterns. A Diagnostic of 10 FDI Trend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 UNCTAD (2024c). *Global trade update – July 2024*. Geneva.
- UNCTAD (2024d). *Inequality: Major trends, policy challenges and the need for global economic compact*. UNCTAD report for the G20 Framework Working Group. Forthcoming.
- UNCTAD (2024e). *Recent develop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ommodity markets*. TD/B/C.I/MEM.2/62. Geneva. 5 August.
- UNCTAD (2024f).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2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I.D.19. Geneva).
- UNCTAD (2024g). *Sovereign debt vulnerabil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port produced for the Brazilian G20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Working Group*. Forthcoming.
- UNCTAD (2024h).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pdate*. Geneva. April.
- UNCTAD (2024i). *Trade in creative services*. TD/B/C.I/MEM.4/32. Geneva. 1 May.
- UNCTAD (2024j).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I.D.11. Geneva).
- United Kingdom,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24). *Balance of Payment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www.ons.gov.uk/file?uri=/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datasets/balanceofpaymentsstatisticalbulletintables/current/balanceofpayments2024q1.xlsx> (accessed on 22 August 2024).
- United Nations 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Technical Team (2024). *A world of debt: A growing burden to global prosperity*. Geneva. June.
-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2024). *Global e-Waste Monitor 2024*. Geneva and Bonn.
-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2024). *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t a Crossroad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1.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2023). Secretary-General's press conference on Climate. 15 June.
-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24). *World Tourism Barometer*. 22(3). September. Madrid.
- United States (2024).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Katherine Tai to take further action on China tariffs after releasing statutory four-year review.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Press release. 14 May.
- World Bank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3). *Trade in Services for Development: Fostering Sustainable Growth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Fact sheet on e-waste, including key facts, impacts on children, prevention and WHO's response*. 18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electronic-waste-\(e-waste\)](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electronic-waste-(e-waste)) (accessed 11 September 2024).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nd Luiss Business School (2024). *World Intangible Investment Highlights*. Geneva and Rome.
-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24). *World Tourism Barometer*. 22(3). September. Madrid.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4). *World Trade Statistics 2023*. Geneva.



2024 贸易 和发展报告

第三章

全球化走到拐点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项重大挑战：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可能给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造成限制。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结构、“去全球化”趋势和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给基于扩大制成品出口和部分资源出口的发展战略造成了隐患。

新技术的复杂影响，包括公司控制权集中度的提高，对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可能大多是负面影响，尽管电力成本降低会带来好处。对电池关键和稀缺材料的依赖加剧了这些风险，因为这些材料的供应链容易受到干扰，从而导致价格波动和供应短缺。

除了像以往一样会取代劳动力，新技术还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有一些技术正在推动“产业回流”，因此治理问题和国际政策协调变得日益重要。

逐渐兴起的第六次经济增长浪潮的技术特征——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并没有为发展战略提供明确的指导。很多问题将取决于能否应对贸易和金融面临的压力。只有不设置新的政策壁垒，保障市场准入和技术获取，以服务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才是长期可行的发展之路。

如果政治上对新技术影响回应太晚或无动于衷，可能会让全球经济中这个庞大而关键的领域被大公司和私人监管机构掌控。这样既没有做到包容各方，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联合国



主要政策启示

- ▶ 第六次浪潮中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能源转型有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因此减少它们现有的债务负担至关重要，如此它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局势中保持财政可持续性。
- ▶ 需要重新调整世贸组织关于工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的规则，以实现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并帮助原材料出口国家扩大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 ▶ 稳定国内农业生产和价格的**协调政策机制**有助于缓解全球南方当前面临的财政压力和偿债压力。
- ▶ 发达国家应该兑现现有的**气候变化承诺**，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 ▶ 需要以商定的原则和标准对**人工智能进行全球治理**，以避免监管碎片化。与此同时，应加强政策协调，以限制公司权力的集中，提高透明度并促进竞争。



A. 导言



布雷顿森林会议距今已有80年，世界贸易制度和全球经济整体似乎都走到了一个拐点。围绕贸易、发展、技术和安全问题的那些貌似既定的假设、规范和体制安排都受到质疑。

这个拐点本质上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造成的，是正在发生的四项转变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转变也决定了发展和增长的长期条件：

- 首先，1990年之后延续几十年的典型贸易自由化措施正在转向本质上更具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性质的政策。
- 其次，历史上移民和国际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开放程度一直不如贸易和金融市场政策，如今限制更多。
- 第三，一系列冲突破坏了相对稳定的全球安全制度。
- 第四，新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分工。

这四项转变中的每一项都会给继续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和发展战略造成限制。¹¹ 对于发展规划几乎总是包括

出口导向性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构成了重大挑战。

当前全球化的拐点凸显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和债务架构中长期面临的许多风险。与此同时，它为全球南方在多边层面再次表明其需求和优先事项提供了机会，非洲集团在联合国发起的制定国际税收框架公约的现行进程便是例证。

拐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60年前贸发会议诞生之时便正值一个类似的快速变化时代。在1964年贸发会议创立之后的十年间，非殖民化的浪潮达到高潮，以固定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为特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开始后又宣告失败，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革命拉开序幕。其中的每一次变化都对重塑当时所谓“第三世界”可选择的发展轨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国家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不太

¹¹ 此处以及在整章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以此标签涵盖的国家，可查阅<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Q/weo-database/2024/April/groups-and-aggregates>。这些国家特别依赖贸易，其中特别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来为增长和实物资本投资提供资金。因此，它们是本章所研究的长期影响的合适分析对象。这一定义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中国、匈牙利、黑山、北马其顿、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但不包括大韩民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省，它们被定义为发达经济体。



准确，因为更准确地说，其中也包括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后发展国家。¹²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现了主要由政府推动、通常通过外债筹资的发展项目，其目的是通过支持大规模工业生产来创造国内资本货物生产能力。

受出生率下降影响，世界人口正在经历缓慢的人口结构转型。因此，未来三十年间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可能缩减，55岁至64岁大龄劳动者的数量则可能增加。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称，到2030年，大龄劳动者可能占到全球劳动力的四分之一(Harasty and Ostermeier, 2020)。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人口的缩减和老龄化，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对进口制成品的消费减少(例如，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4)。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的迹象，这可能推动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达经济体市场已经开始萎缩，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仍处于萌芽状态。

当前的拐点对贸发会议的核心关切贸易和发展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反思过去的政策记录，并应用概念工具来帮助预测正在发生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对增长和发展战略的可能(但并非预先确定的)影响。

本章分为三节。B节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发展方面普遍面临的两难局面。目的在于说明为何贸易和出口变得甚至更加重要，或者如琼·罗宾逊(Robinson, 1962: 45)所说，为什么“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与根本得不到剥削的痛苦相比微不足道”。说到贸易，就有一个“贸易内容”的问题，而在C节中，使用了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 1939, 1942)关于周期性经济增长浪潮或创造性破坏的论点来理解新技术对生产和贸易的潜在影响。

增长浪潮和结构转型一直是发展理论的核心所在(Kaiser, 1979; Kondratieff and Stolper, 1935; Bairoch and Kozul-Wright, 1996)，而熊彼特框架有助于我们捕捉新经济部门的特点以及推动当下这种变革的技术和金融进程。

最后，要分析贸易的质量和方向，就需要回答与谁贸易和由谁进行贸易的问题。D节研究了国际贸易拐点的驱动因素和可能的后果。分析应用了B节和C节提出的框架，根据三种主要的可能变化情景，回答了未来发展道路和政策空间的问题。其中，目前这种开放贸易制度的衰落正日益成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最大的障碍。

本章还酌情考虑了更宏大的安全和金融制度的变化可能如何影响潜在的发展道路；第四章和第五章更详细讨论了这两个主题。

¹² 这些标签反映的是它们在政治上的站队。第一世界主要指富裕的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第二世界是共产主义集团。第三世界由没有站队的国家组成，但通过转喻也指代发展中经济体。

B. 发展已走到重要关口



就在1964年贸发会议第一届大会召开之前几年，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罗格纳·努克塞(Nurske, 1952: 571)试图找出哪些自我强化机制的组合阻碍了发展，他说：“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穷。”

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投资资本和熟练劳动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缺乏操作最新工具所需的人力资本。特立尼达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口中的“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本地工资，抑制了对人力和有形资本货物的投资，而这种投资是推动一个经济体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农业向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结构转型的动力。穷国也穷在有形资本包括重要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缺乏，穷在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稳定性。向技术和发展前沿迈进需要大规模投资，而金融市场的深度和稳定性是这种投资的前提要求。更隐晦的一点是，穷国缺乏监管日益复杂的商品和金融市场的法律和行政能力。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超越了以上所有因素：穷国之所以始终贫穷，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总需求来吸引投资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瑟尔沃尔(Thirlwall, 2012)认为，由于当地需求总量不足，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总量便至关重要，这部分需求不仅能够吸引持续投资，还能吸收会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的当地劳动力供应过剩。刘易斯的两部门

模型假定，或至少寄希望于，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最终能吸收传统或落后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触发工资上涨。反过来，工资上涨会促使企业投资于人力和实物资本。在很多地区都能观察到“刘易斯拐点”，例如，2004年到2006年左右的中国(Garnaut and Song, 2006)，以及以出口量快速增长为特征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刘易斯拐点很少在没有出口增长的情况下出现(Schwartz, 1994; 2007)。

现代经济中许多行业的最小规模经济¹³都超过了当地市场容量，汽车行业就是一例(插文三.1)。即便其他许多制成品的规模经济要低得多，但最复杂的商品以及制成品所需的许多重要通用基础材料仍然需要高水平的生产线吞吐量，方能达到与盈利要求和长期经济韧性相匹配的水平。例如，全世界的市场空间也仅能容纳两三个大型民用飞机制造商(例如，Truxal, 2024)。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规模经济的逻辑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进口产品而不是国内生产来满足国内需求是更合理的选择，但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显然是例外。

¹³ 最小规模经济是指在给定固定资本投资的情况下，可以售出足够多的单位以获利的价格点。



插文三.1

汽车产地位置的转变反映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变化

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经常被视为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地理学的典型案例，也是整个二十世纪贸易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标志。通常在同一平台年产5万辆汽车的情况下，汽车装配能实现最大规模经济的80%，年产25万辆汽车则能实现最大规模经济。内燃机设计和装配的阈值甚至更高，为40万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根本无法吸收如此高的产量，事实上，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做不到。

举例来说，在1950年代，澳大利亚或巴西国内对汽车的需求很少超过20万辆，这还是涵盖了各种车型的需求(Jenkins, 1987)。到2023年，澳大利亚(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可吸收120万辆轻型汽车，巴西(第九大经济体)可吸收220万辆。^a到2023年，使用同一平台生产的汽车年销量要达到100万辆才能实现盈利的规模经济，发动机为30万台(Doner et al., 2021)。

这不仅对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国家(2023年时的例子有洪都拉斯、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具体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来说难以企及，对排名更靠前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例如，2023年，塞浦路斯的新车销售量约为12,500辆，涵盖各种车型。在较富裕的经济体中，奥地利和以色列每年的轻型汽车新车购买量在25万至30万之间。在较穷但人口较多的泰国，汽车消费量大约为85万辆，其中大部分是轻型商用车。以色列不生产轻型汽车；奥地利的汽车生产基本上来自大众汽车的一个分包商，其产量相当于奥地利消费量的三分之一。泰国作为日本跨国车企的平台，是一个主要的汽车出口国。

汽车产地地理位置的转变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的变化。汽车公司开始将零部件生产转移或分包到成本较低的地方，如墨西哥和中国台湾省，最终又转移到东欧和中国，同时它们也开始将廉价小型汽车的装配线转移到选定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所拥有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近乎整个生产综合体，且其地理位置有利于向范围更大的地区出口。例子包括1980年代的墨西哥、大韩民国和西班牙，199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泰国，最后是2000年代的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无论是哪个年代，最终产品通常都是低价值车型，如罗马尼亚制造的达契亚Logan；或共用同一平台的昂贵车辆的低价版，如与大众高尔夫或奥迪A3共享平台的斯柯达Octavia。

插图三.1 汽车产地位置的转变反映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变化

电动汽车延续了这种趋势，装配线的最小和最大规模经济仍然适用。尽管电池已经取代了内燃机，但电池生产的规模经济阈值似乎与内燃机相似，约为每家工厂生产40万至50万单位。因此，转向电动轻型汽车不会让这种生产逻辑发生重大改变，不过生产地点可能会略有变化。

在中国政府做出发展电动汽车产业的战略决策后，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中国在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2023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58%的电动汽车；2024年，中国售出的电动汽车达680万辆(IEA, 2024b)。这与从2010年代至今全球制造业发生的转变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和北美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也很大，2023年销量达460万辆(IEA, 2024b)，延续了非电动汽车的趋势。

尽管如此，电池的重量(会增加运输成本)和“在销售地生产”的逻辑意味着大多数传统的汽车生产区将继续存在，尽管其所有权可能会有所变化。例如，中国在泰国的电动汽车生产正在取代日本在那里的内燃机汽车生产。

资料来源：Doner et al. (2021); IEA (2024b); Klier and Rubenstein (2022); Yang (2023)。
a 数据来自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可查阅<https://www.oica.net/production-statistics/>。

然而，正如普雷维什(Prébis, 1950年)所论述的那样，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制成品都依赖进口是导致一国持续处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原因所在。原材料出口则集合了两种最糟糕的情况：随着恩格尔定律(Engel, 1895)

开始发挥作用，价格持续下跌，与此同时价格和出口量都出现极端的周期性波动。恩格尔定律是普雷维什观察到的贸易条件恶化的基础原理。随着收入增加，直接用于食品、织物和其他原材料的比例会减少(插图三.2)。



插图三.2

恩格尔定律说明了依赖原材料出口存在风险

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在1857年观察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即使用于食品的绝对支出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收入比例也会下降。尽管恩格尔没有直接讨论更广泛的原材料问题，但他的分析对消费中原材料所占比重大有重要蕴意，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的能力也有重要意义。

简单来说，按照瑟尔沃尔(Thirlwall, 2012年)更具普遍性的论点，某一特定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受到出口增长率限制。但具体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原材料出口和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增速低于全球总需求增速，该经济体的收入增速将落后于全球总体水平。简而言之，该经济体即便不会绝对落后，也会相对落后。这种相对的衰退是普雷维什(Prébis, 1950)的核心关切。

插图三.2 恩格尔定律说明了依赖原材料出口存在风险

对此或许可以反驳称，原材料的绝对消耗量总会增加。例如，以往的技术革命总是涉及主要能源来源的转变（见特别关注章节）。煤似乎取代了水力或木材；石油似乎取代了煤。但这种取代更多的是表面现象，而非切实发生，因为在每一场革命中，即使过时的无机能源在总能源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有所下降，其绝对总量仍然很重要。即便石油和天然气在交通和发电领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全球煤炭的产量和消费量仍在增长。

煤炭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出现在2023年，达到179艾焦耳(Energy Institute, 2024)。全球范围来看，煤炭需求较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时飙升了75%，较2015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署之时飙升了近15%。2023年，仅五个国家就消耗了世界近80%的煤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美国(Blas, 2024)。2024年，全球煤炭消费量预计将再次攀上历史新高。按照目前的趋势，2050年的消费量将高于2000年(Blas, 2024)。一些石油公司根据这种历史模式预测石油消费将持续增长。

从历史上看，人口增长推动了原材料消费的持续绝对增长。鉴于全球人口构成正在朝着人口增长减缓甚至逆转的方向转变，不能排除煤炭消费的绝对值出现减少的可能性，并可以此类推至其他原材料消费。按人均计算，主要通过电力、钢铁和水泥消费间接实现的煤炭消费在过去40年里基本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消费的总体增长得益于中国一次性的城市化进程；如今，中国消费量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6%(Energy Institute, 2024; Blas, 2024)。

第二个长期存在的模式是收入增加推动原材料消费增加。但与恩格尔的观察一致，穷国收入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绝对消费量增加的原因。本章的主要论点是，中低收入国家在提高收入方面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尤其是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在提高收入方面可能受阻，尤其是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国家。

这会限制发展，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需求弹性限制了这些出口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受限反过来又对增长构成了障碍，因为发展需要用这些出口获得的收入来支付资本货物进口(Thirlwall, 2012)。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创造新的粮食出口未必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收入。同时，价格和数量的波动给偿债造成了困难，阻碍了投资(UNCTAD, 2023c)。

从政策角度来看，在恩格尔定律和对生产性投资的自我强化抑制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只有一条出路：出口制成品，同时利用出口市场实现盈利性规模经济。制成品出口可能不会像农产品出口那样面临饱和效应，因而能够扩大支撑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本货物进口。而且制成品出口通常会通过边做边学和满足全球质量标准的需要，产生生产率和知识的溢出效应(维尔多恩效应)。¹⁴

¹⁴ 经济学家维尔多恩 (Verdoorn, 1980年)估计，在大量行业中，产出增加1%会导致生产率增加0.5%，就业增加0.5%。

这些溢出效应对于吸收出口企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以及可吸引上游投资用于培训和教育行业的产业升级至关重要。因此，制成品出口可以成为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的引擎。然而，当前全球贸易的停滞损害了边做边学、规模经济和就业溢出到服务业的潜在收益。罗德里克(Rodrik 2013)认为，这种过早的去工业化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推动因素。

如果能够实现工业制成品出口，它们将采取什么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非殖民化消除了工业出口的外部壁垒。从1950年代起，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之下，制成品的贸易壁垒也逐步减少，使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出口。外包和离岸浪潮随之而来，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由此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

然而今天，制成品出口可能会面临与原材料出口相同的一些问题，当前拐点的性质又加重了这些问题。为了探

究原因，下面的特别关注章节介绍了熊彼特关于增长浪潮的论点，以及它们如何与涉面更广且更抽象的结构转型过程相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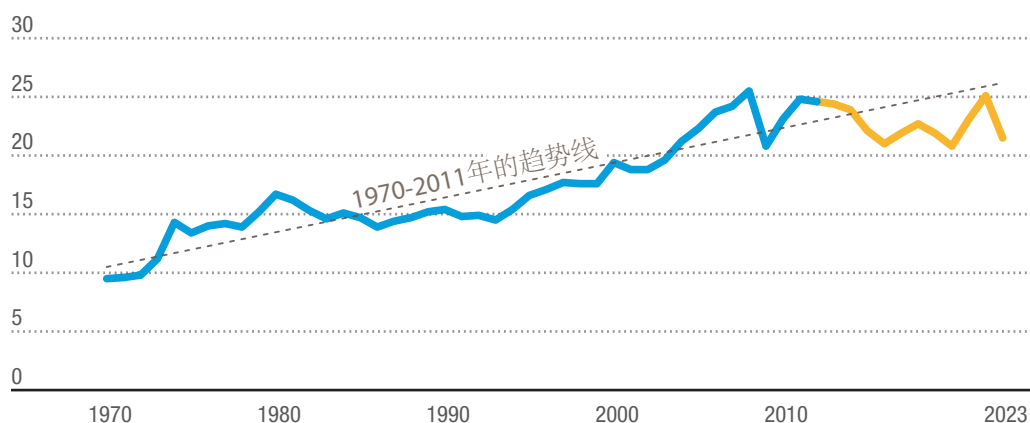
在当前的信通技术浪潮或第五次增长浪潮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除了传统的资源出口组合之外，还增加了制成品出口。一些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它们完全缺乏可出口的自然资源。但大多数国家是自愿为之，1965年后出口加工区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证明。

跨国公司和大型零售商是大部分贸易流动的组织者。到2012年，跨国企业的内部(规划)贸易占全球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来自它们间接控制的公司的采购另占了六分之一，再加上公平独立采购，总量达到三分之二(UNCTAD, 2013: 163)。如图三.1所示，在那个时间点，全球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趋于平稳，按现值美元计算的比例在2016年、2019-2020年和2023年出现绝对下降。



图三.1

第五次增长浪潮导致出口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趋于平稳
世界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

增长浪潮决定了以出口促进发展的潜力

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 1939, 1942)和佩雷斯(Perez, 2002)认为,教科书经济学对均衡和竞争性市场的强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关系不大。相反,正如琼·罗宾逊(Robinson, 1962)和尼古拉斯·卡尔多(Kaldor, 1996)指出的那样,经济永远不会出现均衡状态,而是常常以高度的寡头垄断为特点,有时甚至是完全垄断。相对快速的增长期和大规模动荡期过后,往往会迎来相对停滞的时代:新技术陷入低效重复发展,推动初始扩张的丰富社会和物质资源枯竭。熊彼特认为,快速增长时期有六大特征变化:

- 1 出现新的廉价能源来源,如十九世纪末期出现的煤炭和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石油
- 2 基于新的通用技术出现新的生产流程,如流水线以及随后利用电动设备实现的流水线装配生产
- 3 出现新的投资品或大众消费品,如钢铁及之后的标准化耐用消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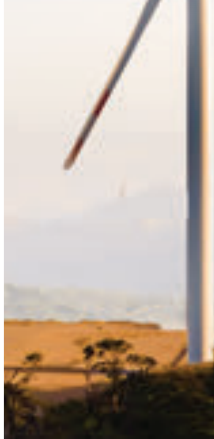
- 4 出现新的交通方式,如钢制轮船和自行车,以及之后的汽车和飞机
- 5 出现新的公司组织形式,如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纵向一体化公司的激增,以及之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Chandler, 1962)提出的“M型”多部门公司;与此相关的是新投资融资模式的出现
- 6 在熊彼特框架中不太突出,但仍非常重要:出现新的社会经济治理模式来平衡供求关系,如20世纪初的卡特尔和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Boyer, 1990; Perez, 2002; Freeman, 2007)。

综合起来,这六种变化体现为公司的快速扩张——其投资和销售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的浪潮,正如石油驱动的大规模汽车生产行业和更广义的耐用消费者行业的整体效应一般。表三.1详细说明了增长浪潮的历史,包括推测中的“第六次”浪潮。



表三.1

六次熊彼特式技术革命和增长浪潮

	1771	1829	1874	1914	1970	2020
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	奴隶劳动力和糖出口的密集化	从胁迫劳动转向契约劳动和雇佣劳动	农产品繁荣期	进口更替时代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新农产品出口	新兴的趋势(见文中讨论)
金融创新	小型私人银行和地方网络(例如，英国的贵格会和法国的公证制度)	国家投资补贴和公共债务	企业和开放资本市场	国家投资补贴、公共银行、细分金融市场	风投资本、证券化、机构投资者	私募股权和私人债务，公开的国家产业政策补贴
交通运输形式	运河	铁路	轮船、城市有轨电车和自行车	汽车、卡车和飞机	电信和集装箱化	电动汽车
能源来源	水	煤炭、天然气	化石燃料、电力	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	可再生能源
通用技术	工厂生产	金属机械	贝塞麦转炉炼钢和平炉炼钢；流水线生产	流水线装配	半导体和软件、互联网、生物工程	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信息学
						
	1771	1829	1874	1914	1970	2020
	第一波浪潮	第二波浪潮	第三波浪潮	第四波浪潮	第五波浪潮	第六波浪潮
	工业革命	铁路修建浪潮	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汽车生产浪潮	信通技术浪潮和第二个全球化时代	可能的第六次技术科学浪潮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 Schwartz (2019)。

注：通用技术包括通用到足以在各种行业应用并对其运转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考虑到它们在改进技术和补充创新方面的潜力。

这几次增长浪潮对利用出口作为发展引擎的可能性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的方面是，新的增长浪潮几乎总是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需求，使其超出当前趋势水平。例如，十九世纪后期自行车和汽车工业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对东南亚橡胶和巴尔干地区矿物出口的需求(Lewis, 1970; Berend and Ranki, 1977)。通信技术产品的激增为东亚的劳动密集型装配线创造了一个利基市场。在这两个例子中，外国和当地行为体创造了新的生产区和出口流。随着后向和前向联系的出现，以及当地需求总量相应的增加促使企业提高产量以供当地消费，这些都有可能促进地方的发展。如今，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导致对锂和电池相关稀土资源的需求增加，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潜在影响(UNCTAD, 2024a)。

第二个积极影响是，发达国家新增长部门的出现往往会促使旧的制造业部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型(Bernard and Ravenhill, 2011)。新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发达经济体工资水平提高，从而将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推向海外，寻求工资成本更低的生产地。“雁行”模型抓住了1980年代以前更为普遍的一种动态模式，即整个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模式(UNCTAD, 1996)。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制衣业以及最终大规模生产的纺织品行业先从日本转移到大韩民国，又从大韩民国转移到中国，最终从中国转移到埃塞俄比亚等国。

这种转移是不平等的。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而且1970年代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跨国企业不再将整个产业转移，而是将生产流程的

特定环节安排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实现工资和生产率水平、技能和物流成本的最优化(UNCTAD, 2002, 2003)。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全球贸易为中间产品贸易，表明生产的分解程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在高度全球化的汽车、服装和电子行业(Lund et al., 2019)。

支撑这种转变的供资对公司的控制和融资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战后初期，少数发展中经济体自筹资金开展了消费品生产和一些资本产品生产。开发银行和援助提供的外部融资额度大体上相对较少，且常常与从捐助经济体的采购挂钩。在这两种情况中，控制资本来源和处置的都是公共机关而不是私人机关(例如UNCTAD, 1998, 2016)。

到了1970年代，发达国家取消了资本管制，石油美元盈余得以循环利用，这导致大量跨境贷款从私有银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金融公司。虽然发展中经济体似乎因此摆脱了1960年代的融资约束，但它们也因此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遗留问题引发了转向本币计价债务的意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代实现了这种转变(Onen et al., 2023)。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开始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以币值更坚挺的货币借贷(Glen and Pinto, 1995)。这种转变在2010年代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内，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大公司被动持股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总体而言，融资模式的转变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得较晚，或者根本没有出现。到2011年，在全球资产管理公司500强中，只有36家来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私人
和国家所有权的
混合模式可能
预示着一种全球
性的趋势。

即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Towers Watson, 2012; Celik and Isaksson, 2013)。尽管如此, 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存在私人(未上市)和国家所有权结合的模式, 这可能预示着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可能出现转向国家所有权和主权财富基金的变化(Babić, 2023; Babić et al., 2023)。

生产的全球分工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如何应对正在出现的第六次熊彼特式增长浪潮所带来的重大变化。一些中等技术产业将转移到部分发展中经济体, 但由于缺乏产品差异化, 加上进入壁垒较低, 会导致其价格被压低。然而, 随着新产品和新生产技术取代旧的产品和技术, 替跨国企业代工的零部件生产活动可能会消失。一些估算指出, 在2010年代, 只有约18%的全球贸易是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目的, 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其贸易伙伴五分之一的国家开展贸易(Lund et al., 2019: 8)。

2010年代只有约
18%的全球贸易
以劳动成本套利
为目的。

随着制造业朝着“服务化”的方向转变, 这些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过去20年里, 随着服务业因技术的快速进步而得到加强, 制造行业内部对服务活动的投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 从2003年的38%增至2023年的69%。如今对制造行业内服务活动的投资占据了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大多数。对

服务活动投资增加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必然结果是对制造活动的投资份额急剧下降, 在同期内减少了一半, 从26%降至13%(UNCTAD, 2024b)。

熊彼特式增长浪潮在结束时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破坏, 例如整个原材料出口生产部门崩溃或面临相对价格急剧下降, 1909年开始使用哈伯法生产人造肥料后, 海鸟粪的出口生产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样, 与当前的拐点更相关的是, 生产原材料合成替代品的创新可能会限制大宗原料商品出口量和出口价值的增长率, 例如合成橡胶对天然橡胶的影响。卡多佐和法莱托(Cardoso and Faletto, 1979)详细跟踪研究了拉丁美洲连续出现的资源出口繁荣的影响, 说明了不同的社会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出口繁荣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实现地方经济的多样化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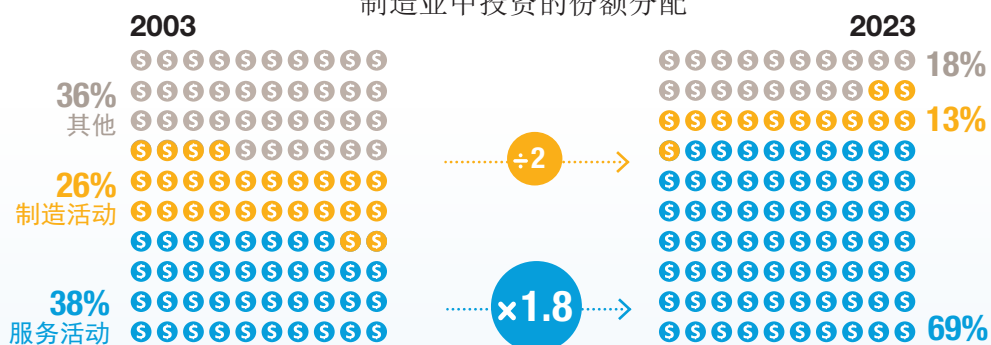
近年来制造业的转移往往涉及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流程的转移, 无法创造太多边干边学的机会, 也不太可能获取足够的利润来为宏大的地方工业化方案供资。阿姆斯特登(Amsden, 2001)对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更乐观的解释, 尽管这是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出口迅速扩张之前。不过这种地理上的转移不一定是永久性的。



©2024 UNCTAD. Image created using AI.

制造业的“服务化”： 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制造业中投资的份额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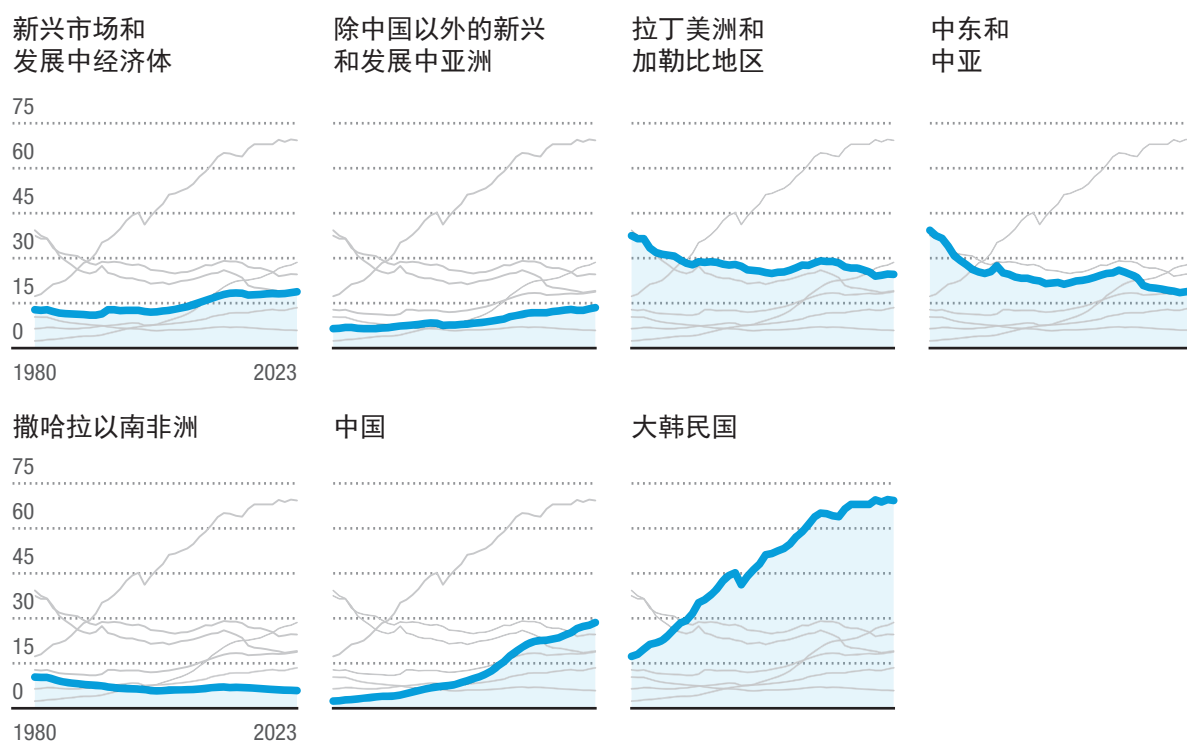
虽然过去40年中发展中国家收入有所增加，但向发达经济体靠拢的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巨头决定了生产的内容和地点，因此也决定了出口的产品种类。他们的规则是将当地工资与当地生产率、当地企业设计和生产零部件的内部能力以及当地市场的规模相匹配(Dunning, 1970; Fröbel et al., 1980; Gereffi et al., 2005)，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布局：在巴西或中国等大型、受欢迎的市场上，进行供当地消费的全规模生产；在具有中等制造技能的国家，包括巴西和波兰，进行全球商品链特定部件的生产，如汽车变速器；在拥有大量廉价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或越南，进行各种非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服装和鞋子的分包生产(例如Hollveg, 2019)。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在技术阶梯上的位置有所攀升，将本国收入和生产能力提高到接近富裕国家的水平。例如，大韩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水平的比率从1980年的17.3%上升到2023年的69.3%。与之相反的是，仍然相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巴西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水平之比从大约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总体而言，除中国之外的整个发展中经济体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保持在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左右，从1980年的17.7%下降到1999-2000年的13.5%，2023年又恢复到16.2%(IMF, 2023)。

图三.2

除了一些例外，大多数国家在人均产出方面并没有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比率，部分国家(组)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4年4月)。

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平价购买力国际美元。美国对应年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

如图三.2所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一些国家大大缩小了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如大韩民国，其次是中国。然而，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的相对人均收入实际上出现下降；东欧国家回到了转型前的水平；而亚洲和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显现出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惊人增长作用的结果。虽然平均而言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绝对收入在过去40年中有所增加，但向发达经济体靠拢的情况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

与以信通技术为基础的第五次熊彼特式增长浪潮相伴的超全球化，实际上创造了比前几次浪潮更加精细的全球劳动分工。除了刚刚提到的模糊影响之外，虽然第五次浪潮为前几次浪潮中基本没有出现的制成品主导的出口战略开辟了空间，但这也有可能導致发展中经济体被困在低附加值生产中(Bruhn, 2014; Lectard, 2023)。就连以汽车为主导的第四次浪潮也往往在关税和非关税的重重壁垒(例如汽车生产中的本国含量规定)保护下发展更加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部门。

过去50年里，发展中经济体制成品出口比例的上升给生产率带来的提升幅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以资源为基础的出口浪潮。这是因为跨国企业或是将自身相对先进的生产流程带到了新的生产地，或是通过分包帮助当地企业将生产水平提升到更接近富裕国家的标准。尽管跨国公司和主承包商往往以更廉价的投入或批发价格的形式获得了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收益，但“边干边学”的做法和规模效应帮助部分经济体提高了本地收入。正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Milanović, 2016)所展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改变了1960年代全球收入的分布模式，从双峰分布变得更趋于单峰分布，尽管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增加。但这种收入增长还是大部分发生在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

当前的拐点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可能出现的第六次浪潮将带来什么影响，包括这次浪潮是否会为出口导向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导向的发展创造经济和政策空间。

第五次增长浪潮实现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将发展中国家困在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中。

C. 三个关键拐点



展望未来，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全球环境。三大变化相互作用，给基于扩大制成品出口的发展战略造成危机，甚至可能危及依靠资源出口的发展战略。随着潜在的第六次增长浪潮逐渐袭来，这些变化会导致市场需求和生产地点发生巨大转变；发生去全球化的风险会因此增加；而且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会放大去全球化带来的压力。

不断变化的技术、去全球化和安全问题给依赖制造业出口和资源出口的发展战略造成威胁。

过去十年里，可能引发第六次增长浪潮的新技术已经从有希望变成了可能。它们貌似包含了熊彼特式增长浪潮的经典元素。所有这些元素都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及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 1 **新能源：**太阳能、风能以及地热供暖等形式的可再生能源。虽然通过节能实现“少发电”的努力将会继续，但更可能出现廉价可再生电能的巨大浪潮。
- 2 **新的通用生产技术：**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增强的生物基因组学和精密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更广泛的应用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太大，却是制造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自动化方面。
- 3 **新的消费品：**种类繁多的各种电动产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电动汽车），以及个人交通工具（不仅限于汽车，还包括电动自行车、三轮车辆等等），再加上通过第二

代生物技术生产的新材料。药品消费方面也可能朝着定制化程度更高转变。

- 4 **新交通模式：**主要能源来源会出现演变，因此大部分交通运输部门的生产流程也通过电气化发生演变，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交通工具生产（两轮和三轮电动车辆）也会由此出现扩张。
- 5 **新的公司组织形式：**这项因素尚不明晰，但私人股本和私人债务市场正在逐渐取代开放的资本市场。
- 6 **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最不透明也最不可预测，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平衡全球供需方面。

这些因素中有一些两两之间显然存在相互关联（例如新能源和交通模式），据此，下文将它们两两一组分为三组进行研究分析：



1. 新能源和新交通模式

现在想阻止全球平均气温大幅上升可能为时已晚，但实现经济去碳化的政策努力正在借助市场力量促进普遍的电气化，特别是促进清洁交通。

许多国家都对新兴的太阳能和风能行业进行补贴，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今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价已经可以与煤电价格和某些情况下的天然气价格竞争一下了。这意味着煤炭使用量会长期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煤炭出口量也会因此下降；从2003年至2022年，发展中国家的煤炭出口量占全球煤炭出口总量的49%。哥伦比亚和莫桑比克都位列特别依赖煤炭出口的国家(ITC, 2024)。

此外，车队的电气化预示着对化石燃料的总体需求，尤其是对石油的需求将大幅缩减(BP, 2023; IEA, 202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3)。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石油是比煤炭更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那些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也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2010年至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原油出口在世界原油出口总量中的平均比重达到81%。¹⁵ 对石化产品和航空燃料的需求就绝对数量而言很可能会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但人均水平未必如此。不过这两个部门加起来仅占全球石油需求的五分之一左右(BP, 202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3)。相比之下，陆

路运输消耗的石油需求已经明显萎缩，而陆路运输占全球总消耗量的一半。2022年的全球石油产量仍低于2018年的峰值，主要私营石油公司正在将利润分给股东，而不是用于新生产投资，绿地支出也有所缩减。市场预测显示，与2021年至2023年的水平相比，从2024年起，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资本支出增长将大幅减速(BMI, 2023)。

在若干发展中国家，能源占出口总量的比重很大，而能源中又往往以化石燃料为主。表三.2列出了能源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超过30%的35个国家。对于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量超出五成的25个国家而言，预期中出口总值将遭受的长期负面冲击(包括价格冲击)预计将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依靠化石燃料出口积累了大量收入的能源出口国，如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或许能够实现经济更加多样化的转型，较小的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便成功实现了这种转型。这些出口国的生产成本往往较低，在化石燃料出口价格预期下降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这可能提供更多优势。但考虑到2012年至2022年间，燃料出口约占全球大宗商品出口总值的44%和总量的14%，这场冲击的规模不容小觑。根据贸发会议的数据，在101个最依赖初级商品的出口国中，燃料出口国约占三分之一。

¹⁵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333组计算，包括石油原油和自含沥青矿物中提出的原油。



表三.2

部分国家极易受能源出口下滑影响

能源出口占商品出口份额超过30%的发展中国家，按比例降序排列，2022年

国家		能源出口 (十亿美元)	商品出口 总额	能源出口占商品出口 总额的份额 (百分比)
伊拉克		124.8	129.3	96.5
阿尔及利亚		57.8	60.9	94.9
安哥拉		48.1	51.3	93.7
利比亚		35.5	38.0	93.6
尼日利亚		57.9	63.6	91.1
阿塞拜疆		34.4	38.1	90.3
土库曼斯坦		11.8	13.2	88.9
赤道几内亚		6.6	7.5	88.5
南苏丹		0.7	0.9	84.5
卡塔尔		109.2	131.0	83.4
文莱达鲁萨兰国		11.4	14.2	80.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6	4.7	77.2
沙特阿拉伯		319.9	426.5	75.0
圭亚那		8.3	11.3	73.3
乍得		2.4	3.5	69.4
加蓬		5.8	9.2	63.3
刚果		6.6	10.7	61.7
哈萨克斯坦		51.8	84.4	61.4
哥伦比亚		35.1	58.6	60.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6	13.3	57.4
阿曼		37.3	66.5	56.1
蒙古		7.0	12.5	55.5
喀麦隆		3.2	5.9	54.8
科威特		51.7	101.3	5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6.7	72.1	50.9
东帝汶		0.2	0.5	49.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62.1	532.8	49.2
也门		0.4	0.9	48.2
莫桑比克		3.8	8.3	46.1
巴布亚新几内亚		5.6	14.5	38.5
厄瓜多尔		11.7	32.7	35.9
加纳		6.7	18.7	35.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7	7.6	34.8
印度尼西亚		100.4	292.0	34.4
埃及		15.6	48.1	32.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的出口数据。

注：巴哈马、牙买加和圣卢西亚没有被列在表中，因为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以转口贸易为主。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能源出口大多为电力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石油消费之间的日益脱钩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发达经济体，现如今这种脱钩现象已蔓延到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图三.3)。过去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长刺激了用于个人交通和商业运输的石油消费；与之不同，未来的收入增长很可能将刺激电动轻型车辆的消费，特别是小型摩托车和超轻型车辆。全球汽车销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目前低于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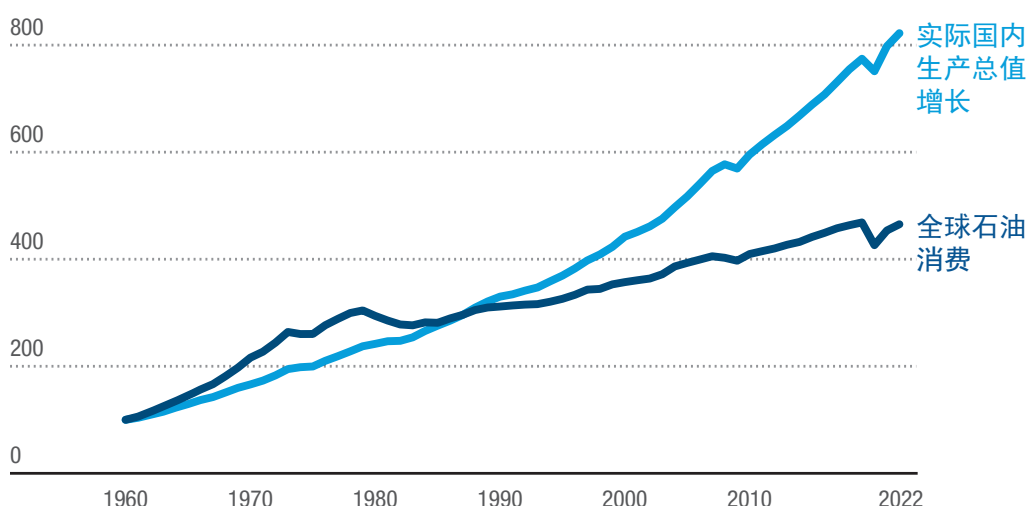
的水平——而2011年本身就是危机之年。与此同时，2022年售出的新车中有七分之一是电动汽车。

2002年到2021年间，石油进口累计总量前十的国家中有八个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推广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实力(ITC, 2024)。另外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也都致力于扩大太阳能发电，并希望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个人交通和商业运输需求的未来增长很可能将刺激电动轻型车辆的消费。

图三.3

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石油消费之间的关联逐渐减弱
世界产出与石油消费增长之比
(指数，1960年 = 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Eikon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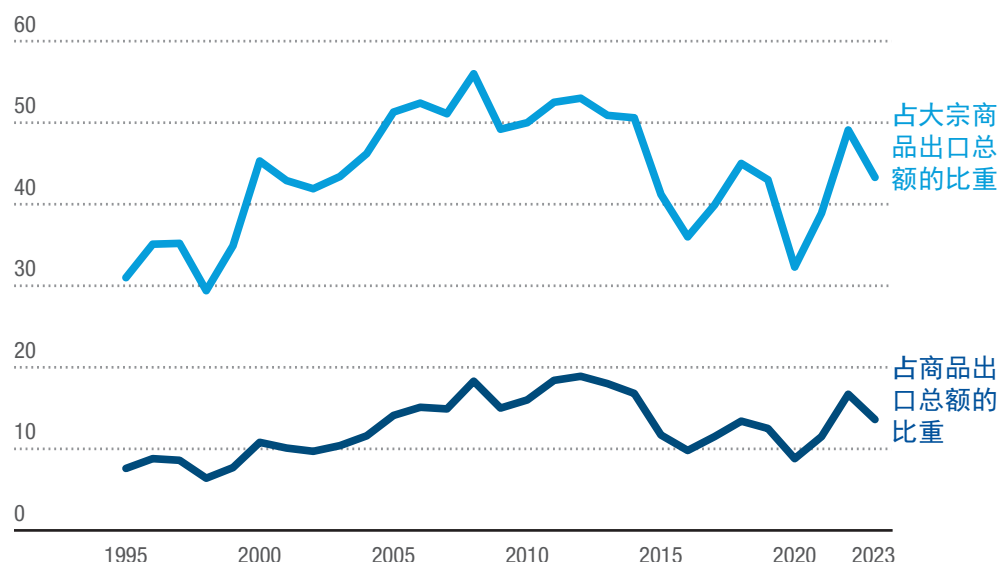
现有的大量燃油车辆必然会减缓变化速度，但未来二十年里，依赖石油出口获得大部分出口收入的国家要维持现有进口水平，在资金方面可能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制约。对于安哥拉、阿塞拜疆和利比亚等国家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挑战：从2010年到2022年，这些国家的燃料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而不仅仅是出口)的比重平均达到40%以上，而且它们以往的出口收入大多已经消耗殆尽。

石油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的第二组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也可能受到这种转变的影响。总体而言，有22个发展中国家的原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0%以上，其中有14个国家的原油出口份额超过50%。第三组利用石油出口为消费品进口提供资金的国家可能会遭遇收入缩减。



图三.4

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燃料出口比重较高的出口依赖型国家可能面临重大冲击
能源出口占大宗商品和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

进口国旨在确保获得转型矿物的渠道，通常做法是扩大国内的采矿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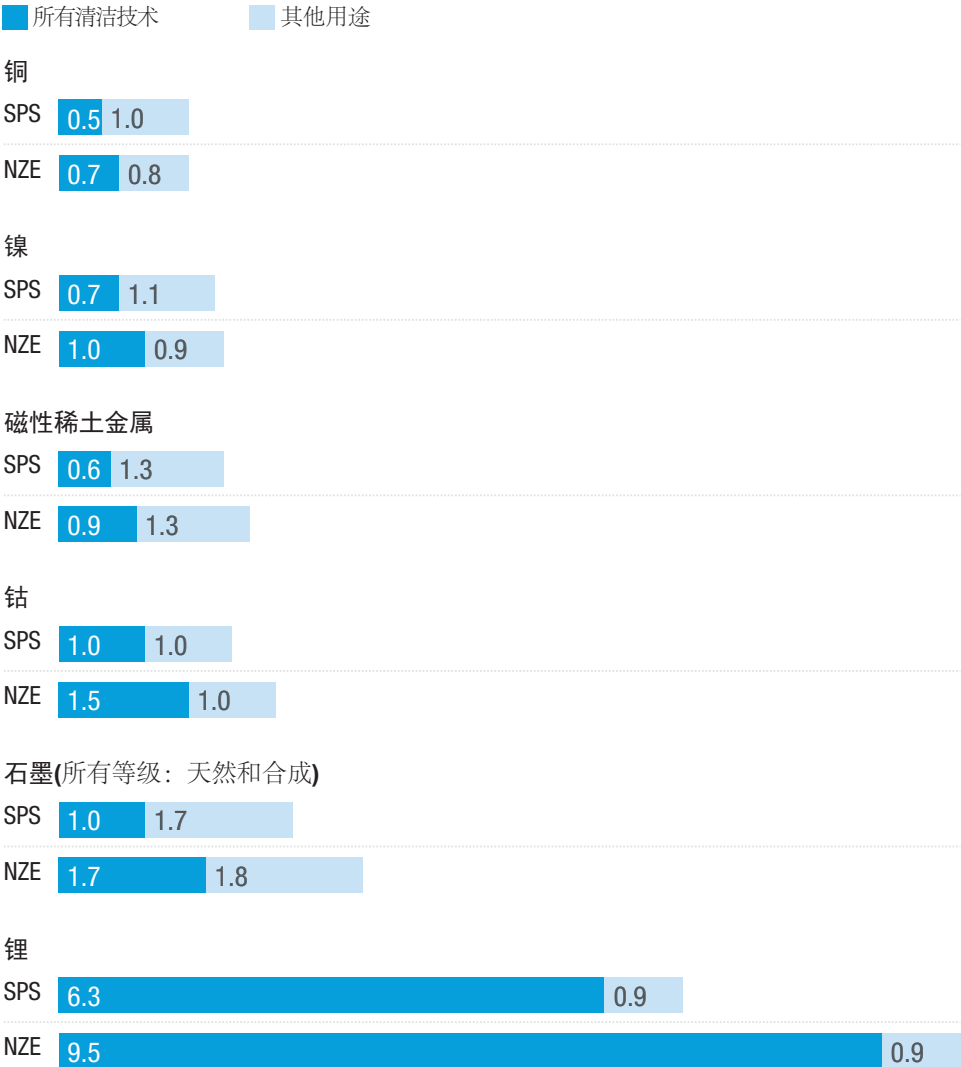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发展太阳能发电，它们或能因此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也不再需要通过举债来填补进口石油造成的贸易赤字。这对于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有着重要影响。1992年至2021年间，全球经常账户累计赤字的约四分之一是由石油净进口造成的(IMF, 2023)。这种赤字需要资金来填补，从会计恒等式上看，这部分资金被石油出口国相应的经常账户盈余所抵消。但由于石油过去以美元定价，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因此这些盈余通常转换成了石油净进口国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哪怕是以间接形式。这释放了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进口商品的借贷能力，但也给贸易计价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下一节将探讨这个问题。

对电气化关键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将使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受益。根据贸发会议的最新分析，全球对转型矿物需求激增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于增加矿物开采(图三.5)。进口国旨在保障获得这些矿物的渠道，通常做法是扩大国内采矿业务，作为弥合供需缺口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继2021年强劲反弹34%之后，2022年全球勘探预算增长了16%。2022年，勘探活动的主要目的地是拉丁美洲，占了25%。非洲位居第二，占17%(Standard and Poor's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3)。对关键矿产开发的投资大幅增加，继2021年增长20%之后，2022年再度增长30%(IEA, 2023)。投资规模是否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有待观察(UNCTAD, 2024c: 43)。



图三.5

对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需求激增，到2050年可能大幅增长
到2050年，既定政策情景和净零排放情景下的需求与2023年需求的比率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IEA, 2024b。

注：SPS指既定政策情景，NZE指净零排放情景，均为到2050年。

重要的是，不应夸大对矿物的需求能够推动多个国家发展的作用。可再生能源所需的一些材料(如锂)的地理分布很广(表三.3)，但目前其加工相当集中。另一些材料(如钴或稀土)的分布则并不广泛。一些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

利亚和美国已经在通过新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地生产。2024年6月挪威政府宣布该国有880万吨的稀土金属储量。安全关切促使各国加紧努力寻找更容易在本地获得的电池原材料，如铁，而不是依赖钴等供应源集中的矿物。

重要的是，不应夸大对转型矿物的需求能够推动多个国家发展的作用。



表三.3
锂资源的地理分布很分散

地区	生产		储量		资源	
	吨 (千)	国家 数量	吨 (千)	国家 数量	吨 (千)	国家 数量
非洲	1	1	220	1	4,340,000	5
亚洲和 大洋洲	54	2	6,200	2	11,550,000	3
欧洲	1	1	60	1	5,870,000	7
北美洲	1	1	1,280	2	10,800,000	2
南美洲	26	3	11,195	3	52,950,000	6
未分类			2,045		490,0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基于国际锂业协会的数据。

新技术可能扰乱市场，影响贸易和稳定，而对稀缺材料的依赖加剧了风险。

下文的分析凸显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若干风险。

- 1 首先，电气化可能会降低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潜力。虽然一些出口品的数量可能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但从人均上看，数量和价值可能都会下降。
- 2 其次，新技术的引入可能扰乱现有市场，影响贸易流动和经济稳定。对关键和稀缺电池材料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风险，因为它们的供应链容易受到干扰，从而导致价格波动和供应短缺。
- 3 第三，需求波动、供应链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会导致新的能源技术和交通运输方式出现价格的大幅波动。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实力和贸易平衡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贸易关系和协议。

这些风险表明，国际协定和机制在推动全球转向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同时应对能源转型的复杂挑战方面非常重要(插文三.3)。



插文三.3

汽车、轮船与飞机——国际政策机制正在引导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

为了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例如《巴黎协定》确定的各项目标，各国通常会为减少交通排放制定具体目标，包括在国家自主贡献中。为了实现这些承诺，各国制定了促进更清洁交通运输技术和实践的政策。

加强政策协调有助于制定统一的全球减排战略。国际协定可敦促各国使交通运输政策与全球标准同步，如燃油经济性法规和电动汽车激励措施，以扩大清洁技术的市场并降低成本。

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组织制定的标准和法规有助于减少航运和航空领域的排放。例如，《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含有限制硫排放以及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和技术的规定。

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机制提供的融资和投资为可持续交通运输以及减排工作提供了支持。但多边倡议不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债务负担。内陆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脆弱经济体应获得所需的官方发展援助和财政支持，以应对潜在技术冲击和能源转型的宏观经济后果。

国际合作可推动技术和创新。例如，国际能源署的“技术合作方案”和“创新使命”正在推进交通技术的研究。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电动汽车倡议”和“全球燃料经济倡议”致力于推广最佳做法和提高燃料效率。区域方面，欧盟的绿色新政为集体实现运输转型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国际组织也为可持续交通政策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扩大多边政策协调以指导此类举措应避免让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经济体处于不利地位，并支持基于透明和公平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

私营部门可以通过投资于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和先进生物燃料的研发来推动新交通能源取得进展。包括特斯拉(Tesla)、里维安(Rivian)和普拉格能源(Plug Power)在内的公司率先将这些技术商业化。虽然私人投资者投资于初创企业和项目，而且企业在开发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新部门的监管和治理对于平衡社会的风险和收益也至关重要。绿色转型的公共投资方案和新产业政策对于协调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展开合作，可以助力技术发展，加快实现向清洁交通方式的转变。公司可以通过为支持性政策站台宣传和将可持续性纳入自身运营来加快这一进程。

2. 新通用技术与消费品和投资品

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和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被发达经济体的本地生产所取代。

人工智能增强的生物基因组学与其他第二代精密生物技术相结合，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构成了第二个实质性威胁。原因很简单。从2013年到2022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别共155个国家中，有71个国家的农业和矿业出口平均占商品出口的50%以上。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的标准，这71个国家中有46个属于全球最贫穷的国家，构成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58%。第二代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潜在新材料的出现构成了威胁，因为可以用发达经济体的本地生产取代这些国家的出口。三组因素解释了这些风险。

首先，农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从产量不稳定、物流链长的劳动密集型活动转变为一个质量可预测、数量可扩展且靠近终端市场的复杂、金融化和数字化的体系。企业对全球粮食体系的集中控制和粮食体系的金融化通常有利于主导市场的大企业集团，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第四章)。少数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从大宗商品繁荣和市场波动中获取了不对称的利润(UNCTAD, 2023c)。

在这些体制变革中，新技术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让数字农业变得更加经济适用和容易获得。原则上，这些转变可以提高农业效率和生产率，对农民的收入和环境都有益。然而，农业的数字化也可能导致植物基因组数据加速集中在少数大型种子公司手中。精

准农业技术方面的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意味着，即使实现了收益，也不太可能惠及世界上的大多数农民(Clapp and Ruder, 2020)。

第二组且与第一组相关的因素是，人工智能实现的生物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结构可视化程序¹⁶ 让公司可以对蛋白质结构开展逆向工程。一旦知道了其结构，就可以精确地构建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来生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是天然存在的物质，也可能不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¹⁷ 已经设计出生产蜘蛛丝仿造物的制造工艺，尽管还没有达到商业上可行的价格。但这一限制只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不是某种根本性的障碍。新型生物基材料不再是机械工程领域的“难得素”。

生物基产品有可能逐渐导致原材料生产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出去。由于这些新型材料具有更高的强度、耐磨性和抗污性，因此很容易取代棉花等纤维的生产(Tummino et al., 2023)。在棉花的例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将承受同样的损失，因为美国贡献了大约40%的全球棉花出口。

总体而言，55个最脆弱国家的约45%的出口是农产品。与石油的情况一样，新材料不太可能取代现有的所有生产和出口。但它们可能会限制出口量增长，并给价值带来下行压力，这反过来会抑制吸引制造业投资所需的本地需求增长。发展中经济体或能成为新的生物基生产流程的原材料生产者，但这将使它们落入商品或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

精准农业中的数据控制意味着收益可能无法惠及全球大多数农民。

¹⁶ 例如见 AlphaFold 蛋白质结构数据库。

¹⁷ 例如 Bolt Threads 和 Ginkgo Bioworks。

通过生物工程可能实现在温带气候中种植一些热带水果和蔬菜，特别是利用所谓的垂直农业结构。生物工程或许还能增加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土地密集型方法生产的农产品的种类，无论是用于出口还是国内消费。然而，历史记录表明，持有与这些新商品或必要投入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发达国家往往会攫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入(Dosi and Stiglitz, 2013)。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已经设法克服了这个问题。巴西研发的适合当地土壤的

大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拥有巴西这样的研究能力。它们在面对主导食品加工和农用化学品的大型企业时可能束手无策(Baines, 2017)。即便是巴西也难以从其大豆的商品链中获得大部分收入。根据梅迪纳和托梅(Medina and Thomé, 2021)估算，由于巴西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种子和营销方面几乎完全依赖外国公司，而且对外国产化肥和农药的依赖程度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很高，巴西仅获得总利润的36%(图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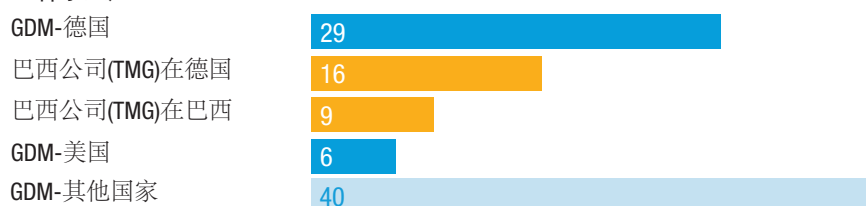
主要农业出口国
巴西由于严重依赖外国产设备和种子，仅获得大豆收益的36%。

图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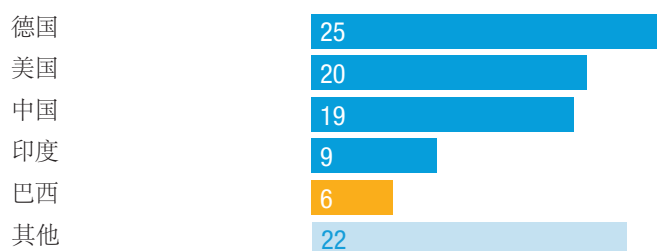
巴西：由于对外国公司投入的长期依赖而损失了大豆商品链的大部分价值

巴西大豆供应链的部分环节，2020年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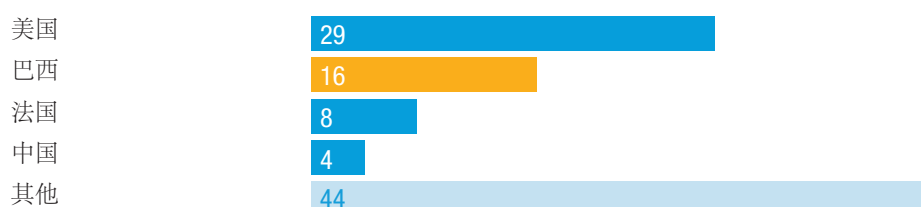
A. 种子生产



B. 杀虫剂



C. 贸易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 Medina and Thomé (2021: 63)。

注：在巴西大豆种子生产市场上只有两家活跃的公司，因此能够显示国家和公司一级的市场构成。活跃在巴西农药和贸易市场的公司数量更多，因此B和C图只显示了国家一级市场构成。

石化产品需求或许不会因汽车的电气化而消失，但塑料污染会促进生物基替代品的发展，从而限制未来的石油出口。

生物工程产品对石油出口国构成了双重威胁。首先，改善农作物固氮能力的生物工程可能会减少对化肥的需求，而化肥的主要原料是甲烷。对有机食品和有机农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强化这一趋势。第二，尽管对石化产品的需求可能不会因汽车的电气化进程而消失，但塑料污染已经刺激了对生物基替代品的研究。与增强型作物一样，这会限制未来石油出口国的出口量和出口价值。在化石燃料的价值链中，塑料是利润非常高的一个部分，因为塑料是炼油副产品，生产成本非常低。从气候角度来看，减少塑料的过度使用和转向非塑料替代品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来说，这种逐步变化既带来了政策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一项新的全球塑料管制条约正在谈判中，其内容包括建立一个基金来为过渡和转型的费用提供支持。转向非塑料替代品也能创造利润。一些大量使用塑料的国家已经开始接纳替代品，包括海藻制成品。然而，并非所有的化石燃料出口国都是大型塑料生产国；缺乏必要的化工厂或炼油

厂的国家甚至可能是塑料净进口国。总体而言，对塑料的生产、贸易和使用进行管制并推广发展问题较少的替代品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健康、经济和环境效益(Barrowclough and Deere-Birkbeck, 2022; UNCTAD, 202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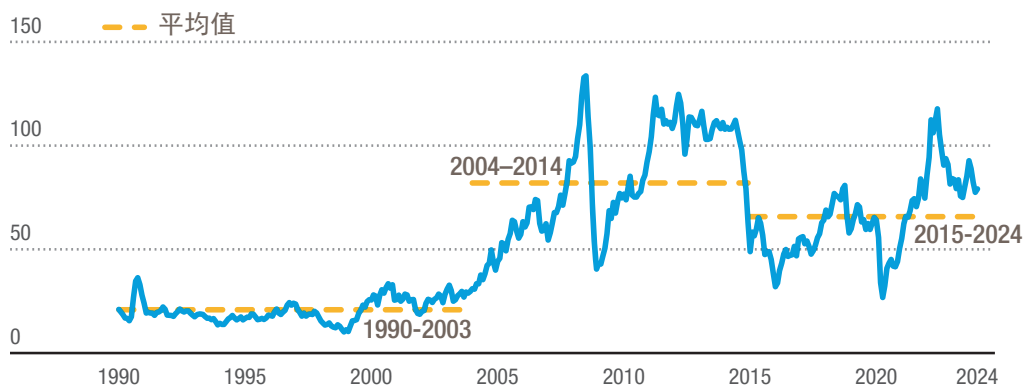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和新型增材制造工艺的结合是出口面临的第三个威胁。三维打印等增材制造技术实现了快速原型制作和零部件的定制，可以在更接近最终用户的地方生产对时间敏感的商品和组件(例如，Calignano and Mercurio, 2023)。只有在物流和劳动力成本以及时间敏感性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分拆劳动密集型、松散耦合的零部件生产，零售商分拆完整的非耐用消费品生产才有经济意义。从亚洲运往美国或欧洲的商品的最终成本中，物流成本约占30%。如果政府认真考虑对用于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化石燃料的碳含量征税，这种成本可能还会上升。1990年到2005年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24美元，但2006年到2023年间的平均价格为每桶77美元(图三.7)。



图三.7

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帮助推动了生产的分拆，但目前的油价仍远高于1990年代的水平

每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1990年1月至2024年5月(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经济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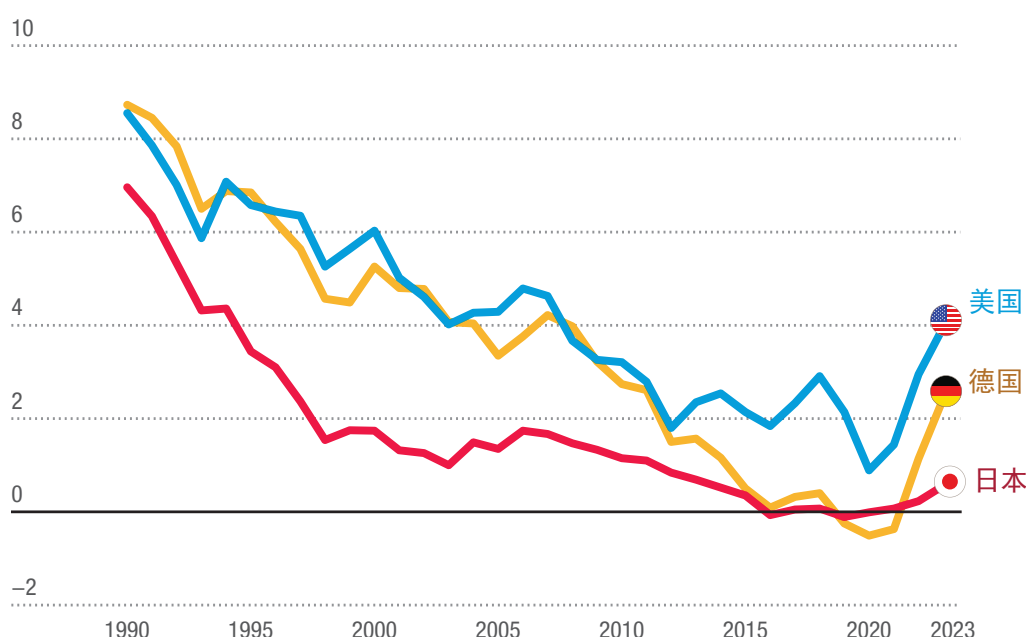
虽然2014年到2023年的平均价格确实略降至68美元，但仍远高于1990年代的水平。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价格(使用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因为石油大多以美元定价)，现在的油价大约是超全球化时代的两倍。与此同时，水路转运的安全性降低，增加了

从亚洲到欧洲的海运航线和一些空运航线的保险费用和运输时间。¹⁸ 2010年之后的极低利率如果出现长期逆转，就有可能导致物流成本逐渐增加，因为运输过程中的在途存货(如船舶集装箱中的货物)必须有融资支持(图三.8)。

图三.8

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上升可能导致物流成本飙升

德国、日本和美国10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月报》数据集。

不断上升的物流成本促进了新的在岸生产技术的使用。所谓的第三次制造业革命——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制造业的所有阶段，尤其是人工智能支持的增材制造——可以通过减少停工期、错误和未售出库存来降低资本成本相对于工资的比率。这场革命还能为本地的市场服务，生产适合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定制的按需产品。通过高度

重视在发展中经济体难以实现和维持的设计和品质特征，本地生产经历这场转变后或能取代在遥远的低工资劳动力地区制造的商品。在成本方面，人工智能大概率将提高自动化的效率，在企业的选址决策中，将发达国家的昂贵劳动力成本抵消一部分。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曾警告说，必须解决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才

必须解决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才能实现普遍共享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¹⁸ 基于贸发会议2024年2月开展的快速评估，可查阅<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navigating-troubled-waters-impact-global-trade-disruption-shipping-routes-red-sea-black>。

能实现普遍共享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带来的好处(Ernst et al., 2018)。

虽然人工智能总体上有被夸大的倾向，但它很可能会给劳动密集型离岸服务，例如通过电话开展的低水平技术帮助和客户服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常规性、可编的客户服务出口已经被交给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降低了此类出口的总价值(Chang and Phu Huynh, 2016)。

新技术和丰富的
可再生能源可能
引发大宗商品和
无差别制成品的
通缩。

这种转变对印度和菲律宾的服务供应商来说会尤其艰难。2023年，印度七家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包括最大的两家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印孚瑟斯公司)共裁员7.5万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4%(The Economist, 2024)。眼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模式的转变也反映了这种迹象：在全球范围内，高附加值部门的绿地投资份额从2004-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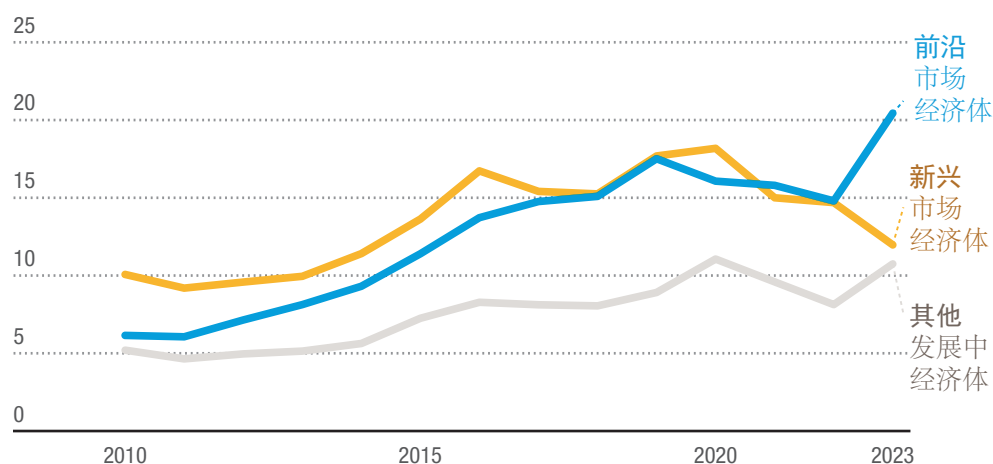
年的45%增长到2020-2023年的63%(UNCTAD, 2024b)。这给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发展早期阶段的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挑战。

更广泛而言，新通用技术的采用，加上潜在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能会引发许多大宗商品和无差别制成品的通缩时代。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可能产生两个金融问题。首先，出口收入会减少，总需求增长会放缓。这些反过来又会抑制本地投资和对投资品的全球需求。第二，出口价格下降意味着用于还本付息的收入减少，而名义利息和本金固定不变(图三.9)。这可能加剧外债对宏观经济平衡和地方总需求的压力。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可能会引发一连串复杂的系统级危机，类似1982年债务危机后拉美和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失去的十年。



图三.9

外债偿债成本相对于出口收入的比率上升可能引发一连串危机
用于偿债的出口收入比例，按经济体类别分列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计算。

总而言之，只要第六次增长浪潮技术得到广泛实施——不要忘了气候变化考量因素也可能加速能源转型——就有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过程可能会阻碍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因为对这种发展道路而言，除了本地总需求之外，出口也至关重要。虽然这场技术革命就其特征而言并非只有负面，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大多数都是负面影响。因此，减少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负担至关重要，如此，它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中实现财政可持续性。

上文的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地缘政治因素，这将在D节中进行讨论；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大多为负面。

3. 企业和社会组织

2017年和2018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研究了数字化对国际范围内生产和就业的组织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2018年的报告指出，数字化可能会削弱领头公司的主导地位，企业间关系也将从领导型治理更多转向关系型和模块型治理。产品定制的可能性增加，对价值链的控制权将因此转移到客户手中，而客户对产品功能和特性的特定要求会引导设计和生产的发展。

但能否获得这些益处，关键在于供应商的数字能力。这是因为，数字化也满足了对更加细化的财务和管理控制的需求，并有助于领头公司在更多的供应商中进行选择时享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可能会增加缺乏数字能力的生产商被边缘化或遭排斥的风险(UNCTAD, 2018: 76)。在这方面，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例子(印度堆栈 India Stack)凸显出公共政策在帮助

各国利用数字生态系统的惠益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Alonso et al., 2023)。

尽管对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企业的组织形式仍然是新兴的第六次增长浪潮中一个尚不明朗和不可预测的部分。社会组织则更加不明确，就像不同国家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斗争的结果一样难以明辨，不过佩雷斯(Perez, 2002)和施瓦茨(Schwartz, 2019)提供了一些历史例子。尽管如此，面对跨国企业实力和规模的不断增长，美国和欧洲在反托拉斯和反垄断方面的立场都愈加强硬(Babić, 2023; Babić et al., 2023; Wang, 2015; UNCTAD, 2023c)，说明1990年后盛行的公开上市股份制大公司模式面临的挑战。一些新的公司组织形式已经依稀可辨。

首先，原则上，技术性要求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组织形式(Kitschelt, 1991)。重工业不能由小公司经营；生物技术研究似乎更适合小型独立团队。然而，在实践中，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技术性要求，制度模仿仍然存在，即人类总是想要模仿看起来是最佳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公司都被复杂的商品链所裹挟。它们之间联系的性质决定了所产生价值的分配(另见第四章)。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苹果、台积电和鸿海(电子组装巨头富士康的母公司)员工人均利润的差异。在这个商品链中，苹果以设计专利和软件版权的形式拥有重要的知识产权。台积电拥有隐性生产知识和巨大的实物资本投资，用于生产iPhone的关键处理芯片。富士康在中国招募了100多万名

第六次浪潮技术和能源转型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因此削减债务对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欧洲和美国强硬的反托拉斯立场给199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股份制公司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发达国家，私募股权正在取代上市公司，而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所有权占据主导。

工人来组装iPhone和其他电子产品。虽然富士康拥有大量的生产知识，但仍依赖于苹果公司拥有的关键机器来达到苹果所要求的装配与表面处理质量(Satariano and Burrows, 2011)。其结果是，2004年至2022年间，苹果创造的累积利润平均到每个员工为465,451欧元，台积电为257,919欧元，而鸿海只有12,984欧元。¹⁹

其次，在制度模仿方面，似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两者都涉及某种程度的缺席(非经营者)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控股公司模式和企业看上去都是可支配的资产集合。在发达国家，私募股权(Appelbaum and Batt, 2014)和机构所有权(Braun, 2022)正在崛起，取代了传统的上市公司(Feldman and Kenney, 2024; Murugaboopathy and Oguy, 2022)。而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实现的国家所有权，或者重新采用旧的格申克龙模式的国有银行似乎是正在兴起的模式(Babić, 2023; Babić et al., 2023; Wang, 2015)。

虽然相对于上市公司约25%至30%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来说，这些变化似乎不是特别重要，但在过去30年里，私募股权的份额一直在上升，而上市公司的份额一直在下降(Schlingemann and Stulz, 2022)。2022年美国私募股权(不同于私有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增至约6.6%(Ernst and Young, 2023)。尽管在美国以外，私募股权没那么重要，但以美国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为中介实现的证券市场资本化的份额一直在增长，私募股权公司的势力也在不断增长。

第三，1980年代迄今公司结构上的纵向分解特征出现了逆转的迹象。1980年代以后，许多公司，包括以及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实物资本密集型的活动剥离出去，专注于一些“核心业务”，而这些业务往往具有高度的人力资本密集特征(Pralahad and Hamel, 1990)。

最典型的公司是苹果，但它不是唯一一个。苹果曾经在自有工厂制造产品。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苹果仅主要从事软件设计，最近也开始设计半导体芯片。它将芯片和其他物理部件的生产分包给日本和欧洲的各种公司，而亚洲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则负责组装部件。但最近，苹果越来越多地将过去分离的元件集合到苹果内部设计的中央处理器即计算机的大脑中。虽然这不是全面的垂直整合，但它确实扭转了早期的趋势，因为它将价值生产收回了公司。苹果还对其组装商和一些零部件生产商施加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整合。

与之类似，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也回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汽车公司那种全面、垂直整合的汽车生产模式。其他汽车制造商正在入股或建立电池生产商，这表明在关键的汽车行业，整合是一种新兴现象。这些例子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过程，即为寻求安全和韧性而将全球价值链重新配置，降低结构的复杂性和分散性(UNCTAD, 2024b, 2024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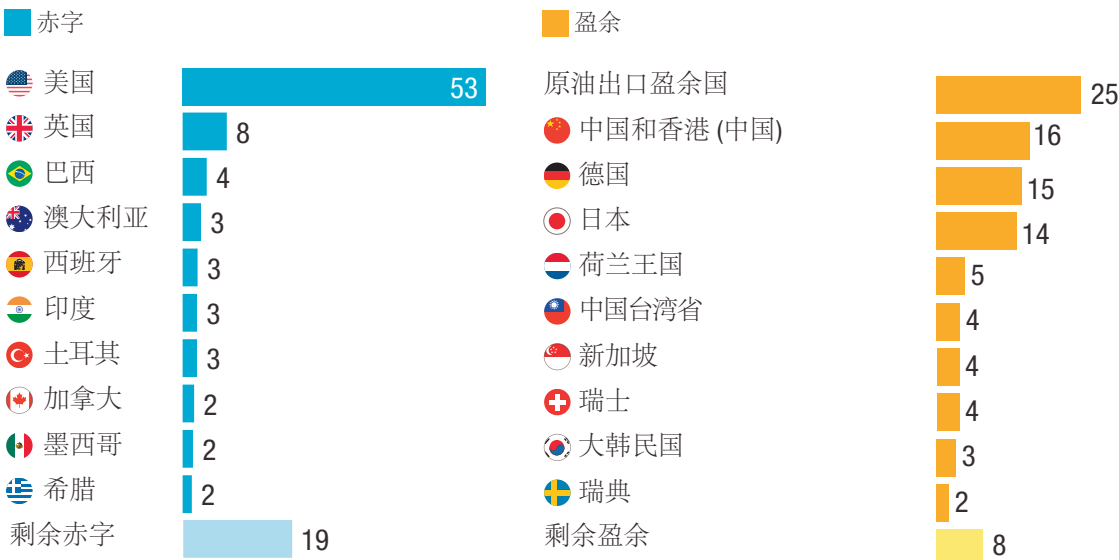
可能实现供需平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甚至更难设想。在全球层面尤其如此，因为要达成大规模的多边协定困难重重。自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

¹⁹ 根据欧洲联盟产业研究与创新经济学机构的数据计算得出，可查阅<https://iri.jrc.ec.europa.eu/data>。

终以来，此类谈判鲜有成功。但主要经济体地方层面的供需失衡所造成的持续全球失衡(图三.10)将给监管净出口和净进口经济体贸易和国内政治

的全球机构带来巨大压力。正如迈克尔·佩蒂斯(Pettis, 2024)所言，三大非石油盈余国家或是根据基本生产率压低工资，或是在整个经济中抑制需求。

图三.10
全球供需失衡将给贸易和国内政治带来压力
1992-2022年累计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分配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经济展望数据库(2024年4月)。
注：原油出口盈余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巴林、文莱达鲁萨兰国、厄瓜多尔、加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尽管如此，主要净出口国的供应侧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越来越不可持续，而如上所述，石油出口国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简而言之，1992年至2022年间，包括出口石油的挪威、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十大商品净出口国约占全球累计经常账户盈余的77%。几乎所有国家在此期间都实现了不仅连续而且未曾间断的盈余，这表明是结构性盈余，而不是暂时性盈余。而所有这些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表明国内需求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一些盈余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至50%。

之所以关注盈余国家而非赤字国家，是因为前者为增加消费实施的调整，对全球经济的通缩效应要小于后者减少消费的效应。如果最近各国通过产业政策扩大本地供应的努力取得成功，供应和疲软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可能会加剧。这给基于出口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最后一个挑战，即全球贸易体制的拐点。

如果各国通过产业政策促进本地生产的同时，需求没有出现增长，全球失衡可能会加剧。

令人满意的制造业工作受到侵蚀，加上眼看着未来不可能找到这种工作，生计岌岌可危，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无保障的担忧。

D. 了解贸易体系碎片化的推动因素和影响

贸易碎片化可以定义为“政策驱动的全球贸易流的变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新调整，通常以战略考虑为导向” (Gaal et al., 2023: 2)。虽然从短期来看，很容易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但从长期来看，政策驱动的国际贸易变化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系列因素影响着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损失的平衡，关键是还影响着公众对这种平衡的看法。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自由化政策和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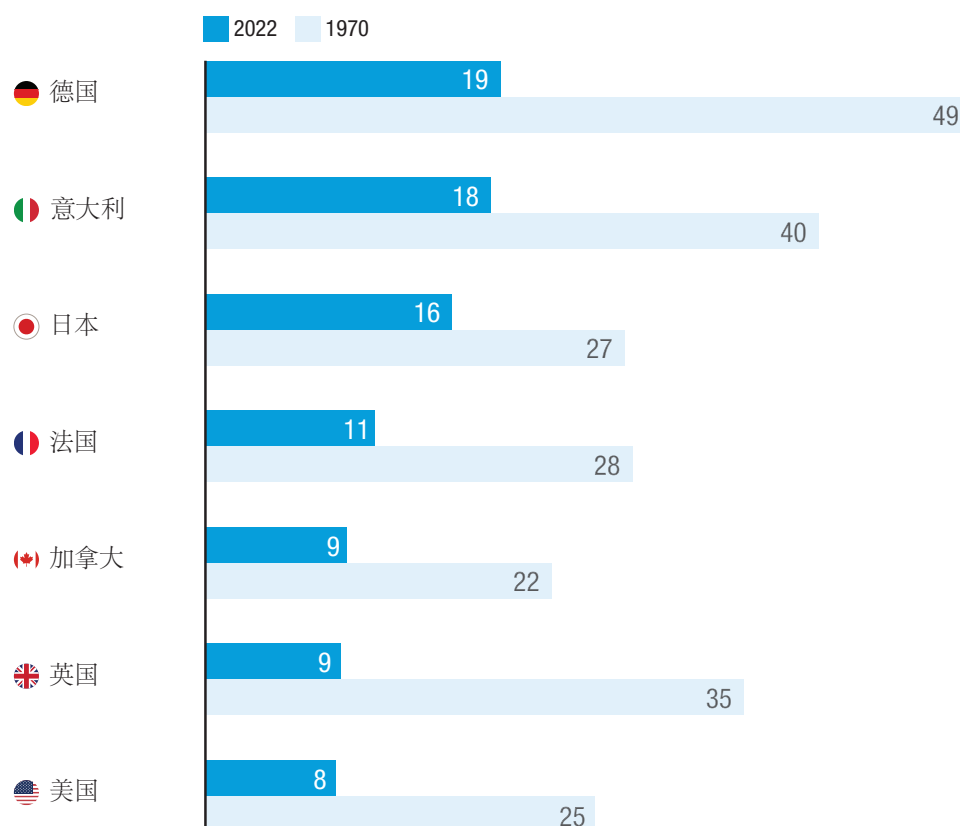
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最有力地体现在对贸易政策的政治态度中。

如今，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人“在以稳定的工业工作岗位为基石的中产阶级民主的承诺下长大，却发现自己在零工经济中辛苦劳作” (Galbraith, 2024; 图三.11)。令人满意的制造业工作受到侵蚀，加上眼看着未来不可能找到这种工作，生计岌岌可危，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无保障的担忧 (Azmanova, 2023)。



图三.11

发达经济体的工人仍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享有稳定工作的保障，但可能大多不再出现在制造业
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部分发达国家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经合组织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这种趋势危机四伏。在公民感到被剥夺权力的社会中，中央权威可能会变得愈加强大，但也愈加专断 (Azmanova, 2023)。这会加剧国内的脆弱性，并增加了国际碎片化的风险。过去十年中，国际贸易的特征是贸易紧张加剧，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逐步回流，供应链日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这些措施部分源于主要经济大国 (中国、美国和欧洲联盟) 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但新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也是面对公众对全球化后果的不满所作出的政治回应。

主要区域市场转向保护主义立场加剧了多边体系本已面临的压力。如前几章所示，经济碎片化给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对眼下的这种趋势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便能发现，(服务和商品) 贸易在中短期内更多由需求驱动，而不是由关税和监管政策引发的效率变化驱动。阿伦·比蒂指出，贸易往往会遵循经济的周期变化，但变化幅度更大 (Beattie, 2024)。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去全球化的程度。

首先，除中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法国和日本——都已经扩大了开放程度 (Posen, 2021)。第二，按绝对值计算，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去全球化。

然而，贸易和金融流动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都停滞不前。1995年至2007年间，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 (Lund et al., 2019: 5)。但全球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基本上在2008年达到16%的峰值。如第二章所述，尽管2023-2024年出现反弹，这个比率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出口附加值在2008年达到最高水平，之后到2022年一直在下降。显而易见的是，在2020年和2021年，疫情对贸易的抑制效应甚至超过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抑制效应，但疫情并不能解释2011年至2019年贸易停滞的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2008年至2019年，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无疑应负主要责任。但低收入国家的降幅更大，达到10个百分点。此外，出口总值与出口附加值之比——衡量商品和服务在最终销售前越过边境的次数——从1993年的1.5升至2011年的1.9，又降至2019年的1.8 (Subramanian et al., 2023: 7)。

各发展中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关切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本国经济的“再次初级商品化”。再次初级商品化是从作为全球商品链一部分的制成品出口转向原材料出口。以巴西为例，根据信通技术的数据，该国的原材料出口比例从2003年的31%增至2022年的61%，而同期内制成品出口比例从38%降至18%。

贸易紧张加剧，产业逐步回流以及供应链日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反映了经济实力的竞争以及公众对全球化的不满。



图三.12展示了在过去25年中巴西出口组合的三种情况：从1995年到2003年，制成品出口日益成熟多样，但在2003年后又转向矿产和食品出口(关于大宗商品繁荣期影响的进一步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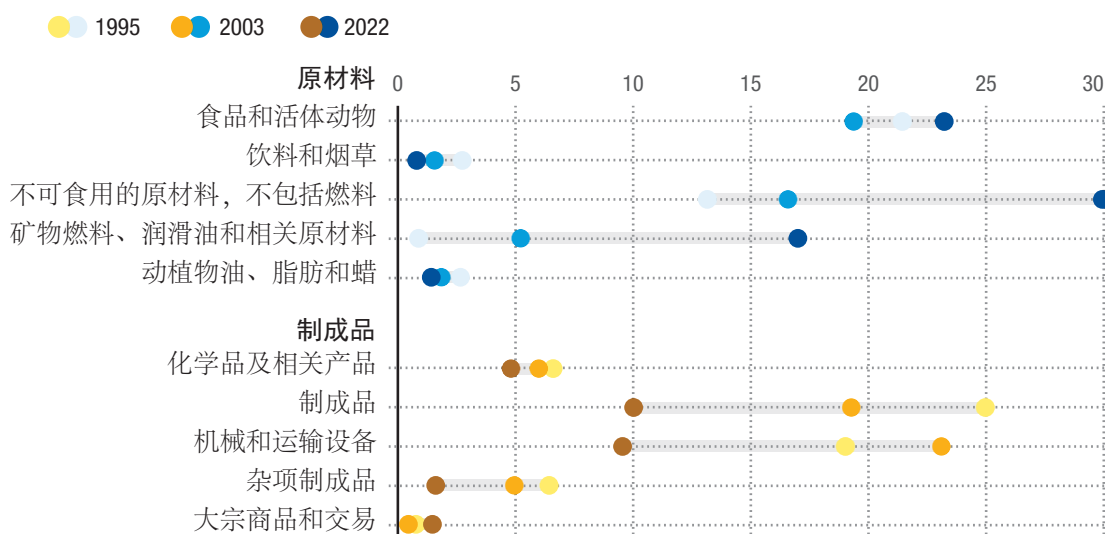
论，见第四章)。澳大利亚经历了类似的从制造品到原材料出口的转变。从长期来看，这种对制造业的侵蚀在政治上似乎难以为继。



图三.12

制造业萎缩？巴西转向大宗商品出口

巴西出口组合，1995年，2003年和2022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制成品类别包括一些原材料项目。与巴西有关的是，1995年至2022年间，有色金属、珍珠、宝石和半宝石以及非货币黄金在该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在2%至5%之间。

再次初级商品化，加上过早的去工业化(Rodrik, 2013)，切断了制成品出口提供的历史发展道路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贸发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农业向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因为历史上发达经济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以这种转变为标志的。今天，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农业生产在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资本化已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

的比重从40%至80%不等减少到低于3%。²⁰ 工人纷纷转而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劳动力减少，非正规就业有所增加，尽管除金砖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就业人口增长停滞或下降。1991年至2022年间，全球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24%上升到28%。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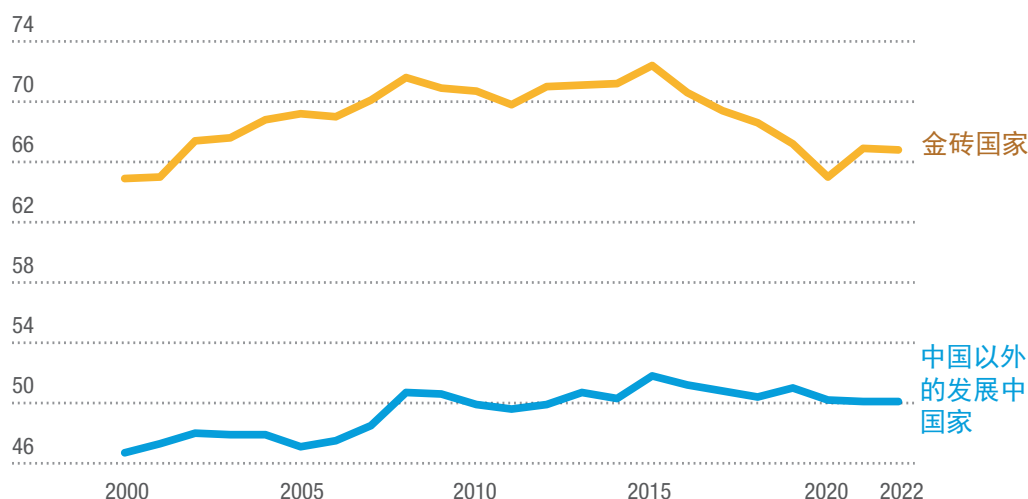
²⁰ 经合组织就业数据，可查阅<https://www.oecd.org/en/data/indicators/employment-by-activity.html>。

²¹ 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探索系列，可查阅https://rshiny.ilo.org/dataexplorer37/?lang=en&id=EMP_2EMP_SEX_ECO_NB_A。



图三.13

结构转型的缺失刺激了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削弱
生产能力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部分国家的结构变化。结构变化是指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性资源从低生产率经济活动向高生产率经济活动的转移。这种转变目前体现在出口的成熟度和多样性、固定资本的密集度以及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数字越大，表明一个经济体越成熟，越发达。

但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巴西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基本持平。非正规就业的增加是导致地方经济能力衰退的一个因素，贸发会议生产能力指数对此进行了衡量。²²

从2000年到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化指数增长了约20%，但从2020年到2022年，金砖国家的指数增速放缓并有所下降(图三.12)。再次初级商品化已经产生了政治压力，促使各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岸外包和地方工业补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大了采取政策措施的压力，这些措施可能会降低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贸易和金融流量。

这种发展动态与1990年代时的情况类似，当时美国针对日本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促使日本公司在东南亚扩大电

子制造和其他制造产能，而同时日本本身并没有减少任何产能。随着投资资本的流入，这触发了东南亚短暂的繁荣时期。但随后过度生产的激增导致价格下跌、偿债困难和竞争性货币贬值，并引发了1997-1998年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

全球资金流动也出现了长期下降趋势。以现值美元计算的资金流动在1992至2007年间增加了逾十倍，但到了202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较2007年的峰值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均水平减少了五分之二以上。虽然直到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仍在增长，但与2008年之前的时期相比，增速在放缓，并且从2022年到2023年绝对值有所下降，尽管已经从新冠疫情中复苏(UNCTAD, 2024d)。

再次初级商品化的压力和地缘政治局势推动了保护主义、在岸外包和补贴，减少了全球的贸易和资金流。

²² 贸发会议生产能力指数可查阅 <https://unctad.org/topic/least-developed-countries/productive-capacities-index>。

扣除与中国贸易 的南南贸易从 2007年到2023年 增长了近150%。

同样，从2020年到2022年，证券投资流量减少了9%，贷款降幅更大，达到14%。²³ 这些降幅并没有被其他类型资金流入的增加所抵消(第二章)。

鉴于基础数据是以现值美元计算的，而未经通胀调整，全球增长遭受的实际影响可能更大。全球银行贷款也一直停滞不前。以定值美元计算，未偿还跨境银行贷款存量低于2007年的水平。²⁴ 跨境证券投资总额是一个例外，从2008年到2020年新冠危机之前，其实际价值大约翻了一番，随后名义价值下降了10%左右。²⁵

最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上调利率造成的经济冲击促使市场开始寻找替代的融资、计价和结算渠道。这次加息使人回想起历史：1982年美联储试图降低通胀的努力引发了类似的债务危机。传统观点认为加息是一项“净利好”因素，因为加息往往会支撑美元走强，并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对美国更具吸引力。但贸发会议和其他最近的研究(Aldasoro et al., 2018)表明，加息是一个净负面因素。

美元走强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的本地企业面临双重价格冲击，因为以美元计价的进口中间产品成本上升，而购买这些进口中间产品的借款利息成本也在攀升。美国加息往往会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引发连锁反应，抑制经济增长(UNCTAD, 2022, 2023c)。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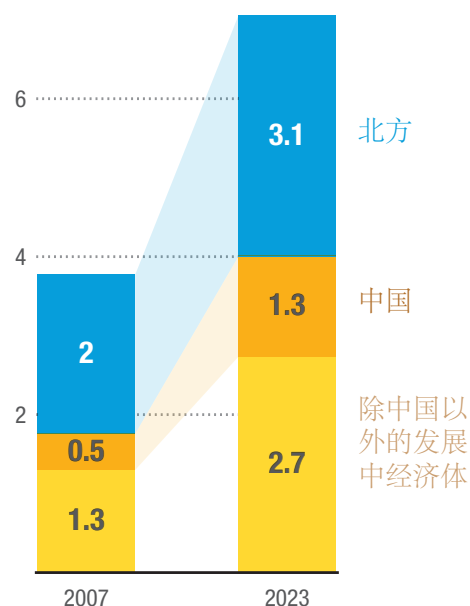
2020年到2023年，由于投资者抛弃发展中国家的债券，转而青睐美国的高收益投资工具，外国投资组合持有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无论以何币种计价)下降了13%(图三.8)。²⁶

南南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抵消美元的影响(UNCTAD, 2022)。从2007年到2023年，扣除与中国贸易净额的南南贸易增长了近150%，快于扣除中国的南南贸易总额的翻番增速以及全球贸易总体增速(图三.14)。

图三.14

2007年至2023年间全球南方的出口额几乎翻了一番

全球南方出口额(除中国外)，按贸易伙伴分列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数据库。

²³ 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证券投资调查数据，可查阅<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0587819>。

²⁴ 基于国际清算银行数据门户网站，可查阅<https://data.bis.org/>。

²⁵ 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证券投资调查数据，可查阅<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0587819>。

²⁶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主权债务投资者基础数据，可查阅<https://www.imf.org/~media/Websites/IMF/imported-datasets/external/pubs/ft/wp/2014/Data/wp1439.ashx>。

但是，南南贸易仍然主要以美元计价，因为大多数货币疲软和/或交易清淡。同期增长近两倍的全球南方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计价，从而降低受美元汇率风险和利率波动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中国石油进口的一部分及其铁矿石进口的更小的一部分转向以人民币计价。

虽然替代支付渠道可能会产生有益影响，让当地出口计价与美元脱钩，并可能创造替代资金来源，但这种转变

可能会充满挑战。几种显而易见的替代货币遇到了若干困难。大型、成熟的盈余经济体的货币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从总量上来看，创造信贷需要以经常账户赤字为代价，这样借款方才能赚取足够的欧元、人民币或日元来偿还新债务。然而，没有一个盈余经济体会容忍这种赤字。全球可接受的合成货币，如特别提款权或金砖国家共同货币，也会存在类似的利益冲突，阻碍开始新的贸易谈判。

替代支付渠道可能会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创造新的资金来源，但这种转变将充满挑战。



© Shutterstock, Strikernia

E. 总结和政策启示



当前的拐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全球经济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转型传递出的信号好坏参半。成功的发展有赖于开放的贸易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扩展有限的国内总需求，激励和促进工业投资。而工业投资反过来又通过国内经济的后向和前向关联以及生产力和质量的提高，带来增长和发展，即生产能力的提高。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当前世贸组织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的脆弱性，有可能扰乱这一进程。由于上诉机构内存在空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目前无法正常运作。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加速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从而实现类似于19世纪末亚洲早期工业化的增长(Abe, 2005; UNCTAD, 2022)。全球贸易格局也可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的贸易、援助和融资条件提供机会。

地缘政治可以加速发达经济体对前文所述颠覆性新技术的投资。但这些技术的影响很复杂，包括因此形成的公司控制权的集中所造成的影响。它们很可能对大宗商品出口国造成负面影响，尽管电力成本降低肯定会带来好处。

制成品出口国或许能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的制造流程编码来大幅提高生产率，不过教育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补充投资至关重要。随之产生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失衡应该促使人们关注国内和全球的收入分配，进而关注消费能力。

简而言之，如今发展中世界面临的挑战与贸发会议刚成立时相似。1964年时，没有几个观察家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推动全球化和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面貌。能预测到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如何收场的人就更少了。显然，逐渐兴起的第六次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浪潮的技术特征并没有为未来二十年提供明确的指引，更不用说未来六十年了。很多问题将取决于能否成熟应对当前贸易和金融架构所面临的压力，地缘政治在贸易和金融架构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也可能限制其政策空间。

那么各国可能成功应对这些压力吗？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现有的全球论坛——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中的谈判或许能帮助解决新兴工业转型带来的一些潜在问题，同时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这场新的技术浪潮与以往的浪潮都截然不同。新技术除了如以往一样会取代劳动力，还集中在少数几个公司手中。此外，一些技术正在推动产业回流。

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的新技术取代了劳动力，推动了产业回流，并提高了治理和政策协调需求。



因此，从三个领域来看，治理问题和国际政策协调日益重要。

- 1 首先，如今愈加需要确保各种政策之间更加协调一致，包括与竞争、贸易、产业战略、数据保护、数字化、劳工、消费者保护和税收有关的政策(见第五章)。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些政策应该能解决国内和国际上经济权力与控制日益集中的问题。

缩小数据差距和开创更精细的方法来界定公司利润的部门构成，应成为国家和国际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 2 其次，需要以商定的原则和标准对人工智能进行全球治理。例如，关于精准农业技术的政策和治理安排既稀少又碎片化。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私营行为体提出了一些行为准则或认证计划(Clapp and Ruder, 2020)，这些规范与更广泛的发展利益可能一致，但也可能不一致。如果政府对新技术的影响回应太迟或无动于衷，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这个庞大而关键的领域被大公司和私人监管机构所掌控。这样既没有做到包容各方，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前文的讨论概述了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一些主要风险。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新技术冲击的影响。在多边层面，这些国家必须既能获得资源(官方发展援助、绿色转型融资、债务减免等)也能获得技术。

- 3 与之相关的第三点是，许多国家都有自救政策可用。但这些政策必须符合更广泛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制度框架，以避免造成贸易冲突和通缩，削弱经济。只有不设置新的政策壁垒，保障市场准入和技术获取，以服务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作为发展之路才能长期可行。

就现有的各种监管框架开展系统的信息交流可以成为实现全面监测全球市场集中趋势、确定多国企业的经济足迹和协调国际最佳做法准则和政策的第一步。

一些自救政策在拓展国家政策空间的能力方面非常突出。例如，在运输和发电行业逐渐摆脱化石燃料依赖的转型过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生产必要设备的国内能力；许多设备需依赖进口。但积极的一面在于，可再生能源产量的每单位提升，都应该能够挤占或减少化石燃料的进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电气化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但与石油净进口国面临的情况一样，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需要国际信贷。

在运输设备生产行业，鉴于生产知识已经普及，本国产业政策可以替代进口。滑板车、三轮汽车以及巴贾吉 Qute 或复兴的塔塔 Nano 等基本交通工具，比发达国家车队中占大多数的电动-重型内燃机汽车更适合本地生产。

在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数据差距和制定精细方法来定义行业企业利润至关重要。

迟迟不对新技术采取政治行动可能会致使关键经济领域落入企业掌控，而不考虑公共利益。

1990年代见证了制造业的分拆，未来几十年可能会见证全球服务业的分拆。

鲍德温和福斯利德(Baldwin and Forslid, 2020)认为，可贸易的服务，特别是那些得到人工智能助力的服务，可能会取代制成品出口，成为需求的引擎。正如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见证了制造业的分拆和地域再分配，未来几十年也可能见证服务业的分拆。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消费者呼叫中心、文案编辑和一些后端计算机服务的迁移，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个见微知著的例子是，纽约市的一些餐馆已经开始让身在菲律宾的员工使用Zoom会议软件接受订单并为顾客结账(Chen, 2024)。政府可以鼓励对服务生产链的其他部分进行类似的拆分，如远程医疗、机器监控和时移活动。

然而自救政策有两个缺陷。首先，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执行这种战略，因为它们仍然缺乏制造能力和电信带宽。第二，为生产运输设备或分拆服务发展额外产能的政策，会遭遇合成谬误陷阱，历史上这种陷阱曾让提振原材料或基本工业产能的努力付之东流。如果大家都涌入同一个市场，市场价格必然会下跌，偿债也会成问题。已经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偿债成本的破坏性将因此加强：有19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偿债支出超过教育支出，45个发展中国家的利息支出超过卫生支出(UNCTAD, 2024d)。因此，国际协定是本国自救工业政策的必要补充。这些协定可以引导各国实施一系列共赢政策。

首先，发达国家可以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下的现有承诺，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支持(UNCTAD, 2019,

2021b, 2023c)。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石油出口国的收入，但也有助于避免极端气候变化让它们本国的人口和经济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可以鼓励许多石油净出口国利用丰富的阳光资源为新产业提供动力。加快能源转型可以让石油进口国满足不断扩大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不会引发国际收支问题。

其次，需要重新调整世贸组织关于工业补贴和贸易壁垒的规则，以促进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并帮助原材料出口国扩大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在现有的框架下，印度尼西亚为了扩大电池生产而推动镍和铬矿石的本地化冶炼，并努力实现电池的本土制造，这是今后可能出现更多世贸组织争端的典型情景。如果出口顺差经济体国内消费相对较低的原因是国内公共品供应不足，世贸组织或类似的多边协定就可以帮助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防止它们升级为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这类协议也可能刺激更多的南南贸易。

最后，稳定国内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和价格的协调政策机制(Schwartz, 2023; Weber, 2024)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南方当前面临的财政压力和违约风险，这些压力和风险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利率的提高以及由生物工程替代传统原材料的可能转型。延续多年的新冠疫情和疫情后的不稳定形势更是增加了缔结新的全球经济契约的必要性。这项契约必须缓解日益升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并协助各国应对贸易体系支离破碎、需求疲软和气候危机的风险，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Abe T (2005). The Chinese market for Japanese cotton textile goods. In: Sugihara K, ed.,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Aldasoro I, Ehlers T and Eren E (2018). Business models and dollar funding of global banks. BIS Working Papers No 708.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Alonso C, Bhojwani T, Hanedar E, Prihardini D, Uña G and Zhabska K (2023). Stacking up benefits: Lessons from India's digital journey. IMF Working Paper 23/78. Marc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msden A (2001).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Appelbaum E and Batt R (2014). *Private Equity at Work: When Wall Street Manages Main Stree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 Azmanova A (2023). Precarity for all. Post-neoliberalism. 29 November. Economic Democracy Initiative.
- Babić M (2023).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 Transforming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genda Publishing Limited. Newcastle.
- Babić M, Dixon AD and Fichtner J (2023).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 What does foreign state-led investment do in a globalized world? *Competition & Change*. 27(5):663–684.
- Baines J (2017). Accumulating through food crisis? Farmers, commodity traders and the distributional politics of finan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4(3):497–537.
- Bairoch P and Kozul-Wright R (1996). Globalization myths: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IDER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Kings College.
- Baldwin R and Forslid R (2020). Globotics and development: When manufacturing is jobless and services are tradabl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7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24). Statistical release: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and global liquidity indicators at end-December 2023. 30 April.
- Barrowclough D and Deere-Birkbeck C (2022). Transforming the global plastics economy: The role of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plastic pollution. *Social Sciences*. 11(26).
- Beattie A (2024). The protectionist president who's has been good for trade – for now. *Financial Times*. 22 July.
- Berend T and Ránki G (1977).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 Bernard M and Ravenhill J (2011).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Blas J (2024). Old king coal remains omnipotent and omnipresent. Bloomberg. 25 July.
- BMI (2023). Oil & Gas Global Capex Outlook. Fitch Group. December.
- Boyer R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Braun B (2022). Exit, control, and politics: Structural power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 asset manager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50(4):630–654.
- British Petroleum (2023). *BP Energy Outlook 2023*. London.
- Bruhn D (2014).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ep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romoting trade at the cost of domestic policy autonomy?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3/2014.
- Calignano F and Mercurio V (2023). An overview of the impact of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n supply chain, reshoring, and sustainability. *Cleane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7.
- Cardoso F and Faletto E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Celik S and Isaksson M (2013).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owners: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do? 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Chandler A (1962).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Chang JH and Huynh P (2016). ASEAN in transformation. The future of jobs at risk of automation. ILO Working Paper No 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Chen S (2024). The fried chicken is in New York. The cashier i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New York Times*. 11 April.
- Clapp J and Ruder SL (2020). Precision technologies for agriculture: Digital farming, gene-edited crops,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3):49–69.
- Clark G (2004). The price history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209–1914.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Emerald Group. Leeds.
- Collins W and Williamson J (2001). Capital-goods prices and investment, 1870–19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59–94.
- DiMaggio P and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47–160.
- Doner RF, Noble GW and Ravenhill J (202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mot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Dosi G and Stiglitz J (2013).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th some lesson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 introduction. LEM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3/23. Scuola Superiore Sant’Anna, Laborator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Dunning J (1970).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 The Economist* (2024). Will chatbots eat India’s IT industry? 9 May.
- Energy Institute (202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Production of Coal*. London.
- Engel E (1895). *Die Lebenskosten Belgischer Arbeiter-Familien Früher und Jetzt*. C. Heinrich. Dresden.
- Ernst E, Merola R and Samaan D (2018).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work. ILO Research Paper No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Ernst and Young (2023).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vate equity sector in 2022.
- Feldman M and Kenney M (2024). *Private Equity and the Demise of the Loc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Freeman C (200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ong wave. In: Hodgson G,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 Critical Reader*.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 Fröbel F, Heinrichs J and Kreye O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Gaál N, Nilsson L, Perea JR, Tucci A and Velazquez B (2023). Global trade fragmentation: An EU perspective. Economic brief 075.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 Galbraith J (2024). Industrial policy is a nostalgic pipe dream. Project Syndicate. 25 June.
- Garnaut R and Song L, eds. (2006).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 Gereffi G, Humphrey J and Sturgeon T (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78–104.
- Gerschenkron A (1989).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 Glen B and Pinto J (1995). *Capital Market and Developing Country Firm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Haber S (1992). Assessing the obstacles to industrialisation: The Mexican economy, 1830–1940.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4(1):1–32.
- Harasty C and Ostermeier M (2020). Population age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dependency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work. ILO Working Paper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Hollveg C (2019).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neva.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1). *IEA Global Energy Review 2021*. Paris.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3).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Paris.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4a). *Global Critical Minerals Outlook*. Paris.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4b). *Global EV Outlook 2024*. Paris.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4). 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s://data.imf.org/?sk=b981b4e3-4e58-467e-9b90-9de0c3367363>.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24a). Trade Map. Available at <https://intracen.org/resources/tools/trade-map>.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24b).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intracen.org/resources/data-and-analysis/trade-statistics#export-of-goods>.



- Jenkins R (198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Latin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MacMillan. London.
- Jones B and Malcorra S (2020). *Competing for Order: Confronting the Long Crisis of Multilateralism*. IE School of Global Public Affairs an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drid and Washington, D.C.
- Kaiser RW (1979). The Kondratieff cycle: Investment strategy tool or fascinating coincidenc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35(3):57–66.
- Kaldor N (1996). *Causes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itschelt H (1991). Industri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case of Japan: Sectoral or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4):453–493.
- Klier T and Rubenstein J (2022). North America's rapidly growing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Chicago Federal Reserve Bank.
- Kondratieff ND and Stolper WF (1935). 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7(6):105–115.
- Langley W and Sandlund W (2024). China exports rise at fastest pace in more than a year. *Financial Times*. 12 July.
- Latham A (1988). From competition to constraint: The international ric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17:91–102.
- Latham A and Neal L (1983).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ice and wheat, 1868–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6(2):260–280.
- Lectard P (2023). Manufacturing exports: A virtuous circle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a lock-i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ase of the machinery and textiles sector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5.
- Lewis W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139–191.
- Lewis W (1970). *Tropical Develop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 Lund S, Manyika J, Woetzel L, Bughin J, Krishnan M, Seong J and Muir M (2019).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ew York.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3). *Global Energy Perspective 2023*. New York.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4). Help wanted: Charting the challenge of tight labor marke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26 July.
- Medina G and Thomé K (2021). Transparency in global agribusiness: Transforming Brazil's soybean supply chain based on companies' accountability. *Logistics*. 5(3):58–73.
- Milanović B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Murugaboopathy P and OGuy C (2022). Private equity firms pounce to take companies private. Reuters. 21 July.
- Nowells G (2002). Imperialism and the era of falling price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5(2):309–329.
- Nurkse R (1952).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2):571–83.
- Onen M, Shin HS and von Peter G (2023). Overcoming original sin: insights from a new dataset. BIS Working Paper #1075.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Open Markets Institute (2024). *Rebalancing Europe: A New Economic Agenda for Tackling Monopoly Power*. April.
- Perez C (200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 Pettis M (2024). Can trade intervention lead to freer tr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Peace.
- Posen A (2021). Testimony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Economic Disparity and Fairness in Growth.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Prahalad C and Hamel G (1990).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3):79–93.
- Prébisch R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New York.
- Robinson J (1962). *Economic Philosophy*. Doubleday. New York.
- Rodrik D (2013).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165–204.



- Satariano A and Burrows P (2011). Apple's supply-chain secret? Hoard las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Schlingemann F and Stulz R (2022). Have exchange-listed firms become less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3(2):927–958.
- Schumpeter J (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Democracy*.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 Schwartz H (1994). *States Versus Markets: History, Ge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 Martins. New York.
- Schwartz H (2007). Dependency or institu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causal mechanisms, and logic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2(1):115–135.
- Schwartz H (2019). *States Versus Markets: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Bloomsbury Publishing. London.
- Schwartz H (2023). The NIEO as global Keynesianism.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 11 January.
- Setser BW, Weilandt M and Baur V (2024). China's record manufacturing surplu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0 March.
- Standard and Poor's Global (2023)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2023 Corporate Exploration Strategies*.
- Subramanian A, Kessler M and Properzi E (2023). Trade hyperglobalization is dead. Long liv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3-11.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Thirlwall A (2012).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ed growth models: History and overview. In: Soukiazis E and Cerqueira P, eds., *Model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ed Growth: History,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algrave. Basinsgtoke.
- Thorp R and Bertram G (1978). *Peru, 1890-1977: Growth and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Truxal S (2024). State subsidies and aircraft financing in the EU, USA, and China: a balancing act. *Uniform Law Review*. 29(1).
- Tummino ML, Varesano A, Copani G and Vineis C (2023). A glance at novel materials, from the textile world to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Journal of Polymers and Environment*. 31:2826–2854.
- UNCTAD (199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II.D.6. Geneva).
- UNCTAD (199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Financial Instability – Growth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8.II.D.10. Geneva).
- UNCTAD (200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orld Trad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2.II.D.2. Geneva).
- UNCTAD (200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D.7. Geneva).
- UNCTAD (201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Inclusive and Sustained Growth*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6.II.D.5. Geneva).
- UNCTAD (201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Power, Platforms and the Free Trade Delus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8.II.D.7. Geneva).
- UNCTAD (2019).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Financing a Global Green New Dea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II.D.15. Geneva).
- UNCTAD (2021a). *State of Commodity Depende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1.II.D.17. Geneva).
- UNCTAD (2021b).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From Recovery to Resilience: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II.D.1. Geneva).
- UNCTAD (202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II.D.44. Geneva).
- UNCTAD (2023a). *Plastic Pollution: The Pressing Case for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ubstitutes to Plastic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3.II.D.11. Geneva and New York).
- UNCTAD (2023b). *Trade: Unlocking Sustainable Strategies for People, Planet and Prosperit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 UNCTAD (2023c).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Growth, Debt, and Climate: Realig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 UNCTAD (2024a). *Digital Economy Repor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I.D.12. Geneva).
- UNCTAD (2024b). *Global Economic Fracturing and Shifting Investment Patterns. A Diagnostic of 10 FDI Trend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 UNCTAD (2024c).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46.



第四章

崛起、回落与重新 定位：全球南方的 经验教训

本世纪初，全球南方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2013年，全球经济似乎被划分为崛起的南方和危机重重的北方。

然而，南方的崛起并不均衡，也不完全。2003-2013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掩盖了结构性问题和巨大的区域差异。

全球性冲击进一步考验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韧性。在过去40年的所有重大经济危机中，南方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北方，但随后的衰退也往往更为严重。

全球南方的区域多样性引发了对当今发展战略方向和类型的思考。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许多先前关于发展模式的假设受到了质疑，新的挑战也随之出现。

在新的大宗商品周期、能源和技术转型以及经济高度金融化和服务化的背景下，1990年代的成功模式可能难以轻易复制。





主要政策启示

- ▶ 在实体经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金融化对一体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往往显而易见。
- ▶ 在能源转型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如何管理采掘业的扩张和金融化是大宗商品出口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 ▶ 要保障经济韧性，就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包括监测跨国企业的经济足迹并共享相关数据。
- ▶ 要找到成功发展的新路径，就必须重新评估大宗商品周期，并制定政策以实现多样化和再分配。
- ▶ 全球南方的政策制定者应重点关注采掘部门的增长与金融化之间的平衡。



A. 导言



新千年伊始，国际政治词汇得到了极大拓展。**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国家”一词，将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划分为同一个资产类别。

2009年，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峰会，开始就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重大议题以及集团内部的经济优先事项正式表明立场(*The Economist*, 2024)。

全球南方崛起的概念出现于21世纪初，全球南方指的是非洲、东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这标志着这些地区已成为新的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然而，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存在分歧。许多人看到了南北经济趋同的迹象，并注意到全球财富正在向新兴市场转移(OECD, 2014)。然而，发展中地区的高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出的明显韧性，促进了南北“脱钩”假说的形成。

2013年，全球经济似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一方面是复兴的南方，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显著代表，其特点是人力发展进步、强劲增长和快速减贫。另一方面是危机重重的北方，紧缩政策和经济衰退让数百万失业人口陷入困境，并对社会契约造成压力(UNDP, 2013)。

但人们很快意识到，随着2003-2013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的结束，南方的崛起显然难以为继(UNCTAD, 2018)。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见顶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纷纷回落至低增长轨道或陷入停滞。大

宗商品繁荣期的结束暴露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这两大危机，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持续代价，意味着自2013-2014年以来，全球南方的增长开始出现回落。

这一趋势在非洲尤为明显，该地区通常被视为全球南方更广泛演变的风向标(见B节)。在经历了贯穿20世纪最后2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非洲在2000年左右迎来了转折点。更深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强劲增长，人们对非洲大陆的发展前景普遍感到乐观。然而，自2014年以来的低增长以及持续的经济和政治挑战表明，非洲经济在“非洲崛起”的年代未能实现结构转型。自2014年以来，疫情、冲突、债务和气候危机等外部冲击制约了非洲的发展前景。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南方作为全球经济力量已达到顶峰？

这些国家能否克服宏观经济差异，提出并推行共同的全球经济架构改革议程？在当前的全球化转折点，南方经济体面临哪些关键优先事项和挑战？

本章将探讨上述问题。B节将分析2003年至2013年全球南方崛起初期的主要经验教训。C节将探讨与采掘业持续金融化相关的当前政策挑战。D节进行总结。

2013年，全球经济似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复兴的南方和危机重重的北方。



B.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与“崛起”的概念

1. 概念背后的推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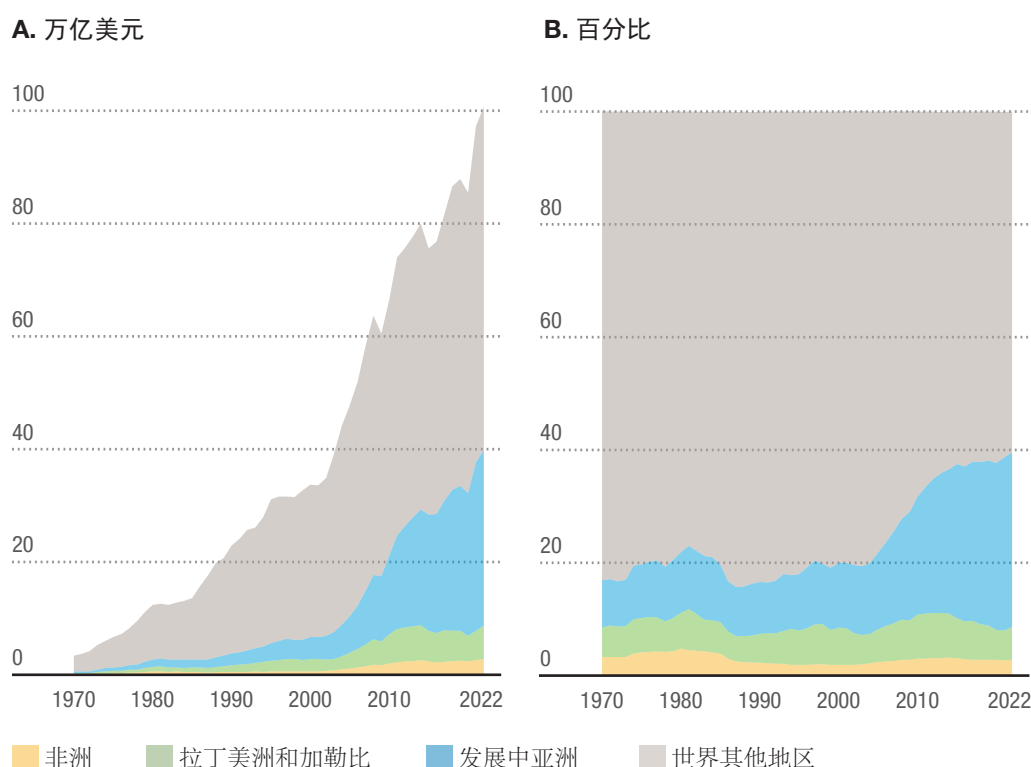
尽管“全球南方”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但其定义却相当模糊，无法在地图上清晰界定，涵盖了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区域和国家。全球南方的崛起这个概念通常用来描述国家个体而不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的崛起(*The Economist*, 2024)。历史上，南北之间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发展中南

方的一些经济体，如新加坡，已成为富裕国家(Mold, 2023)。

更广泛地来看，不得不提到南方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性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潜力。1970年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合计仅占全球总收入的不到17%。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近40%，其中发展中亚洲占31%(图四.1)。

图四.1

全球南方的崛起带来了更多财富，但主要集中在亚洲
按区域分列的国民总收入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统计司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

南南商品贸易约占全球贸易的23%；北北贸易占39%。

如今，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0%，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85%。

当今最大的双边贸易走廊位于中国与美国之间。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南南商品贸易约占全球贸易的23%，北

北贸易占39%。²⁷ 全球南方目前吸引了超过65%的外国直接投资，远高于1990年的16%。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全球南方占总量的32%，相比1990年的5%有显著增长(UNCTAD, 2024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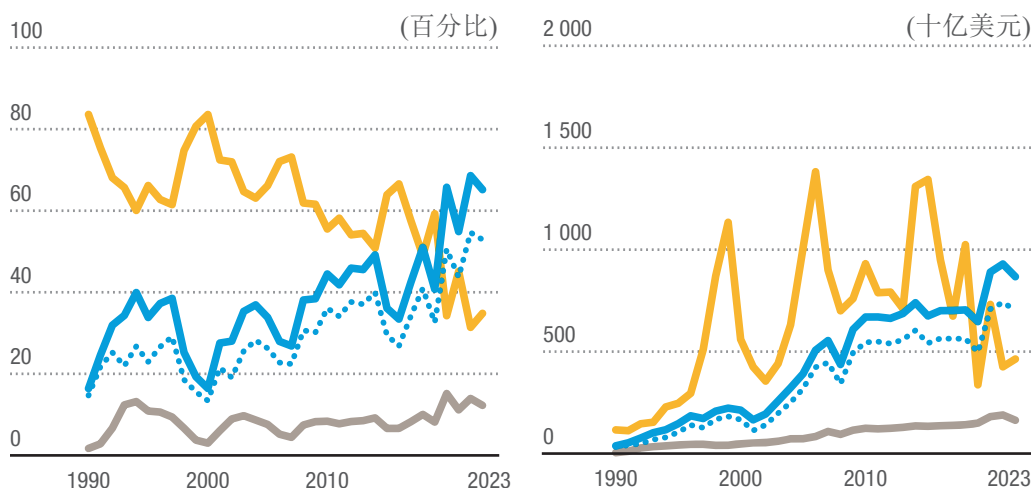


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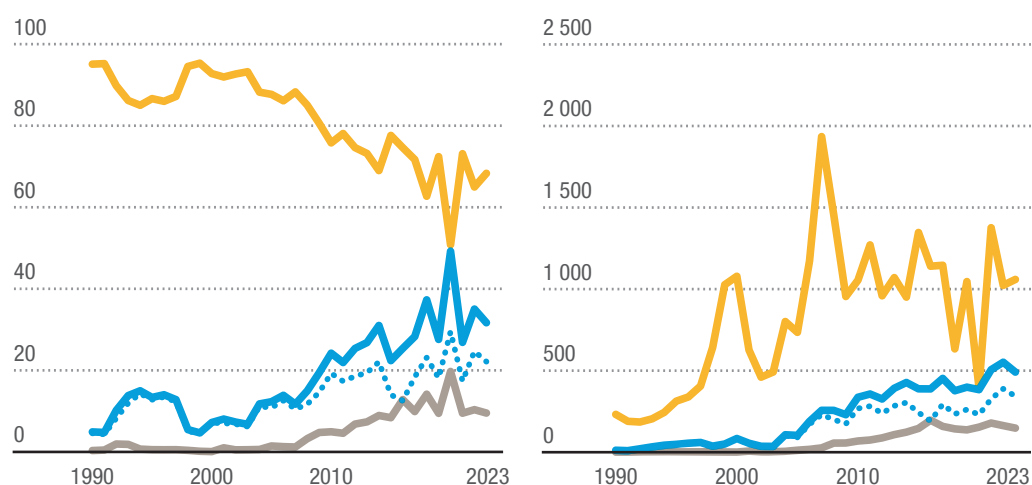
全球南方吸引了超过65%的外国直接投资
部分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份额

— 中国 — 发达经济体 — 发展中经济体 ... 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

A.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B. 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²⁷ 见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datacentre/dataviewer/US.IntraTrade>。



鉴于经济实力攀升以及自2022年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南方”在政策术语中再次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法国、印度和美国的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The Economist*, 2024)。

当前的全球南方表述有其历史渊源。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左翼作家和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首次使用了该术语，他指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主导……[已经]汇聚……形成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Ogelsby, 1969)。尽管在当时，这并不是对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确定义，但“全球南方”已成为一个总括术语，泛指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以外的国家。

冷战时期，在媒体、政策界和学术界，当评论员提到南方国家的政治联盟和安全立场时，经常会互换使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这两个词。在关于经济和发展问题的更专业的讨论中，“欠发达国家”²⁸或“发展中国家”²⁹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二元划分变得普遍，甚至多边外交中成为主流。2000年，联合国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八项发展挑战。

然而，随着全球形势不断演变，过去十年间，多边政策词汇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21世纪头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以及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仍有意义的疑问，这种疑问主

要出现在北方。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联合国会员国一致认为，接替千年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适用于所有国家，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

新冠疫情和随后的一系列危机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与此同时，再度抬头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强化了发展中经济的集合概念，即全球南方。尽管学术出版界自2008-2009年已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但在全球政策领域，其使用频率直到这两年才开始激增。自2023年以来，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峰会的官方文件中都提到了全球南方。2024年1月，该术语被纳入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的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77国集团的134个成员国首次一致同意推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具影响力、更加平等的地位，并与所有合作伙伴开展互利合作”(Group of 77, 2024)。

简而言之，尽管缺乏“供政治家和记者使用的替代简短用语”(Nye, 2023)是“全球南方”一词被纳入国际政策术语的原因之一，但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概念的主流化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身份认同、经济潜力和共同挑战方面具有些许共性。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处于转折点，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考验，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为理解背后的原因，下一节将探讨全球南方崛起初期的主要政策经验。

2024年，77国集团一致同意推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具影响力、更加平等的地位。

²⁸ 大会关于第一个发展十年的第1710(XVI)号决议。

²⁹ 大会关于设立贸发会议的第1995(XIX)号决议和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第3201(S-VI)号决议。

2. 脱钩迷思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南方的增长已与危机重重的北方“脱钩”。

发展中经济体在面对2007-2009年外部金融冲击时表现出的韧性被视为后美国世界崛起的先兆。

21世纪初，人们对全球南方经济体历史性崛起的预期主要建立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高增长率之上。发展中国家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出的明显韧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预期。这种韧性如此显著，以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人们普遍预期南方经济体的增长将与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困境“脱钩”(Akyuz, 2012)。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因紧缩政策和债务压力而放缓，而发展中世界的金融韧性和充足的储备头寸似乎预示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望实现强劲增长。

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脱钩的理论基于几个论点。首先，2007-2009年危机的性质比较特殊。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席卷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不同，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北大西洋信贷紧缩”(Nesvetailova and Palan, 2008; Tooze, 2018)或“第一世界债务危机”(Wade, 2008)。这场金融崩溃的中心是美国的部分抵押贷款市场，随后蔓延到欧洲的银行系统，并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规模庞大、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该系统在传递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这种几乎未曾预料到的新型“明斯基式”危机在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中爆发，最初似乎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尤为严重的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较为有限，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非银行金融中介较不发达，信贷关联度较低(Whalen, 2007; Griffiths-Jones and Ocampo, 2009)。

全球南方国家不仅经受住了冲击，而且在2010-2011年期间，许多国家的

增长率还达到或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在摆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后，它们正以“适度的确定性和势头”实现复苏(Abiad et al., 2012: 4)。世界银行(2018)指出，总体而言，发展中经济体“相对较好地应对了全球经济衰退，尤其是那些对外贸和金融依赖程度较低、在危机前拥有强劲基本面的经济体”。许多评论家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在面对金融冲击时表现出的相对韧性是美国实力衰退、后美国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Zakaria, 2008)。³⁰

然而，脱钩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全球南方的危机抵御能力是暂时的。人们很快发现，“崛起的南方”这一总称掩盖了各区域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截然不同的经历。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台一揽子救助计划，以支持其金融体系和(或)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UNCTAD, 2010)。

2007-2009年的危机发生在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剧烈波动时期，这增加了不确定性，并加剧了贸易流量和投资下降的恶性循环。2008年年中，粮食和燃料价格飙升，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和石油进口国承受了巨大压力，耗尽了外汇储备，难以支付进口费用并维持增长。虽然石油出口国的收入增加，但繁荣和萧条加剧了产量波动，阻碍了对长期生产能力的投资(Allen and Giovanetti, 2011)。

正如贸发会议当时得出的结论，2007-2009年的危机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的审慎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储备的积累“不足以使其免受金融全球化所固有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UNCTAD, 2010)。“崛起”本身

³⁰ 事实上，北方抵御危机的能力更强，尤其是从中长期来看。

是不均衡、不完全的，2003-2013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掩盖了结构性问题和巨大的区域差异(UNCTAD, 2018)。

此外，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方面的政策空间存在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新冠疫情之前就面临高负债问题。2019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233%，政府债务占比也创下84%的历史新高。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为GDP的180%，其中私人债务占比最高，为126%。80%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内债和外债水平均高于2010年(Kose et al., 2021)。

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南方的影响虽未立即显现，但比对北方的影响严重得多，因为这场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的增长轨迹(图四.3)。2001年至2008年，发展中国家实际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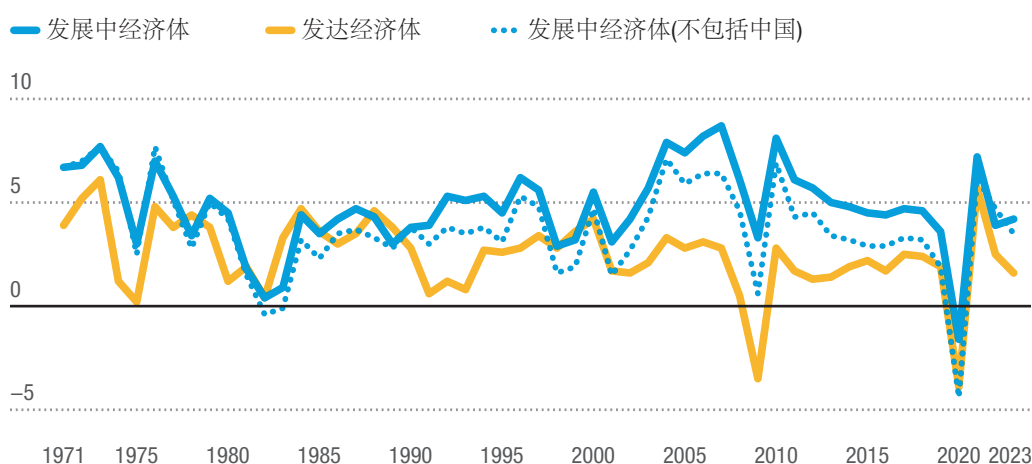
的年均增长率约为6.7%，比发达国家(2.3%)高4.4个百分点。全球金融危机后，从2008年到2019年，发展中国家(5.0%)和发达国家(1.5%)的年均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但差距缩小至3.5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从2020年到2023年，差距进一步缩小至1.9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为5.1%，发达国家为3.2%)。

如图四.3所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南北之间的增长逐渐趋同，尽管南方理应拥有更大的增长潜力。这与之前的模式一致。在过去40年中，五次重大经济危机(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2022年疫情)都揭示了类似的趋势：南方的增长确实快于北方，但随后的衰退往往更为严重，经济复苏所需的时间也更长。

在过去40年的所有重大经济危机中，南方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北方，但随后的衰退往往更为严重，复苏所需的时间也更长。

图四.3

危机期间，经济增长全面下滑，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产生了持久影响
实际GDP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和表一.1。

全球增速正趋于稳定，但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如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使这一总体模式进一步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复杂性。疫情过后，全球经济增速趋于稳定，但仍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应对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3. 回落：2003-2013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的不同影响

2003-2013年的大宗商品繁荣波及广泛，涵盖能源、金属和粮食需求的增长。与以往的繁荣期不同，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相似的走势(例如IMF, 2011: 47)。

大宗商品周期对全球南方三个主要区域的影响各不相同，揭示了宏观经济、制度和结构上的差异。在亚洲，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推动大多数大宗商品出口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表现(OECD, 2014)。然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一繁荣却阻碍了经济多样化进程。³¹

这一繁荣揭示了经济转型方面的显著差异：东亚取得了成功；拉丁美洲部分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得到了改善；非洲的非采掘业部门未实现结构性转变。

亚洲

亚洲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主要由中国带动，中国在1978年至2017年间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5%)。

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亚洲为2003-2013年大宗商品周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该地区成为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的一个重要需求来源。1980年至2009年，亚洲经济体的实际GDP实现了7.5倍增长，而全球经济仅实现了3倍增长。全球平均收入增长了近1倍(Lee and Hong, 2010)。

亚洲经济的崛起得益于结构性因素，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尽管劳动力投入、教育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起到正向作用，但这些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较为有限(Lee and Hong, 2010)。结构转型政策，包括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以及制造业内部向高附加值产品持续转型，促进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IMF, 2006)。1990年代至2020年代，亚洲成为了全球加工、制造和装配中心，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总增加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29%增至2021年的53%(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3)。

推动亚洲增长的第二大不变因素是其无与伦比的区域一体化水平，过去15年中，区域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ADB, 2023a: xvi)。新冠疫情对物流、供应链和劳动力供应造成了冲击，导致消费和投资水平下降(ADB, 2023b)。然而，即使在疫情期间，即便贸易局势紧张，贸易总量仍然保持稳定。全球价值链在2020年严重收缩后，2021年迅速迎来反弹。图四.4显示了该区域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出口结构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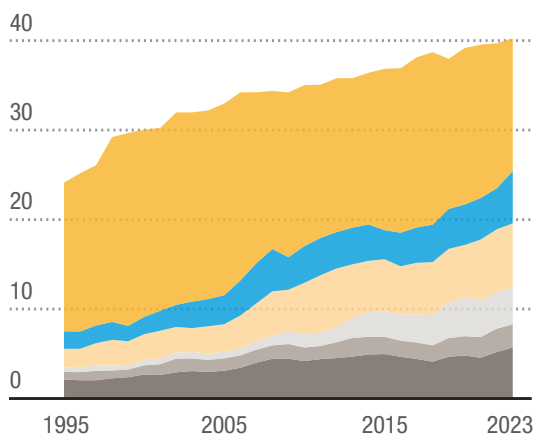
2003-2013年的大宗商品繁荣表明，东亚成功实现了结构性转变，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趋于稳定，而非洲未能实现结构转型。

³¹ 过去50年来，亚洲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约为5%。这表明，虽然全球南方整体上正在赶超全球北方，但并非所有全球南方区域都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其中(Fernandez et al.,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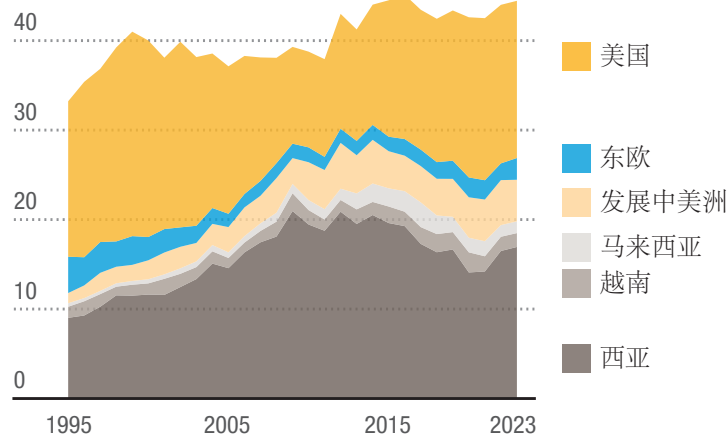
图四.4

即使在危机时期，该地区两大经济强国的出口依然保持增长且势头强劲
对部分地区的出口
(百分比)

A. 中国的出口



B. 印度的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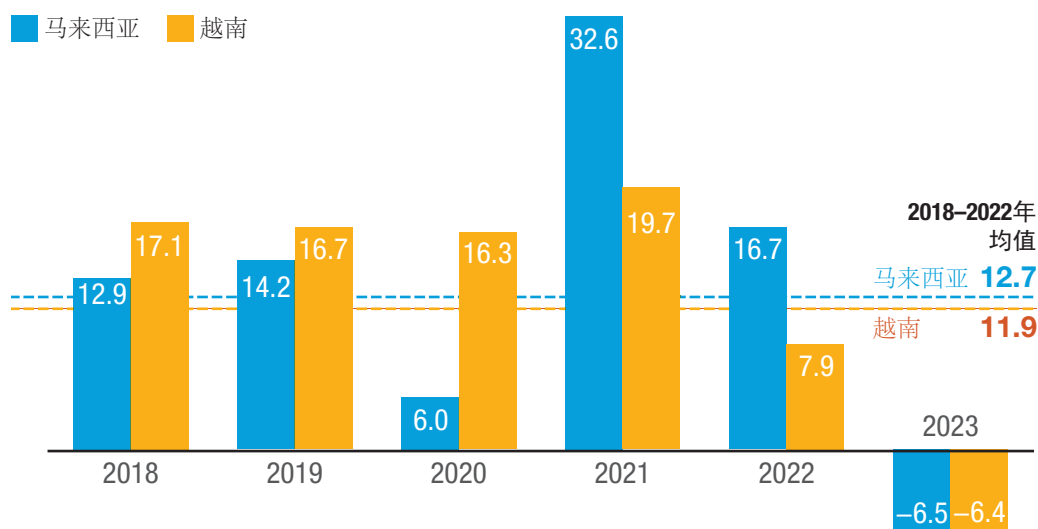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疫情期间，区域内贸易为维持亚洲经济体的韧性发挥了作用。例如，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与越南的贸

易额年均增长12%，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额年均增长近13%(图四.5)。

图四.5

在疫情期间，扩大区域内贸易增强了韧性
中国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贸易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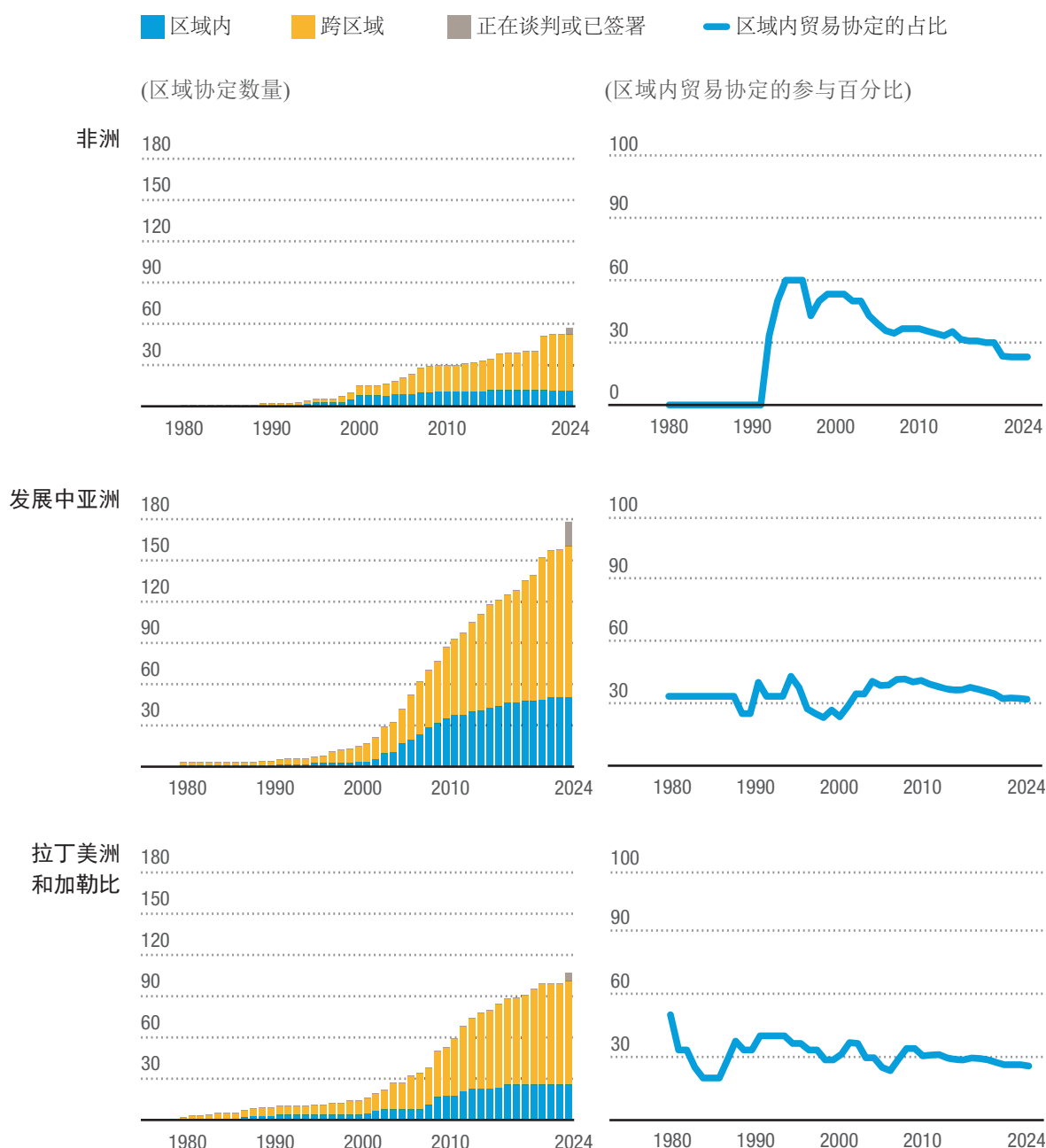
贸易一体化一直是亚洲经济体的优势，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减轻供应链中断的影响(ADB, 2023a: 10)。图四.6显

示，自2000年代初以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区域内贸易协定的程度逐步提高，远高于非洲和拉丁美洲。



图四.6

亚洲国家参与了更多区域贸易协定，减轻了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区域贸易协定数据。

注：计算区域内贸易协定占区域贸易协定总数(区域内+跨区域)的比例时，仅考虑所有缔约方均属同一区域且已生效的协定。



拉丁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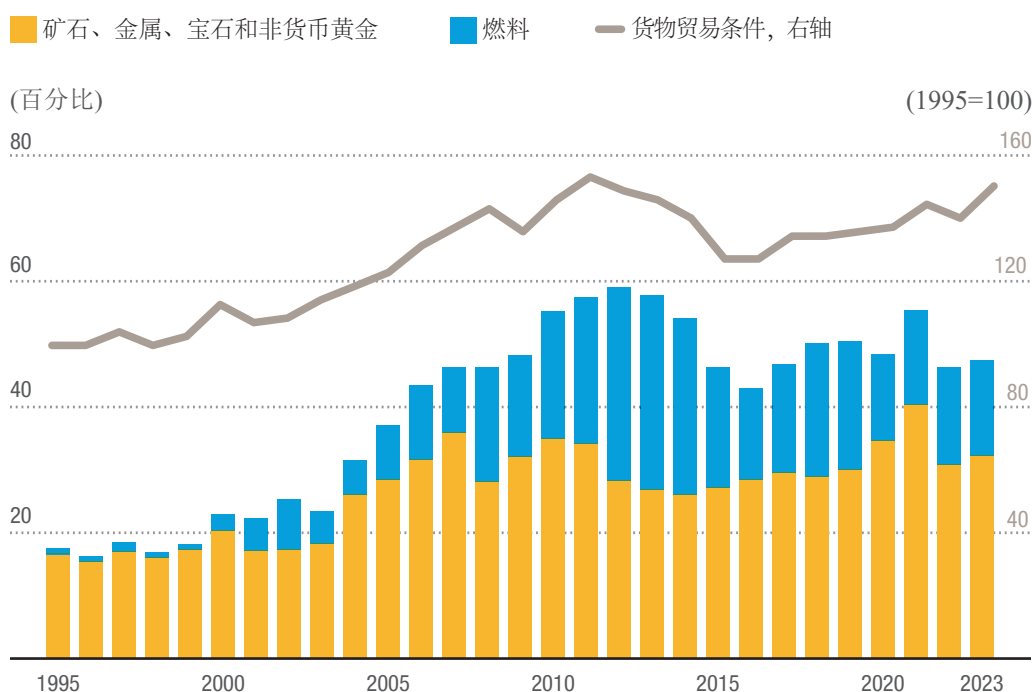
2003年至2013年，亚洲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使拉丁美洲国家受益匪浅。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在2011年4月达到顶峰，随后金属价格开始下跌。如图四.7所示，2014年6月，油价冲击使局势发生逆转，受影

响最大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即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等金属出口国的大宗商品贸易条件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有所恶化，但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基本保持不变(Balakrishnan et al., 2021: 5)。

图四.7

亚洲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拉动了拉丁美洲的出口，但拉动效应随时间和商品类别而有所不同

在拉丁美洲向发展中亚洲出口的商品总额中，部分大宗商品类别的占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和拉加经委会统计平台数据库。

尽管拉丁美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实现了多样化，但在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初级产品在总出口中的平均占比仍高达60%(图四.8)。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的大宗商品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重金属或能源出口国未能实现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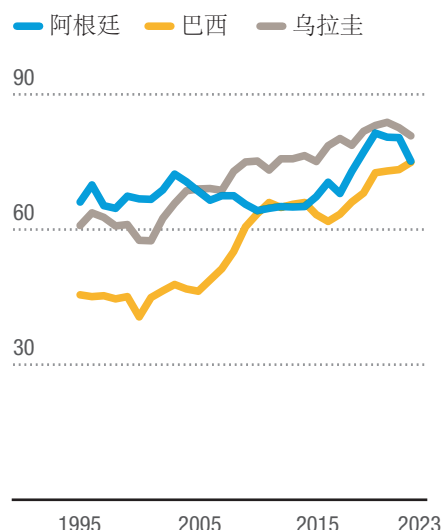
的多样化，因此在周期出现逆转时变得更加脆弱。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在1970-1980年至2010年间下降了一半(IMF 2011: 51)。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在大宗商品繁荣时期，拉丁美洲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自1970年代以来总体而言变化不大(IMF 2011: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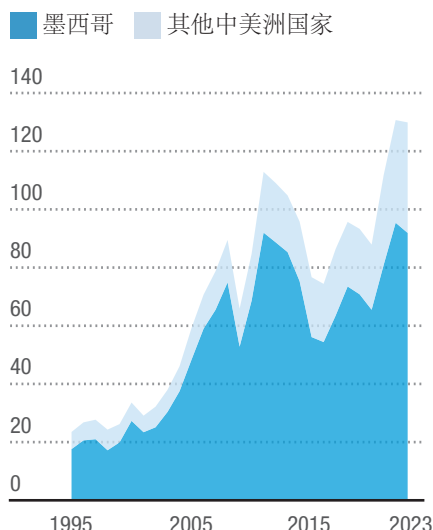
图四.8

在拉丁美洲，降低对大宗商品依赖的多样化进展有限
部分国家初级商品出口和集中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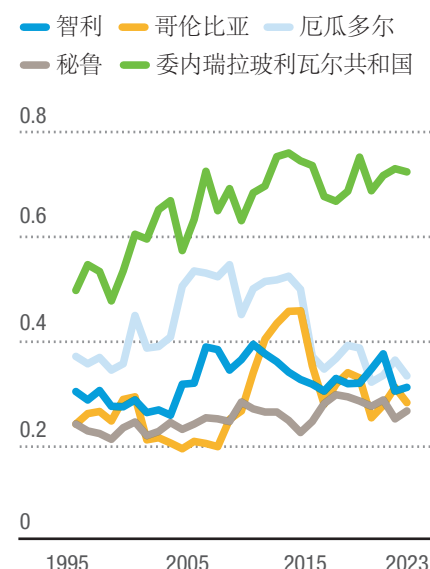
A. 大宗商品出口占比
(百分比)



B. 大宗商品出口额
(十亿美元)



C. 集中度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产品集中度指数显示单个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多大程度上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而不是更均衡地分布于多种产品之间。该指数不包括服务业。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接近1表明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低)。

自然资源产品在拉丁美洲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再度上升(这一现象被称为“再第一产业化”或“再大宗商品化”),凸显了该区域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OECD, 2014; Ocampo, 2017)。中国是拉丁美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出口中,大宗商品占比超过90%。从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削弱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制造业,加剧了再第一产业化(Ocampo, 2017)。

大宗商品繁荣促进了减贫和缩小不平等方面的进展。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平等率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南美洲。

从2000年到2020年初疫情爆发前,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标均有所下降(UNDP, 2021)。³²然而,在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2013-2014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结束)至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由于劳动力市场停滞、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减贫工作陷入停滞(Balakrishnan et al., 2021)。阿根廷和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的贫困率有所上升,但平均而言,繁荣时期取得的显著进展并未被逆转,只是陷入停滞(Balakrishnan et al., 2021)。与全球南方其他区域相比,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图四.9)。

³² 多维贫困指标包括：营养、儿童死亡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烹饪燃料、电力、饮用水、卫生设施、住房和资产(UNDP,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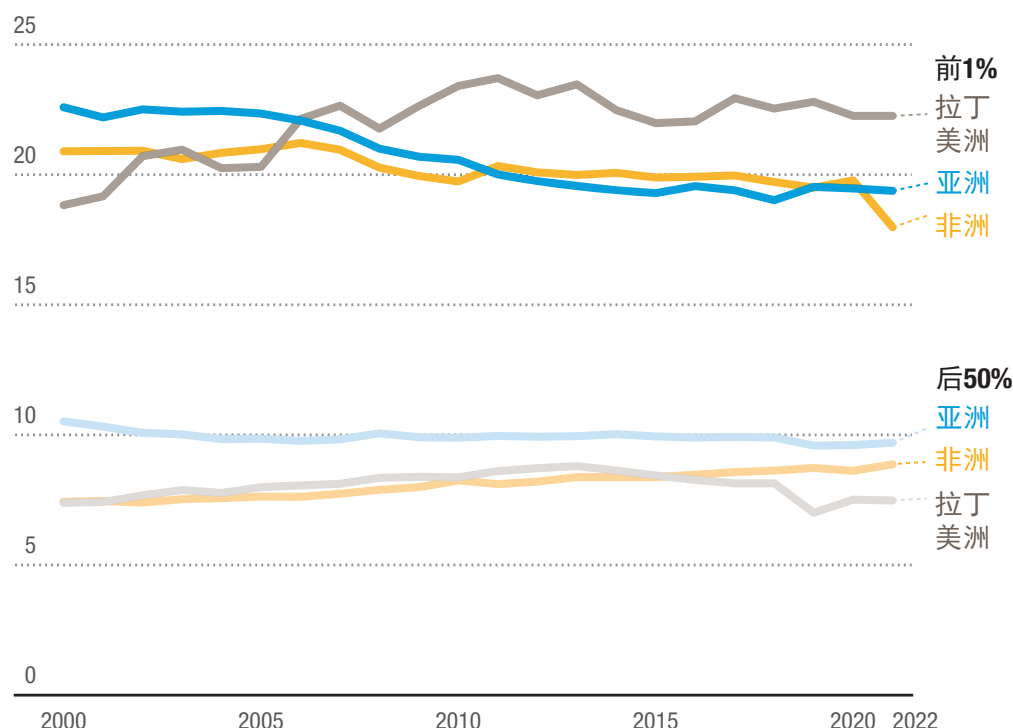


大宗商品繁荣时期，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贫困现象减少，主要得益于财政支出的增加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与资源生产直接相关的低技能部门劳动力需求的上升(Balakrishnan et al.,

2021)。各国政治意愿增加社会支出，用于面向穷人的创新举措，例如非缴费型计划，也促成了积极成果(Sánchez-Ancochea, 2021; Gasparini and Cruces, 2021)。

图四.9

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
按地区分列的税前国民收入前1%和后50%人口的收入占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注：亚洲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就整个区域而言，不平等现象减少是由于政府相较于过去，改善了对大宗商品繁荣的短期管理。政府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并提高了最低工资，同时还采取措施“管控更高比例的大宗商品租金”(Sánchez-Ancochea, 2021)并减少避税行为(Gasparini and Cruces, 2021)。然而，总体而言，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远高于其发展水平所应呈现的状态，拉丁美洲仍然是全球最不平等的

的区域(Galindo and Izquierdo, 2024; Gasparini and Cruces, 2021)。

与亚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始终落后。该区域贸易政策不均衡，区域间贸易碎片化，优惠贸易区网络中缺乏共同的优惠和原产地规则，这些都阻碍了供应链的发展(Moreira and Stein, 2019: 50–51)。美洲开发银行指出，“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可能会使一些拉丁美洲经济体受益，但在当前情况下，该区域出口的先行指标并未显示出2024年上半年趋势将发生变化”(IDB, 2024: 10)。³³

非洲

本世纪初，“非洲崛起”甚至“前进的雄狮”³⁴的概念体现了对全球南方崛起的诸多设想。非洲拥有全球约12%的石油储量、42%的黄金、80%至90%的铬和铂金属、60%的可耕地和大量木材储备(African Union, 2021)。在非洲大陆54个国家中，有46个国家的大宗商品出口占总出口的60%以上(UNCTAD, 2022a)。

然而，对于这个资源丰富的大陆而言，事实证明“崛起”是短暂的，与2003-2013年的大宗商品周期高度吻合。2004年至2014年，在亚洲工业化经济体强劲需求的推动下，非洲大陆的矿产产量和价格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表现尤为亮眼。2004年至2014年，非洲前十大生产国创造了高达2.3万亿美元的惊人收入(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9)。

除了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主要生产国以及一些长期从事油气生产的中等规模生产国(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外，还有许多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也引起了企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Oppong and de Oliveira, 2021)。

其中，莫桑比克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该国在2010年发现了一些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Salimo et al., 2021)。采掘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来自西方的石油和矿业公司——它们直至2000年都在非洲占主导地位——还来自全球南方的众多公司，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公司。

总体而言，2000年至2010年期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5.1%，但2010至2019年期间，增长率放缓至3.3%(Tran, 2024)。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DP在2014年达到1,936美元的峰值，此后下降了超过10%，到2023年降至1,700美元左右。同一时期，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近15%(Blas, 2023)。自2014年以来，非洲大宗商品出口国增长缓慢，非洲大陆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非，均为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发展轨迹尤其令人失望(图四.10)。

³³ 梅斯奎塔等人(Mesquita et al., 2022)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墨西哥等“近岸”供应商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然而，这些收益似乎是以美国生产商的利益为代价，并没有触动亚洲“远岸”供应商的利益，后者仍在巩固其市场地位。然而，乌塔尔、托雷斯·鲁伊斯和苏里塔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研究了2015年至2021年墨西哥的企业数据，发现“美中贸易战对[墨西哥]企业的出口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墨西哥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可以取代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并与美国制造业形成互补。具体而言，美国在2018-2019年针对中国采取的进口保护措施显著促进了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对美国的出口，2019年增长率达16.5%。”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一效应在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期暂时有所减弱，但到2021年，这一正面效应依然显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达到17%。美国转而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也导致墨西哥全球价值链企业增加了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进口，但进口增幅小于出口，最终促成了整体净出口的显著增长。”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近期的贸易政策转变在重塑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了作用，并提供了全球价值链向墨西哥迁移的证据”(Utar, Torres Ruiz and Zurita 202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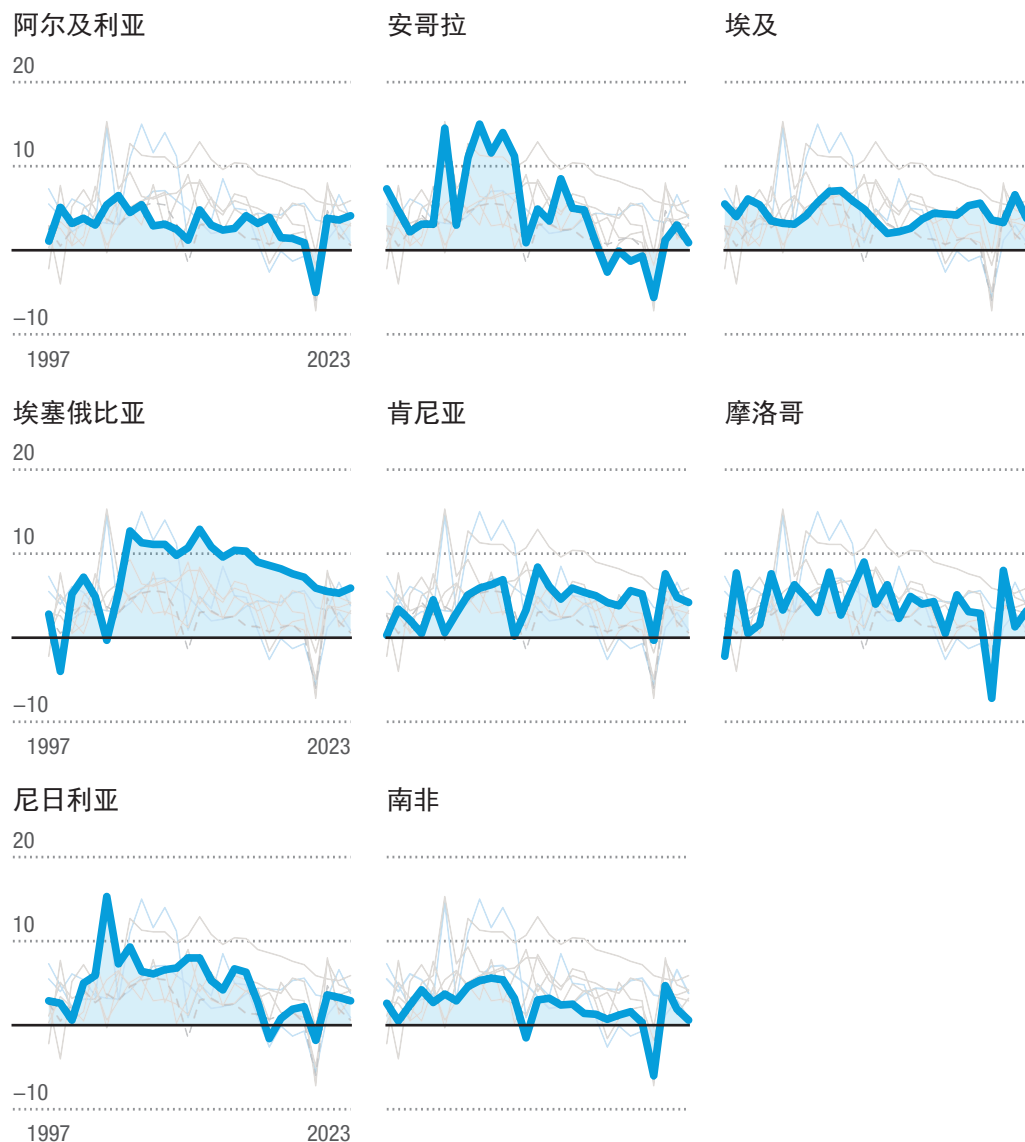
³⁴ 特别见McKinsey, 2010和Radelet, 2010。

图四.10

依赖大宗商品的非洲主要经济体明显呈下行趋势

非洲最大几个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和表一.1。

非洲大陆尚未完全从疫情中恢复，截至2023年，其GDP相较于新冠疫情前的增长趋势下降了2.4个百分点。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对非洲的发展不利(Tran, 2024)。通过一个假设性预测可以看出当今非洲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贸发会议的计算表明，非洲

联盟的55个国家需要在未来20年内实现年均19%的增长率，才能达到七国集团如今的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好处。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时代为经历了数十年经济衰退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使许多经济体得

以恢复强劲增长，缓解了20世纪末的债务负担，并摆脱了国际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最为严苛的结构调整措施。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和投资者的高度多元化，特别是获得来自亚洲工业化经济体的投资，非洲似乎有望实现质的提升。

21世纪初的经济改善使非洲国家能够更加重视公共机构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的作用(Péclard et al., 2020)。安哥拉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在2002年内战结束后经历了石油繁荣期，实施了资本密集型工业项目。即使是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资源贫乏的国家也力求实施雄心勃勃的多样化政策。尽管财力有限且起点很低，但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多样化进程中表现更为突出(图四.11)。而在非洲其他国家，多样化的结果令人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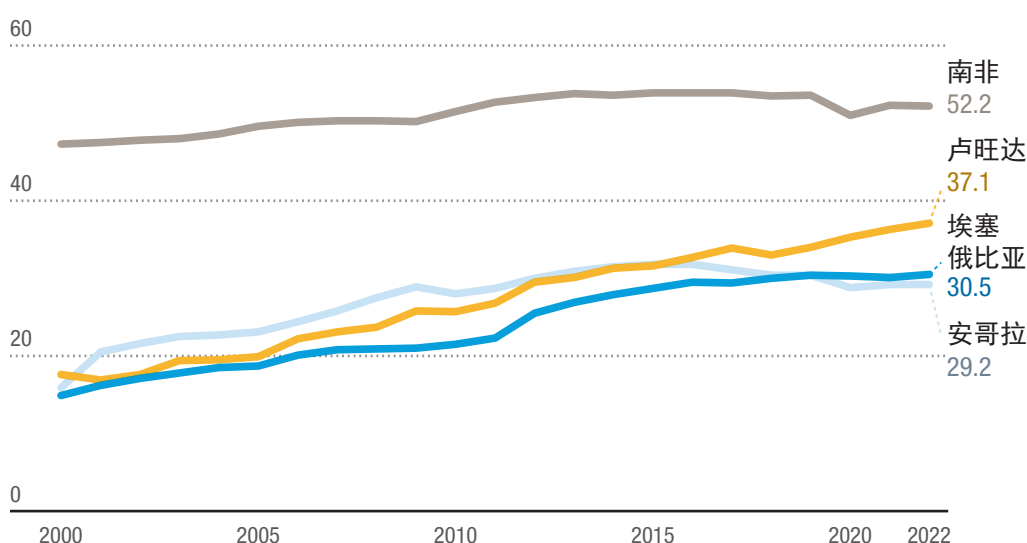
由于结构转型缓慢或缺失，形势更加不容乐观。1980年至2000年间，制造业在非洲GDP中本就不高的占比又下降了一半(Jacquemot, 201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潜在投资者对制造业很感兴趣，但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仍从1981年的18%下降到2023年的11%(Pilling, 2024)。

从本质上讲，2000年至2010年代是无就业增长时期。非洲大陆众多年轻人的期望仍未实现。非洲每年创造约300万个正规带薪岗位，但在未来十年，每年将有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非洲15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平均超过20%。南非的青年失业率居全球之首，达到61%(Tran, 2024)。



图四.11

多样化帮助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提高了生产能力，尽管两国起点很低
部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指数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关于生产能力指数的详细信息，见图三.13的注。



现在看来，非洲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潜力被夸大了，同样被高估的还有该阶层的规模和地理分布（例如 Melber, 2017）。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减贫工作没有取得进展，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在增加。尽管非洲制造业中形成了一些亚洲外国直接投资集群，但工业化的“雁行”理论并未奏效。从制造业价值的绝对规模和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长来看，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仍在持续推进（Abreha et al., 2021）。然而，非洲迄今为止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南非却出现了工业衰退。总体而言，非洲经济体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Abreha et al., 2021）。

国际金融一体化加重了许多国家的债务负担。截至2018年，自2013年以来面临债务困境高风险的13个国家中，有10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至2023年间，在57个发展中国家中，有46个（占81%）外部财政可持续性出现恶化，偿债成本的年增长率中位数为16.3%，远超出口加汇款的增长率（5%）。在情况恶化的国家中，有27个位于非洲，14个位于亚洲，5个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UNCTAD, 2024b）。2023年，在出口收入用于偿还外债比例最高的25个国家中，有9个是非洲国家（图四.12）。

站在大宗商品繁荣期过后的今天回望，绝大多数非洲经济体显然在向非采掘部门进行结构转型方面进展甚微。2024年，非洲经济体的发展明显

有别于工业化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它们仍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极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无论在制造业还是商品化农业领域，都难以与灵活的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竞争。

4. 总结

因此，回顾过去发现，2003-2013年全球南方的崛起既不均衡，也不完全。亚洲向成为全球经济中心迈进，是国内结构转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的结果。

在拉丁美洲，新世纪前二十年的增长主要依赖大宗商品繁荣等偶然性因素，不过事实证明，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也是有效的，符合控制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明显的例外。

尽管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一些非洲国家成功实现了向非采掘部门转型的多样化发展，但非洲整体上经历了由大宗商品驱动的无就业增长的繁荣期。尽管非洲大力推行工业政策，但大多数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在2013-2014年仍然像以前一样依赖自然资源。如今，非洲大陆仍然严重依赖其资源基础，而沉重的债务负担加剧了长期存在的贫困、结构性改革不足和整体发展乏力等问题。



图四.12

出口收入用于偿债比例最高的25个国家

偿债金额在出口收入中的占比
(百分比)

新兴市场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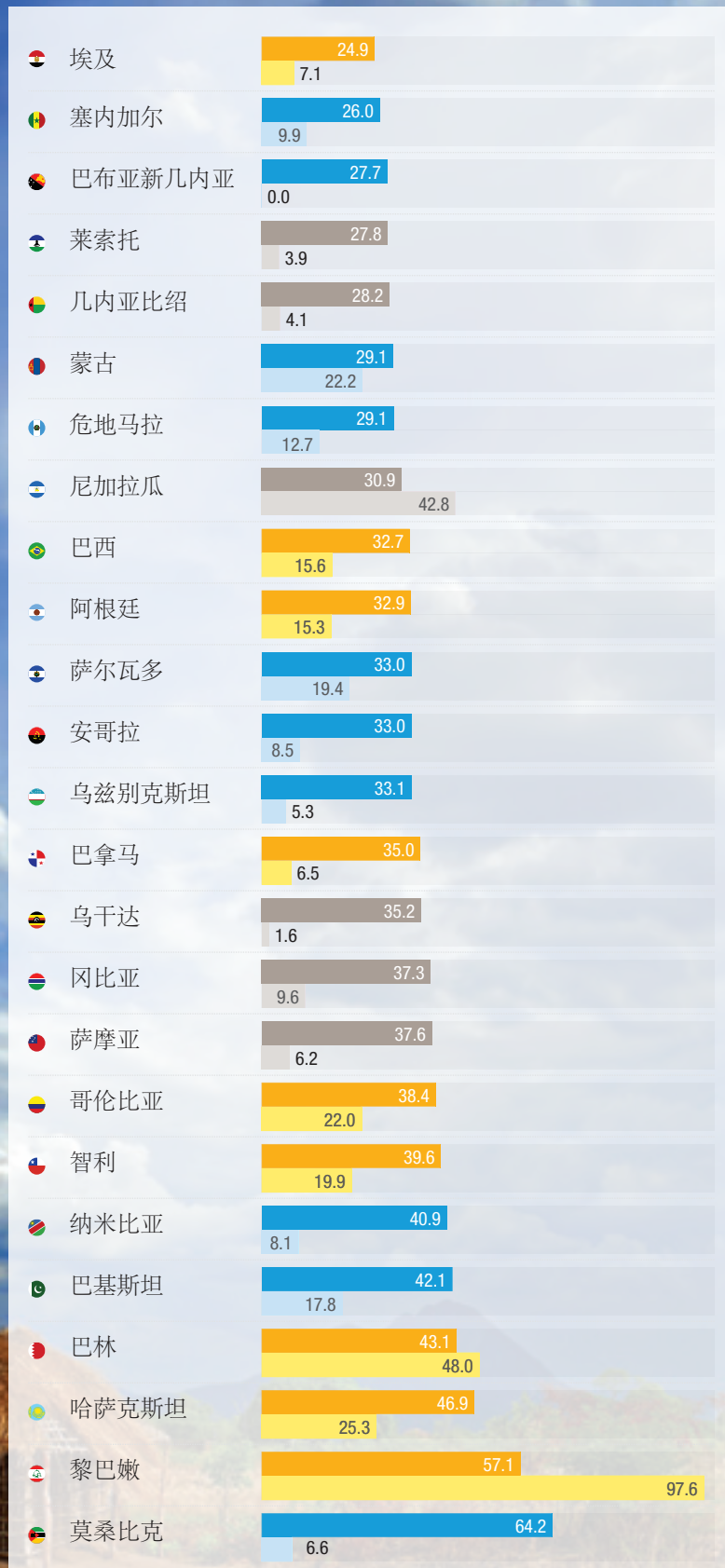
2022 2012

前沿市场经济体

2022 2012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2022 201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4年4月)。

C. 重新定位：发展的新路径

全球南方的区域多样性提出了在全球化转折点上如何选择发展战略方向和类型的重要问题。

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使一些先前流行的假设受到质疑，例如东亚的工业化模式在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可以复制。诸多因素对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首先，东亚一体化与传统的南北贸易和投资关系极为相似。然而，工业化的“雁行”模式和区域一体化并未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实现。人们期望“雁行”模式能够真实地描述东亚工业化路径，并认为其可以在全球南方推广，但这种期望往往忽视了该模式在分析方面的缺陷和不可避免的简化。正如对亚洲模式的批评所指出的（例如 Das, 2015），这种期望夸大了该模式的政策适用性（Saad-Filho, 2014）。

其次，全球南方当前的多样性体现在部分区域经济领头羊中断的发展轨迹上。例如，在1990年代，智利因选择了与东亚接近的模式而备受赞誉（Paik et al., 2011）。如今，该国税收不足，危及公共服务；官僚主义阻碍了投资；与包括邻国阿根廷在内的其他新兴国家相比，制造业规模仍然较小。铜等矿产品占据了出口和亿万富翁财富的绝大部分，这使得智利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大宗商品经济体，而不是东亚四小龙那样的国家（Sharma, 2024）。

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2003-2013年大宗商品繁荣的崩盘暴露了该

国的诸多问题，包括青年失业率超过50%、大量人口依靠社会福利生活、投资疲软以及频繁停电。即使在亚洲，在最初的亚洲四小虎之一泰国，人均GDP也出现了下降。泰国是全球不平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79%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尽管泰国试图凭借其在全球贸易路线上的区位优势发展成为制造业中心，但其生产力却陷入停滞，在与越南等制造业竞争对手的较量中落于下风（Sharma, 2024）。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第三章探讨的新增长浪潮的影响对亚洲发展模式 and 工业化的前景产生了新的制约。在新的大宗商品周期、能源和技术转型、高度金融化以及经济重心向服务业转移的背景下，1990年代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成功经验可能难以轻易复制。

以服务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全球南方当前的多样性（图四.13），发展中亚洲仍然占据绿地投资流量增长的绝大部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尽管以服务为导向的投资项目所占份额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有所上升，但总体投资自2020年以来陷入停滞。与此同时，服务业和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可能会给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带来风险。这可能会加剧阻碍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现有结构性障碍，并加重这些国家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UNCTAD, 2018）。

如今，关于全球南方其他地区可以成功复制东亚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假设受到质疑。

在新的大宗商品周期、能源和技术转型以及经济高度金融化和服务化的背景下，1990年代的成功经验可能难以轻易复制。



图四.13

投资向服务业倾斜可能会加剧结构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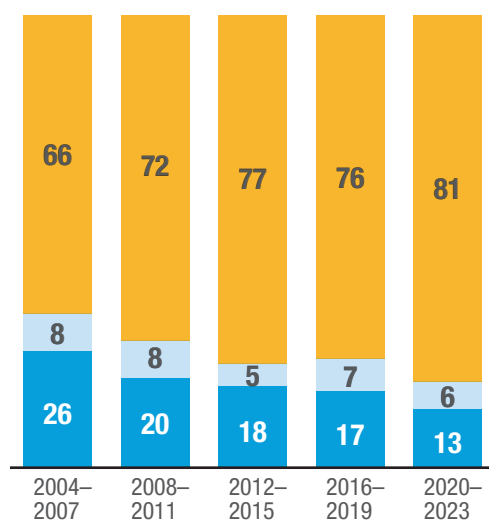
按地区和产业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

(占跨境绿地项目总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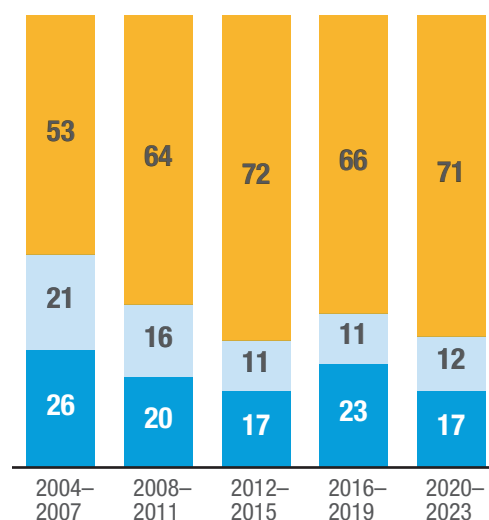
A. 按地区分列

制造业 其他有形产业 服务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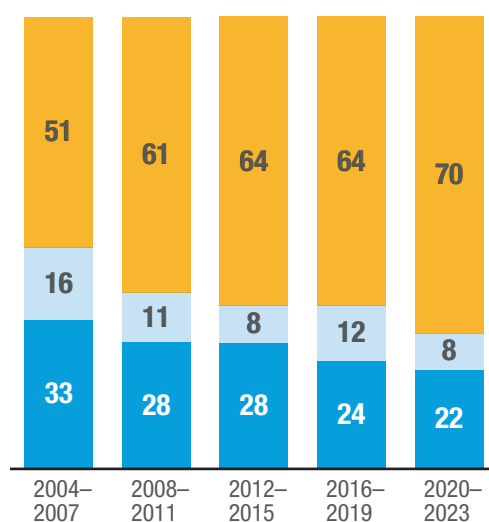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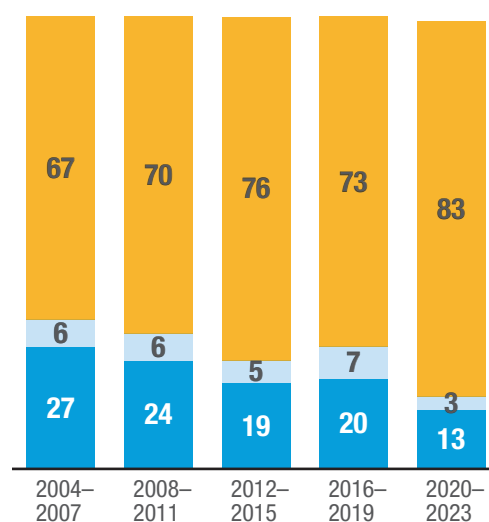
非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发展中亚洲



B. 按产业分列

	2004–2007	2008–2011	2012–2015	2016–2019	2020–2023
制造业					
非洲	3	5	5	6	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8	11	14	13	13
发展中亚洲	37	40	34	31	27
世界其他地区	51	44	47	50	55
其他有形产业					
非洲	9	10	12	8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2	12	15	16	11
发展中亚洲	26	27	33	27	14
世界其他地区	52	51	40	50	67
服务业					
非洲	3	5	5	4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	7	7	7	7
发展中亚洲	36	34	31	26	27
世界其他地区	57	55	57	63	63
总计					
非洲	3	5	5	5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	8	9	9	8
发展中亚洲	36	34	31	27	26
世界其他地区	55	52	54	60	6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金融时报》FDI Markets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库。

注：产业分析基于“商业活动”这一变量。重点在于，这意味着“服务业”包括典型制造业中的服务活动(例如，汽车制造商的销售办事处)。“制造业”与数据库中的分类一致。“其他非服务业”包括一些通常被归类为服务业但本质上是实物资产密集型的活动，包括以下类别：建筑、电力、采掘和基础设施。“服务业”包括所有其余(与服务相关的)商业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一商业活动类别被拆分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其余部分，前者归入“其他非服务业”，后者归入“服务业”。

要找到成功发展的新路径，必须重新评估大宗商品周期，并制定多样化和再分配政策。

在实体经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金融化对一体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依然可以找到通往成功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对于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大宗商品周期的短期利益以及服务业和金融相关行业占比上升的问题。需要制定新的政策，以实现长期多样化和再分配。

金融化——即金融工具、活动和估值的作用日益增强(Sawyer, 2013)——对实体经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持续影响，对寻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下文将探讨其中一些影响。

1. 金融化的挑战：新老问题并存

鉴于2003-2013年大宗商品繁荣的经验教训以及新一轮增长和能源转型的影响，全球南方的许多资源出口国愈发需要审慎管理采掘业的扩张。2018年，在调查的27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有18个经济体的采掘业在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一些经济体的增幅超过10个百分点(UNCTAD, 2018)。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宗商品繁荣与金融周期和相关金融化风险密切相关。自2000年以来，大宗商品市场及相关行业的金融化不断推进，因为当时美国放松了对衍生品市场的管制，在新一轮金融创新浪潮下，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类型的投资者纷纷参与到大宗商品指数产品的交易和投机中。大宗商品衍生品受到大量机构投资者追捧，因为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将推动全球自然资源需求的持续上升，未来几十年粮食产量需增长50%，甚至更多(FAO, 2017; Clapp, 2019)。

较新的一个发展是能源转型。鉴于能源转型伴随着对大宗商品，特别是矿产需求的不断攀升，因此这一进程也受到高度金融化的影响(例如Knuth, 2018; Appiah et al., 2023)。随着能源转型和新一轮增长的推进，如何管理采掘业的扩张和金融化成为大宗商品出口国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

采掘业大宗商品行业，即采矿和能源行业，具有极高的资本密集度，租金往往集中在资本所有者手中。而农业大宗商品部门的活动则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生产者规模较小，只参与国际粮食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只能获得其产品附加值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咖啡种植者所得仅为最终售价的3%(UNCTAD, 2018)。

少数跨国企业对农业部门的掌控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小农户面临诸多挑战：投入品的成本高且获取途径有限；资本不足；需要遵守进口国制定的日益严格的安全、质量和环境标准；气候变化日益加剧而适应工具有限(UNCTAD, 2024a)。

相反，在近几年的市场动荡中，保守估计控制着全球70%粮食市场的大宗商品交易巨头却实现了利润飙升，在许多情况下是由金融投机推动的(UNCTAD, 2023)。例如，全球谷物贸易由少数几家公司主导，这些公司处于高度金融化且容易出现波动的大宗商品市场中(Clapp, 2022)。这些公司的投机行为甚至已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因为监管力度不足和企业套利行为使它们能够在危机和市场波动时期牟取暴利(UNCTAD, 2023; Clapp, 2022)。

不同学科对金融化有不同的定义(van der Zwan, 2014)，这一现象既可以理解为基础资产在金融市场上的可交易性增强，也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带来的利润超过了核心业务活动的收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平衡大宗商品出口国对外部金融化的风险敞口，又要在国内宏观经济中调控采掘业的增长。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往往显而易见(Aldasoro et al., 2023)。大宗商品市场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金融周期方面的确切作用仍存在争议，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出口价格的内生反应对于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向发展中国家的传导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对利率敏感，并且美国货币政策和全球风险偏好的变动是影响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关键驱动因素(Juvenal and Petrella, 2024)。

如图四.14所示，自21世纪初以来，金融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时国际金融市场推出了大宗商品指数产品，扩大了金融投机的机会(Gkanoutas-Leventis and Nesvetailova, 2015)。

金融周期的变化速度往往比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慢得多，后者的变化频率更接近资本流动的变化频率。图四.14显示的相关性与阿尔达索罗等人(Aldasoro et al., 2023)的研究结果一致。也就是说，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第一主成分与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关性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入的第一主成分与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关性。

疫情前的分析(Bonizzi, 2013; Kaltenbrunner and Paineira, 2015)已经记录了金融化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最近的研究(Sharma, 2022)发现，与2008-2009年相比，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明显。

最近，关于大宗商品价值链金融化的新实证研究(插文四.1)推进了这一分析。研究表明，大宗商品金融化和全球价值链集中化实际上给全球南方出口国带来了双重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尽管在总体层面上，金融机构和市场发挥着核心中介作用，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金融投资则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实践来完成。

金融化意味着基础资产的可交易性增强，金融活动的利润超过核心业务收入。

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往往显而易见。

与2008-2009年相比，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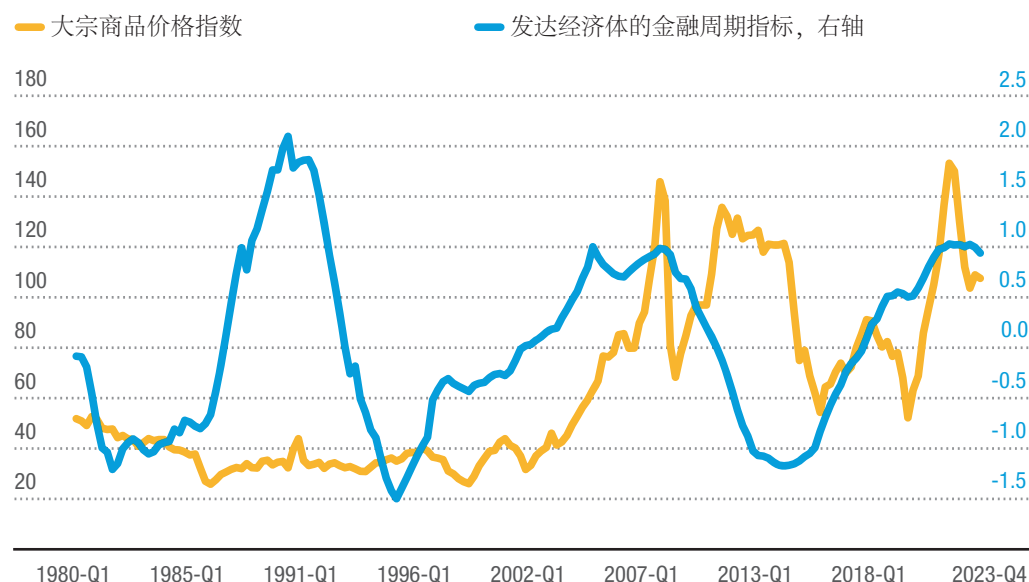


图四.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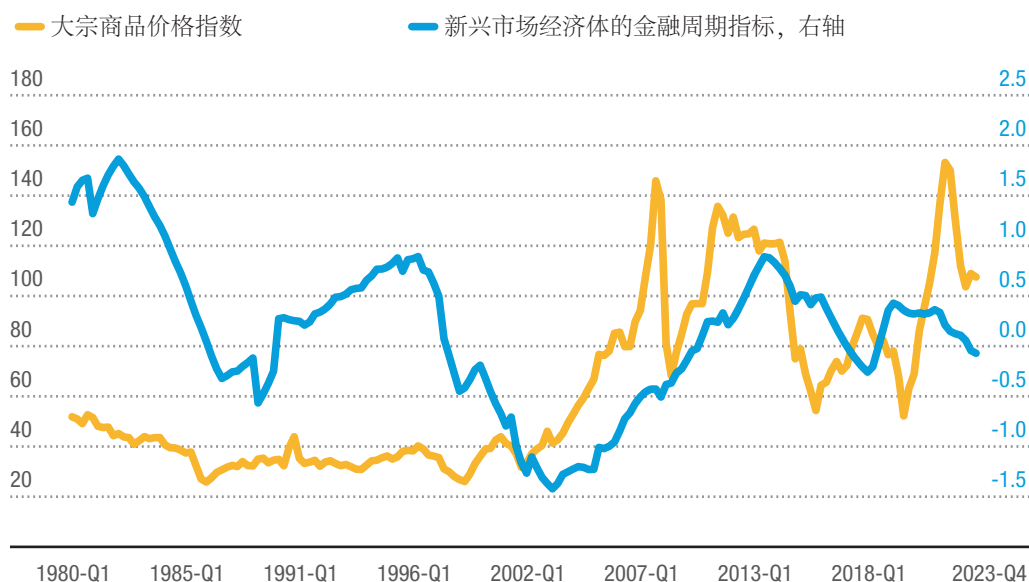
大宗商品周期等同于金融周期吗？有证据表明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在新兴市场尤其如此

金融周期指标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10=100)

A. 发达经济体



B. 新兴市场经济体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惠誉、国家数据、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大宗商品价格数据。

注：Q1, 第一季度；Q4, 第四季度。金融周期通过基于频率的(带通)滤波器衡量，这些滤波器能够捕捉实际信贷、信贷占GDP比率和实际房价的中周期(Borio, 2014)。在计算各国家组的简单平均值之前，按各国的均值和标准差对金融周期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巴西、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韩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泰国和土耳其。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王国、挪威、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插文四.1

加纳：可可定价机制的特殊案例

可可豆价格具有高度波动性，主要由伦敦和纽约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决定。加纳的经济高度依赖可可豆出口来获取外汇储备。然而，可可价格的波动会导致财政收入、收益和汇率的起伏，进而对内部和外部平衡构成风险。

加纳是唯一一个由国家垄断可可豆销售的国家。加纳可可委员会(Cocobod)旗下的子公司——可可销售公司负责管理这一垄断业务，该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21世纪初，加纳可可委员会引入了一项制度，使加纳国民银行能够通过国际货币市场获得低成本信贷。该制度以远期合约(即在未来以指定价格买入或卖出可可)作为抵押，由一组贷款人提供贷款(van Huellen and Abubakar, 2021)。设计该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进口石油筹集外汇资金。迄今为止，这一被称为“银团贷款”的安排已成为加纳央行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的主要渠道。

可可销售公司拿到的价格中，有80%以上由国际市场决定，取决于期货销售与采购合约，不在该公司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定价机制具有前瞻性和投机性，它反映的是交易商对未来供求状况的预期，而这些预期本身易受市场波动和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影响。

可可销售公司把握市场价格波动时机的能力受到内部运转所需资金的制约。为了在收货季节向农民付款，公司必须确保银团贷款在九月底之前到位。为此，公司需要通过远期合约锁定一定的可可交易量，这意味着即使在市场价格上涨时也要锁定价格。这种情况被买方充分掌握并加以利用。例如，在疫情期间，买家要求可可销售公司接受负的国家溢价，否则就拒绝签订远期合约。如果不签订远期合约，公司就无法筹集资金向可可种植者付款，最终公司不得不同意买家的要求。

远期销售制度使可可销售公司能够在市场价格下跌时锁定销售价格，从而保护可可种植者免受价格下跌的风险，但公司也因此失去了在价格上涨时获益的灵活性。通过保留部分收成用于现货销售，公司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然而，如果收成太低，公司仍然可能陷入困境。在经济动荡和外债危机时期，加纳可可委员会和可可销售公司可能会面临来自政府的额外压力，被迫远期出售比市场条件下理想水平数量更高的可可豆。

加纳央行每年通过可可豆销售可直接获得约20亿美元资金，这使得加纳可可委员会成为了该国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然而，缺乏独立性损害了可可销售公司的信誉。在加纳因债务危机而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面临更高的风险溢价后，银团贷款成为了加纳进入国际市场的唯一途径，也成为该国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最大来源。

插图四.1 加纳：可可定价机制的特殊案例

现行制度以伦敦终端市场价格为基础，并涉及多次货币兑换，这使得可可销售公司面临巨大的价格和销量风险。调整现有安排具有挑战性，因为该安排为加纳可可委员会提供了流动性，以维持其作为加纳可可豆垄断买家的地位。该安排还使加纳央行能够以可负担的利率从国际市场融资，这一优势在国内债务危机和货币持续贬值的背景下至关重要。

这一制度已经实施了30年，近年来，要求废除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不禁猜测，加纳可可委员会可能会制定一项五年计划，逐步摆脱对银团贷款的依赖。这样既能减少利息支出，又能让可可出口带来的美元收入持续流入加纳央行。然而，资金需求依然存在，而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国的融资规模施加了限制，这意味着在实施新战略之前需要进行谈判。

资料来源：van Huellen et al., 2024。



2. 金融：资源诅咒的新维度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频繁且愈发剧烈的波动直接影响出口和财政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和汇率，进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这往往会阻碍长期投资和财政收入筹集，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UNCTAD, 2018)。

此外，金融部门的无序扩张可能会使各国面临增长失衡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取决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产业)对总产出、增加值和就业的贡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该产业对产出和增加值的贡献性质引起了政策和研究界的关注，尽管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更容易获取数据的发达经济体。

宏观经济研究指出，国民账户在计算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增加值时，采用了“赋值”法，使增加值等于收入(工资和利润)(Foley, 2011)。就该产业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与其在总就业中所占份额的相关性而言，金融部门呈负相关性(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房地产部门则没有显著相关性(Assa, 2016)。金融服务收入代表机会成本，因为本可以将支付这些服务的钱用于其他生产性活动。金融服务在产出和就业中的占比呈负相关性，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对经济而言，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具有攫取性而非生产性(或者说其作用是减少价值而非增加价值)(Assa 2016, 2017)。

金融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在英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占GDP的30%以上)和美国等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中，依靠金融来推动经济增长会拖累经济，导致“金融诅咒”。“金融诅咒”与资源诅咒类似，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规模过于庞大的金融部门从其他经济部门攫取资源，却没有创造出足够比例的高薪就业岗位，同时还引发了系统性失衡(Shaxson, 2019; Tax Justice Network,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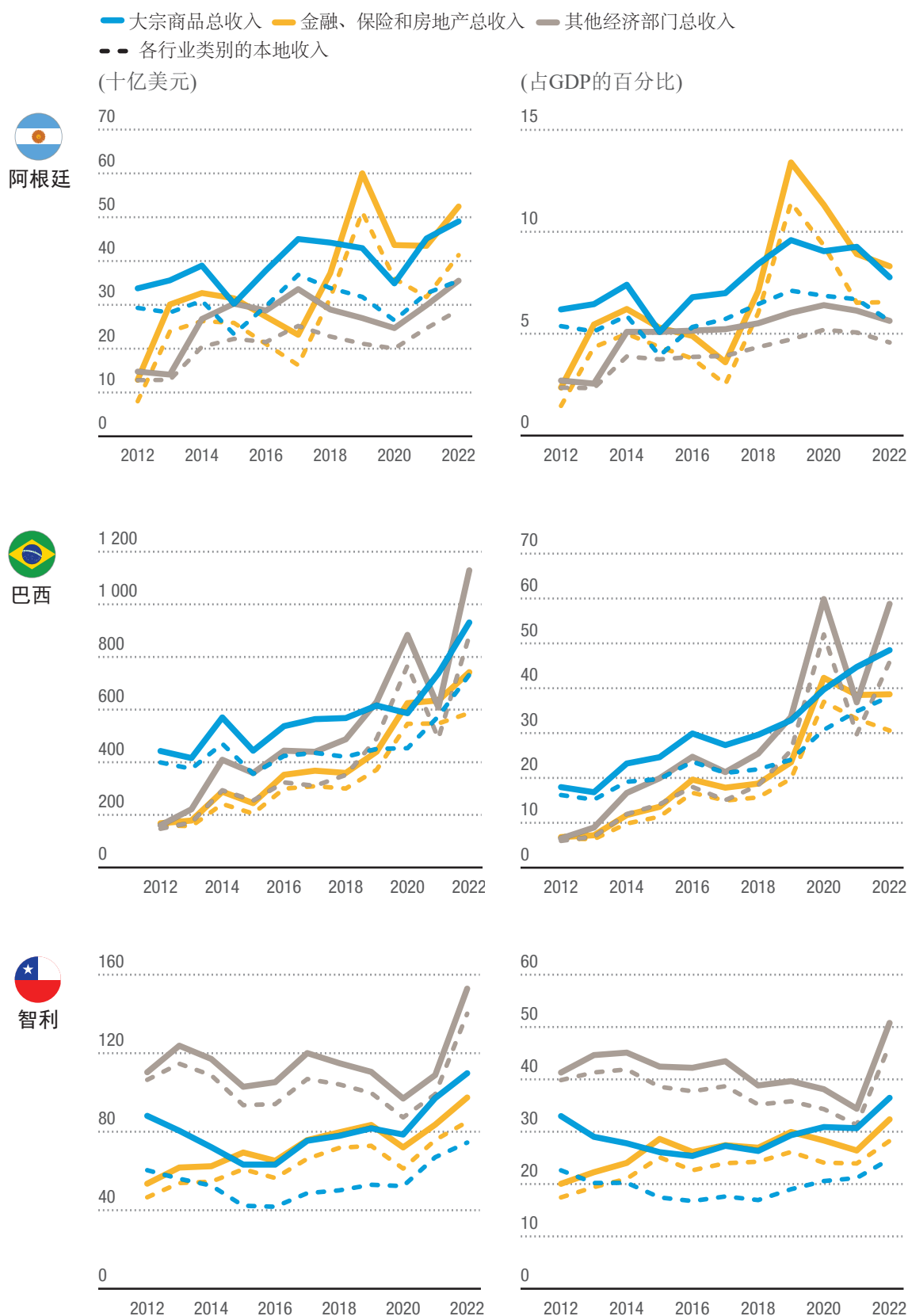
关于金融诅咒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经济体(Baker et al., 2018; Epstein and Montecino, 2016)。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估计，英国“银行业污染”的成本(即银行业危机给公众造成的社会成本)可能接近1,000亿美元(Haldane, 2010)。对于全球南方经济体而言，持续的金融化——特别是在无形资产和相关金融活动的作用日益增强的背景下(WIPO, 2024)——引发了重要的政策关切。

为了简要说明这一问题，图四.15展示了2012年以来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三个重要行业类别的部门利润动态：大宗商品(能源、矿业和农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其他经济部门(非大宗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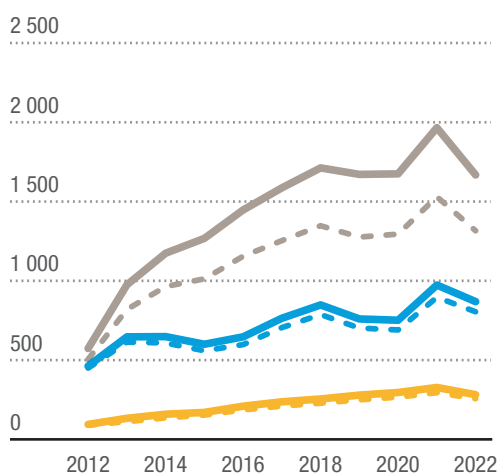


图四.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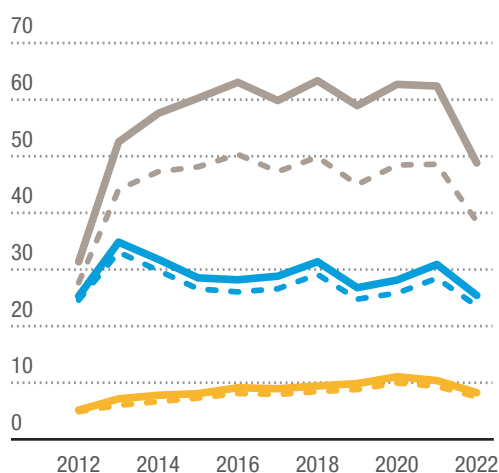
经济多样化程度影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部分国家按行业类别分列的总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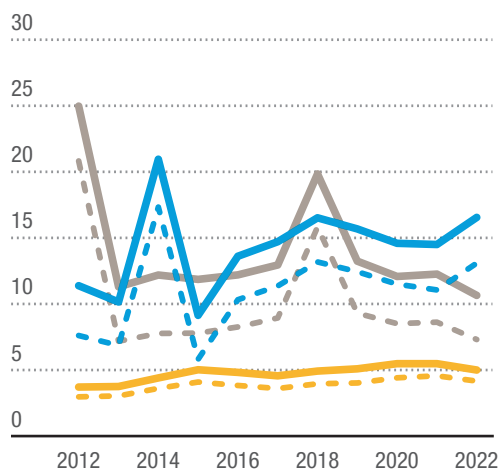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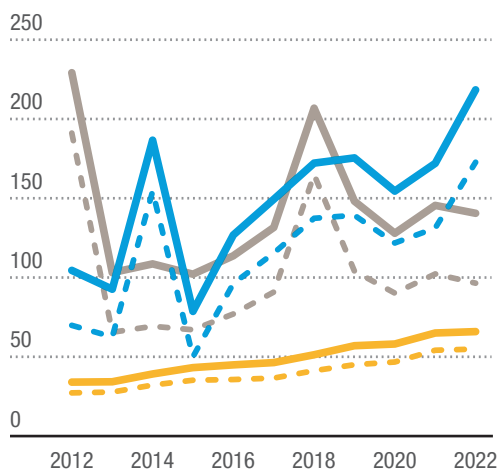
— 大宗商品总收入 —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总收入 — 其他经济部门总收入
- - - 各行业类别的本地收入
(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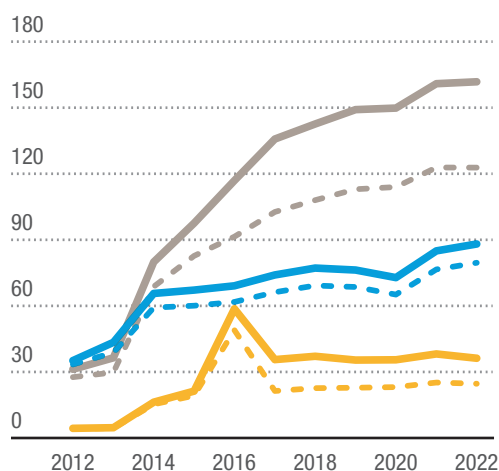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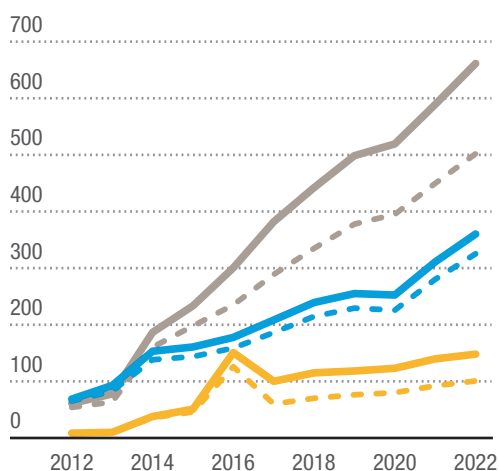
(占GDP的百分比)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穆迪Orbis数据库。

注：在Orbis数据库中，公司层级的分类字段将公司划分为三大类：大宗商品；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其他经济部门。行业类别是根据公司财务报告中对其业务活动的分类汇总而成的。数据集涵盖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报告的收入，包括子公司层面的收入。

该图显示，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国家(Castillo and Neto, 2016)，核心大宗商品部门的收入变化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收入扩张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2020年开始的大宗商品繁荣期。这加剧了通过庞大的金融部门传递的不稳定风险，同时引发了对部门集中度的担忧。在图四.15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经济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多样化程度更高，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似乎更加均衡，其收入趋势也似乎更加平稳。

这一结果与哈佛增长实验室公布的133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杂性排名相吻合。该排名基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即有多少国家能生产这些产品)来计算其经济复杂性。³⁵ 研究人员发现，总体而言，自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参差不齐(图四.16)。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名迅速上升，特别是亚洲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而另一些国家的排名大幅下降，特别是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经济体，例如阿根廷、巴西和南非。鉴于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且如上文所述，金融化与采掘部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相互依赖性可能不断增强，这种排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政策重点

关于发展中国家以及采掘业与金融化之间关系(包括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例如Cibils and Alami, 2013)较为有限。然而，在全球价值链的金融和法律机制的推动下，企业对核心市场的控制权不断巩固，这一问题需要引起全球南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更多关注(Lianos et al., 2022; BRICS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Centre,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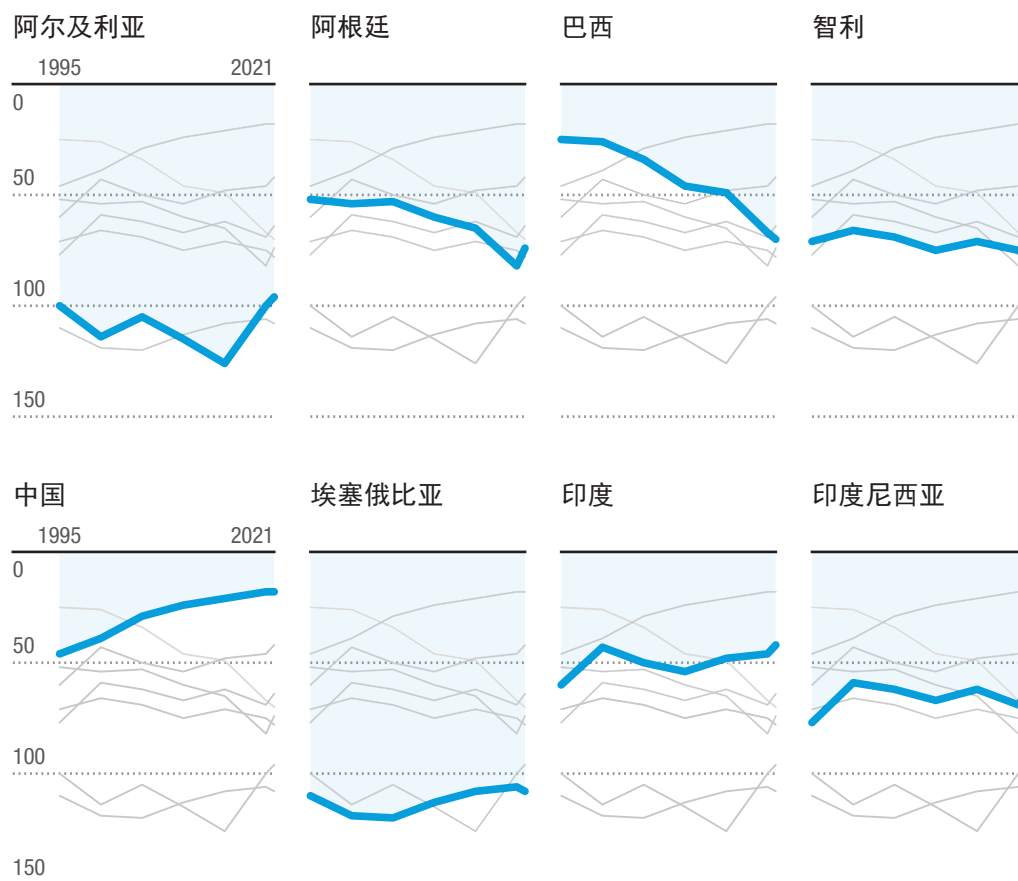
如果不制定政策加以应对，过度扩张的金融部门(Muda et al., 2020)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加剧国家对大宗商品的依赖。首先，在大宗商品出口国，金融和以金融为中心的部门的无序或不均衡扩张可能会影响经济中的部门构成。这可能会限制经济多样化，削弱经济韧性，并加剧收入不平等(UNCTAD, 2024c)。

其次，在多重危机交织的时期，能源、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叠加并形成多重压力点，因此全球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可能会通过与大宗商品收入增长紧密相关的金融部门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大宗商品出口国在

³⁵ “经济复杂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所掌握的知识水平的指标，通过其生产的产品来体现。该指标的计算基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即有多少国家能生产这些产品，以及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复杂性)。能够掌握多样化生产知识(包括复杂、独特的技术知识)的国家通常有能力生产种类繁多的商品，包括其他国家无法生产的复杂产品(见增长实验室的定义<https://atlas.cid.harvard.edu/glossary>)。然而，经济复杂性不能被视为发展的替代指标，因为发展是一个多维度进程。例如，由于贸易结构的原因，澳大利亚和挪威的经济复杂性指数排名较低，但它们却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对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例如中国、印度、泰国和越南，尽管它们已迅速成为许多复杂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但在多项发展指标上仍然面临挑战。

图四.16

经济复杂性指数有所提高的国家往往经济更加多样化
部分国家的经济复杂性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哈佛增长实验室《经济复杂性地图集》。

制定国家产业和金融法规及政策时，需要考虑到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的扩张(Cibils and Allami, 2013)。要加强监管，就必须对企业各级业务活动的会计和财务数据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但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非洲，仍然很难获得此类数据。

反过来，要保障经济韧性和公平，就需要协调再分配、多样化和金融监管政策。关键在于，为了筹集发展资金，这些措施需要加强国内财政收入筹集能力，包括加大力度遏制企业套利、追踪和监测跨国企业的经济足迹，并在多边层面共享相关数据，以加强政策协调。

参考文献

- Abdul J, Bluedorn J, Guajardo J and Topalova P (2012). The rising resilience of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MF Working Paper No. 12/30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breha K, Kassa W, Lartey K, Mengistae A, Owusu S and Zeufack A (2021). *Industrial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Seizing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Acevedo I, Castellani F, Cota MJ, Lotti G and Székely M (2022). Higher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collateral effect of the pandemi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Adler G and Sosa S (2011). Commodity price cycles: The perils of mismanaging the boom. Working Paper No. 2011/28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frican Union (2021). Africa's commodities strategy; value addition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Press release. 1 September.
- Agosin MR (2006). Trade and growth: Why Asia grows faster tha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and Sector Studies Series RE-2-06-00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kyuz Y (2012). The staggering rise of the South. *Research Papers* 44. South Centre.
- Aldasoro I, Avdjiev S, Borio C and Disyatat P (2023). Global and domestic financial cycles: Variations on a the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Allen F and Giovannetti G (2011).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sub-Saharan Africa.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 1:1–27.
- Appiah M, Ashraf S and Tiwari AK (2023). Does financialization enhanc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Energy Economics*. 125:106898.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1). 'Missing Valu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Presents Growth Opportunity. 16 Novembe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3a).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GVCs in Turbulent Times. Manila.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3b). Trade integration deepe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mid pandemic. ADB News Release. 9 February.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4).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Manila.
- Assa J (2016).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GDP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roeconomic debates. Working Paper 10/201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Assa J (2017).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GDP: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Routledge. New York.
- Atolia L, Prakash M, Marquis M and Papageorgiou C (2018).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Deindustrialization, servic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MF Working Paper No. 18/22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aker A, Epstein G and Montecino J (2018). The UK's finance curse? costs and processes. Sheffiel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 Balakrishnan R, Lizarazo S, Santoro M, Toscani F and Vargas M (2021). Commodity cycle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IMF Western Hemisphere Working Paper No. 21/0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anga K, Harbansh P and Singh S (2023). Digital de-industrial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23/65.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 Bas M, Fernandes A and Paunov C (2022). How resilient was trade to COVID-19.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975. World Bank.
- Benitez JC, Mansour M, Pecho M and Vellutini C (2023). Building tax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2023/0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irdsall N and Fukuyama F (2011).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90(2):45–53.
- Blas J (2023). What happened to Africa rising? It's been another lost decade. Bloomberg Opinion. 12 September. Bloomberg.
- Bodansky D and WHO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1999).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protocol approach. Technical briefing series WHO/NCD/TFI/99.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Bonizzi B (2013). Finan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2(4):83–107.
- Borio C (2020). The Covid-19 economic crisis: dangerously unique. *Business Economics* 55:181–190.
- BRICS Law and Policy Centre (2021). Combatting cross-border cartels: empirical study. Moscow.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 Brown C (2023). Modern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WTO.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3-15.
- Cadena A, While O and Lamanna C (2023). What could a new era mean for Latin America.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 July.
- Cadzow L, Hearson M, Heitmuller F, Kuhn K, Okanga O and Randriamanalina T (2023).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views from the global South. ICTD Working Paper 17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ax and Development.
- Campos R, Pienknagura S and J Timini (2023). How far has globalization gone? A tale of two reg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 23/255.
- Caruana J (2009).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he crisis and Latin Americ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XLVI Meeting of Central Bank Governor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May 14.
- Castillo M and Neto AM (2016).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ECLAC production development series No. 20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ntiago.
- Cibils A and Allami C (2013). Financialisation vs. development finance: The case of the post-crisis Argentine banking system. *Revue de la Régulation*. 13(1).
- Clapp J (2019). The ris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common ownership in global agrifood firm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4.
- Clapp J (2022). Concentration and crises: exploring the deep roots of vulnerability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food system.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0 (1):1–25.
- Das DK (2015). The Asian growth model: myth or reality? In: *An Enquiry into the Asian Growth Model*. Palgrave Pivot. London.
- Didier T, Hevia C and Schmukler S (2012). How resilient and countercyclical were emerging economie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1(8): 2055–2077.
- Fernandez V, Moretti L and Ormaechea E (2022). Divergent convergence complemen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challenges for “the res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28(1):98.
- Foley DK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output and employment 2001-2010. Working Paper Series. Schwartz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7).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challenges. Rome.
- Furusawa M (2017). What we have seen and learned 20 years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MF Blog.13 July.
- Galindo A and Izquierdo A (2024). Ready for take-Off? building on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for growth.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Macroeconomic Report. March.
- Gasparini L and Cruces G (2021). The changing picture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 Gerstle G (2022).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kanoutas-Leventis A and Nesvetailova A (2015). Financialization, oil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Energy Policy* 86. November.
- Goel R and Papageorgiou E (2021). Drivers of emerging bond flows and prices.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Notes No2021/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Goldberg P and Reed T (2023). Is the global economy deglobalizing? If So, Why? And What is Nex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23: 347-396.
- Griffiths-Jones S and Ocampo J (2009).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53.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 Gruss B (2014). After the boom: commodity pr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MF Working Paper No. 14/154.
- Guterres A (2023).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launch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rogress Report.
- Haldane AG (2010). The \$100 billion question. Comments at the Institute of Regulation and Risk. 30 March.
- Hall H and Gochoco-Bautista M (2013). *Asia Rising: Growth and Resilience in an Uncertain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 Han Q, Song Shin H and Zhang L (2023). Mapping the realign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IS Bulletin No. 78.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Herrera C, Veillard J, de Colombi N, Neelsen S, Anderson G, and Ward K (2022). Building resilient health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Ianchovichina E (2024). The evolving geography of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ideas for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a territorial le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IBFD (2023). Promotion of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tax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8). Connecting the dots: a road map for better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23). Export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ntract as trade opportunities emerge. *IDB news releas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5 December.
-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24). Trade trends estimates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9). Africa Energy Outlook 2019: World energy outlook special report. Paris.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24).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Geneva.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Septembe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Octobe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 Western hemisphere: shifting winds. new polic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April. Washington, DC: IMF.
- Ioannis L, Ivanov A and Davis D (2022). *Global Food Value Chains and Competitio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ácome LI (2015). Central banking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gold standard to the golden years. IMF Working Paper No. 16/60.
- Jacquemot P (2018). L'industrialisation en Afrique en question : Des désillusions a un nouveau volontarisme. *Afrique Contemporaine*. 266: 33.
- Jesus F and A Mehta (2016). Deindustrializ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Economic Letters*, vol. 149: 148-151.
- Jiménez S, Dietzenbacher E, Duarte R and Sánchez-Chiliz J (2022). The geographical and sectoral concentr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vol. 17(3): 370-394.
- Juhász R, Lane N and Rodrik D (2023).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31538.
- Juvenal L and Petrella I (2024). Commodity price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VOXEU columns*. 11 May.
- Kaltenbrunner A and Paineira J (2015).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nging nature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new forms of external vulnerability: The Brazilian experi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9(5):1281–1306.
- Kamran M, Mujica I, Fontañez MB, Newhouse D, Rodriguez C and Weber M (2023). Exploring two years of labor market policy responses to COVID19: A Global Effort to Protect Workers and Job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Knuth S (2018). Breakthroughs for a green economy? Financialization and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41 July.
- Kose M, Nagle P, Ohnsorge F and Sugawara N (2021).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debt? Turning a wave into a tsunami.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vember.
- Kose M and Eswar S (2010). Emerging markets come of ag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47(4): 7-10.
- League of Nations (1923). Report on double taxation submitted to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ssion.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 Lebastard L, Matani M and Serafini R (2023). GVC exporter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ole of supply bottlenecks.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766.
- Lee JW and Hong K (2010)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determinants and prospects. ADB Economic Working Paper No. 22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September.
- Lianos I, Ivanov A and Dennis D (2022). Global food value chains and competition law. BRICS law and Policy Centre. Moscow.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 Lustig N, Pabon VM, Neidhöfer G and Tommasi M (2023). Short and long-run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COVID-19 in Latin America. *Economía LACEA Journal* 22(1): 96–116.
- Mason R (2020).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4(3): 353–402.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0). 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 London.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3). Asia on the cusp of a new era. McKinsey Articles. 22 September.
- Melber H (2017). The African middle class(es) – in the middle of what?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44, No. 151.
- Mesquita YW, Mengatto MF and Nagai RH (2022). Where and how?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icroplastic pollution on beach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AC). *Environment Pollution*. December.
- Mold A (2023). Why South-South trade is already greater than North-North trade—and what it means for Africa. Brookings. 11 December.
- Moreira M, Stein E (2019). Trading promises for results: What global integration can do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Moreira MM, Blyde J, Volpe C, Dolabella M and Marra I (2022). The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hat's in i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D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IDB-WP-01414.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Muda A, Dharsuky A, Asriana N and Ridhani D (2020). Contribution of real estate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 insurance industry activities to the forma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search in World Economy*. 11(3): 192.
- Nassif A, Feijó C and Araújo F (2015).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razil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9(5): 1307–1332.
- Nayyar G, Cruz M and Linghui Z (2018). Does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matter? 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versus services in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596. World Bank
- Nesvetailova A and Palan R (2008). A very north Atlantic credit crunch: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liquidity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2(1): 165–185.
- Nye J (2023).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Project Syndicate*. 1 November.
- Ocampo JA (2017). Commodity-le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lternative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sson from Latin America Gilles Carbonnier.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 Boosting productivity to meet the middle-income challeng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COVID-19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priorities.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8.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Global value chains: efficiency and risk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glesby C (1969). After Vietnam, what? *Commonwealth*. 90(001).
- Oppong P and Soares de Oliveira R (2021). Governing African oil and gas: boom-era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tractive Industries in Society*. 7(4):1163–1170.
- Paik WK, Johnson S and Villavicencio H (2011). East Asian economic models for Chile.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14(1).
- Péclard D, Kernen A and G Khan-Mohammad (2020). Etats d'émergence: Le gouvernement de la croissance et du development en Afriqu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89: 9–27.
- Pilling D (2024). The foreign powers competing to win influence in Africa. *Financial Times*. 22 August.
- Posen A (2021). The interconnected economy: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US economic disparity. Testimony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economic disparity and fairness in growth. Hearing on Globalization. September 28.
- Radelet S (2010). *Emerging Africa*. Brookings. Washington D.C.
- Reuters (2022). Exclusive: under Biden, China has widened trade lead in much of Latin America, June 8.
- Rodrik D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Rodrik D (2015).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0935.
- Rodrik D (2017) Growth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Syndicate. *October 10*.
- Rodrik D (2023) On productivism. HKS working paper No. RWP23-012. March.
- Rodrik D and Stiglitz J (2024). A new growth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 Saad-Filho A (2014). The 'rise of the South': global convergence at last? *New Political Economy*. 19: 4.
- Salimo P, Buur L and Macuane J (2021).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gas: The Sasol natural gas deals in Mozambique. *Extractive Industries in Society*. 7(4): 1219–1229.
- Sawada Y and L Sumulong (2021).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in developing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5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Sawyer M (2013). What is finan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2(4): 5–18.
- Sharma A (2022).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 during COVID-19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using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Resources Policy*. 78:102923.
- Sharma R (2024). A warning from the breakdown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6 May.
- Shaxson N (2019). *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er*. Penguin. London.
- Stampini M, Ibararán P, Rivas C and Robles M (2021). Adaptive, but not by design: cash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DB Technical Notes No. 02346.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Tax Justice Network (2023). The finance curse. Tax Justice Network.
- The Economist (2024). China's economic model retains a dangerous allure. 8 June.
- Tooze A (2018).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Allen Lane. London and New York.
- Tran H (2024). Africa: The centre of the global South. 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
- UNCTAD (2007) Global players from emerging markets: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outward investment. United Nations.



- UNCTAD (2010).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2009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1. II. D.11. New York and Geneva.
- UNCTAD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5. II. D.5. Geneva.
- UNCTAD (201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power, platforms and the free Trade delus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8. II. D.7. Geneva.
- UNCTAD (2020). Unprecedented COVID-19 stimulus packages are not being leveraged to accelerate SDG investment. Geneva. UNCTAD. 11 December.
- UNCTAD (2022).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Africa: The catalytic role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 II. D.31. Geneva.
- UNCTAD (2022b).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 II. D.44. Geneva.
- UNCTAD (202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growth, debt, and climate: realign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Geneva.
- UNCTAD (2024a). Global debt vulnerabilities. Report to G2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Group.
- UNCTAD (2024b). Inequality: major trends, policy challenges and the need for global economic compact. Report for the G20 Framework Working Group.
- United Nations (2023).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78/235. 26 July.
- United Nations (2024).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UN DESA.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3).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1a). Annual report 2021.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1b).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DP.
- Utar H, Torres Ruiz L and Zurita A (2023).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the reloc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o Mexico.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0638. CESifoGroup.
- Van der Zwan N (2014). Making sense of financialization. *Socio-Economic Review*. 12(1): 99–129.
- Van Huellen S and Abubakar F (2021). Potential for upgrading in financialised agri-food chains: The case of Ghanaian cocoa.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33:227–252.
- Van Huellen S, Abubakar F, Asante-Poku N and Fig R (202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cing and price risk in Ghana's cocoa marketing system. GDI Working Paper 2024-074.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Van Lieshout E (2023). Deglobalizati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OECD Trade Policy Paper No. 27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Wade R (2008). The First-World debt crisis of 2007-2010 in global perspective. *Challenge*. 51(4): 23–54.
- Whalen C (2007). The US credit crunch of 2007: A Minsky moment. Public Policy Brief.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 White O, Woetzel J, Smit S, Seong J and Devesa T (2023). The complication of concentration in global trad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Wickizer VD (1951). *Coffee, Tea and Cocoa.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er LS and Zucman G (2022). Global profit shifting, 1975-2019. NBER Working Paper 306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World Bank (202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23). Crisis and recovery: learning from COVID-19's economic imp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4). Better data for better policy. World intangible investment highlights. Geneva.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June.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Beyond production.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3). Global value chain report: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GVCs in turbulent times.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4). 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ril.
- Zakaria F (2008). *The Post American World*. W.W. Norton and Company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第五章

全球南方与国际税收新架构：对发展资金的寻求

当前正在推进的制定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的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使它们得以弥补现行国际金融架构的不足，将国内财政收入来源嵌入本国经济之中。

与依赖双边和有限多边税收协定的现行税收制度不同，该公约旨在为国际税务合作构建一个全球多边框架。

与早前诸多全球税收倡议（如国际货币交易征税方案）不同的是，这项拟议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国际税纳入一套综合治理框架。因此，该公约将同时关注全球商业活动中的贸易与金融两个维度。

公约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应对避税和非法资金流动等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的全球税收平台，提高国际金融诚信和治理水平，这些都是实现有效发展筹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所提出的促进发展的税收架构能否成功、成效如何，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策合作及全球南北对话。



联合国



主要政策启示

- ▶ 尽管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均致力于完善国际税务合作，但前者采取**更具包容性和透明度的方法**，**重点关注并代表全球南方的利益诉求**。
- ▶ 正在推进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谈判及其最终可能通过，将在重塑税务合作未来、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会员国的政治承诺、审慎外交和技术专长是确保该进程成功的关键要素**。
- ▶ **全球出现差异化税制的风险不容忽视**。双重征税和套利空间可能损害国际贸易投资流动，危及国内收入动员能力。这一挑战对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和数字经济企业尤为不利，因为大部分消费者位于发展中国家。
- ▶ 在寻求长期发展资金来源的宏观视野下，全球南方的政策努力应**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不足的根本原因**，包括企业套利、金融化趋势和企业权力集中等问题。



A. 引言



当前全球化进程的转折点凸显了发展中经济体在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增长道路上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随着发达国家财政与贸易政策转向支持国内长期再工业化和气候转型，全球金融市场正日益聚焦私营部门利润最大化(Foroohar, 2024)。

2023至2024年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出现一项重大进展。在尼日利亚和非洲国家集团主导的系列倡议推动下，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12月批准成立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24年启动工作。

这项拟议公约将构建一个新型国际税收架构，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更多收入，遏制它们眼中的大规模利润转移行为。该公约同时关注全球商业活动中的贸易与金融两个维度，有望显著弥补当前国际金融架构的若干不足。其目标是建立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行为的全球税收平台，包括打击避税和非法资金流动，提升国际金融诚信和治理水平，这些都是实现有效发展筹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本章探讨该税收公约在可持续融资议程中的潜在作用。B节梳理了寻求长期发展资金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坐标，重点阐述贸发会议关于构建顾及发展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讨论国内收入动员面临的挑战。C节探讨税收公约在保障长期发展融资中的作用。D节分析了联合国以及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进程下的现有提议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潜在效益和挑战。E节为本章结论。

拟议框架公约同时
关注全球商业活动
的贸易和金融两个
维度。



B. 寻求长期发展资金来源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布雷顿森林机构在战后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卓越的制度设计” (Rodrik, 2011)。当下，面对生产、贸易、金融、技术和气候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重新定位全球南方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就要对全球经济的若干维度进行制度重构。这项改革应以包容性、南北对话协商、保障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等核心原则为指引。其中，解决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权不足问题，是贯穿这三重关切的重中之重。

疫情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危机已严重阻滞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就目标1消除贫困而言，2020年极端贫困人口攀升至7.24亿，较疫情前预测值增加9,000万，减贫进程倒退约三年。按当前趋势推算，到2030年仍将有5.75亿人深陷极端贫困，仅约三分之一国家能实现本国贫困水平减半目标。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亟需外部支持，包括通过多边行动重塑可助力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金融架构。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艰难的政策权衡：能源价格高企，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激增，保护主义抬头叠加第三章讨论的地缘经济变局导致国际贸易受限，这些复杂交织的危机形成叠加压力。目前仍有54个发展中国家因无信用评级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而拥有评级的国家中也仅有少数达到投资级。非洲与拉美地区有58个国家拥有评级。2019年有11个获投资级评级，到2023年降至8个。全体发展中国家范围内，仅22个国家拥有投资级评级。高昂的融资成本、波动剧烈的外部私人资金，以及可负担公共融资渠道的匮乏，加剧了本就滞后的发展筹资困境(参见第二章)。

随着债务压力有可能演变为全球南方的发展危机，改革国际债务架构的紧迫性持续升高。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现行机制已显不足，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迫切性愈发强烈(图五.1)。全球南方政策制定者还需考虑全球金融安全网内部的代表权和贷款能力等问题(插图五.1)。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性正随着债务危机向发展危机演化的风险而持续加剧。



插文五.1 危机时期的区域和双边措施

全球金融安全网发挥着支持各国应对重大冲击和危机的关键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该网络已较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间扩容十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预防能力。

全球金融安全网中一个逐步演变的要素是区域融资安排，此类安排以优惠条件提供紧急短期流动性和外汇支持，且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要求的紧缩措施及不受欢迎的顺周期性条件限制。部分区域安排还提供了治理结构和公平投票权上的平等，这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尚未实现。

2019至2020年间，区域融资安排向成员发放贷款逾50亿美元，数额庞大。诸多案例表明，这类安排被视为“首选方案”，与全球机构的“最后手段”形成互补(Barrowclough et al., 2022; UNCTAD, 2022)。但即便如此，而且尽管区域安排的能力已经扩大，其资源在疫情期间仍然基本没有得到利用。它们向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Hawkins and Prates, 2021; Mühlich and Fritz, 2021; Mühlich et al., 2020, 2022)提供的支持也较为不均(UNCTAD, 2022)。

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已成为迅速崛起的新型融资工具，新冠危机期间已广泛使用，规模达1.5万亿美元。提供互换的央行范围广泛，包括不丹、印度、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卡塔尔和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央行。但发展中国家央行安排的互换规模远小于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互换安排，也不及澳大利亚、日本、瑞典、瑞士和英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的安排。

过度依赖双边互换的隐患在疫情前一年已现端倪，引起人们的担忧(Mühlich et al., 2022; UNCTAD, 2022; Barrowclough et al., 2022)，因为其其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影响尚不明朗。此类互换虽然看似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来源，但实际上缺乏全球或区域多边贷款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等众多优势。互换是两国间抱团的一种极端形式，不同于处于区域或国际融资安排核心位置的“俱乐部式”多国协定。双边机制从定义到设计都具有任意性，缺乏标准化操作或规程，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分布既不透明也不均衡。

国际货币基金仍是全球最后可以依靠的贷款人，疫情冲击期间提供了超过1,190亿美元的贷款(Mühlich et al., 2024)。尽管改革该组织份额制度的呼声不断，但近期第十六次份额总审查既未实现贷款能力的净增长，这套制度也未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以及经济人口比重重新调整。虽然份额增加了50%，但包括新借款安排在内的其他融资来源被相应缩减，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贷款能力未获提升。

资料来源：Barrowclough et al. (2022); UNCTAD (2022); Hawkins and Prates (2021); Mühlich et al. (2020, 2022, 2024); Mühlich and Fritz (2021)。

及时灵活的流动性、债务减免、主权债务重组、扩容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扩展多边开发银行贷款范围，仍是发展筹资多边议程的顶级优先事项。这些内容在贸发会议关于构建顾及发展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中处于核心位置(表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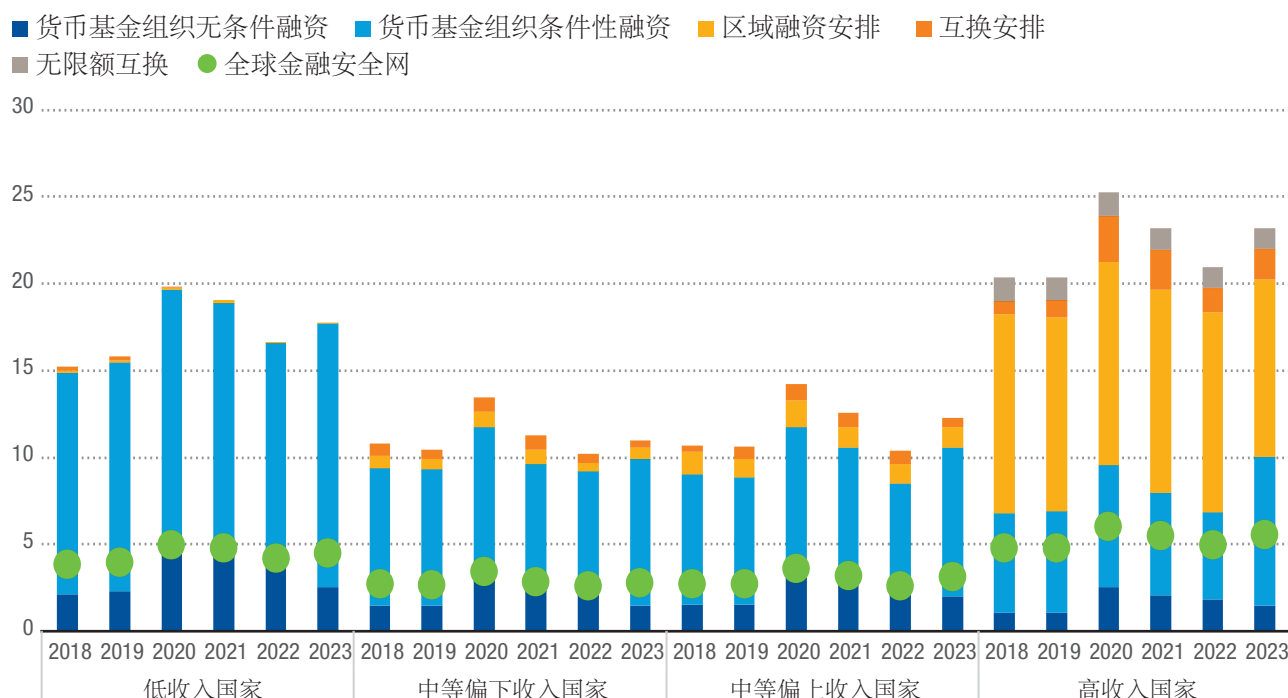
尤为关键的是，上述改革须与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民主化进程协同推进；尽管过去二十年有所改善，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仍显不足(图五.2)。³⁶ 除这些紧迫任务外，长期发展筹资还需建立在有效、协同的收入动员机制的基础之上。

长期发展筹资需建立在有效的收入动员机制的基础之上。

图五.1

在全球金融安全网获取危机融资的机会不平等

按国家收入组别分列的融资安排获取情况
(GDP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金融安全网追踪数据库中的数据整理，可查阅<https://www.bu.edu/gdp/global-financial-safety-net-tracker/>。该数据库由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柏林自由大学和贸发会议联合创建，系首个全球交互式数据，可测量货币基金组织、各国央行及区域融资协议的年度贷款能力，并统计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区域融资协议和货币互换等抗疫融资的总额。

注：绿色圆点表示各单项的平均值。

³⁶ 在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展中国家的总投票权从2000年的38%增加到了43%。这意味着在24年间增长了约15个百分点。虽然这一比例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约40%的占比，但仅为其人口占比的一半。在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等按一国一票原则安排投票的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60%至75%。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对其有利，也不能说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方向总是一致。各国的利益可能差异很大，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

表五.1
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

贸发会议的提案	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6建议的相关行动
机构改革	行动1: 转变国际金融机构治理 行动2: 设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最高机构，以系统地加强国际体系的一致性
流动性 1965年: 与援助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 1971年: 成立二十四国集团	行动10: 加大流动性供给，拓宽金融安全网 行动11: 应对资本市场波动
投资 1964年: 多边利息平准基金(霍罗威茨提案) 1965年: 与援助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 1970年: 官方发展援助目标设定为国民总收入0.7% 1971年: 确定最不发达国家的定义 2014年: 支持南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	行动5: 大规模增加发展贷款，改善贷款条款 行动6: 改变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的业务模式，注重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更加有效地利用私人融资，增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行动7: 大幅增加气候融资，同时确保额外性 行动8: 更加有效地利用开发银行系统，增加贷款并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行动9: 确保最贫穷者能继续享受多边开发银行系统带来的好处
债务 1980年: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商定需要建立公正的主权债务机制 1983年: 创建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 2012年: 促进负责任的主权放款和借款原则 2014–2015年: 联大决议设立主权债务重组进程问题特设委员会，界定基本原则	行动3: 减少债务风险，加强主权债务市场，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4: 分两步加强债务危机解决办法：设立债务解决机制，以支持《共同框架》，并在中期内设立主权债务管理机构
金融-企业关联 1967年: 联大决议设立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 1975–1993年: 建立跨国公司中心	行动12: 加强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更好地管理风险，控制过度杠杆 行动13: 提高企业的可持续性，减少洗绿现象 行动14: 加强全球金融诚信标准 行动15: 加强全球税务规范，通过切合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和能力的方式，经由包容性进程，应对数字化和全球化。 行动16: 改进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中列出的支柱二，减少浪费性税收激励，同时更好地为来源国征税提供激励 行动17: 创建惠及所有国家的全球税务透明度和信息共享框架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文件(United Nations, 2023a)整理，该文件包含更详细的次级行动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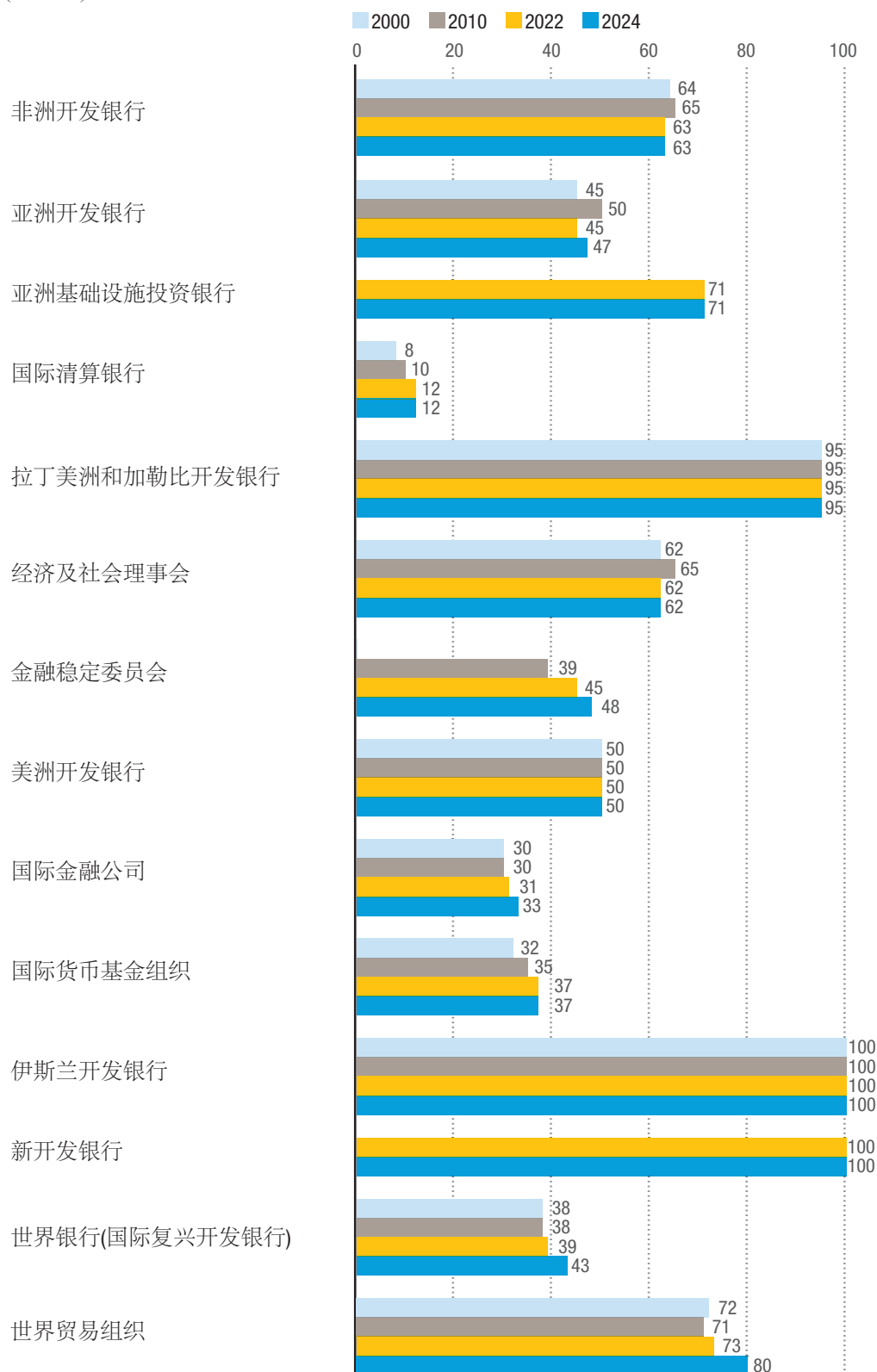
注：黄色标注表示应对气候和环境可持续性跨领域挑战的行动和/或次级行动。

图五.2

主要经济治理机构中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仅小幅变化

按年份和机构分列的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占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各机构官网数据整理。

国际税收体系为企业 提供巨大的套利 机会，滋长逃税避 税行为。

鉴于外部资金的制约和成本，通过税收等渠道动员国内收入仍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可持续性的筹资来源。³⁷ 这一进程是建设国家能力、维系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杠杆，使政府能够进行必要的投资而不必依赖外部资金。《2030年议程》便包括如下目标：“通过向较低收入国家提供国际支持等方式，以改善国内征税和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加强筹集国内资源” (Garcia-Bernardo and Janský, 2024)。

发展中国家国内融资不足严重制约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各项进程推进。多数专家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至少达到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基准线，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这一门槛。特别是在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税基狭窄、能力受限、影子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占比过高及治理挑战等因素，共同导致国内资源调动水平低下。

双重征税协定中的 议价地位不对等使 众多发展中国家在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活动面前十分 脆弱。

发展中国家因国内资源调动困境难以从跨境收入流动获取可观税收，同时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与其需求脱节，制约其在全球化数字经济中拓展收入来源的能力。税务机关往往缺乏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挑战的必要工具和技术能力(如数据、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

此外，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双重征税协定数量较少。即便有涉及发达国家的这类协定，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条约谈判代表的谈判能力有限且议价地位不对等，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跨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活动时显得尤为脆弱。

现行国际税收体系为跨国企业创造了巨大的跨境套利空间。此类行为虽被企业及其国际税务顾问视为合乎道德且合法的税收筹划，但发展中国家及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些行为不道德也不合法。发展中国家税务机关尤为关切的是跨国企业的“越线”行为，从合法监管套利转向税务不法行为 (Eden and Smith, 2022)。与此同时，避税港和金融枢纽架构的数量激增且日益复杂，也助长了跨国企业的全球利润转移行为 (UNCTAD, 2022)。

关于发展中国家因避税行为所蒙受税收损失数额的估算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够全面。尽管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贸发会议 (UNCTAD, 2020) 提出的概念框架有助于厘清犯罪相关非法资金流动与定价偏差的界定问题，但原始数据可得性导致的计量难题依然存在，部分测算方法仍待验证和完善。

总体而言，近期估算表明全球利润转移严重削弱了国内资源调动，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冲击尤甚。例如，Wier 和 Zucman 估算 2015-2019 年间跨国企业近 40% 的利润登记于避税港；利润转移导致全球企业所得税收入减少 10%，实际有效税率下降三分之一 (Wier and Zucman, 2022)。Chiari (2024) 测算显示，按全球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计算，2019 年全球税收损失达 4,800 亿美元，按有效税率计算则高达 6,000 亿美元。

近期对现有案例研究的回顾表明，跨国企业将最高达 40% (约 6,000 亿至 1.1 万亿美元) 的境外利润转移至百慕

³⁷ 关于建设税收能力促进发展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扩大税基、改善机构以及开展国际合作、对跨国企业利润征税，将显著提高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动员能力 (参见 Benitez et al., 2023)。

大、荷兰王国、瑞士等中转国。虽然美国在利润转移的绝对损失额上首当其冲，但法国、德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以这种方式损失的利润基础也高达一半(Clausing, 2016; Torslov et al., 2023)。

较低收入国家即便在绝对值上损失的收入较少，但就相对值而言，它们因利润转移损失的税收在其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却更高。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较低收入国家中尤为突出，它们流失的税收收入相对于税收总收入而言更高。非洲经济体税收流失比例远超平均水平。总体而言，仅有极少数国家能从中创造税收收入(Garcia-Bernardo and Janský, 2024)。

企业套利，即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司法管辖区制度差异实施的战略操作，加剧了收入动员、企业问责与透明度的困境。现代企业套利手段范围广且多种多样，涵盖监管套利、信息披露套利、税收套利和会计套利。通过责任规避技巧，跨国企业得以摆脱社会和环境责任，将外部冲击和危机的成本转嫁给最脆弱国家(Baines and Hager, 2021; Palan et al., 2023; UNCTAD, 2024)。此外，企业套利行为使企业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足迹降至最低。一项近期研究发现，世界百强非金融跨国企业在全球南方的子公司

中，四分之一未开展明显的相关经济活动(UNCTAD, 2022)。

非法资金流动进一步加剧全球南方国家的收入动员挑战。贸发会议正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试点研究表明，采掘业通过进出口伪报和利润转移成为非法资金流动的重灾区(表五.2)。典型案例包括布基纳法索的饮料、石油和矿石行业，南非的贵金属宝石和电机行业。布基纳法索发现黄金业与瑞士和乌干达的交易涉及非法资金流动。尼日利亚审查了石油行业中的利润转移现象，暴露出流向避税港的资金。初步估算显示非法资金流动规模可达官方记录贸易额的一半。

面对上述挑战，发展中国家长期呼吁建立一套以联合国为核心、体现国家平等地位的国际税务合作机制。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税务合作被视为提升国内资源调动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拟议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视为国际金融体系再平衡、提升其公平性进程的一部分。

这项拟议公约是构建全球多边税收合作框架的首次尝试。现行税收架构依赖双边及有限多边协定。相较于早前诸多全球税收倡议(如国际货币交易征税方案)，这项拟议的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国际税收入入一套综合框架。

采掘业通过进出口伪报和利润转移成为非法资金流动的重灾区。

较低收入国家因利润转移蒙受的损失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更大。



表五.2

初步估算显示部分经济体的非法资金流动规模可达官方贸易额的50%
部分非洲国家涉税和商业非法资金流动(流入和流出)的非正式初步估算

国家	覆盖年份	时间长度 (年数)	估算方法	涉税和商业非法资金流动 与官方贸易额之比 (百分比, 年均值)
 加纳	2000–2012	13	PCM+ 和 PFM+	5.1
 布基纳法索	2011–2020	10	PCM+	10.5
 赞比亚	2012–2020	9	PCM	30.2
 南非	2017	1	PCM+	32.7
 加蓬	2010–2021	12	PCM+ 和 PFM+	50.5
 纳米比亚	2018–2020	3	PFM+	57.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资料(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23) 整理。

注：本表呈现2021-2022年国家试点项目的非正式初步估算结果，采用不同方法测算进出口伪报导致的涉税和商业非法资金流动。各国主管机关未来可能进一步修正、扩展相关数据。估算方法包括：伙伴国法加强版(PCM+)和价格过滤器法加强版(PFM+)。有关追踪非法资金流动努力的详情，参见贸发会议《可持续发展目标脉搏》报告，可查阅：<https://sdgpulse.unctad.org/illicit-financial-flows/>。



C. 全球南方与建立国际税收架构的呼声

过去六十余年间，由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经合组织始终主导着各国对跨国企业的征税规则的制定。现行规则通过数百项双边税收协定(通常称为双重征税协定)在各国间分配利润。这些协定基于复杂的居住国与税源国原则划分征税权，并依据独立交易原则核定关联企业间交易价格。³⁸ 这种以双重征税协定网络管理国际税收关系的模式源自1920年代国际联盟的工作(League of Nations, 1923)。

1960-197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贸发会议以及“77国集团和中国”尤其成为这一诉求的核心讨论平台。1960年代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税务条约特设专家组的成立即源于此背景下的辩论。³⁹

对双重征税协定的批评声音，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批评为数众多。第一，人们认为这些协定侧重防止利润在居住国和税源国被双重征税，却不

重视防范双重不征税，即企业通过逃税和激进避税手段在居住国或税源国规避纳税。

第二，许多人认为协定偏袒资本输出国(居住国)，损害资本输入国(税源国)利益。⁴⁰ 第三，这类协定条款的繁复性催生大量税收漏洞，助长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总体而言，尽管防止双重征税的总体原则具有合理性，但发达经济体始终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此类协定并未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驱动因素。

过去25年间，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国际税务合作。随着资本输出国从全球征税制转向属地征税制，各国税率及税基差异为复杂税收筹划创造大量空间。在漏洞百出的国际税收架构下，跨国企业通过激进利润转移策略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和投资枢纽。贸发会议(UNCTAD, 2015)研究显示，避税

双重征税协定无法防范双重不征税，并且偏袒资本输出国。

³⁸ 从历史上看，税源国和居住国原则决定了哪一国家(母国或东道国)拥有对跨国企业各种收入流(如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的优先征税权。当两国均主张征税权时(例如对境外子公司利润征税)，“第一征税权”原则赋予东道国优先征税的权利，而母国(若选择对境外来源收入征税)则需通过外国税收抵免或扣除方式让渡征税空间。独立交易原则确保关联方交易和活动的定价基于独立企业在相同或类似事实和情况下达成的交易条件。参见Eden(1998)第2章。

³⁹ 1967年8月4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273(XLIII)号决议。正如该小组的名称所示，其重点仍然是通过双重征税协定管理的国际税收体系。自2004年11月11日起，该小组更名为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联合国税务委员会)。

⁴⁰ 人们通常假设净资本输出国为发达国家，净资本输入国为发展中国家。然而，在21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双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无论是从存量还是流量的角度来看，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净资本输入国。尽管如此，在考虑两国之间的流量和存量时，除某些例外情况(如投资枢纽或避税港)，净资本输出国通常是更为发达的经济体。Eyitayo-Oyesode(2020)认为，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中的若干条款倾向于居民国征税权，因此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港和离岸金融枢纽激增助推了合法及非法的资本流动。

此外，数字跨国企业数量的增长与“工业4.0”催生出依托自动化数字服务、

交易以及高度流动资本构建的“无实体规模经济”。这为利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漏洞开辟出新的路径(插文五.2)。



插文五.2

经合组织及双支柱进程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各国政府认知的转折点，即遏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需多边而非双边合作(Mason, 2020)。

随后，经合组织2012-2015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提出了15项行动项目，以填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主要漏洞。设计这些措施的部分目的是推动双重征税协定从单纯防范双重征税转向消除双重不征税。相关改动包括引入国别报告制度及一项新的多边税收文书——《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该文书的目的是与一国现行的双重征税协定同时适用并对之进行修改，允许签署国采纳相关行动项目而无需重谈协定，但美国等多国未签署该公约，且许多签署国选择退出关键条款^a。

经合组织将数字经济征税(行动项目1)留待后续研究，但新冠疫情延缓了进程。通过第二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中的包容性框架进程^b，经合组织及包容性框架进程成员提议用完全不同的新规则替代或覆盖现行国际税收规则。“双支柱进程”包括：对全球百强跨国企业利润课征新税(支柱一金额A)，对几乎所有跨国企业实行新的15%全球最低利润税率(支柱二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模板)。^c

新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且多数未经实践检验。尽管部分国家已着手实施最低税率规则，但尚未就支柱一达成共识，对其的批评集中在其复杂性、违背独立交易原则等现行国际税收原则、对发展中国家裨益不

^a 当前的签署情况参见经合组织多边税收文书数据库：<https://www.oecd.org/tax/treaties/mli-matching-database.htm>。

^b 包容性框架系经合组织为弥补“民主赤字”吸纳非成员国、达成对这些规则协商一致的一项努力，但批评人士认为该框架基本上围绕经合组织设定的一套菜单展开，问题重重。多数(但非全部)发展中国家都是该框架的成员。参见：<https://www.oecd.org/en/topics/policy-issues/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beps.html>。

^c 例如，支柱一以全球公式分配法取代独立交易原则；见Eden, 2022。另一个例子是支柱二的收入纳入规则，该规则优先赋予居住国对纳税不足的利润征收补足税的权利，而不是遵循“第一征税权”原则。虽有后来加入了本国补足税且可抵免收入纳入规则，但对本国补足税的限制仍有利于居住国。



插文五.2 经合组织及双支柱进程

足以及未能充分解决数字经济征税问题等方面。加之拟议的经合组织多边公约需满足较高的批准门槛^d，公约获得通过以执行支柱一的前景渺茫。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第二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进程持怀疑态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非经合组织成员且认为该进程事不关己。^e

资料来源：Mason (2020)。

^d 公约需至少30个国家批准，且这些国家须覆盖支柱一范围内跨国企业最终母公司实体的约60%。参见：<https://www.oecd.org/en/topics/sub-issues/reallocation-of-taxing-rights-to-market-jurisdiction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amount-a-of-pillar-one.html>。

^e 关于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进程的有效性和包容性问题的评论，另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报告(A/78/235)。

D. 发展中国家力推联合国主导的税收公约

随着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一个允许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税收决策的进程，对现行国际税收体系的不满与日俱增。早在2012年，77国集团和中国在倡议团体支持下就尝试启动联合国政府间税收谈判进程，但成效有限。⁴¹多年来，非洲国家集团一直在倡导制定一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税收公约，联合国税务委员会定期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行国际税务合作特别会议。⁴²

关键节点出现在2015年，发展中国家提议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设立一个联合国税务合作机构。⁴³尽管该提议未获采纳，但联合国同意推进国际税务合作方面的努力。2022年10月，非洲国家集团提交了一份关于非法资金流动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草案，其中建议建立一个联合国政府间税务机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提出了制定框架公约的初步构想。⁴⁴

⁴¹ 参阅由民间社会发展筹资机制编制的数据库中的发展中国家声明清单，这些声明呼吁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税收合作进程，可查阅：<https://csosforffd.org/post/database-governments-supporting-an-intergovernmental-un-tax-body-and-or-un-tax-convention/>。77国集团和中国2012年的声明可查阅：<http://www.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120727>。

⁴² 特别会议至少可追溯到2019年，见<https://financing.desa.un.org/ecosoc-special-meeti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tax-matters>。

⁴³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可查阅<https://sdgs.un.org/documents/ares69313-addis-ababa-action-agenda-thi-21093>。

⁴⁴ 关于框架公约的两项早期提案，见Chowdhary and Picciotto (2021); Ryding (2022)。

转折点出现在非洲国家集团修订提案后，联大于2022年11月23日未经表决通过了第77/244号决议。⁴⁵ 决议请秘书长概述今后可能采取的加强国际税务合作的包容性和效力的步骤，并征集成员国及利益相关方意见。会员国、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智库和工商界提交了多份材料。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 2023)和国际税收与发展研究中心(Cadzow et al., 2023)等机构编写了相关报告。⁴⁶

联合国秘书长发布报告指出，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下的双支柱进程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强调必须实现包容性，确保所有国家能够参与议程制定、谈判和决策过程(United Nations, 2023)。该报告提出，决策程序应保持透明，并为提案审议及立场准备留足时间。报告进一步列出并讨

论了联合国推进国际税务合作的三种备选方案：设立一个开展非约束性讨论的论坛、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公约及若干议定书，或缔结一项全面的法律协定。报告还呼吁外部利益攸关方提出意见。

在2023年11月15日的联大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非洲国家集团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建议采用第二个备选方案，即制定一项框架公约及若干议定书，同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公约的权限范围。

第78/230号决议于2023年12月22日以111票赞成、46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投了赞成票，而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集体反对。⁴⁷ 决议设立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由一名主席、18名



©2024 Adobe Stock_Milna Creative

⁴⁵ 见联合国大会关于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第77/244号决议。
⁴⁶ 国际财政文献局的报告建议调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最低标准、简化其他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建议、改进双支柱解决方案等，本质上是在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进程内开展工作。国际税收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则侧重于参与国的能力限制及其他组织问题。
⁴⁷ 见联合国大会关于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第78/230号决议。

副主席及一名报告员组成，联合国五大区域组各推出4名成员任职。决议要求委员会同步制定若干具体优先领域的议定书，如涉税非法资金流动、跨境数字服务征税等，并于2024年8月前完成权限范围起草，连同一份报告一并提交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审议。⁴⁸ 第78/230号决议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收到了广泛而迥异的公众评论。⁴⁹

1. 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

框架公约为国际法律制定提供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有益做法，各国政府先就特定议题建立一个总体治理体系，继而通过若干议定书细化具体承诺和体制安排(Bodansky and WHO, 1991)。实际上，框架公约构建出一个“伞形结构”或“框架”，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包含目标、原则及治理结构等核心要素，并通过选择性加入及退出条款指导各类议定书。拟议的税收框架公约遵循类似思路制订。

根据2024年6月和7月起草的公约权限范围草案，五大优先领域被确定为

制订早期议定书的方向：数字化和全球化经济征税、跨境服务所得征税、涉税非法资金流动、预防与解决税务争端、高净值个人征税。另外列出四项今后制订议定书的潜在议题领域：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的税收措施、为税务目的交换信息、税收事项行政互助、有害税收做法。

2024年8月通过的最终权限范围将早期议定书清单缩减至两项，均来自原清单：跨境服务所得征税以及待确定的另一优先领域，其他潜在领域维持不变。公约通过的期限延至2027年，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将继续定期召开会议。权限范围草案以110票赞成、8票反对、44票弃权的非正式计票结果获得通过。⁵⁰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益处

众多发展中国家将拟议的税收框架公约视为其战略的一部分，从而突破与发达国家谈判中的能力和经济发展不对称，从国际贸易投资流动中获取它们眼中的应得的公平收入份额。若结合联合国税务委员会当前的工作一

⁴⁸ 联合国税务委员会独立于起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权限范围特设委员会运作。前者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多名成员现在也代表本国政府参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⁴⁹ 关于第78/230号决议的更多信息，见 <https://financing.desa.un.org/un-tax-convention/inputs>。

⁵⁰ 见 Travers (2024)。正式计票结果于2024年9月27日公布。8张反对票来自“五眼联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以及以色列、日本和大韩民国。大多数西欧国家从2023年12月对第78/230号决议投反对票，转变为2024年8月对权限范围草案投弃权票。

框架公约有助于构建一套更公平、更包容的国际税收制度。

并考虑，⁵¹ 该公约有望整合现有国际税收关系和指南，使以往工作的益处在新框架下得以保留。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构建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税收制度的契机，借由这种制度，发展中国家可破解能力建设和治理挑战。

经合组织也提供某些关于政策问题的援助，并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提供税收征管能力建设，但许多观察家认为经合组织忽视税收的发展维度，往往过度聚焦技术细节问题。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经合组织的包容性框架本质上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论坛。虽然在数字经济征税等共同关切议题上存在交集，但视角和方法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还采用不同方法应对非法资金流动问题，而国内资源动员对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而言并非一个紧迫事项。现有“竞争性框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没有得到充分的知情同意，并且受双边关系动态调整的影响。

评估拟议框架公约的有效性，尤其关注新规范为发展中国家预想的政策空间时，需考量以下因素：

- **包容性和代表性。** 联合国框架公约致力于提高包容性，赋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话语权；而经合组织的双支柱进程被诟病为受经合组织成员国主导。包容性是建立更

公平、更民主、更有效的全球税收体系的必要前提。

- **决策进程。** 联合国框架公约可能采用联合国会员国多数表决制，有利于某些措施的采纳。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虽名义上寻求协商一致决策，但在难以协商一致时仍强势推进（比如在关于支柱一的拟议多边公约的问题上）。
- **范围和重点。** 联合国路径的目的是更聚焦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问题，例如对跨境服务利润征税以及强化税源国征税；这些议题在双支柱进程中鲜少被关注。以自动化数字服务利润征税为例，这曾是支柱一原始提案的一部分，但随后被调整为针对约100家跨国企业的征税方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联合国税务委员会提议在《联合国税收公约范本》中新增一个条款，允许来源国对数字服务总利润征收预提税。⁵²
- **透明度。** 联合国谈判进程透明度更高，会议实况直播并向观察员开放。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谈判传统上更为保密。特设委员会建立了观察员参与机制，允许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学术机构、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参与权限范围制定工作。观察员不参加经合组织的包容性框架会议，仅通过单独磋商参与。

⁵¹ 框架公约的谈判机构将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虽然它与联合国税务委员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可能会出现重叠，例如在所谓的快速通道工具以及关于转让定价、碳税、采掘业税收等方面的全面技术指导方面。见联合国税务委员会的网站：<https://financing.desa.un.org/what-we-do/ECOSOC/tax-committee/tax-committee-home>。

⁵² 2024年8月的权限范围草案将数字服务征税列为拟议税收框架公约下要制订的第一项议定书。

- **合法性与规范制定。**支持者强调，联合国通过政府间进程统筹考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需求，在集体拟订规范方面具有独特的合法性。这一点被视为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技术性指导。
- **弥补现行体系缺陷。**倡导者指出，当前经合组织主导的努力未能避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也未能处理数字经济问题。他们主张亟需一个联合国框架以应对数字经济的各种问题并提升发展筹资效能。联合国主导的路径还可恢复“第一征税权”等国际税收基本原则。
- **与更广泛目标挂钩。**支持者强调联合国税收公约可将国际税收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权与环境保护等其他承诺直接挂钩。
- **灵活性和渐进路径。**支持者强调，框架公约模式支持分步推进，在确立核心目标和机制的同时，允许该制度随时间推移全面完善。在公约的“伞形结构”下可制定多项议定书，处理非法资金流动等具体议题。
- **构建进步联盟的潜力。**联合国进程有望促成跨越传统鸿沟的新联盟：例如，让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吸引外资的小型开放型经合组织成员国联合起来。双方在税源国优先征税以及有必要对资本流出征收预提税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
- **法律约束力。**框架公约将具有法律约束力，可提供比现有安排更正式且可执行的架构。
-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税务公约的权限范围中有相关规定，可以纳入增强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动员能力、建设税收能力的机制。
- **更关注国家主权关切。**公约可设立一个双轨机制，类似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第四部分，降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水平。此外，公约还可引入类似《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优惠贸易安排的“快速通道”机制，允许志同道合的国家深化双边或区域税收一体化，前提是不对公约其他签署方造成不当损害。

3. 制定税务框架公约的关键挑战

联合国在制定税务框架公约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⁵³ 一些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如对2024年8月的权限范围投反对票的8个国家，抵制制定雄心勃勃的框架公约，主张维持经合组织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它们主张现行机制已足够充分，担忧联合国主导的进程可能使力量平衡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可能制定出更不利于发达经济体利益的规则。⁵⁴

⁵³ 其中一些挑战见 Choudhury (2024)。

⁵⁴ 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从对第 78/230 号决议投“反对”票，转变为对 2024 年 8 月的权限范围草案投“弃权”票，这表明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可能看到了由联合国主导进程的潜在益处。例如，对于主要是资本输入国的国家而言，情况可能如此。

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与联合国进程的分歧体现在以下领域：

- **范围和重点。**人们对公约应处理哪些问题的看法各异。经合组织国家倾向于聚焦争议较小的议题，而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将所有相关议题纳入公约，即便这些议题先前在其他论坛已有讨论。
- **可能重复工作。**批评者认为，联合国主导的进程将重复经合组织自1960年代初以来作为国际税收合作主要平台已做的工作。经合组织已制定多项综合性框架和指南(如首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工作下的多边公约)，并且已在全球实施。然而，联合国公约的支持者强调，这是首次在真正普遍包容的平台上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税务合作框架，此类重复并不存在。他们认为，联合国进程将利用现有优势，弥补国际税收体系的缺陷和不足，而非复制既有进程。
- **规则碎片化风险。**批评者警告，联合国涉足其他国际组织已处理的议题可能导致重复工作以及框架并行，例如分别由经合组织与联合国主导的机制并存，这将割裂国际税收规则。这种局面不仅会增加跨国企业的合规负担，还可能引发税收政策的不一致。另一方面，支持者认为，联合国进程将构建一个更具协调性的整体系统，整合并发扬其

他论坛的现有成果。此外，发展中国家强调，将本国资源用于何处事关国家主权。

- **资源分配。**反对者认为建立一套新框架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用于其他领域可能更好。他们的论点是，参与另一个多边论坛的财政和行政负担会分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其他关键倡议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在联合国谈判的优势在于各国常驻代表团可以协助谈判。
- **复杂性和低效问题。**另一项批评认为，联合国进程可能加剧国际税收治理的复杂性与低效性。尽管经合组织基于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有时进展缓慢且常受大国主导，但相较于联合国仍被视为更加简洁。然而支持者反驳称，联合国进程更可能制定更简化的方案，更易于执行，也适配资源较少的国家和情况。
- **专业能力关切。**对框架公约的批评者认为，经合组织在国际税收政策领域拥有数十年经验，而联合国的专业能力相对有限。经合组织的成熟经验使其更擅于处理复杂税收问题。然而支持者指出，联合国税务委员会及其众多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虽以个人身份履职，但主要来自各国税务和财政部门。因此，联合国已具备雄厚的专业能力，其国际税收专家长年协作处理复杂国际

税务议题，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 **平衡各方利益。**联合国必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协调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以创建一个可接受的框架。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在税收问题上达成共识本身就困难重重。一些人认为，联合国包容各方的方法可能会使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涉及更多具有不同优先事项的利益相关方。然而，如果联合国能够平衡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国际税收架构的稳定性应会提高，这将使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受益。基于联合国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更具合法性，取的更大成功。

4. 总结：有两条前进道路

支持者认为，拟议的框架公约是解决全球税收治理中长期问题的必要、包容且具有潜在变革性的方法，而现有机构和进程都未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尽管经合组织和联合国都致力于改善国际税务合作，但后者提供了一个更包容和透明的进程，重点关注并代表全球南方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税收政策规范方面的传统分歧仍在延续，不过当前已进入制度化平台。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政府间讨论可能实

现更高包容性，议题优先次序和议程设置将比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进程吸纳更多元的声音和辩论。经合组织秘书处在包容性框架进程中产出文件的效率和速度令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时间或资源去审读，只能“照单全收”。联合国大会和特设委员会2024年会议讨论进程显示，联合国进程推进得更缓慢，预留了更充分审议时间。因此，尽管该进程可能耗时较长且显繁琐，但从发展中国家视角看，新规范获得广泛接受的可能性更大。

当前谈判进程凸显联合国会员国在若干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见，因发达国家长期偏好利用经合组织平台开展全球税收架构对话。克服这些挑战需要会员国开展审慎的外交、达成妥协并且致力于共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税务合作体系。鉴于当前全球贸易和金融领域的紧张局势，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考量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此前税收领域的对话从未考虑到此类因素。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立场将成为关键因素。其中部分国家已是主要资本输出国，另一些国家则开始见证本土企业寻求海外投资机遇。在全球化当前的转折点上，这类替代性资本来源的重要性可能持续提升。

随着金砖国家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间、以及此类国家向发展中世界其他

虽然联合国进程可能耗时较长，但新规范获得普遍接受的可能性更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税收政策规范方面的分歧已进入制度化平台。

联合国税务谈判的关键因素在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立场。

双重征税和套利风险可能危及国内资源动员。

地区的贸易投资流动增长，由资本流动双方国家共同商定的税收框架将更具现实意义。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和南非在联合国工作中积极为全球南方发声。巴西在特定领域中贡献卓著。

税务框架公约的制定将对全球税收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可能重塑未来数十年的国际税收政策与实践。正在进行的谈判及公约预期的最终通过(包括同期和后续制定的议定书)，将在塑造国际税务合作未来、改革金融架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风险亦不容忽视。若形成不同制度并行格局，即多数国家税务关系受联合

国公约约束，而经合组织国家及其他部分高收入国家继续奉行双支柱方案，将产生重大挑战。双重征税风险和套利机会可能影响全球贸易投资流动，危及国内资源动员的重要考量。

这对于面向消费者的数字经济企业尤为突出，因为主要消费群体位于发展中国家。例如经合组织支柱一金额A方案不仅旨在取代数字服务税，更对继续实施该税种的国家施以惩罚。而联合国框架公约可能纳入对数字服务的税源国征税权。两种数字服务税制并存，或将导致跨国企业利润被双重征税，进而抑制外国直接投资。

E. 结论

拟议的税务框架公约从发展的角度处理税收问题，具有弥补当前全球贸易和金融治理不足的极大潜力。这为缩小国际金融架构中的不对等、将国内收入动员机制嵌入发展中国家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

新税收架构能否成功、成效如何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合作、对联合国体系内专业技术知识和网络的运用能力，以及建设性的全球南北对话。

在前文讨论的其他改革措施的支持下，该公约可推动构建更顾及发展的国际金融架构。

在寻求长期发展资金来源的过程中，这项倡议要想取得成功，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努力还需聚焦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不足的根本原因，包括企业套利、金融化趋势及企业权力集中等问题。

参考文献

- Baines J and Hager S (2021). Commodity traders in a storm: Financialization, corporate power and ecological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9:4.
- Barrowclough D, Kozul-Wright R, Kring WN et al., eds. (2022). *South–South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Collaboration Towards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Basingstoke.
- Benitez JC, Mansour M, Pecho M et al. (2023). Building tax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2023/0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odansky D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protocol approach. Technical Briefing Paper 1. WHO/NCD/TFI/99.
- Cadzow L, Hearson M, Heitmüller F et al. (2023).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Views from the global South. ICTD Working Paper 17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Chiari A (2024). Revenue losses from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stimates from the UNU WIDER Government Revenue Datase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8:600–629.
- Choudhury H (2024). United Nations makes progress toward a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Tax Notes International*. 114:1903–1906.
- Chowdhary AB and Picciotto S (2021). Streamli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tax through a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Tax Cooperation Policy Brief No. 21. South Centre.
- Civil Society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Mechanism (2021). Database of Governments supporting an intergovernmental United Nations tax body and/or United Nations tax convention. Available at <https://csoforffd.org/post/database-governments-supporting-an-intergovernmental-un-tax-body-and-or-un-tax-convention/>.
- Clausing K (2016). The effect of profit shifting on the corporate tax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National Tax Journal*. 69:4.
- Eden L (1998). *Taxing Multinationals: Transfer Pricing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ation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Eden L (2022). The (not so) simple analytics of the new Amount A. *Tax Notes International* 107:16–20.
- Eden L and Smith LM (2022). The ethics of transfer pricing: Insights from the fraud triangle.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Investigative Accounting*. 14(3):360–383.
- Eyitayo-Oyesode OA (2020). Source-based taxing rights from the OECD to the United Nations model conventions: Unavailing efforts and an argument for reform. *Law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1):193–227.
- Foroohar R (2024). The White House knows that the global South has a point. *Financial Times*. 23 April.
- Garcia-Bernardo J and Janský P (2024). Profit shifting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orldwide. *World Development*. 177:106527.
- Hawkins P and Prates D (2021).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s, S[pecial] D[rawing] R[ight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nce: Can the options on the table deliver needed fiscal space? Project Policy Brief No. 10. UNCTAD.
-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Fiscal Documentation (2023). Promotion of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tax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put paper provid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 League of Nations (1923). *Report on Double Taxation Submitted to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ssion. Geneva.
- Mason R (2020).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4 (3):353–402.
- Mühlich L, Fritz B, Kring WN et al. (2020).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Tracker: Lessons for the COVID-19 crisis – lessons from a new interactive dataset. Policy Brief No. 10.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 Mühlich L, Zucker-Marques M, Fritz B et al. (2022). No one left behind? COVID-19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Paper No. 05/22. UNCTA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ccount Project.
- Mühlich L and Fritz B (2021). Borrowing pattern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Does governance play a role? *Global Policy*. 12(4):47–68.
- Mühlich L, Fritz B, Kring WN, Zucker Marques M and Gaitán, N (2024).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Tracker. Available at: <https://www.bu.edu/gdp/global-financial-safety-net-trac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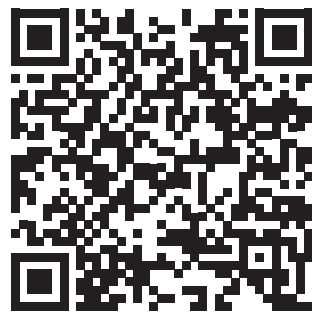
- Palan RH, Petersen H and Phillips R (2023). Arbitrage spaces in the offshore world: Layering, “fuses” and partitioning of the legal structure of modern firm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55(4):1041–1061.
- Rodrik D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New York and London.
- Ryding TM (2022). Proposal for a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ax. Discussion paper. European Network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and Global Alliance for Tax Justice.
- Torslov T, Wier L and Zucman G (2023). The missing profits of n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0(3):1499–1534.
- Travers E (2024). Why the world needs a UN global tax convention. UN News. 16 August.
- UNCTAD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5.II.D.5. Geneva).
- UNCTAD (202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2.II.D.44. Geneva).
- UNCTAD (2024).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4: Shaping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igital Futur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24.II.D.12. Geneva).
- United Nations (2023a). Reforms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Our Common Agenda. Policy Brief 6. July.
- United Nations (2023b).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launch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rogress Report.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23). Counting the Cost: defining, estimating and disseminating statistics on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in Africa. Addis Ababa.
-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23).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A/78/235.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nd UNCTAD (2020).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of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Vienna.
- Wier LS and Zucman G (2022). Global profit shifting, 1975–2019. NBER Working Paper 306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是联合国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的主要机构。

贸发会议通过就贸易和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和分析,提供技术援助,促进政府间建立共识,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公平地从全球化的经济中受益。

贸发会议现有195个成员国,是联合国系统中成员国最多的组织之一。



2024年贸易和
发展报告

